

# 布衣将军

# 卢寿

BUYI JIANGJUN LUTAO

• 韦宏孔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GUANGXI MINZU CHUBANSHE

# 布衣将军 卢焘

BUYI JIANGJUN LUTAO

韦宏孔 著

他早年参加孙中山革命，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屡立功勋……

他主掌过贵州军政大业，为人博爱、和平、仁慈……

他与朱德同窗，同情革命，支援红军

他怜悯百姓疾苦，为中国大西南的交通和经济建设呕心沥血……

他高举反蒋和抗日大旗，是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奔走呼号的壮族爱国将领

ISBN 978-7-5363-5743-3



9 787536 357433 >

定价：33.00元

● 韦宏孔 著

# 布衣将军

# 卢秉

BUYI JIANGJUN LUTAO



广西民族出版社  
GUANGXI MINZU CHU BAN SH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衣将军卢焘/韦宏孔著.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363-5743-3

I. 布… II. 韦…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036 号

布衣将军卢焘

韦宏孔 著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地址:南宁市桂春路3号 邮政编码:530028)
发行电话	(0771)5523216 5523226 传真:(0771)5523246
E-mail	CR@gxmzbook.cn
责任编辑	张丹竹 黄丹
封面设计	玉荣奖
版式设计	雨彤
责任校对	何杏华
责任印制	余秀玲
印 刷	广西新华印刷厂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87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ISBN 978-7-5363-5743-3/I·1216

定 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们!**

——作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纪念前夕题记



民国时期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卢焘上将

朱  
德

英  
雄  
不  
死  
永  
志  
人  
心

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元帅军衔，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壽慈先生

七十

為社會而犧牲先生堪拜  
仁義而肆虐大憝宜誅

楊勇陳曾固蘇振華敬挽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楊勇，上将军衔，曾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振华，上将军衔，曾任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曾固，曾任贵州省委副书记、教育部副部长

板  
固  
一  
心  
雄

薛  
強  
王  
志  
化

杜新  
2007年1月

杜新，新华通讯社广西分社原社长、高级记者，  
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经济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卢燕将军牺牲后，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给卢燕家属发来了唁电



卢焘将军亲属在慈母园卢焘将军陵墓前合影

# 序

银建军

2007年12月20日上午，宏孔兄给我送来了一大袋《布衣将军卢焘》书稿，他要我为他已花近20年时间写成的20余万字的《布》(简称，下同)一书代写序言，我真的颇感为难。因为《布》的主人公是一位为国为民捐躯的官至省长衔至上将的国家级烈士的重量级人物，要我为此书写序，我确实有点“身份不符”的感觉，但经不住宏孔兄的“嘴磨”，最终我还是答应为《布》一书写个代序，以慰含笑九泉的卢焘将军。

对于《布》的主人公卢焘将军，我并不陌生。早在十多年前，我就从不少的报刊杂志中和卢焘将军故乡人的口中，看到和听到了介绍卢焘将军爱国爱民的许多故事。为此，我还专门去了一趟将军的故乡，瞻仰了将军的故居。回来后，还就将军故居的修缮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过一些建议。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对将军的故事还是比较清晰的。这次宏孔兄送来《布》的书稿，我连用了两天时间，几乎一口气就读完了《布》的全稿。掩卷沉思，我觉得《布》让人耳目一新，它不仅写作手法新颖，思想性强，中心突出，结构严谨，而且文字通俗易懂，史料丰富，信息量大，是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完整的纪实性人物传记。宏孔兄身为基层一名普通干部，不仅工作繁忙、环境差、条件艰苦，而且又频繁调动，但他能坚持“十年磨一剑”、矢志不渝地搜集《布》的大量资料，并在其父病逝过后万分悲痛之中，及时完成了《布》浩大的写作工程任务，这实在是来之不易，其锲而不

舍的精神，可敬可佩！

卢焘将军，字寿慈，壮族，1882年农历九月初一，生于广西省宜北县五洞九伦村（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明伦镇明伦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少年时代勤奋好学，17岁府试获第一名，19岁从军，23岁成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曾在庆远、柳州一带从事秘密反清革命活动。柳州武装起义失败后，他远赴昆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与朱德、范石生等同班同学，毕业后曾在滇军历任排长、副连长、连长、大队长、支队长等职，参加过云南独立起义和援川援黔作战，功勋卓著。1904年4月，他转入黔军，曾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等职，参加过著名的护国护法战争，在湘西的麻阳等重大战役中，他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当代中国大文学家沈从文在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许多作品中，多处提到的并非常崇拜的高级将领之一。1921年，他40岁奉孙中山大总统令任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领衔陆军上将，42岁任大总统府高等顾问和高级参谋。他为人正直，勤政廉洁，待人忠厚，平易近人，治省有方，治军严谨，深得当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1924年引退后，他致力于西南交通建设和经济发展，开修了贵州历史上的第一条公路和购买了贵州的第一辆汽车；为了避免战乱，他还经常奔走各省调停各路军阀，成功地制止了多起混战，使百姓免遭涂炭之灾；为了支援革命，他还嘱其盟友范石生给驻扎在湘南的朱德八一南昌起义部队予以军火等支援，同时他还两次营救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使红色的革命火种得以发展壮大；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呼吁团结，反对内战，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并亲赴江苏、安徽、河南、山东等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他看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多次拒绝蒋介石委任他为湖南省主席兼第四路军总指挥等高官；尽管他晚年无一官半职，但他依然为民请命，热心为民办事，热爱公益事业，为桑梓造福。他一生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刚正不阿。1949年11月，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国民党反动政府迅速溃退、贵阳出现权力真空的危急关头时，为了稳定贵阳

局势，维护社会治安，迎接解放，时年已 68 岁高龄的卢焘将军，竟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出任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讵料，在距贵阳解放只有半天的 1949 年 11 月 14 日清晨，卢焘将军竟遭国民党 89 军反动军长刘伯龙杀害。

据陶朱问《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最新披露，蒋介石在国民党准备撤离大陆前夕，命令军统最后暗杀宋庆龄等 87 位爱国民主人士，其中卢焘将军被列入“黑名单”的第 50 位，可见卢焘将军被害不是偶然的、而是纯属意料之中。

卢焘将军牺牲后，贵阳市立即成立了由 276 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前来参加悼念活动的各界群众达 5 万多人，国内外各界人士所送的唁电、挽联、挽诗、挽词多达 410 多帧。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李济深给将军的家属发来了唁电，朱德总司令还给卢焘将军题写了“英雄不死，永志人心”的挽词，时任五兵团政委、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五兵团司令员、贵州省主席杨勇，副主席陈曾固，西南军事联络员陈又新，贵阳市委书记兼市长秦天真等领导，亲自参加了悼念活动并题写了挽联。50 多年来，党和人民也对卢焘将军予以很高的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已追认卢焘将军为国家级烈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也确立卢寿将军为中央立传烈士。贵州、广西两地为了纪念卢焘将军，还在将军的遇难地修建了烈士纪念亭，在他的旧居建起了烈士陈列馆，在他的墓地建起了烈士陵园，在他的家乡建起了纪念亭和安放了雕像，同时还编辑出版了怀念他的 5 本文集，拍摄了他的电视专题片和电视连续剧 3 部及绘编了他的连环画册等，卢焘将军爱国爱民为国捐躯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后人奋勇前进，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卢焘将军是我国一位知名的爱国将领之一，他虽然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者，但他思想进步，从反清活动、到辛亥革命独立起义，到护国护法战争，到主掌贵州军政大权，到支持孙中山北伐革命，到引退后致力于西南交通建设，到调停各路军阀，到反对蒋介石、到

支援红军，到支持抗日，到关心进步革命青年，到造福桑梓，到为国捐躯等，处处都体现了他反帝反封、淡薄名利、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爱国爱民的革命思想，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高尚品德和风范。我想，我们今天纪念卢焘将军，第一，要学习卢焘将军爱国、爱民的伟大思想，一个人要时时以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为重，不管你官多大，也不管你多富有，都应该具有一种“大地情怀”和“草根意识”，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生长你的这块土地，不能忘记养育你的人民，尽其所能，为人民造福。第二，要学习卢焘将军处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卢焘将军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面对高官厚禄、名利诱惑，都能恪守优秀传统道德，不为所动。在今天的商品经济大潮中，对每个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要像卢焘将军那样，耐得住平凡，耐得住寂寞，始终保持心中的一块净土。第三，要学习卢焘将军脚踏实地，坚韧不拔地为理想而奋斗的勇敢精神。卢焘将军虽然出身贫寒，但他从小就怀抱不凡志向，从青年时代起就为追求革命、追求光明、追求社会平等和谐而不辞劳苦，直至献出宝贵生命。他的一生虽然道路坎坷，但他却走得非常坚定。在他身上我们得到一种启示，那就是“出生不由己，事业任努力”，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要自卑，更不要妄自菲薄，只要刻苦勤奋，开拓进取，人生的理想就会逐步得到实现。所以，宏孔兄所写的《布》是有着历史和现实的意义的。《布》的出版不仅对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作出有益的贡献，而且也丰富了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的内容和教材。我们要通过缅怀像卢焘将军等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来激发大家爱国爱乡的革命豪情，为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共同奋斗！

愿卢焘将军高风常在，浩气长存！

是为序。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作者系广西河池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 心 愿

覃栋梁

2008年夏间,我从北京南下广州、深圳、柳州、贵阳等地,小住月余。6月中旬,在柳期间,专程从环江到柳看望我的弟弟覃栋云,他说,同乡晚辈韦君宏孔同志,利用近20年,为先外祖父卢焘烈士写了一本书,最近将要出版,想要我代表烈士亲属审阅过目。鉴于当时的时间安排紧迫,我当即与宏孔君电话相约,将书稿校样用快件邮寄北京给我。6月25日中午,当我从贵阳飞抵北京回到家中时,三女儿就把宏孔君于前日寄到的快件大包,送到我的书桌案头,顾不上休息,我就打开包裹,300多页的《布衣将军卢焘》一书全稿,跃然面前,闻着一股股清纯的墨香味,我不禁心潮澎湃,百感交集,热泪盈眶……

我是卢焘烈士的长外孙,1930年出生在贵阳,自幼在先外祖父卢焘烈士的身边长大,先外祖父的言行、品德和爱国爱民的风范,我记忆犹新。先外祖父虽然在旧中国担任过许多高官要职,但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从不为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时时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出发,直到距离贵阳解放仅12小时,他还履行了当年加入孙中山先生“同盟会”时之誓言,为建设民主、富强之新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不愧为让他的同学朱德元帅,在他牺牲后送给他的挽词评价那样“英雄不死,永志人心”!

我与宏孔君相识是在20年前,那是1987年11月,我与先外祖父的长子卢慈仪、七女卢慈和等卢焘烈士亲属共12人,应家乡广西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成立庆典邀请,回乡参加庆祝活动。时任县委宣传部新闻记者宏孔君,当时还是一位20来岁的年轻小伙子,他为人热情、礼貌、机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县里安排,他自始至终负责我们一行的接待工作。记得在老家明伦镇参观时,他还为我们照了许多相,后来又亲自寄给我分发和写信,他的信函至今我仍保存呢!然而,时间就像时代的列车一样过得飞快,转眼又20年过去了,在我颐养天年之际,真没想到又一次与宏孔君在电话和书稿中相遇了,真是有缘于为国为民捐躯的先外祖父卢焘烈士啊!

收到《布衣将军卢焘》书稿后,我连用了六天时间,几乎一字不漏地通读了两遍。全书层次结构严谨,语言流畅朴实,手法巧妙新颖,内容细致丰富,许多信息和事件及情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全书处处充分体现了宏孔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以及对历史求真求实的作风,作为卢焘烈士的亲属,我认为这是一部迄今为止记录反映卢焘烈士整个人生历程最系统、最全面、最完整的不可多得的好传记。

宏孔君矢志20载,奔走数省,查阅资料数百,访问知情老人数十位,摘录笔记数万,锲而不舍,奋笔疾书,终于完成了《布衣将军卢焘》一书全稿26万余字的浩大工程,真是令人敬佩!在当代的中国文坛上实属难得!在此,我特向宏孔君深表谢意!

宏孔君历经艰辛,不辞劳苦,20年如一日,为《布衣将军卢焘》一书写作操劳奔波,已代我们海内外的亲属们完成了心愿,我们已感慰矣!卢焘烈士在天之灵也亦感慰矣!

最后,谨让我代表卢焘烈士的亲属们,再次感谢《布衣将军卢焘》一书的作者韦宏孔君,以及向关心、支持此书出版发行的同志和读者表示谢意!

2008年7月8日北京奥运会前夕于北京宝星园F座家中

(作者系广西柳州市东风化工总厂退休工程师)

# 目 录

## 引子 / 1

###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 1 出身乡邑,家门贫寒 / 2
- 2 乡人反清起义,襁褓中流离他乡 / 5
- 3 借米不成,薯叶当饭 / 10
- 4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 11
- 5 聪敏过人,深得喜爱 / 13
- 6 效仿英雄,发奋读书 / 14

### 第二章 少年壮志,初露智勇奇才

- 1 远赴庆远求学,成绩出类拔萃,府试夺取“状元”桂冠 / 17
- 2 巧治纨绔子弟,击溃象城劫匪 / 23
- 3 灭莫团总威风,长众乡亲志气 / 24

### 第三章 投笔从戎

- 1 两次放弃轻松工作,匆忙回家订婚 / 26
- 2 远赴桂林开始军旅生涯,实现多年当兵夙愿 / 28
- 3 郭姐夫柳州升官,小内弟倾力相助 / 30

### 第四章 天有不测风云,家事国事悲喜交织

- 1 遭诬陷被撤职,姐夫百口难辩 / 32

- 2 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姐夫离人世 / 33
- 3 遵照母命,卢焘迎娶覃清德 / 34
- 4 大股游勇扰境,携妻母潜居庆远 / 34

## **第五章 与张铁城共谋大事,走上革命道路**

- 1 世道艰难,赴柳州再次从军 / 36
- 2 遇志士张铁城,在庆远投身革命 / 37
- 3 创办怀远半夜算术科,开设龙岸竞化学堂 / 39
- 4 辞去军职,一心革命 / 40
- 5 义士齐聚会,密商到港购武器 / 41
- 6 密运武器返途被查,几义士潜逃广州 / 42
- 7 环境险恶,各奔南北 / 44
- 8 南宁无法立足,再择龙州进发 / 45
- 9 龙州化险为夷,从此更名“卢焘” / 48
- 10 街头联手卖对联,寻找人生出路 / 50

## **第六章 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与朱德同班**

- 1 云南从军考入随营学堂 / 52
- 2 荣幸进入“尖子班”,与朱德等同班 / 54
- 3 秘密传播革命思想,与朱德等同学歃血金兰 / 57
- 4 记忆超人,品学兼优,深受校长教官器重 / 60
- 5 参加云南“重九”独立起义,荣获“二等功臣” / 62

## **第七章 奉命援川,促其反正独立**

- 1 响应号召援川,升为后队队官 / 69
- 2 古蔺人民央求部队不走,卢队官假借演习离开 / 70
- 3 轻取合江,可笑黄大队长拉郎配 / 71
- 4 克泸州,卢焘名声大震,杨杰嫉妒报复 / 72

## **第八章 奉调援黔剿匪**

- 1 野猫溪治恶,平定有功直升大队长 / 75
- 2 奉命黔东剿匪,感化土匪改邪归正 / 77

## **第九章 大理平乱,奉命率队回滇支援**

- 1 慈母忧儿贪枉财,孝儿耐释终消母虑 / 82
- 2 平定“大理事件”,避乱返回柳州 / 84

## **第十章 转入黔军**

- 1 刘显世电邀来黔襄助,卢焘思考再三终答应 / 86
- 2 宣传“新派”思想,成立贵州模范营 / 89

## **第十一章 参加讨袁护国战争**

- 1 袁世凯称帝,云南护国军兴 / 92
- 2 彭文治叛逃,卢焘临危受命 / 97
- 3 与强敌马继增相持在麻阳 / 100
- 4 激战三昼夜,勇黔军攻克麻阳 / 103
- 5 敌军二次反扑,护国军乘胜追击 / 106

## **第十二章 参加护法战争**

- 1 护法军兴,又师次湘西 / 111
- 2 爱护官兵,慎理疑案 / 119
- 3 遭遇冯玉祥,鏖战番龙坳,三战三捷 / 122
- 4 与冯玉祥商议“剿匪保商,安境息民” / 124
- 5 母亲寿辰不收礼,奉调湘西地方告留 / 126

## **第十三章 奉命代理黔军总司令**

- 1 高层内部现裂痕,急赴渝稳定黔军 / 129
- 2 “民九事变”纷繁复杂,镇定自若巧妙平定 / 136

## **第十四章 出任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

- 1 公推出任黔军总司令兼省长 / 144
- 2 王文华被刺，“五旅相争” / 148
- 3 实行“联川防滇”战略，确保贵州稳定 / 151
- 4 协调各方，维持残局 / 152
- 5 宣布自治，振兴经济 / 154
- 6 派兵援桂，改造广西 / 159
- 7 家乡力邀回桂主持军政大业，林俊廷率三万饥军来黔投奔 / 161
- 8 不要厚禄，不建公馆，不娶姨太 / 162

## **第十五章 “定黔军”回黔夺取政权**

- 1 “定黔军”，袁祖铭伺机报复 / 166
- 2 不甘弱势，刘显世积极“复黔” / 168
- 3 力避战祸，交出省长大权 / 171

## **第十六章 支持北伐，统率黔滇大军挥师南下**

- 1 德高望重，公推就任黔滇联军总司令 / 173
- 2 浩荡南下，攻克广西重镇——柳州 / 173
- 3 北上桂林，晋谒大总统孙中山 / 174
- 4 意见不一，黔滇联军分道扬镳 / 175
- 5 就任滇黔桂联军总司令 / 176
- 6 陈述北伐要领，争取各方支持 / 177
- 7 协助范石生击退李易标部，并将陈炯明逐出广州 / 179
- 8 三次婉拒大本营北伐革命总司令要职 / 182

## **第十七章 地道大孝子**

- 1 惊悉母逝，几千里外奔丧 / 183
- 2 守制3年，辞去一切高官，众称“大孝子” / 184

- 3 滇黔军阀兵戎相见,大孝子从中斡旋 / 187
- 4 亲率黔军两旅师次独山,周西成省长赠地修建“慈母园” / 190

## **第十八章 致力黔桂两省交通建设**

- 1 巧支袁祖铭北伐,为建设贵州奠定基础 / 195
- 2 贵州的第一条公路和第一辆汽车 / 198
- 3 中国大西南铁路的第一个筹建者 / 203

## **第十九章 三度赴邕调停,化解蒋桂“六一”矛盾**

- 1 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三封紧急电报 / 204
- 2 以第三者身份出席广西最高军事会议,陈述化解矛盾的关键和意义 / 205
- 3 “六一”事变前夕的贵州形势 / 207
- 4 组建和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于南丹,保卫家乡广西 / 209
- 5 蒋桂和谈,救国军解散复员 / 213
- 6 复员为民,淡泊世事 / 215

## **第二十章 抗日民族意识强烈,渴望和平统一**

- 1 捐款支援十九路军,赴安徽等地慰问抗日将士 / 218
- 2 闲居仍关注国事,计划力劝李宗仁进行和平统一祖国大业 / 220

## **第二十一章 推动黔、桂、粤长期合作**

- 1 保持互访,加强联系 / 223
- 2 互不侵犯,互相支持 / 227
- 3 长期合作,互惠互利 / 228

## **第二十二章 同情革命,支援红军,向往延安,爱护进步青年**

- 1 两次营救韦拔群,痛惜革命者 / 229
- 2 支援红军,接济朱德 / 231
- 3 三次想赴延安找朱德 / 232

- 4 关心爱护进步青少年 / 235
- 5 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自食其力 / 240

## **第二十三章 造福桑梓,创办学校,兴办农林场,关心地方政治**

- 1 建议修整白龙洞 / 243
- 2 创办贵阳两广中学 / 244
- 3 关心广西省立十一中 / 245
- 4 兴办农林场 / 246
- 5 关心地方文化 / 247
- 6 关心地方政治,为地方人民说话 / 248

## **第二十四章 晚年生活平淡,怜悯民众疾苦**

- 1 生活简朴,乐于助人 / 250
- 2 不搞生日祝寿,不收受节日礼物 / 252
- 3 水庙题联,与家人同乐 / 254
- 4 外出走访,联络老友吟诗自娱 / 255
- 5 帮助农民争水 / 258
- 6 为桑梓请命,减免家乡粮税 / 258
- 7 不用公车,与民同车 / 259

## **第二十五章 回到阔别 42 年的家乡探亲**

- 1 家乡人民万人十里相迎,盛况空前 / 261
- 2 连喝三捧家乡的甘泉水 / 265
- 3 在县政府举行欢迎会上的讲话 / 266
- 4 走亲访友,家乡处处标语对联欢迎 / 268
- 5 题诗龙潭 / 271

## **第二十六章 始终不为蒋介石所利用**

- 1 拒任湖南省主席兼第四路军总指挥 / 273

2 两次拒蒋接见 / 274

## **第二十七章 为国为民捐躯贵阳**

- 1 两次秘密接触中共地下党组织 / 276
- 2 山雨欲来,大西南岌岌可危 / 282
- 3 谷正伦突访“半日山庄” / 283
- 4 毅然出任贵阳市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 / 286
- 5 血染贵阳大地,长眠贵州高原 / 294
- 6 惨遭杀害,举世悲痛 / 301

## **第二十八章 罪魁祸首刘伯龙的可耻下场**

- 1 刘伯龙其人 / 313
- 2 谷正伦、韩文焕与刘伯龙的矛盾 / 315
- 3 恶有恶报,省长杀军长,以平民愤 / 318
- 4 剑子手刘伯龙的幕后操纵者 / 322

**附文:**一、卢焘《简明年谱》遗稿 / 325

**二、卢焘将军手书选载 / 332**

**三、参考文献 / 334**

**尾语 / 336**

## 引子

2003年11月上旬,由中央电视台、贵州电视台联合录制的七集电视连续剧《喋血黎明》在央视八套热播,一时间在国内外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该剧再现了以曾在护国护法和北伐战争中驰骋滇、黔、川、渝、湘、桂、粤7省,屡立战功,后任黔军总司令、贵州省省长、孙中山总统大本营高等顾问和高级参谋、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等职,领衔国民党陆军上将卢焘先生为原型的主人公,在贵阳解放前夕的紧要关头,为了全市免遭国民党反动派“三光”政策的破坏,保护国家和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毅然出任贵阳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带领全市人民卓有成效地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

然而,1949年11月,正当贵阳市30万人民准备于15日载歌载舞迎接解放军进城欢呼解放时,时年已68岁高龄的卢焘将军却在14日早晨,被蒋介石亲信、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骗到郊外杀害。

全剧故事内容丰富,情节生动,震撼人心,催人泪下……

## 第一章

# 苦难的童年

### 1 出身乡邑，家门贫寒

卢焘原名卢启焘，号亮畴，后改名卢焘，号寿慈。1882年(光绪八年)农历九月初一，生于广西宜北县五洞九伦村(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明伦镇明伦街)一个贫寒的壮族农民家庭。在卢焘出生后的第三天，按照做“三朝”的古老习俗，卢家请了族人和邻里吃饭。卢焘的族兄卢楚材来了，他是村里出名的饱学之士，又是私塾先生，颇有声望。卢焘的父亲卢泰留请卢楚材给孩子起个名字，卢楚材想都不想就按卢家的班辈字谱，给卢焘起了个乳名叫海湖，意为孩子长大后以五湖四海为家，并能做出一番大事业。



今日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城全景

宜北县地处广西西北部，系云贵高原东南山麓余脉，东南面与广西融水、天河、思恩相邻，西北面与贵州荔波、从江相接，境内有绵延数百里的九万大山横贯东北，全境 2500 多平方公里，多为山地，沟壑纵横，山路崎岖，平原极少，一年四季分明，属高原气候。农业以种植稻谷为主，盛产香糯、香梗米及香猪、香鸭、香菇等，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有煤、铁、铅、锌等。该县唐时属于抚水州多蓬县，明、清时属思恩县。1904 年，清政府在这里设立安化理苗抚民分府，次年改为安化厅，1913 年改为宜北县，辖城厢（今明伦）、中和（今吉祥）、治安（今龙岩）、崇兴（今东兴）、道安（今永安）、驯乐六乡，当时全县人口不足 3 万人，是广西清末民初人口较小的边远山区县之一。宜北县政府所在地为城厢乡九伦村，今为明伦镇明伦街。城厢乡地处全县之中心，这里重峦叠嶂，奇峰突兀，田洞相连，水草丰美，山川秀丽，人称“小桂林”。而九伦村则居于该乡西北角，全村四周群山环抱，风景更加秀美，村前有十余丈高，状似平顶宝塔的翠微山，以及三座“品”字形摆开的岸架山，同时还有两条弯弯



宜北龙潭风光



明伦境内“将军山”风光

曲曲的小河分别绕过翠微山及岸架山，日夜流金淌银似的由西向东而去，当两条小河交汇于麒麟山下时，突然穿岩泻入数丈深谷，形成瀑布。谷底就是深不可测的龙潭，瀑布日夜声若雷鸣，声闻数里，是宜北地区的名胜之一。村东有状似凤凰起舞的凤凰山，村西有似谷仓的小仓山，村后有巍巍的昆仑山和小巧的狮子山并排相连，昆仑山上三峰鼎立，形似一把交椅。卢焘的家就座落在这两山脚下，屋后的山边还有一口清澈的泉水。相传这是一块风水宝地。

九伦村所在的宜北县，历史上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在卢焘之前，这里就曾涌现过官至云南省布库大使的卢式慎、反清起义农民领袖莫梦弼、著名诗人韦继新等历史风流人物。

卢焘的卢姓家族是宜北县的望族，于汉朝末年由山东济南府迁来，祖上世有科名。卢焘的父亲卢泰留，兄弟三人，祖辈世代耕农，卢泰留是一位粗识文字的老实厚道的农民；母亲莫氏，略知文墨，为人贤惠，勤俭持家。全家的家产只有祖父卢日明早年去世时留下的三间破瓦房和三亩多薄田。

## 2 乡人反清起义，襁褓中流离他乡

卢焘上有两个姐姐，大姐比他大 13 岁，二姐约 7 岁时病逝。卢焘是家中的独子，也是父亲卢泰留 40 岁时才喜得的贵子，因此，深得全家人的宠爱。卢焘 1 岁时，正值隔壁才院村革生莫梦弼发动反清农民武装起义。

据卢峰、莫争荣两位老人回忆和《清实录》广西资料辑录记载：那是 1881 年（光绪六年）秋，革生毕业并很有才学的莫梦弼，本来可以谋得一官半职，但他不愿沉沦于清政府那腐败的官场之中，此前也曾多次与同学或友人议论清廷的腐败，时常流露出反清除害的英雄气概。于是，毕业后他就到恩思县城卢丹成（邻村才西团总）与葛之泰合办的铁锅厂当文书糊口，等待时机。但到职不久，姓葛的却要梦弼交 50 到 100 块银元做股东，才能长期任职。逼得莫梦弼只好向乡人卢丹成求借。按当时的借贷规矩，莫必须先托中间人向债主送礼、办酒席，才能立契成交。加上乡俗，礼物都要以送二三十斤重的香猪为主。因为家穷，莫梦弼东挪西借，好不容易才凑到钱，买了一个仅有十多斤重的香猪托中间人送去给卢丹成，卢嫌猪小礼薄，对他不尊敬，便连猪带笼甩出大门外面的鱼塘里，莫借贷不成，无钱入股，最后被解除了文书职务。丢了饭碗，又欠了一身债，走投无路，这一切都迫使他加深了对那些为富不仁的恶棍的愤恨。1882 年春，在他离厂不久之后，便串联了一帮穷兄弟，包围了卢丹成家，鸣枪以示警告，接着又下恩思袭击铁锅厂。同时向官府揭发卢、葛偷税瞒税的勾当。弄得卢、葛胆战心惊，惶惶不安，于是联名诬告莫梦弼为匪作乱。由于莫梦弼财权都亚于对手，最后在卢、葛的重贿之下，1882 年冬官府将莫逮捕入狱。1883 年春，莫梦弼的挚友、吉祥村的蒙有对，仗义疏财，为了救出朋友，东筹西借，

遂设法买通了狱吏，几经周折才将莫梦弼保释出狱。

莫梦弼出狱后，感到冤屈难消，决心一定要报此仇。可是报仇又无钱，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队伍，揭竿而起，铲除贪官污吏及恶霸豪绅。大约在1883年春夏间，莫梦弼与蒙有对、莫梦葵（莫梦弼之弟）等，打出了“反清复明”和“穷是我兄弟，富是我冤仇”的口号，先后在宜北、罗城、宜山、天河、恩思、南丹及贵州的荔波、从江、榕江等州县串联，结识了一大批反清的仁人志士。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黔桂九县的四五千名壮、汉、苗、瑶族青年自愿带枪带粮带钱来到宜北县才院村投奔莫梦弼，其声势之浩大，威震黔南桂北。

1883年冬，莫梦弼以本才院村为大本营（才院村地处险要，四周群山环抱进退各仅一路，屯中平地数里），一面对义军进行操练，一面派队周游各县张贴告示，勒令地方富豪充实粮饷，深得穷苦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告示文曰：

盖闻范叔得时，不弃仇而忘志。深山聚义，锄杰以诛贪。余清贫自守，一介寒孩，屡被奸贼恃富欺贫，视书无人，联名妄告，贿赂官府，以通豪绅。谢、李二人，贫其财而革职。黄汤诸老，受其愚而忘生。余守法皋监，幸荷营遁，得以报仇。招兵买马，铲灭豪强，既理直而气壮，自人从而众多。迄今该诬告如瓮中之鳖，不日授首。惊弓之鸟，无处栖身。所有四十八绅士，不念斯文，联名诬告余在案，情实艰难。余不日来到上额下额地方，质问诸人之罪，以吐不平之事。务望亲戚朋友，各自安家，财物妻女，匿之为严。柴米油盐，勿藏大尽，使余能充五日十日之资。自此以后，或辞故土，或建新邦，桑梓之恩，自当铭刻。倘能卖刀买牛，得享太平之福，修文偃武，永绝奸佞之徒，岂不美哉！

一天，莫梦弼在出营巡视义军操练望见村前天马山时，随口即诗一首：“青峰屹立异群山，状似奇骝不一般；终古扬鞭飞电闪，四时佩韁绿苔斑；秋风响云嘶何壮，春雨淋漓汗自沾；天马有灵能应变，骑行千里入京关。”这首诗充分表达了莫梦弼当时反清天马行

空的激昂豪情和雄心壮志。

经过一段时间的操练，莫梦弼看到各项工作已安排就绪，认为时机已成熟，即自封为“顺德王”，其他仁人志士，均按功劳和能力封官拜将。

1884年元月春节前夕，莫在才院村打起“顺德王”的旗号，在辕门贴上“炮响动地惊天，胡子闻声丧胆；旗开遮云蔽日，黎民引领归心”的大联。三声炮响，宣布起义，并发布了讨清檄文。这一天，才院村一片欢腾，热闹非凡。

文曰：“盖闻帝王崛起，发于畎亩孔多。豪杰迭兴，出自布衣者不少。是故，高王以亭长兴兵，洪武以牧牛起义，开汉四百年之基业，成明十七代之山河。上观往古，下察来今，唯恐无虎贲之臣，何患无龙飞之日。孤自少攻书，及长肄业。芹花曾采于黉宫，丹桂未拔于月窟。自笑汉家臣子，反蒙胡虏冠裳。揆诸天理，其何以顺？叩诸人情，其何以安？况乎谢令不仁，残民以逞，清廷无道，暴政肆虐。华夏坐于涂炭，盖亦有年。中原困于倒悬，殆非一日。孤目不忍见，耳不忍闻。反清复明之计早成，变夷用夏之行未就。复思，不大困者不大亨，不奇穷者不奇达。且被葛姓之捏成，受贪官之屈辱。仰伏皇天保佑，泥马渡河。全凭列祖威灵，白光引路，岂非命也，信是天乎？现今坐才院之村，无异咸阳巩固。守连天之隘，何殊剑阁崎岖。策士谋臣，如云如雨。惯战能征，动云几百。荷戈负戟，何止数千。天与人归，神推鬼助。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蠢矣谢保年，临下里而魂飞天外。野哉吴景亮，过中州而魄散空中。没有葵阳之力，难舞关圣之刀。孤粮已足而兵已精，谋已成而事已举。不日兵攻桂岭，马渡环江。凡属萍乡，毕究葭莩之谊。乃苦梓里，分明瓜葛之亲。如列谋功之辈，同具攻城，定加奖赏。务农安分之家，谕其迴避，免受惊恐。先此晓谕，咸使闻之，钦哉，勉之！”

檄文发出以后不出几天，莫的义军就分成两个纵队人马，威威武武开出才院，一路经吉祥、八面、柳平、马口洞、大安，由陆路挺进

思恩县城；一路经龙岩、东兴、长美、安马，由水路挺进桂西北重镇怀远，直接威逼庆远府（今宜州市）。两路义军犹如猛虎下山，沿途打富济贫，弄得地方豪绅 48 人（原联名诬告莫的人）纷纷告急，府衙也惊恐万状，不敢轻举妄动。经过多次军事会议，才派兵出城应付，但清兵哪能抵挡得住。一面退兵回城固守，一面向省院告急，省院又向清廷皇帝奏请。清廷命两广总督张树声严查，广西巡抚潘鼎新立即派遣臬司李秉衡带省防军到思恩、怀远查办，同时清廷又调湘军苏元春部增援。1884 年 4 月下旬，义军一纵队在思恩县城附近与清兵打了几仗，双方都有伤亡，特别是清军伤亡较大。义军虽然武器低劣，但唯赖万众一心，与敌拼搏，初获大胜。然而，最终土枪抵不过洋枪，加之清军人多又训练有素，后面的几仗，莫梦弼只好下令两线义军全线撤退至马口洞一带据险固守。相持数日，清军表面虽毫无进展，但他们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绕道中瓦村登可墨屯进行背击。莫梦弼见势不利，于是又下令义军退至中河桥（现英豪村）西岸布防，清军得知义军撤退，便分两路尾追，苏元春部向马口洞挺进，李秉衡部由洛阳永安、永权包抄过来。当时正遇大雨，河水暴涨，清军一到只能望河兴叹。农历四月初八，天刚转晴，日晕重轮，五彩纷呈，颇为壮观。中午，苏元春下令攻击，双方隔河对垒交战，枪声大作，杀声震天。义军凭借地形熟悉，扼守要害，居高临下，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湘军仍过不了河。此时，莫梦弼本想转守为攻，待河水退下后，强渡中河，一鼓作气，消灭敌军。但正在这个时候，莫梦弼得到了清兵从永安方向包抄援兵将到的消息。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只好又下令往后撤退到才帛村牙洞屯伏兵险关防御。但刚布防不久，清军又已逼近，莫自忖部队连日作战，士兵已劳累过度，不宜再正面作战，于是又将部队转移到翠山村的下帮、独山一带，后又转回大本营才院布防。才院地形险要，进可攻，退可守。

1884 年 6 月 23 日（农历五月初一），清军省、湘两支部队进逼才院外围，作围攻的部署，同时一面派兵以莫之名，在乡村四处掳

掠；一面重赏通缉莫梦弼，企图瓦解义军内部和挑拨义军与百姓的关系。由于莫梦弼反清态度坚决，官兵关系好，所以军心自然稳定。他本来可凭借才院“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整顿固守，但考虑到才院致命的弱点是活动范围太小，武器、粮草、兵源都有困难，不利久战。于是决定放弃才院，利用小路夜间悄悄带兵转入驯乐，向贵州荔波、从江、榕江一带进发，并准备与当地的反清首领杨嘉贞、潘开文等联络，力图在那里站稳脚跟，东山再起。

然而，哪知清廷早已命令贵州巡抚李用清剿办。李用清即命都匀、黎平知府，荔波知县及荔波营游击王恩贵、下江通判姚善澎防堵。同时又调分统清江协副刘青煦前赴荔属与广西毗连的地方，会同平远营练军管带王佳成，上江营练军管带邱俊书分扼要隘防剿。此时，莫梦弼与义军已在清军四面包围之中，形势十分严峻。面对如此困境，他只好命令义军化整为零，开展分散的游击作战。

1884年7月9日，由于军师罗寿山叛变投降清军，自称“顺德王”的义军领袖莫梦弼，就这样在贵州从江县长寨村被众多的清兵擒获。莫梦弼、韦家祥等其他义军领袖，虽然奋不顾身率得少量义军乘夜冲出重围，但由于群龙无首，他们也只坚持到年底便全军覆没了。这场前后历时近3年的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才院村“顺德王”反清农民武装起义，就这样在叛徒的出卖下宣告失败了。

三年的战乱，给当时的宜北及周边地区带来了深重灾难，广大老百姓颠沛流离、妻离子散，有田无人耕，有家不能回。卢焘的家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莫梦弼反清农民武装起义爆发的时候，卢焘刚刚1岁，父亲被迫为清军作向导，母亲带着襁褓中的他和两个姐姐，连夜逃到龙岩的那平村亲戚家中避难。母亲靠帮村上人家做些针线活为生，13岁的大姐，小小年纪就要去帮亲戚家做农活。卢焘一家四口在亲戚家约住了半年后，看见亲戚家的生活也十分困难，于是就搬到村边的一个岩洞里去住，这一住就是两年多。岩洞靠近

小河边，蚊虫多，又潮湿，一家人一年到头，不但吃不饱穿不暖，而且落得个个生病。由于缺医少药，二姐在7岁那年，因长期疟疾和饥饿，不幸病死在岩洞里。从此，在卢焘幼小的心灵中似乎领悟了母亲的艰辛，贫困的悲惨和战乱的可恶。直到1885年春，战乱平息后，在清军中被迫当了三年向导的父亲，才回到那平村，终于把一家老少带回了九伦村老家。

### 3 借米不成，薯叶当饭

从那平村回到老家，一家人看到三间老屋已摇摇欲坠，破烂不堪，都不由得潸然泪下。父亲一面找亲戚帮忙修整房子，一面组织耕作。他借种子，借耕牛，没有肥料就上山烧草木灰当肥料，没有钱请工就以工钱换工钱解决。尽管异常辛勤和努力，但由于丢荒时间长，地力瘦，加上流落他乡时间长，家底薄，回乡后头两年家里所种的粮食产量低，常常是一年口粮只够全家吃半年，五黄六月揭不开锅是常事。卢焘6岁那年的“七月七”（宜北地区的小节），那天家里的玉米刚好吃完，母亲把卢焘拉到怀里，贴近他的耳朵，边指边说：“小湖（乳名卢海湖），你去邻居家借几筒米回来，娘去地里搞点嫩红薯叶来掺着煮稀饭过节。”将出门，娘又叮嘱说：“碰见公老才问，讲小声点，不要给别人听见为好。”“嗯！嗯！”卢焘边答边走出家门。

卢焘一进邻居家门，正好只有公老一个人在家，他悄悄地跟公老说明了来意。公老是个好心人，立即量了几斤大米给他，卢焘高兴地连说几声“多谢公公！多谢公公！”便回转了，心想，今天可过个好节啦！谁知道，刚下到楼梯角，就碰见奶老回来了，奶老见卢焘提着一只竹饭兜，便抢着打开来看，见里面装着大米，脸便一沉。卢焘心慌了，忙说：“这是公老借给我的。”奶老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拉进屋，指着公老的鼻子骂道：“老不死的，你借米给他，明天他拿什么还给你？”接着从卢焘的小手里夺过竹饭兜拿到米缸倒个精光，

把饭兜甩在地上。卢焘只好拾起空兜抹着眼泪回家，娘见卢焘满脸泪痕，知道借不到米，娘儿俩搂着哭泣。娘说：“穷人家就是这样受气，你长大后，要争气，要记得苦日子是怎么过啊！”从此，卢焘幼小的心灵就深深地铭记着这苦难的日子。卢焘当官后，乡亲们到贵阳话旧时，他曾诙谐地说：“以前七月七，摘薯叶来吃；现在七月七，我们且安居。”后来，有人把卢焘的这句话编成壮族山歌教育后人，至今仍广泛流传于宜北地区。

对于不肯借米的奶老，卢焘认为，奶老的作为只是代表旧时少数妇女一时的浅见，对此他一点也不记怨恨。后来，这位奶老的舅舅去贵阳找工作时，卢焘还是量才适用，可见卢焘胸怀是多么的坦荡啊！

#### 4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卢焘大约6岁半左右，大姐便出嫁了。姐夫郭礼轩是当年父亲所在湘军的一名下级军官，时正随部队驻守宜北。郭系江西人氏，行伍出身，早年投入湘军苏元春部，历任排长、副队官、队官等职。大姐出嫁后，劳力少了，家里的困难不言而喻，别人家六七岁的小孩或高高兴兴去私塾念书，或仍在母亲的怀里撒娇。可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小年纪的卢焘，因家庭困难所迫，在7岁的时候就开始分担家务事了。上山砍柴，下河捕鱼，放牛喂猪，几乎样样都做。一天，卢焘随父亲到村后的昆仑山上打柴，父亲用手指着西北方向问卢焘：“哥呀（方言，对爱子的昵称），你知道那边有个很出名的村吗？”卢焘答说不知道，父亲接着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那个很出名的村叫才院村，以前村里有个很有名的人叫莫梦弼。”卢焘仰起小脸，凝神望着他父亲问：“莫梦弼为什么出名呢？”

父亲感叹地对卢焘说：“那年你刚出生，他在外乡一个姓葛开办的一个铁锅厂里打工，后来发生矛盾，姓葛的有钱，买通官府带

兵来镇压他，可是他有理，不怕别人有钱有势，组织几千人和官府对抗。”父亲说到这里，语气更加深沉。卢焘也听得入神。“后来因为莫梦弼的义军所用的武器太差了，被官军打败了，他也被官军杀害了！”

接着父亲又唱着当地的罗嗨山歌：“绿头苍蝇眼盯屎，官府见钱不讲理；判案不问青和白，带兵镇压莫梦弼……”歌声在树林里悠悠地飘荡，在卢焘幼小的心灵里燃起了愤怒的火苗。听完歌后，卢焘咬着牙，用柴刀砍着前面的一棵小树：“有钱人和官府好惹人恨的！”

父子俩打得柴火，挑去卖给财主。为了早点回家多干点其他活路，到财主家后，父亲就让卢焘在后面称柴收钱。可是卢焘拿钱回家交给父亲时，见只有一毫元，父亲就发怒地问他：“还有的你拿到哪里去了？”卢焘说：“没有了呀，卖柴的钱全在这里了哦，刚才老爷不是给一块银元吗？”父亲立刻大呼起来说：“上当了，别人拿一毫当一元给我们了。老爷欺负你小孩不识字啊！”卢焘觉得头大了，当即问父亲那以后怎么分辨，父亲对他说今后如果想不上别人的当，只有去读书识字！从此，卢焘对学习开始产生了欲望。因为家里困难，他虽然还没有进学校读书，但看见父亲晚上在家偶尔看点书时，他总是在旁边好奇地问这字怎么读，那字怎么讲。家里无钱买油点灯看书，他将干芭芒点燃照明。每在这时，母亲总是不辞辛劳地在旁边举“灯”助照。

为了帮助家里解决一些困难，卢焘从小练就了一手下河捕鱼的拿手好艺。早在那平村住河边岩洞家避难的时候，卢焘就对村里的大孩子们下河捕鱼之技艺十分仰慕，可是当时自己年纪太小，只好在岸边眼巴巴地看着。回到老家，卢焘7岁了，也学会下河游水捕鱼了。有一天，卢焘与村里的伙伴们，到村前的小河去捕鱼，可是卢焘没有渔具，伙伴们也没有多余的借给他，卢焘无奈，只好在沙滩上苦闷地走着，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在沙滩上开出一条水

道，把鱼赶到里面，然后把水道上游堵住，接着便可欢快地在水道里抓住那些“涸辙之鱼”。回家的时候，有渔具的伙伴们将捕得的鱼在卢焘面前炫耀，卢焘也将自己打得的鱼亮给他们看，结果伙伴们捕得的鱼比他还少，他们问卢焘是怎么弄得的，卢焘也毫不保留地向他们介绍了经验。

卢焘既是聪明的孩子又是调皮的村娃，与他年龄相近的孩子都听他的号令，俨然就是一个娃娃的头领。每到夏天，打水仗挖泥鳅抓鸟儿摘野果等都是他的拿手本事。有一次放牛时，他家的牯牛和邻村的牛角斗，大获全胜。他高兴极了，便采摘一些野花，编成花环，戴在牯牛的脖子上，威风八面地赶回家，博得同村人的喝彩，他得意地说：“我家的牛是英雄。”卢泰留心里也很高兴，只是笑着说：“这孩子真调皮。”私底下却对妻子说：“海湖这孩子有志气，要好好引导他。”

## 5 聪敏过人，深得喜爱

卢焘学会做家务后，给年迈的父母减轻了不少负担，如白天做饭、喂猪、放牛、砍柴，还有捕鱼，晚上又自觉跟父亲学识字、背诗歌，他聪明勤快，样样能干，又很听话，因而赢得了全村男女老少的喜爱。当时，有一个同姓族人卢慎徽，在村上办了一个私塾学校，招收的学生几乎全是富人的孩子。卢焘因为家穷，七、八岁了仍没办法去私塾上学。但每当他走过私塾学校旁边时，听到里面琅琅的读书之声，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倚窗驻足聆听，感到非常新鲜和稀奇。见到许多与他同龄的孩童能上学读书，他更加羡慕。常常因为听老师讲课而忘记家务事。如此多次，便引起了私塾先生卢慎徽的留意，卢先生看到这孩子面堂宽阔，眉目清秀，相貌非同一般，而且听课都是全神贯注，具有强烈的学习欲望，便想探个究竟，到底是谁家的孩子这么聪明好学啊！有一天，卢慎徽老先生出来问他：“小娃

仔,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很干脆:“我叫卢海湖。”“你想读书吗?”他只瞪眼不敢回答,心想家里那么穷,再说还得帮家里做家务、看牛,恐怕父母不会让他来读书。先生再问,他才点头表示愿意读书。卢老先生很高兴,便带他到卧室的桌子旁边教认几个字词。第二天,见到卢焘又来到教室外的窗边视听时,卢老先生便叫他进教室,提问昨天所教认的几个字词,卢焘则毫不害羞地张口就答。卢先生高兴地摸着他的小辫子,连连夸奖道:“你真聪明哦,看来我们卢氏家族能光宗耀祖的只有你一个了!”当卢老先生了解到卢焘是家贫如洗的卢泰留之子时,他竟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不收卢焘的学米和学费,破格招收卢焘为自己的学生,决心培养他成才。决定传出之后,全村为之震动,卢泰留夫妇在家给孔子牌位磕头之后,立即带着卢焘提着家里唯一的准备下蛋的老母鸡,连夜赶到私塾拜谢卢老先生的大恩大德。

1890年农历8月,9岁的卢焘终于进入卢慎徽的私塾开蒙。上学的第一天,卢慎徽老先生就给卢焘取了个学名叫卢启熹,其寓意是希望卢焘从今以后能够打开无量的光明的前程。这样,卢焘梦寐以求的读书愿望实现了,但他心里知道,别人家与他同龄的孩子7岁就读书了,他9岁才读,落后人家两年,因此他自己给自己定了严格要求,即大家用一倍的力学习,他就用2~3倍的力来学习,总之,自己的努力都必须要比人家多几倍才行,否则就辜负了卢老先生和父母的期望。

## 6 效仿英雄,发奋读书

卢焘上学后,学习确实非常勤奋和用功。不论严寒酷暑,早上他总是第一个到学校,上课期间他全神贯注,先生提问他积极发言;下课活动时他不懂就问,作业也是次次优良;晚上无油点灯,他就用树枝点亮,逐字逐句照着读写到深夜;晚上睡觉他怕甜眠天亮

难醒，就将发辫绑于床板架上，头部必将扯痛而觉醒，不致误时。在学校期间，他还常常听到卢老先生用莫梦弼反清起义和莫小时候刻苦读书的故事，以及杨家将、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袁崇焕、洪秀全、石达开、冯子材、刘永福等爱国英雄故事，来激励他们为国家为民族而努力发奋。有一次，卢先生在讲故事当中，突然停下来向同学们提问：“我们今天在学校读书是为了什么？”许多同学都争相站起来回答：“为了我们自己将来能做事情！”有的还说：“为了我们今后发财！”卢先生总是摇摇头说不对，最后卢焘站起来说：“为了报效国家！”这回卢先生终于点头笑着说：“启熹同学说得对呀，我们读书就是为了报效祖国、为了福及大众！”同学们面面相觑，都扮着鬼脸投向才进校几个月的卢焘新同学，他们既羡慕又嫉妒先生表扬这位新同学呢。

当时的宜北县，文化十分落后，像卢慎徽老先生这样的秀才，可算是当地一大文豪。有一天，邻村莫氏家办婚酒，请卢老先生去提笔弄墨写对联，学校也因此放假一天。这一天，卢焘与几位同学因不知情况仍去学校读书。在先生的书房里，因为好奇，就与同学将先生抽鸦片烟的烟具



明伦北宋牌坊

找来，点起烟灯，学着先生吸起鸦片。太阳偏西了，卢泰留见孩子还没有回家吃饭，便到私塾去找。走进先生书房，看见两个小孩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卢泰留慌了：这两个孩子为啥这样呢？

不久，卢老先生回来了，当他看见自己的房门被打开时，以为强盗进了自己的书房，可是他刚跨进门槛就看见卢泰留恐惧地站在烟床旁边，床上又躺着两个孩子。卢泰留对他说：“卢先生，你看这两个孩子为啥这样？”卢老先生也惊慌起来，发现自己原先留在房内的鸦片被烧后，他马上说：“不要紧，他们是吸鸦片过量才成这样的，待会儿会好的。”

卢焘回家后，父亲狠狠地训斥他一番：“我让你去读书，还是让你去吸鸦片？你卖柴被人骗钱的事，难道教训不深吗？你去吸鸦片干什么？”痛定思痛之后，卢焘很后悔，暗下决心加倍努力，以此雪洗自己的过失。通过这件事以后，卢焘永记父训，在他后来的一生中也永远离开了鸦片，成为民国时期不吸鸦片的高级将领之一，这是后话。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卢焘聪敏过人，学习目的明确，加之过目不忘的好记性和刻苦发愤的精神，因此他的学习成绩果真一鸣惊人，崭露头角。进校第一年，他就读完“四书”，并且全能背诵，对答如流，超过了比他早读两年所有同学的水平，名列全校前茅。

明伦双桥



## 第二章

## 少年壮志，初露智勇奇才

## 1 远赴庆远求学，成绩出类拔萃，府试夺取“状元”桂冠

1891年农历1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卢泰留正借着灶火在破竹子编泥箕，私塾卢先生突然来到家里，卢泰留连忙放下手中活路，一边叫卢先生坐坐，一边又唤卢焘快去给卢先生倒茶。同时，又叫正在煮猪潲的卢焘妈马上换锅做饭招待客人。

卢先生心直口快，一坐下来便说：“启熹爸妈，看来你们的小孩我是无力再教他了，今晚来我是想把他交回给你们。”卢泰留听后以为卢焘又调皮捣蛋做坏事了，使卢先生讨厌，便焦虑地问：“他又干什么了？”卢先生连说：“没有，没有！”并连忙解释道：“你们看这四本书，过去我两年才读懂，可是启熹现在一年就全读懂了呢！”卢先生边说边拿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几本书亮亮。卢泰留夫妇立即转忧为喜，大加赞赏卢先生教学有方，他们一再要求卢先生继续给卢焘跟着他读书，不想让卢焘失学。

卢先生接着说：“我的意思是启熹这么聪明，基础这么好，让他到大地方去读书今后定成大器，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地方读，恐怕耽误了他的前程。你们不是有个姑爷在庆远府军中任职吗？让启熹去跟他姐夫读书那必定是件大好事的。”卢泰留夫妇想也是，但庆

远离宜北太远了，近 300 里地，光走路都要几天，他们只有这么一个独苗苗，现在土匪又多社会又乱，真有点放心不下。

然而，在卢焘心里，庆远是个神奇的地方。往日凡去那里看望姐夫回来的亲戚，都曾描述那里如何如何的好，他心里总是痒痒的。刚才卢老先生说要让他去那里学习，他高兴极了。可是现在父母却有顾虑，不敢答应，他心又有点凉了。于是，在卢老先生面前，他鼓起勇气对父母说：“爸、妈，你们就让我去吧，姐夫那里有枪，我不怕那些土匪！”

卢焘的母亲是一个贤达知礼之人，她知道孩子的求知欲望不能压抑，想了好久，她还是动员丈夫说：“启熹爸，还是让他去吧。孩子想读书，我们应该支持才是啊，至于匪乱问题，在家也免不了，况且那里还有兵防。”卢泰留前几年战乱被迫去给官军当向导，饱受离子之苦，现在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舍不得让唯一的儿子离开自己。于是妻子又开导他说：“你被迫去当向导，是因为我们没有人支撑门户，现在我们给启熹去读书，以后他当官了，那我们倒有团圆的条件了。”当时，村上的叔伯兄弟也劝卢母说，“卢焘年纪这么小，又是独子，你忍心让他远离你吗？”卢母说：“吾与若父，不欲以溺爱误学龄也。”最后，卢泰留觉得妻子说得在理，也就不再坚持反对了，终于同意送卢焘去庆远府随姑爷郭礼轩读书。

1891 年农历正月，正当人们还在欢度春节的时候，卢泰留就带着年仅 10 岁的儿子卢焘，徒步到龙岩的那平村，乘船东下经东兴、长美、安马、怀远抵达当时桂西北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庆远。刚到姐夫家，卢焘还真有点害怕，因为当时郭礼轩已被提拔到庆远府军中任协镇，住在知府署内，到处戒备森严。见到老丈人带着内弟小启熹到来，郭礼轩和妻子自然喜出望外。当他们得知小启熹在家乡仅读一年书就取得优异成绩时，更是喜爱有加。于是，在小启熹刚到的第二天，郭礼轩便放下繁忙的军务，请假专门为小启熹找到当时庆远城内最好的私塾和先生。之后几天还

未开学之前，郭礼轩夫妇一家又专程陪同老丈人和小启熹在庆远城内游转几圈。第一次来到庆远，小启熹觉得一切都感到新鲜奇特，庆远城果真是像原来亲戚们回乡所描述的那样，要比宜北县城大几十倍，城外地域开阔平坦，城内九街十八巷宽阔笔直，街道两旁的商铺连绵，货物琳琅满目，行人如织，还有日夜重兵把守威严的知府衙门，雄伟壮观的东西南北4个四牌城门楼、古色古香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议事亭(今宜州市老市委大院)等等，所到之处，他都问这问那，兴趣盎然，依依不舍，流连忘返。在翼王石达开议事亭前，听到姐夫讲解太平天国的故事时，小启熹突然向姐夫插问了一句：“石达开是不是和我们家乡的英雄莫梦弼一样为穷人打天下呢？”姐夫予以了肯定的回答，小启熹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来到了庆远，卢焘确实开拓了视野，大开了眼界，似乎长大了许多。看到庆远比家乡宜北这么大这么好，他很幽默地对姐姐和姐夫说：“父亲送我来跟你们读书，我一定听你们的话，努力读书，将来我也想和你们一样，在庆远城里永远住下去，可以吗？”郭礼轩夫妇在老丈人面前高兴地说：“我们相信，我们的小启熹说话一定会算数，也一定会实现的。”

庆远，是当时中国大西南通往东南沿海的咽喉要地，也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116年(汉元鼎六年)设县，明清改为府。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山谷)曾被贬谪于此，南宋孝宗淳熙元年在城西建山谷祠(现迁于会仙景区)，以表彰他传播文化之功；明建文帝朱允炆曾云游至此，明末大地理学家徐霞客也曾到此考察；清末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从南京出走回桂，也曾驻扎于此等。庆远山川秀丽，环境优美，城北有北山(又名会仙山)，山腰有白龙洞，洞内有全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五百罗汉名号牌，洞外石壁上有唐宋以来历代摩岩石刻60余幅，还有石达开及其部将唱和诗词石刻以及翼王亭、点将台；城西北有宜山庙、三门寺及下枧河的刘三姐故事传说；城西有仙女岩、多灵山；城南有九龙洞、南山寺等。此外，此地人

杰地灵，人才辈出，历史上曾涌现出 40 多名进士，为广西历史上出进士最多的县份之一。同时还涌现了“三元及第”、官至宋朝参知政事（副宰相）、赠太子少师的冯京等一大批官员。庆远是当时桂西北拥有两千多年的名副其实的文化历史名城和商贸中心。



“汉马伏波寓此”宜北摩崖石刻

在庆远，卢焘师从的是钟逸卿先生。钟先生是一位为人正直的老师，青年时代曾想在政治上建功立业，改变当时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可是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奋斗了半辈子，自觉对社会仍无所贡献，于是只好弃政从教，但他对不劳而获的权贵富人还是怒目而视。有一天早上，他给卢焘等学生们教读《诗经·硕鼠》这首诗时，卢焘问他：“先生，‘硕鼠，无食我年！三岁贯女，莫我肯顾！’写

的是什么意思？”钟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很深，加上对那些为富不仁的富人恨之入骨，于是讲解得感情激愤：“硕鼠就是大老鼠，但作者不着意写大老鼠，而是采用比拟手法写财主，财主和大老鼠一样，不劳而获，吃的是老百姓的血汗。”听了钟先生的解读，卢焘就想起了家乡的英雄莫梦弼因无钱被官府镇压，想起几年前自己卖柴被财主骗钱等事，他对财主又增加了一分憎恨。

1891年腊月中旬，卢焘来到庆远镇读书转眼就一年了。由于他聪明好学，不到一年时间便将《诗经》全部背完，钟先生称他为“少有的奇才”。腊月22日，父亲来信叫他回去过年，于是姐姐就托家乡商人顺道把他带回老家。

在老家，卢焘与伙伴们过了一个快乐的春节。伙伴们见他从庆远大地方读书回来，争相邀请他去家里做客，要他讲讲大地方的见闻，卢焘也毫不推辞，把他所在庆远一年时间的各种见闻趣事，都毫不保留地讲给他们，鼓励他们也要到庆远去读书见识。有时还与伙伴们一起放牛、砍柴、捕鱼，真是玩得不亦乐乎。然而，就在元宵过后准备返学的时候，父亲觉得儿子在庆远读书开销太大，怕影响女儿女婿的家庭生活，因而决定不再给卢焘去庆远读书。卢焘理解父亲的难处，也不吵不闹，每天都默默去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也不主动与父母提起读书之事。

开学快10天了，在本村另一间私塾的族兄卢楚材看见卢焘还在家砍柴，便问：“你怎么不去庆远读书了呢？”卢焘如实说出了难以返校的原因。卢楚材知道情况后，当即找到卢泰留并将其责备一番，之后又叫卢焘立即到他的私塾免费上学。于是，卢焘又在家乡师从族兄卢楚材先生，读完《书经》、《易经》。

话说远在庆远城的郭礼轩，原以为岳父母叫卢焘回家，只不过是思念孩子，和孩子一块过年而已，可是开年过后等了一天又一天，近半年还不见卢焘返回庆远。他这时才意识到，岳父母可能怕拖累自己。郭礼轩的家庭生活虽然也不很宽裕，但他顾及到卢焘的

前途，又几次写信或托人口信催促岳父母派人送卢焘来庆远读书。

在女婿的再三催促下，1893年农历12月中旬，卢焘留只好让卢焘随族叔卢重周公再赴庆远就读。1894年正月下旬，卢焘重新回到了庆远的学校，这次的私塾先生是简敬轩。此时卢焘已经13岁了，按照传统风俗，也是起正名的时候了。简先生见卢焘出身贫苦家庭，于是给他取名为卢亮畴，意为照亮着拥有众多的田地和财富，摆脱过去的穷困。在简先生的私塾里，卢焘开始读《声律启蒙》、《幼学》、《礼记》。简先生看到卢焘学习刻苦用功，人又机智勇敢，于是让卢焘当班长，并经常让卢焘协助他批改作业等，有意培养卢焘学会独当一面。

1895年春，卢焘转入韦星五先生私塾就读，开始读《唐诗三百首》，初学作对子，并将《礼记》、《幼学》读完。次年，由于基础课程已学完，为了更好地转入写作阶段，于是姐夫先后专门聘请蔡漫云、郑小谷(即郑献甫)两位先生到家里，分别给卢焘做专职辅导先生，补学八股文，背诵经典古文古诗，练习写作文章和论题。1897年正月，卢焘师从杨香林先生私塾强化写作、策论等。1898年春，府试开考，卢焘17岁时参加府试，他的作文以《其为人也发愤》为题，夺取了全府数百名考生的“状元”(即第一名)桂冠。

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一段时间里，卢焘在庆远城内每到一处，人们都在他背后仰慕地指着：“就是他考得第一名啊！”按当时的规矩，凡府试成绩优良者，知府都是要任用的。然而，正当知府准备要给卢焘委以官职时，却突然被贬谪他处，新来的知府不用前任知府所考的人，所以卢焘只落得个虚名。

卢焘能来到庆远读书，既有优美的人文环境，又有众多的名师指导，是他少年时代最舒心的时期，令他终身难忘。在读书之余，凡是空闲的时候，他就经常和同学游玩白龙洞、山谷祠等，饱览了庆远众多的名胜古迹。他很崇拜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说石达开是文武双全的名将。在事隔30多年后的1922年5月，当他统率黔滇3

万大军南下“两广”支持孙中山北伐革命路过庆远时，还带部将数人登上白龙洞，给石达开和诗一首。可见，庆远对卢焘的影响非同一般。

## 2 巧治纨绔子弟，击溃象城劫匪

卢焘 13 岁那年，也是第二次来庆远读书的时候，有一天下午，他从简先生的私塾放学回家，走过街上，快到知府大门时，一伙年纪和他不相上下的少年围着他喊“乡巴佬！乡巴佬！”起初他还不懂得乡巴佬是什么意思，只凝神地看着他们。后来只见一个少年走上来，抓着他的衣襟说道：“乡巴佬，你愣着看什么？你这等穿着，干芭蕉叶似的衣服也想跟我们比！”卢焘这时才明白，这伙狗崽子是在欺负他啊！可是见他们人多，他没有说什么，挣脱着要走，然而抓他的少年竟把他破旧的衣服扯破，卢焘怒不可遏，他猛地把双手伸过去，也将对方的衣服撕烂。那少年素来娇生惯养，外强中干，被撕破了衣服，便哭爹喊娘地在地上打滚。不一会儿，那少年的母亲来了，边扬手要打卢焘边嚷道：“小乡巴佬，我打死你，你还我儿子的衣服来！”卢焘起初怕对方人多，可是当把那少年镇住后，他胆量也大了起来，他大喊起来：“你这母狗吵吵嚷嚷什么，是你的狗崽子先扯烂我的衣服！”“扯破你的衣服我还得起，可是你扯烂我儿子的衣服你还得起么？”那婆娘的家是经商的，她以为有钱有财就可以肆意欺人。卢焘昂起头，眼里好像没有那婆娘一样地说：“有钱就可以随便扯烂我的衣服吗？你有理找我姐夫去，我姐夫在知府署里当官，你敢去吗？”这么一说，那婆娘便不敢再嚷了，只顾拖着自己的儿子回家。晚上，卢焘把白天发生的这件事告诉他姐夫，姐夫说：“街上这些做生意的人开口闭口以钱欺人，你不要跟他们有一般见识，要刻苦读书，书读多了，你才明白许多道理，才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地位。”

卢焘 16 岁时,姐夫已调到象县(今象州县)任军中主事。当年暑假,卢焘跟随姐夫到象县任所去玩。有一天,姐夫带兵到柳州出差了。当地的匪首探知郭礼轩不在象县后,便纠集匪徒数十人,抢劫象县县城郊区农民的耕牛和财物,当晚又围攻县城,计谋破城抢劫更多的财物。由于县城内留下的兵丁不多,官员们惊慌失措,居民更是人心惶惶。卢焘看到情势万分危急,又无人做主计议对策,他便自告奋勇,挺身而出,立即组织城内青壮年拿起鸟枪土铳,协助兵丁上城防守,并火速派人连夜赶赴柳州报警。同时又组织民众夜间通宵点火,敲锣示警,巡逻通道关口,使土匪无法攻城。天微亮时,他们看到那帮土匪是乌合之众,且只有少数土枪,还不如他们守城的兵民,于是就打开城门向匪众冲杀而去,匪帮如鸟兽散,溃退逃命,丢下耕牛 100 多头,财物不计其数。击溃劫匪后,卢焘又和官员们立即把缴获的耕牛和财物集中于城郊,及时通知各乡失牛失物的农户前来认领。事后,象县各界群众对卢焘的胆识和谋略大加称赞,卢焘的英勇抗匪的事迹一时也传遍了象县的千家万户。数日后,郭礼轩带兵返回象县了解情况之后,对卢焘更是夸奖:“你要是早生十年,对我就有很大的帮助了。”事后,卢焘在象县率众抗匪的英勇事迹,曾被刊载在当时柳州知府剿匪的战报上。

### 3 灭莫团总威风,长众多亲志气

卢焘 14 岁那年春节,从庆远放假回家过年。本县团总莫某为人傲慢,霸气十足,他家住学强村,每次赶街时,都骑着一匹大马,随从人员众多,可谓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常常把赶街的民众撞倒碰伤,民众敢怒不敢言。有一天,卢焘邀几个相好的伙伴专程走到距离明伦街七八里路远的“金童玉女滩”岔路埋伏下来,准备用石头教训教训这个嚣张的家伙。大约上午 11 时许,坳口出现了一帮赶街的人,其中有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大长衫,骑着一匹大马,在

人群中耀武扬威地走过去了，卢焘与伙伴们看清了，这帮人正是莫团总他们。于是口哨一响，紧接着一阵飞沙乱石砸过去，打得马嘶人叫，队伍乱阵，莫团总连喊救命，可是他的随从人员跑到前面查找肇事者时，却连个人影都看不见。这件事以后，莫团总上街时不敢再像以前那样威风嚣张了。

那年春节期间，离明伦街约3里远的中尧村有个叫卢万章的青年人，平常仗着他家富有，经常在半路上欺负那些来赶街的男女青年，大家对他恨之入骨，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更不敢惹。有一次，卢万章因为本村女青年与外村男青年对唱山歌，竟纠集本村一些男青年横蛮打人。这时，正碰上卢焘与父母去外村走亲戚回来，他路见不平，毅然挺身而出，以理教训万章，在旁围观的过路群众也群起指斥卢万章做得不对，最后卢万章不得不向对方叩头赔礼道歉，并表示今后不再为非作歹，欺负路人。

## 第三章

### 投笔从戎

#### 1 两次放弃轻松工作，匆忙回家订婚

话说卢焘自夺得府试第一名而得不到任用后，姐夫一再要求他再复读一年然后再考，但通过这件事，使他看透了官府的腐败，对继续学习考试不再感兴趣了。辍学后，卢焘想跟随姐夫去当兵，但郭礼轩觉得内弟跟随自己当兵，怕别人说闲话，于是就介绍卢焘到附近的忻城县跟随他的老熟人吴廷辅正堂出巡，边学书启。在忻城，卢焘几乎每个月都跟吴正堂出巡几个乡村，而且每次都要在乡下住上近 10 天，所到之处各乡都有酒肉接待，工作也是帮帮吴正堂做点文字记录、整理和其他杂事，可谓是既轻松又安全。但卢焘觉得工作太平淡没有刺激，在忻城县只干了一年左右，又要求姐夫还是给他去部队当兵好。此时，卢焘正好接到家里“父亲病危需速回家”的急信，于是匆忙向吴正堂辞职，星夜离开了忻城赶回宜北老家。

卢焘回到家里，看到父亲躺在床上，他心酸泪下。但父亲对他的第一句话不是讲自己的病情，而是直截了当地提起了儿子的婚事。他说：“孩子，你今年 19 岁了，此次回来要订好婚事再走。”卢焘本是关心父亲的病情才回来，可是父亲见他的第一句话却是要他

结婚,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理解父母的心情,自己长期不在父母的身边,年迈的父母无人照顾,自己在外奔波也不放心,于是,卢焘尊重父母之命,与邻村姑娘覃清德按家乡的风俗订了婚。覃清德比卢焘小两岁,本姓卢,后由于与卢焘订婚(因当地风俗同姓不能结婚)便改为覃姓。覃清德身材高挑,美丽贤惠,性格温柔,通情达理。她家虽然也是方圆几里人人皆知的富裕人家,但她从不嫌贫攀富,对穷人有着特别的同情,乐于扶助他们。早在两年前,每次看见卢焘父母挑担劳作,她总是上前争着帮助老人分担,后来,卢焘家里有什么困难,她都经常去帮忙,如挑水、种田、砍柴等,使卢焘父母深受感动,特别喜欢这个女孩子。看到覃清德如此尊敬老人,看得起穷苦人家,又豁达勤快,卢焘父母便萌发了娶她为儿媳的想法,于是叫媒人牵线,果然覃清德不仅同意,而且她家人也支持。这样卢父便叫人以“父病危”的名义,写急信叫卢焘火速回来定亲。

从老家返回庆远后,卢焘又向姐夫提出当兵的事。郭礼轩与妻子反复商量后,认为卢焘是家中的独子,岳父岳母又已年迈多半不会同意,让卢焘去当兵实在是不适宜。于是1900年8月郭礼轩通过老乡的关系,帮助卢焘在广西最大的通商口岸和水上门户——梧州海关谋得一个文书职位。在海关,卢焘初出茅庐,为人正直,不了解世事,只知埋头苦干,每月所得薪水十多两银子。但每逢发薪时,看到其他职员都多分得一些银两,卢焘十分迷惑不解。于是向同事问个究竟,同事嘲讽他说:“你只埋头做事,不想法检查客人行李货物,怎么能分得更多的银两呢?”卢焘仍不理解其中奥妙,同事就得意地告诉他说:“如见客商私带货物,就可以敲诈他索取银子才放行,每次得来的银子交出大家平分。”卢焘觉得这是谋财害民的行为,不能拿这不义之财。于是仅在梧州海关做了三个月,便向当时的梧州海关监督郑孝胥(“九一八”事变后,此人任东北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申请辞职,绝不与那些贪赃枉法、营私害民之徒为伍,拟另谋差事。

## 2 远赴桂林开始军旅生涯，实现多年当兵夙愿

当卢焘把在梧州海关辞职拟另谋生路的事写信告知姐夫时，郭礼轩气得大骂一通，但他知道内弟，爱憎分明，一心想到军队去锻炼，为穷苦人民打天下，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才是他最大的心愿。于是他瞒着妻子，私下与昔日的老战友、时已升任桂林新军左营管带周鑫吾联系，推荐卢焘去周的司令部任参谋文书。卢焘在梧州接到姐夫让他去桂林且又是省城从军的信函后，他真有点不敢相信姐夫这次终于同意他的初衷，实现了他人生最大的愿望，让他高兴得几乎手舞足蹈，彻夜不眠。

1900年11月下旬的一天，也是接到姐夫来信的第二天上午，卢焘就买好了船票，乘船离开梧州北上那素有“山水甲天下”之美称的省城——桂林。在船上有位同行的客人，年纪较长，与卢焘一路倾心交谈，颇为投机。这人姓王，贵州荔波人。他夸口说：“桂林许多大人物我都认识，到桂林后我举荐你去做事不成问题。”卢焘也不说这次去桂林是从军，佯装与他谈下去。几天后船到桂林已经是夜晚了，卢焘要去的部队又在郊外，于是当晚他们同在一个客栈投宿。第二天上午，王某早早出去一下回来说：“刚才我去见某大人忘记带门贴封包，你能否把你的衣服借给我一下，我将我的衣物拿去当铺当取点银子来做门贴封包送守门差役，请求引见某大人。”卢焘听了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将好的衣服借给王某出去办事。可是等了又等，都不见王某转回，时至中午，卢焘因急着早点去找部队，没法再等了，知道自己已上了王某的当被骗了，他后悔不已。

当天下午，卢焘通过问路终于找到了仰慕已久的部队——桂林新军左营的驻地。刚进营区大门就被两个守门的哨兵，从两边岗亭出来严格盘查并搜身，不管卢焘怎么声明要找周管带，哨兵就是不给进去，后来卢焘只好把姐夫给他写的信拿给他们看，信中提到

要他立即到桂林找周管带任职的事，两个哨兵交换看信之后，又互打了个眼色，才同意放行，并派一个哨兵带着卢焘绕了几条岔路，过了几个岗哨之后，才找到了周鑫吾管带。见到周管带，卢焘立即双脚一并向周敬了一个军礼，并大胆地自报家门：“报告长官，在下姓卢名亮畴，来自庆远府，我姐夫叫郭礼轩，是他叫我来找你的，请吩咐！”周管带看到卢焘站着笔直，英俊高大，相貌堂堂，连连说：“哦，知道了，原来你就是庆远府试第一名和象县击溃劫匪的英雄卢亮畴啊，真是个不简单的小伙子，难怪你姐夫老是向我推荐你呢！”一席话，让卢焘原来紧张的心情平静了许多。接着，他们很随和地又聊了好长一阵子之后，周管带才叫侍从人员给卢焘安排吃的、住的及今后工作的地方，同时又带卢焘在营区里走了一圈，以便让他尽快熟悉工作环境。

桂林，是当时广西美丽的省会城市，漓江、七星岩、芦笛岩、象鼻山、九马山、独秀峰、伏波山、靖王陵……处处风景如画，犹如仙境，“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名，真是名不虚传！能来到桂林工作而且是在部队工作，卢焘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他很珍惜和热爱这份工作。卢焘的工作就是做周管带的参谋文书。有关文书工作，他在忻城、梧州都干过，加上文字功底好，干起来可谓得心应手。尽管如此，但卢焘还是谦虚谨慎，虚心向其他有经验的老同仁学习。这样，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卢焘的参谋文书工作，就已经干得轻车熟路了，平常一有空，他都与同事们交流思想，有时还主动给周管带提出不少的军事建议等等，深得周管带和同仁们的肯定和称赞。那时，社会还比较平静，卢焘从军半年多了，他所在的部队还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事，仅有的一两次小小的剿匪战斗，卢焘也没有机会参加，他为此挺郁闷的，难道当兵就这样舒服吗？正当卢焘对当兵又产生疑惑的时候，一天周管带突然走进他的办公室对他说：“恭贺你卢亮畴，你姐夫已升任柳州新军中营管带了，他要你回柳州协助他呢！卢焘听了，有喜有忧，喜的就自不必说，忧的是他实

在是舍不得离开周管带！卢焘说：“周长官，说实话，我姐夫升官我很高兴，但我真不想离开你，可以吗？”“呵呵，可以，但得要你姐夫同意。”周管带微笑着答道。卢焘想只要做一下姐夫的工作就可以了，所以他也不再说什么就忙工作去了。

### 3 郭姐夫柳州升官，小内弟倾力相助

在桂林，卢焘与姐夫沟通了几次想留在桂林的意图，但是姐夫还是坚持要他返柳。无奈，卢焘只好辞谢周管带，于 1901 年 8 月离开桂林南下柳州。到达柳州后，姐夫即任卢焘为柳州新军中营收支，掌管全营近 500 号人的后勤财务管理。接任此职后，卢焘曾谨慎地提醒姐夫：“我以前都是干文书的，后勤财务管理方面恐怕难以胜任。”姐夫说：“没学过的东西，现在就从头学起不是很好吗？何况你手下还有那么多的助手呢！”姐夫既然如此说道，卢焘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暗自下定决心以做好工作来报答姐夫的信任和厚爱。由于全营从事后勤财务管理的 20 多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原来前任管带留下来的人。所以上任伊始，卢焘首先想到的是整顿队伍和纪律。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姐夫及其他营官汇报以后，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于是，卢焘先后召开了全营后勤财务干部会议，整顿后勤财务队伍纪律，统一思想认识，重申和修改有关后勤财务纪律和有关规章制度，加强业务培训、规范业务程序等，使全营的后勤财务管理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走上了正常规范的轨道，为部队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在业务上，卢焘虽然从零起步，但由于他勤奋好学，态度严谨，很快就胜任了这项繁杂的工作。对于基层采购的货物，他都要求层层把关，杜绝“头大尾小”的账目和浪费现象发生；对于每一笔收支的票据和报表，他都一丝不苟地梳理、审核、把关。有一次，他在审核季度报表时，发现一个连队的收支不平，于是他立即追问该连财务主管，该主管吞吞吐吐，说不出所以

然。经请示营分管长官同意,营部财务对该连进行查账,结果是该连长勾搭该主管搞假账,贪污军饷。最后,营部经请示上级批准,开除了该连连长和连财务主管的军职。由于后勤财务管理有序,全营伙食大为改善,官兵们不仅吃得好,而且也穿得暖,从而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多次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和表扬。

## 第四章

# 天有不测风云，家事国事悲喜交织

### 1 遭诬陷被撤职，姐夫百口难辩

正当郭礼轩在柳州把事业干得火旺的时候，部队内部却出现了一股分裂势力，就是原来因财务问题被开除的那个连长和连财务主管，离开部队后不久，又暗地勾结其他两个营官制造陷阱，诬告郭礼轩目无上峰。那是某一天，郭礼轩带兵到柳州西郊搞野营训练后，正好碰上上级副统领到本部队检查工作，在家的两个营官串通一气，装聋作哑，说管带去哪里他们不知道，再问别的情况也说不知道，接待用餐的时候，也只是三菜一汤，简简单单，冷冷清清，使得副统领大为光火：“都说你们中营搞得如何如何好，现在我看你们是不是都弄虚作假啊？”两个营官又附和道：“我们没有权，都是郭管带说了算呢！”此事，让上级机关对柳州中营的印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不明真相的领导，还真的以为郭礼轩独断专横、目中无人，这对郭礼轩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之后，他们又乱编罪状诬告郭礼轩等。郭礼轩知道原委后，尽管专程到统领处解释真相，但给某些长官的印象还是有些难以全抹。

无独有偶。1902年5月，因游勇大乱三江口洪河金库，由于路途遥远，加上当时消息又被那两个营官滞压，待郭礼轩带兵急行军

赶到三江口的时候,金库已被洗劫一空。为此,上级以郭礼轩怠慢战机为由,将郭礼轩的管带职务就地免职,郭礼轩真是百口难辩,含冤叫苦。

## 2 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姐夫离人世

1902年6月,卢焘与姐夫含恨回到庆远。姐夫回到家后,整天闷闷不乐,门也不出,话也少说,饭也少吃,他真的想不通那几个人为什么老是与他过不去,过去他待他们也不薄啊!还有老天爷为什么对他这么不公。他从小就在江西老家从军,为了国家为了民众,出生入死,转战江西、湖南来到广西,今天落到这个地步,真是越想越气,直至精神恍惚。10月上旬,回家仅三个多月,姐夫就在含恨中辞世,时年才50余岁。

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天爷有时真是很捉弄人啊!卢焘与姐姐刚刚处理完姐夫的后事,还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一个天大的灾难又降临到他们姐弟俩头上。11月16日,得到乡人的口信,他们的父亲卢泰留已先于九月初九就辞世了,也就是说父亲辞世还比姐夫辞世早近一个月,只是由于家乡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直到此时才知道这个天大的不幸消息,真是祸不单行!姐弟俩当时呼天抢地哭抱一团,真是哭干了泪,喊哑了嗓,其悲痛真是无法形容。

当晚,卢焘与姐姐连夜启程回乡奔丧。回到老家,来不及进家放下行李,姐弟俩就直奔村头,来到由家里亲戚和众乡亲当时为其父亲临时安放所帮做的草墓房(当地风俗如父母过世时子女出门在外不能按时回来,先起草房停棺安放,待3个月或3年后再下葬)前长跪痛哭不止。直到天黑了,在亲戚和乡亲们长劝之下,姐弟俩才踉跄着回家守制。一进家门,看见几乎哭瞎了眼睛的母亲,姐弟俩又放声大哭,长跪不起,真是人间的悲哀莫过如此!



卢焘将军夫人覃清德女士

### 3 遵照母命，卢焘迎娶覃清德

1903年春节过后，正月初八，时年已22岁的卢焘，听从母亲的安排，计划将两年前订婚的姑娘覃清德接回家里完婚，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也叫“抢婚”。卢焘接受了母命，但结婚需要钱，眼下家里这么困难，去哪里找钱呢？卢焘的忧虑，被村上的大伯大叔和乡亲们看到了，大家都表态，所办婚事的费用都由他们来考虑，叫卢焘不要操心，要他只为母亲尽孝解决老人家的这个后顾之忧就行了。于是卢焘完婚那天，亲戚和乡亲们有送钱的，送猪的，送鸡鸭的，送米的，送酒的，送菜的，帮忙做工的，络绎不绝，来了一批又一批，卢焘和母亲看到这种热闹的场面，激动得热泪盈眶。覃家不但不要卢焘家的彩礼，反而还给卢焘家送来了丰厚的嫁妆以及米、猪、酒等。卢焘的婚礼，也按当地的习惯，热闹了三天。卢焘的母亲看到长期奔波在外的儿子终于完婚了，她也从悲痛中感到欣慰。

### 4 大股游勇就境，携妻母潜居庆远

2月12日，办完婚事后不久，卢焘又给原来临时安放在草墓房的父亲，开吊大葬。众乡亲得知卢焘困难，又纷纷解囊相助。远在吉祥茶洞村的富豪人家蒙卓儒也感动得开恩了，他不仅给卢焘送来了近百斤大米，而且还给几十两银元资助。对于亲戚和乡亲们的关心和帮助，卢焘都一一铭记在心，并用一个小本子专门记录下

来,作为永久的记忆。他认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后来,卢焘荣幸当官后,这些曾经帮助他克服困难的亲戚和乡亲们,只要找到他,他都予以适当帮助。如蒙卓儒就曾经得到卢焘的关照,卢焘任黔军总司令后,就特地把蒙卓儒请到贵阳住了好几年,后又介绍蒙卓儒到大硐喇朱砂厂做厂长。1948年,卢焘回乡探亲时,还特地走访蒙卓儒的故居,并到去世的蒙卓儒的坟前祭奠,可见其极重情义。

清朝末年,社会动荡四起,民不聊生。宜北地区虽然当年的莫梦弼农民起义被平息了,但清兵一走,散兵游勇、土匪、盗贼又猖獗起来,肆意抢劫,此起彼伏,民无宁日。1903年4月,刚安葬完卢泰留,宜北县就爆发了以原在贵州边境活动的黄留之、梁贵材、韦五娘、顾二嫂等为首的大股游勇(约5000人之众,但自称万众)全境骚扰动乱。他们所到之处,揭红家旗,开拜台会,凡顺者留,逆者则烧杀劫掠,老百姓怨声载道,官军也无力平息。看到这种混乱局势,本想在家养儿育女、照顾母亲、不再外出奔波的卢焘,此时又萌发了“走为上策”的离乡之念。就这样同年8月,卢焘又护着母亲带着新婚的妻子,背井离乡,乘船东下庆远潜居姐姐家。

## 第五章

# 与张铁城共谋大事，走上革命道路

### 1 世道艰难，赴柳州再次从军

在姐姐家，因为生活所迫，经过朋友介绍，卢焘先到恩思县长美乡与天河县简爱乡交界的拉门樟脑厂打了两个月工。该厂设备简陋，只有十几个大铁锅和十几个大蒸桶，还有十几个工人。当地有着丰富的樟脑树资源，所以虽然地处偏远，但还是吸引了庆远的老板去开发办厂。因为厂子刚开办没有什么效益，除了能吃饭，工人们几乎没有什收入。正当卢焘要离开的那天晚上，有5个土匪持刀冲进厂里要抢劫妇女和财物，卢焘见状立即奋不顾身与土匪开展搏斗，并及时夺得了一个土匪的长刀，迅速把土匪打退。后来，厂老板和其他男工友也赶来了，见卢焘和几个妇女及财产都平安无事，老板立即奖励卢焘十几块银元。

从拉门厂回到庆远后，卢焘收到了柳州老战友张萼楼寄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他现在已到杨发贵部任参谋官，叫卢焘速去柳与他共事。于是同年10月下旬，卢焘又辞别家人，去柳州杨发贵部任参谋。杨发贵统领早年与郭礼轩结交共事过，郭礼轩蒙冤时，他很同情，但爱莫能助，那时正在桂林任职。来柳州后，他知道郭礼轩还有内弟在庆远，于是叫其部下张萼楼写信给卢焘叫他来柳州跟

他从军。杨发贵见卢焘为人机智聪明,又曾在两个部队呆过,就安排他在统领部跟张萼楼任参谋。在生活上,他对卢焘也特别关照,每月给卢焘的薪水也比别人(同期)高,住的也是单间。所以卢焘一上任,就感觉到有无穷的力量,促使他做好每一项工作。

1903年底,卢焘刚在参谋部任职仅一个多月,其上司参谋官张萼楼就升任为营防管带,卢焘也随之破格提拔为营副,协助张驻防运江。两个老战友能重逢在一起,共事在一起,又搭档在一起,真是太难得的机遇。他们两个一个前方指挥,一个后方管理,配合默契,步调一致,使全营上下井然有序,活力四射。

可是,好景不长。1904年5月11日,祖绍文部先锋营陆亚发在柳州发动兵变,所有驻柳部队一片哗然,祖绍文出走。杨发贵部也遭受其害,部队一片混乱。这样,同年8月卢焘与张萼楼管带只好率部来到庆远,投入济字营龚捷三统领部,张仍任管带,卢焘则改任统领部参谋。

## 2 遇志士张铁城,在庆远投身革命

1900年,英、俄、德、法、美、意、奥、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次年,英、美等帝国主义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帝国主义列强就争先恐后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企图把中国豆剖瓜分。腐朽的清政府对外节节退让,屈从于帝国主义,希图苟安,对内则倒行逆施,横征暴敛,镇压人民。内忧外患,无以复加,国难日益深重,民族危如累卵。有识之士无不激发爱国热情,立下救亡图存的壮志,相继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广西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动乱日甚一日。1903年,广西全省发生大饥荒,饿死73000多人。清政府的残酷压迫,引发了1902~1904年间的会党

起义。据《东方杂志》(1904年第1卷第4期)记载：“柳州、庆远、思恩三府……党匪麇集，几乎无村不匪，情况极为吃紧，官军疲于奔命。”孙中山把南方各地的会党和农民起义作为反清运动的重要力量，多次派人到两广联络会党和运动清军，策划武装起义。

当时统领部有一个参谋官叫张铁城，人很活跃、仗义。卢焘刚来就在他手下工作，也不觉生疏，好似老朋友一样，说说笑笑，倒挺和谐、开心。张铁城系江西瑞金人（字鱼书，辛亥革命后，曾任桂军旅长、总司令，后因反对袁世凯被杀害）。他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成城学校，同盟会会员，后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在粤赣两省从事秘密反清活动，后辗转到广西柳州庆远一带开展活动，并打入龚部任参谋官。一次，卢焘买回一本皇历，张铁城见了，便用红笔把“皇”字划掉，卢焘不知他为何这样做。之后，又常见张铁城在下班后偷看禁书或私约陌生人到隐蔽处谈事，卢焘对张铁城的行为举止开始存了疑心，于是他决定找个机会探知这家伙到底在做什么。

有一天，张铁城拿着渔竿说去龙江河边钓鱼，还带上个挎包。卢焘认为他去钓鱼是假的，而去进行秘密活动是真的。于是卢焘也悄悄地随后来到了河边的隐蔽处，只见张铁城与几个陌生人拨开岸边的竹丛往下走，每个人下去之前，总是左右窥视是否有人跟踪其后。待他们都下去之后，卢焘就轻轻地走过去躲在竹丛后面，侧耳听他们说些什么事。由于离他们较远，只隐约听到什么“孙中山”“同盟会”“发动起义”等词，卢焘越听越兴奋，最后竟莽撞地分开竹丛，下去详听张铁城等人商谈的秘事，可是没等他走近他们身边，几个陌生人的枪口已对准了他，同时压低声音说道：“你是什么人？想来当侦探？”此时正猫在地图上军事地图的张铁城，听见同事们的问话声，便迅速抬起头来，看见来人是卢焘后，便立刻叫同事放下枪。他与卢焘是好同事，知道卢不会有恶意。卢焘说：“鱼书兄，小弟冒犯了，请多包涵！”“亮畴兄，今天你偷听我们开会，按理不可原谅。但念你与我同事，此事就不必计较，但若你把我们今天

开会内容外泄出去,那可怪不得兄弟我不讲情面了!”张铁城语沉辞严。卢焘道:“鱼书兄放心,我卢某对你素来甚是仰慕,只是无缘恭听教诲,今天冒昧探听你们开会只想核实你们是否是同盟会会员,小弟也好倾诉衷肠,以求入会。”“好啊,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组织,但还得让我们考验你一段时间才行。”

从那以后,张铁城通过一段时间对卢焘的观察和了解,见到新来与他共事的参谋卢焘,为人正直,思想进步,民族意识强烈,心里感到异常高兴,从此,这两个志同道合的战友,朝夕相聚,经常密谈革命之事。不久,经张铁城介绍,卢焘终于在庆远秘密加入了同盟会组织。卢焘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走上了革命道路。

### 3 创办怀远半夜算术科,开设龙岸竞化学堂

为了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培养家乡革命人才,1905年夏,卢焘与张铁城等人,利用节假日或空闲时间的晚上,秘密到离庆远城20多路远的怀远,创办了一个名叫“半夜算术科学校”的学堂,并亲自担任教员。怀远地处桂西北当时内河水路的交通要塞,从柳州逆江而上的船只到怀远中转的,北可上宜北、天河,西可上河池、恩思、东兰、凤山、巴马、南丹及贵州的荔波、独山、三都等县,自古以来这里也是桂西北物资的集散地。卢焘与张铁城当初选定怀远作为培养革命新人的基地,就是看中这里是当时桂西北人流物流的中转站,来往人员既多又广,有利于开展表面掩护和广泛宣传工作。起初,他们派当地人龚献之、韦钦武、龚德胜等以为亲戚朋友及子女们办算术科补习为名来开展工作。刚开始仅有10多人,第二个月每期一个月就增加到30多人,而后要求参加的人越来越多。这一活动表面上是给群众传授文化知识,但实质上是传播革命思想,招纳各方同志,培养革命新人,发动他们加入革命组织。可是刚办了5个多月,培训了近200人,就被清政府发现并取缔了。但他

们并没有灰心,于1906年4月转赴更偏远更隐蔽的罗城县龙岸圩开设竞化学堂,继续从事秘密反清活动,并得到当地青年李德山、罗一箫、廖有源等人的支持。为了加强教职员队伍力量,他们又通过统领部随营学堂易麦秋、陈晓峰等人,请来了越南革命统领关仁甫担任高级教员,使学堂办得更加有声有色。转到龙岸比在怀远扩大了将近7倍,这给从庆远去授课的教员们带来诸多的不便,特别是对于卢焘来说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当时他的长女卢慈祥刚在庆远姐姐家出生20多天,家中只有多病的母亲、姐姐及年幼的外甥,月子中的妻子和孩子由谁来照顾呢?家庭、革命,真是忠孝难全。卢焘想了想,还是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让家里的困难暂搁一旁。于是在龙岸竞化学堂筹办之初,他一去就是整整一个星期。后来学堂走上正轨后,不管家里有多困难,他仍坚持每月有一个星期以上呆在龙岸授课和管理。卢焘的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革命精神得到了当时上级同盟会组织的表扬。

#### 4 辞去军职,一心革命

正当龙岸竞化学堂办得红火的时候,1907年初,由于有人告密,遂被清政府查封。于是卢焘与张铁城便毅然向龚捷三统领辞去统领部参谋职务,带着母亲、妻子、女儿来到桂中最大的商埠和军事重镇——柳州,创办樟脑公司,并开设富贵升旅馆,给同盟会组织筹集资金,专门从事革命活动,招纳各方革命同志。柳州,地处广西中部平原,融江、龙江、贝江、清江等交汇于此,合称柳江,因柳江自西北环绕城东南而流,像一条巨龙蜿蜒而过,故别称“龙城”。柳州是当时广西继省会城市桂林之后的第二大城市,市内工商繁荣,名胜古迹众多,如我国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衣冠墓、柳侯祠、鱼峰山、大龙潭等。在同盟会组织和朋友的帮助下,卢焘和张铁城很快就把樟脑公司和旅馆运转起来。樟脑公司是集生产、收购、销售

为一体的生产贸易公司，卢焘凭着原来在拉门樟脑厂打工学到的经验，在柳州西北郊首先建起了一个有30多个人的樟脑厂，韦钦武是他的助手。卢焘既当厂长，又当技术员，同时也是一名工人，样样都干，样样都管，使工厂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就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产品。张铁城则在公司本部负责收购社会零散的樟脑和贸易工作。而承租的约有20多个床位的旅馆，则由妻子和一个雇工打理。樟脑公司和旅馆开业后，其生意一直走好，效益显著。特别是旅馆开业后，几乎是天天客满，来往这里的多是同盟会员，他们常常云集在这里，密商革命事宜。

卢焘、张铁城等人，通过创办半夜算术科、竞化学堂、樟脑公司、旅馆等作掩护，使柳庆一带的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仅同盟会会员人数就迅速增至近百人。如卢笙伯、王威洋、易麦秋、刘古香、陈晓峰、李德山、龚德胜、韦钦武、龚献之、张品三、郑明斋、廖有源、黄岱道、罗一箫、韦五洲、韦玉卿、金凤、李凤、韦统准、韦统铃、韦荣初、韦树模等。卢焘与张铁城等人不仅为广西培养了大量的革命人才，而且也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不少的骨干力量。如在1910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和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中，参加起义的广西革命者，个个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才能。黄花岗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李德山就是广西罗城龙岸人，在起义中英勇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就有广西的李德山、韦统准、韦统铃、韦荣初、韦树模等20多位英烈，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同盟会会员，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谱写了人生壮丽的诗篇。

## 5 义士齐聚会，密商到港购武器

1908年2月18日，柳州富贵升旅馆门外人来人往，但旅馆内的一间密室里，张铁城、卢焘、易麦秋、李德山、韦钦武、刘古香等几十位同盟会员聚集这里密商大事。会议开始，便听李德山等人汇报

去广州的情况。李德山说：“诸位同志，我们这次去广州，上级说我们分会组织机构已经健全，往后我们的任务是配合总会发动武装起义。”于是针对起义之事，大家展开了讨论。易麦秋说：“要响应中山先生发动武装起义，得先搞到枪支弹药，可是通过什么渠道搞到枪支弹药是个难题！”之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了几个小时，终究没有得出结果。于是，张铁城发言了：“诸位静下来，依我之愚见，要搞到枪支弹药，我们可通过做生意来完成。我们常运樟脑到香港出售，在那里买回洋纱包，买洋枪装在里面，这样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可是还是有人反对道：“洋人不一定卖枪给我们呀？”“怎么不卖？洋人见钱眼开，要紧的是怕运回途中被各关卡查出。”卢焘似乎一锤定音地补充道。

最后，会议决定去香港买枪。由张铁城、卢焘、李德山三人，以运樟脑去香港出售为名，去完成该项重大任务。

## 6 密运武器返途被查，几义士潜逃广州

1908年农历五月下旬，张铁城一行3人带着公司生产和收购得的近千斤樟脑，在柳州乘船南下当时有万国贸易天堂之称的中国最大的国际大都市——香港。

香港，位于广东珠江口东侧，地处世界航道要冲，扼居我国华南门户，面积1061.8公里，1842年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占领（1997年7月1日我国已对香港收回主权）。在香港这个花花世界里，他们顾不上游玩和访友，在售完樟脑和顺利购买到60多支条长短枪及五六捆洋纱包后，便匆匆上船赶回广西。农历六月二十三日早晨，当船开到广西武宣县城码头靠岸时，便遇到了七八个头盘长辫，手握枪支，身穿蓝色制服的巡丁上船检查。巡丁们看见船舱内，堆放着几捆大包，便问：“这是谁的东西？里面都包着什么货物？”张铁城镇定地答道：“是我的，里面是洋纱。”没等张铁城说完，

几个巡丁就分别用探针刺着洋纱包。卢焘、李德山见状，立刻觉得大事不妙，屏住呼吸看着巡丁们的变化。突然有一个巡丁板着面孔朝着张铁城问道：“你敢保证包内装的全是洋纱？”卢焘、李德山朝巡丁轻蔑地白了一眼，齐答道：“洋纱包装的不是洋纱，那还装什么？”

巡丁们得此回答，恼怒起来，狠狠地说：“倘若查出别的货物来你们怎么说？”“怎么说都行？”张铁城脸上毫无惧色，冲着巡丁们说。巡丁们即用刺刀把洋纱包一捆一捆地划破，发现里面暗藏着不少亮铮铮的枪支。一时间，整个气氛极度紧张起来，巡丁们顿时脸色变黑，怒气塞胸，握紧枪支，指着张铁城、卢焘、李德山说道：“你们真是胆大包天，从什么地方运来这些东西？要运到什么地方去？”

由于事关偷运枪支，于是巡丁们立即把张铁城、卢焘、李德山带到县厘金局，由局总亲自审问。在厘金局，张铁城从容地向局总说：“我姓张名铁城，素与你们柳州府杨道霖太守厚交。今天运这批枪支，实属想发一笔横财而已，别无他意，如何处办，请局总大人三思。”局总听了张的话，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战，眉头也皱了起来。为了掩饰他心里的虚怯，他又转问旁边的卢焘：“你叫什么？”卢焘说：“我叫卢亮畴，和张老板同仁。”

局总感觉头疼了。杨道霖太守是自己的上司，倘若处理不好此事，日后必招麻烦。于是，寻策觅计，给省巡抚张鸣岐稟告此事。张鸣岐得到稟告后，手击案台道：“什么杨道霖的厚友，你们可不要上当受骗让他们蒙混过关。张铁城是地道的同盟会会员，他偷运武器，完全是准备发动武装叛乱，妄图颠覆大清江山！”当时同盟会在南方屡次发动武装起义，仅钦廉起义就占领了防城，杀死清朝县令宋冕之，张鸣岐为此惊恐万状，立即电令柳州府杨道霖太守缉拿张铁城、卢焘、李德山。

杨道霖太守接到省巡抚张鸣岐的电令后，也觉得左右为难。张铁城确实是他的厚友，但他触犯了大清皇法，怎么样才能对上对友

都能说得过去呢？左思右想，杨道霖终于想出一个比较两全其美的办法来：即先秘密通知张铁城、卢焘、李德山逃往广州，估计他们离开自己的辖区后才下通缉令。这样，既不伤朋友情面，又执行了上司的命令。得到杨道霖太守的变通之计，张铁城、卢焘、李德山便立即从武宣县城乘船逃往中国南方当时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广州。

## 7 环境险恶，各奔南北

广州，俗称“羊城”，素有“花都”之美名，地处珠江三角洲平原，是华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两广总督”督署的所在地。张铁城、卢焘、李德山刚逃到广州落脚不久，广西巡抚张鸣岐又电告广州两广总督张人骏缉拿他们。一时间，广州大街小巷都贴满了悬赏张、卢、李的通缉令。令曰：“……凡能抓到上述一犯的，每人重赏一千块银元；凡窝藏者，与逃犯同罪！”1908年农历七八八早晨，他们看见广州城内城外，到处张贴总督的通缉令，觉得自己的处境极其危险，于是他们便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商议如何逃离这种险境。

卢焘首先说：“鱼书兄，眼下广州环境险恶，看来我们得逃往南宁了。”张铁城马上惊诧起来：“南宁为广西辖区，那里最早发出通缉令，我们今天又朝那个方向走，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卢焘解释说：“鱼书兄忽略了，广西虽然先发出通缉令，但是他们都知道我们已逃往广州，必然认为我们不敢再往那里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许老虎麻痹大意了。”张铁城觉得卢焘言之有理，但他认为还有一个更妥的办法。便对他们说：“我们一同逃往南宁，若有不测，三个人都身陷囹圄，那我们今后就无人与组织联系了，组织造成的损失太大。不如我逃奉天（今沈阳），你们逃南宁，怎么样？”卢焘与李德山点头赞许。

然而,当他们刚谈完准备分别的时候,韦钦武等人找到了他们。原来张铁城、卢焘、李德山在武宣被释放出来后,同盟会柳州组织就派韦钦武、龚献之、廖有源等10多人,分组分别赴广州、梧州、桂林等地,协助他们3人潜逃。韦钦武等人见到了张、卢、李3人后,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不仅向张、卢、李转达了同志们对他们的关心和汇报了后方的工作情况,而且还代表组织给他们送来出逃的经费,使张、卢、李大为感动,深感组织的温暖。

将要分别的时候,卢焘单独对韦钦武说:“兄弟,你什么时候返柳?”韦钦武答道:“本来还不想回,因为这里还有许多事未办完,可是你的家人目前无人照料,而你又无法回去,我只得马上赶这班船回去。”提起家人,卢焘的眼眶立刻湿润了。自从5月赴港购枪到现在,由于情况危急,已有一个多月没有与家人联系了,想想与母亲、妻子和幼女不辞而别,而且现在还在四处奔波,他不禁心酸泪下。卢焘紧握着韦钦武的手连声说:“谢谢哦,谢谢你老兄!我家老少全拜托你啦!”韦钦武也连连答道:“放心吧,亮畴兄,我俩亲如兄弟,你家的事也就是我家的事,我会照料好她们的。”说完,张铁城、卢焘、李德山及韦钦武等人,便各自朝着自己的目标和方向,离开了岭南重镇广州。

## 8 南宁无法立足,再择龙州进发

回到南宁,由于情况紧急,卢焘和李德山决定分开居住。有一天晚上,卢焘来到南宁西郊,看到墙上到处还贴有他们3个人的通缉令。他在一个小旅馆住下的时候,也听到不少人在议论着他们的事。几天过去了,卢焘几乎每天都换着一个地方来住,但还是总觉得不安然。南宁,地跨邕江两岸,古称“邕州”,是左江、右江的交汇处,属桂南平原,也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各国的南大门和南方军事、商贸中心(今为广西首府)。在南宁,卢焘反复思考,总结失败的教

训。他领悟到,要继续革命,赤手空拳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设法加入新军或进军事学堂,学习军事技术,宣传革命思想,争取更多的同志,共同努力,才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他打算一是到云南昆明去,那里有一位柳城同乡在官府做事,可找他帮忙加入新军或进讲武堂;二是到龙州进中法书院学习法文。正当卢焘酝酿下一步路如何走的时候,在友人的提醒下,他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不妨投奔龙济光,那里最安全!当时,龙济光是南宁驻军的长官,卢焘曾经与他有过一段不平凡的交往。原来,卢焘小时候随姐夫郭礼轩在庆远读书的时候,郭是龙的部下。有一次,郭礼轩请龙济光到家里做客,龙进屋后,郭用壮语对佣人(壮族)说:“要杀黑龙(壮语意:要茶给龙伯伯)。”龙是云南彝族人,不懂壮语,听到郭这么说,以为他暗使佣人来杀自己,于是立刻抽出佩剑,要杀郭礼轩。当时卢焘也在旁,他看见情况紧急,连忙向龙趋步合掌道:“统领不要误会,我姐夫往昔为人如何统领心里明白。”龙见佣人送茶上来后,才知自己动作冒失。他很感谢小卢焘,要是没有小卢焘,他就误杀了一个好部下。于是他夸赞小卢焘道:“胆量超人,临危不惧,等你长大后我一定重用你!”还有一次,也就是卢焘在桂林被姓王的骗走衣服的那天中午,卢焘正在街上找路去周鑫吾部队的时候,正巧碰见了龙济光,龙问他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卢焘不好说来当兵,就骗说他来这里读书,龙拍着他的肩膀:“好好用功啊,等你毕业了我一定重用你!”临别时,便将几块银元硬塞给他。

通过这些事,卢焘想龙济光一定还会记得他的。于是有一天下午,卢焘找到龙部的驻地,就大摇大摆地走进龙的军营。当岗哨问他:“你找谁?”他直说:“我找你们大人,我是他的亲戚。”几个卫兵互相耳语了一番,也不问什么,就让人将卢焘带进去。龙济光一见到卢焘,既兴奋又惊讶地说:“唉呀,亮畴,你胆子真够大的,这个时候来找我难道都不有点怕吗?”龙边说边让侍从退下去,并亲自给卢焘倒茶。卢焘说:“没办法哦,就是因为有这个困难,我才敢来找

龙大人呢！”龙马上说：“我知道了，你就先在我这里住下去吧！”于是便叫侍从给卢焘安排好食宿。

卢焘在龙济光的军营里，高枕无忧地住上了几天后，他想：如果在龙的部队长住下去是可以，他对自己也好，也会给自己安排一个好的工作。可是这样下去，对革命工作会有影响，自己恐怕还是早点走为上策。但走要有资金，去哪里找钱呢？一天中午，卢焘斗胆走进龙济光的办公室，对他说：“大人，我在你这里已住了这么多天，真不好意思再麻烦大人了，我想去龙州中法书院学法文，你能否借点钱给我？”龙惊讶地反问道：“你说什么？你还想去学习法文？当今中国局势混乱，学习法文有什么用，只有跟我搞这个才有出息！”龙举起拳头，表示只有从事军事才有出路。

卢焘见龙这样说，灵机一动，便改口说：“大人，讲要去学习法文，这只不过是我想试探你罢了，其实我是想学武的。”“唉，这样才对，你小时候我就看得出来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学武，应该学武！”龙这才兴奋地说。卢焘边喝茶边观察龙的脸色说道：“大人，学武这条路我是走定了，可是要学好得花好多钱呢，我现在身无分文，你能借点给我吧？”“你要多少？”龙问。卢焘说：“要两百元。”龙惊讶地瞪大眼睛：“两百元，你要这么多干嘛？”卢焘答道：“我想去云南讲武堂学军事，路途遥远，需要许多经费。”龙立即举手拒绝：“不行不行，什么讲武堂，你一个文弱书生的，扛把洋伞差不多，扛得动洋枪吗？我看你跟我学习最好！你就在我这里当文书吧，每个月我可以给你几十两银子，否则我分文不给。”卢焘费了许多唇舌，可龙始终不同意借钱。最后，他还是扫兴地离开了龙的军营，到外面另寻新的生路。卢焘此时下决心，他现在并不是要找碗饭吃，谋个职务，而是要学军事，继续革命。于是，他与李德山向友人借了少量的盘缠，就沿左江步行而上，向中越边陲小镇——龙州进发。

## 9 龙州化险为夷，从此更名“卢焘”

卢焘与李德山去龙州，同路的还有友人十六七岁的小孩小毛。走了几天，一天中午，他们在路旁大树下休息，小毛不慎被一只大蜈蚣咬伤了腿部，当即红肿，疼痛难忍，大哭不止。二人商量之后，决定把仅有的旅费分为三份，由李德山带小孩返回南宁医治。从此，卢焘与李德山就失去了联系。

龙州是中越边境的一个小镇。卢焘一个人徒步去龙州，前路茫茫，说不尽的孤单和惆怅。沿途美丽的风景，他视而不见，无心浏览。由于赶路心切，某日天色已是黄昏，他却还未找到投宿的地方。走着走着，突然阴云密布，竟下起了滂沱大雨。道路泥泞，天又快黑了，视线越来越不清晰了。他心里有些慌，于是在大雨中加快步伐，但前方一条小溪拦住了去路。暴雨之下，溪水猛涨数尺，奔腾急湍，卢焘无法再走了。这里两侧群山连绵，路旁大树参天，前后十多里荒无人烟，前不靠村，后不着店。卢焘心急如焚，他暗道：“老天毁我了！老天毁我了！”于是大声地呼喊起来，看看邻近有没有人。突然，有两个年轻小伙子，扛着扁担，穿过雨幕疾步走来，他们二话不说，一人站到水中，一人站在岸上，将扁担递给卢焘，把卢焘接过了小溪。卢焘上岸后，正要向两人道谢，可是他们已不见踪影。卢焘感到奇异，百思不解。

这时，天已经全黑了，雨也渐渐小了。卢焘知道那两个救他的青年已经走远了，他也不得不星夜赶路了。尽管走了一天山路，既没吃上东西又被风吹雨淋，疲劳、饥饿不断向他袭来，但他还是坚持摸索着前进。走了大半夜，才看到前面不远有一处星火在晃动，卢焘高兴极了，他知道有火就会有村庄。他来到一家茅屋前敲门，开门的是一位满脸皱纹、银发苍苍的老大娘。她看见卢焘满头乱发，一身湿衣，便问道：“孩子，你从什么地方来，为啥湿成这样子？”卢焘说

明情况后,大娘立即叫他到火塘边烤火,把身上的湿衣服烘干,同时又煮饭给他吃。卢焘边吃边直言问大娘道:“大娘,这一路没有客栈,今晚上我想在你这里借宿可以吗?”谁知听后大娘像训自己的孩子似的说:“说什么傻话呢,孩子,你能到我这里吃住,算是我有福了。”经了解这位老大娘的儿子已在边境作战中牺牲了,现家里仅有大娘一人,生活十分困难。

第二天一早,卢焘将饭钱和住宿费交给大娘时,大娘把他的手推开说:“孩子,你看得起我的话就把钱收回,这钱顶什么用?你留着它,替我积点阴功,让我多延年益寿!”于是卢焘千恩万谢,继续登程赶路。

走了一段路,过了一个小圩集,卢焘来到了左江边。此时已是中午,太阳升得老高了,从江面上南宁开往龙州的客船正在靠岸接客。想到几天来走路腰酸腿痛的困苦,卢焘很想坐船去龙州,可是他摸摸衣袋,囊中仅有几两银子,吃饭都嫌不够,去哪里找船费呢?卢焘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上船再说,到龙州后再找熟人借钱付船资。于是他跟着人群也挤上船去。当船役来问他要船费时,他说没有钱了,到龙州再付。可是船役哪肯如此将就?坚持先付钱才能坐船,否则就要推他下船。卢焘见到这个船役没有丝毫的松动灵活,就叫船役带他去找船座讲。见到眼里布满血丝的船座,卢焘说出了自己的窘迫和到龙州后找人借付的打算,船座上下打量了卢焘说:“可以,但你在龙州得有个担保人。”“有,他叫关仁甫……”卢焘倏地感到自己失言,但他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当船座继续盘问他关是哪里人、长相如何、何时与之相熟时?他低声地对答如流。与此同时,卢焘无意中还发现了船座的桌底放着一本《水浒传》和掩在下面半露的一份同盟会的旧文件,暗自想自己可能找对人了,这位船座肯定也是一位同盟会员呢!后来,只听船座说了一声:“好吧,那你回去大仓里坐。”

回到大仓,由于很累,卢焘就找到大仓楼梯角蜷伏而卧,不久

便睡着了。第二天天刚亮，他忽然听到有银毫落在仓板上的声音，而且靠近自己。他想是不是楼上账房漏落下来的，但向上一看，根本又没有什么漏洞。由于几天的徒步跋涉，他非常疲倦，因而继续睡下去，同时也等待别人来寻找银毫。可是等到中午准备下船时，也不见有人来找。卢焘把银毫一数，竟有十多元，不仅足够船资，而且尚有结余，他感到十分幸运，也久思不解，难道真乃天助也？

卢焘在龙州码头道谢船座上岸后，在友人的带领下，他找到了关仁甫。关是广西上思县人，早年随孙中山革命，同盟会员，后曾为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并任过军长等职，眼下正负责中越边境镇南关、平而关、水口关军事，任管带。见到卢焘，关仁甫紧握着他的手，兄弟二人于龙岸竟化学堂一别，已近两年没有见面，死里逃生今日重逢，他们真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卢焘向关说明了来意，关表示支持，并保证地说：“你去云南，盘缠之事由我负责。要使革命成功，必须拥有武器，拥有权力！”接着他又沉痛地说：“我们上次在镇南关起义失败，正是因为缺乏武器，没有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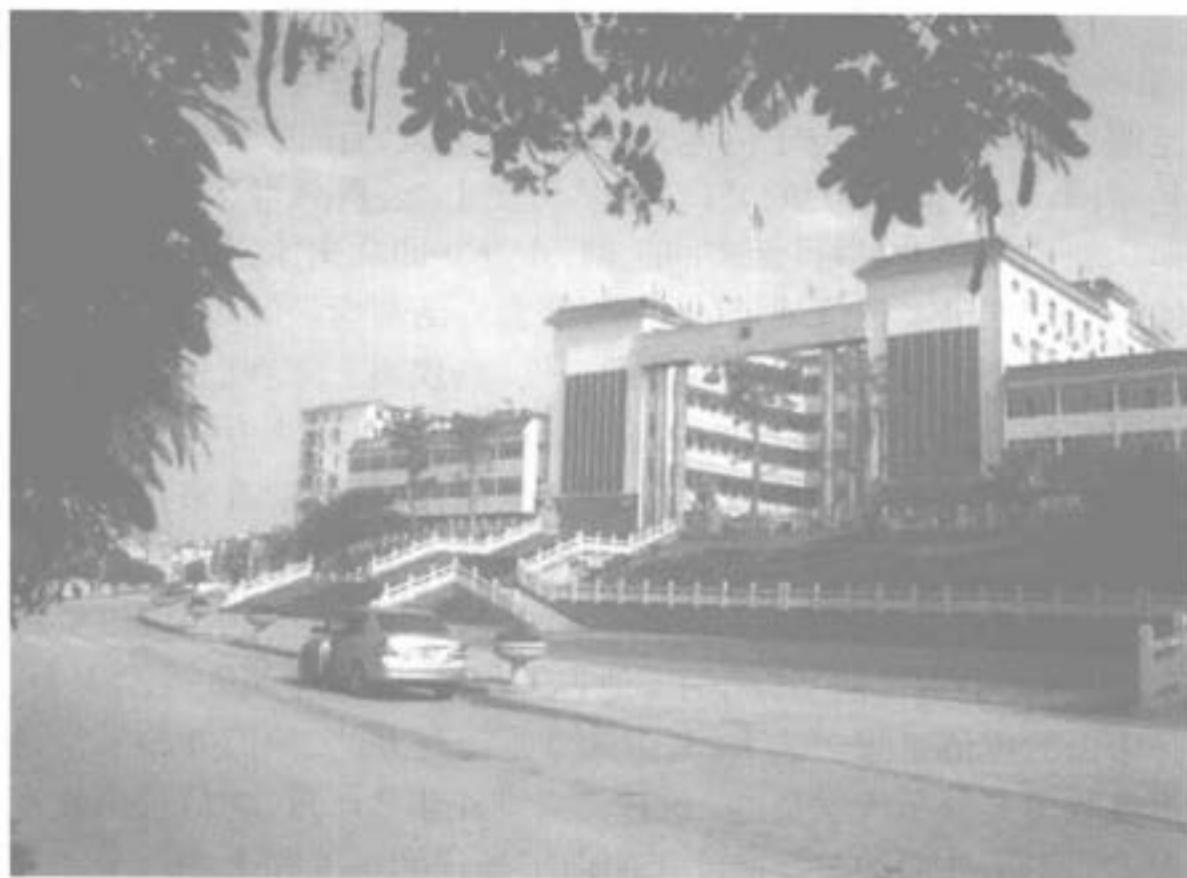
临别时，关仁甫又提醒卢焘道：“斗争是残酷的，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最好把你卢亮畴的名字也改了！”卢焘想了想，觉得对，改名不改志，于是经过一番斟酌，他决定把名字改为“卢焘”，“焘者，覆盖也”，意为希望自己能为老百姓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

## 10 街头联手卖对联，寻找人生出路

从关仁甫处出来后，卢焘虽然得到关仁甫近百两银元的资助，但碰到友人的小孩病倒了，他立即就拿出几乎一半的资金，交给了友人给小孩治病。于是去昆明的事，又暂时被搁置下来。卢焘被迫在龙州停留了一个多月，每天住在一个小客栈里。与他同住客栈的有个贵州盘县人叫冯松生，是清末的一个贡生，卢焘和他很谈得来，甚是投缘。冯松生也是到龙州谋事的，刚到不久，正在等待机会，盘缠

不多,手边也很拮据,所以暂住在小客栈。他比卢焘年长,看到卢焘很有志气,便与卢义结金兰,以兄长的身份对卢焘予以照顾。

时值冬末,如何渡过年关,是摆在他们眼前的迫切问题。冯松生便对卢焘说:“我们都是读书人,又能写字,不如写点春联去卖,好度年关,又给你增加去昆明的盘缠。你看如何?”卢焘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便说:“好啊,你写我卖!”于是他们就上街买回了不少红纸、笔、墨等,冯松生在客栈里写好春联,卢焘便拿到街上去摆卖。遇到赶圩之日,村民看到春联写得好,书法又漂亮,内容又喜庆吉利,买的人特别多。还有邻近这个客栈的居民,也都纷纷前去请他们写对联。他们后来清点所得收入,除了能过一个丰盛的春节外,还为卢焘凑齐了去昆明的足够资金。



今日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大门雄姿

## 第六章

# 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与朱德同班

### 一 云南从军考入随营学堂

1909年3月春节刚过，卢焘就告别冯松生，离开龙州绕道安南（今越南）河内，于3月下旬转抵美丽的云南省会城市——昆明。昆明，别称“春城”，位于滇池北岸，气候宜人，有“四季如春”之誉，是中国西南边陲最大的城市，也是历史上“云贵总督”督署的所在地。在他乡异土、举目无亲的时刻，卢焘立即拿出原来友人写给他的广西柳城老乡杨仪地址的字条，就直奔昆明府。经过多方打听，他终于找到了时任昆明府官员的杨仪。杨仪离开家乡已久，见到家乡人来找自己，那热情相见的场面就甭提了。可是卢焘提到自己要去讲武堂学军事时，他却为难地说：“老弟，这个要求看来我无法帮你的忙。”卢焘以为杨仪怕自己向他借钱去报考才这样推辞，于是就向他说明了自己想来云南学军事的经过。杨仪说钱他可以资助卢焘，但考得不得他却保不了。他告诉卢焘：因为广西人受洪秀全、孙中山的反清思想影响太深，讲武堂是清廷办的，他们办的学堂是不吸收嫌疑分子为学员的。还有云南排外非常严重，学员只招收本省人，不招外面的。卢焘终于明白了杨仪的难处和个中的一些奥妙。

于是，经杨仪的介绍，卢焘于1909年4月先到云南陆军第十

九镇机关枪营任文书。由于卢焘外形貌端气正，才学渊博，办事又是稳重熟练，才任文书仅一个月，就被管带李承邺看中，遂提拔到他身边任参谋。然而，卢焘并没有实现来昆明的初衷。一天，卢焘想，云南排外严重，学堂只招收本省人，那我不如学会讲云南话，把自己改变成云南人不就行了吗？于是卢焘在机关枪营时，就有意识地与云南人特别是云南与广西百色交界县份的人结交，跟他们学讲云南话，了解云南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地方方言。

1909年8月，云南陆军第十九镇崔祥奎镇统开办随营学堂招生，卢焘觉得时机已到了，便去报考，他在报名表上填写的籍贯是云南广南县。可是当主考官提问他时，他说的云南话并不很流利，还夹杂着广西口音。考官怀疑他不是云南人，问他是什么地方人。他急中生智，说自己是广南县人。广南县与广西百色接壤，其方言介于云南广西之间。考官不懂广南方言，以为卢焘说了实话，便让他顺利通过了。在文化课考试时，卢焘又以前10名的成绩进入了录取线。这样，卢焘终于成为随营学堂的一名学员了。

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大门



他的夙愿实现了，那是多么的兴奋和激动啊，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内就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告诉了老乡杨仪，让他和自己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 2 荣幸进入“尖子班”，与朱德等同班

卢焘在崔祥奎的随营学堂学习了一个学期后，由于清廷对全国军队学堂的整顿，1910年正月，崔祥奎的随营学堂并入李根源总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李根源系云南腾冲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08年8月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任监督，与随营学堂合并后任讲武堂总办。随营学堂归并讲武堂后，经过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地形学、交通学等科目的严格考试挑选，卢焘因成绩优异，被编入步兵科特别班，与朱德等同班同学。

云南陆军讲武堂当时(一期)教职工的政治成分是：教职员总人数47人，其中同盟会会员人数17人，各革命党派人数11人，留学日本者人数10人，其他9人。作为一座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云南陆军讲武堂可谓群英荟萃，人才济济。讲武堂的学员教官不少其后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李根源、唐继尧、罗佩金、李烈钧、顾品珍、唐继虞，贵州省省长兼黔军总司令卢焘，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曾任北伐军总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先后任北伐军总参谋长、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云南省主席金汉鼎、胡若愚、胡瑛、龙云、卢汉，热河省主席孙渡等，担任过省长或省长以上的职务；还有在白山黑水中与日寇奋战了多年的周保中将军，在云南和平起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朱家璧将军等共产党人……可谓名将辈出，非同凡响。然而，在讲武堂众多战绩辉煌、功勋卓著，对历史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的杰出人物中，最值讴歌的乃是朱德和叶剑英元帅。

尽管从讲武堂出来的也有一些沦为国家民族败类的人，如杨



卢焘(二排右二)与朱德(前排左一)等同学在云南讲武堂合照

希闵、刘存厚、何应钦等，但这些并无损于讲武堂光荣的历史和光辉的形象。云南讲武堂是当时国内最进步、最先进、最有名的军校之一。

如愿以偿了，卢焘的心也宽松了许多。自 1908 年 5 月下旬离开柳州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年都没办法与家人联系了，母亲、妻子、女儿，不知道她们目前的情况怎样？于是他铺开信纸，凝神静思，把自己从离开柳州到香港返回武宣被查到潜逃广州、南宁、龙州，又经安南河内转到昆明从军及后考入讲武堂紧张而愉快的学习和生活等坎坷的经历以及思念家人的心情，写了一封家书，通过老朋友韦钦武转给家里的亲人，让她们放心。1910 年 4 月 3 日下午，卢焘收到了韦钦武的回信。韦钦武在信里说：“武宣事发后，令堂及嫂夫人为避免株连，趁黑夜逃离柳州家里，生命虽然保全，然生活难保，曾在柳州讨饭度日，弟自广州返柳后，在友人的帮助下才找到她们，并于当年底将她们送回宜北老家，去年正月十一，嫂夫人又喜得一小千金（即次女卢慈明），目前家里各项我都已安排妥当，全家老少安康稳定，请吾兄安心学习，日后为国家效力……”得到家人都还安在，且喜添千金的消息，卢焘既高兴又愧疚，禁不住流下了

热泪。那一夜，他失眠了，他想到了在宣北老屋家里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想到逃往奉天的张铁城，想到返逃龙州途中失散的李德山……

云南陆军讲武堂坐落在昆明小西门至翠湖边的承华圃，东起翠湖西岸，西至钱局街，南迄洪化桥，北至仓园巷。讲武堂是清廷培养优秀军事人才的军事学堂，教育和训练非常严格。它设有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四科。各科的军事教材均采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其中有战术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马学，称为大教程；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称为小教程。为了培养学员实际指挥作战的能力，还有图上战术作业、沙盘教学、实地测绘和野外作战实习等。在操场上，严格地进行班、排、连、营、团的队列教练，要求每个人姿势端正，动作敏捷，各个动作都要反复练习，做到娴熟了才能结束。丙班学员除学科和术科外，还有普通学科，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伦理、代数、几何、英文、法文等，头半年主要是补习普通学科，以后就专门学习军事学科。

进入讲武堂后，卢焘被编在特别班丙班二队学习步兵科。同班同学有朱德、范石生、朱培德、李云鹤、杨希闵、杨如轩、杨池生、蒋光亮、王均、董鸿勋、唐淮源、李文汉、田钟谷、杨蓁、邓泰中、李雁宾、胡瑛、洪鹤年、朱泽民、杨复光等。

每天清晨，当嘹亮的军号声迎来黎明之后，学员们就列队走上操场，唱起激动人心的讲武堂堂歌，开始一天的训练和学习的生活。这首堂歌的歌词是：

风云滚滚，感觉它黄狮一梦醒。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做长城。  
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但凭那团结力，旋转新乾坤，哪怕它  
欧风美雨，来势颇凶狠。练成铁臂担重任，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  
歎那世人，不上高山安知陆地平。二十世纪风潮紧，欧美人要

瓜分。枕戈待旦，奔赴疆场。保家卫国、壮烈牺牲。要知从军事，是男儿本分。鼓起勇气向前进，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

### 3 秘密传播革命思想，与朱德等同学歃血金兰

卢焘来到昆明后，不论在机关枪营、随营学堂，还是到讲武堂，他始终忘不了自己是一个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人。因此，不管学习现代军事知识有多忙，但他依然关注着南方的革命，他还常常与张铁城、李德山、关仁甫、韦钦武等家乡的革命同志通信。这些同志也常常给他寄来南方的革命刊物和书籍，如《南风报》、《民报》、《警世钟》、《猛回头》及《洪秀全演义》、《万古愁曲》等。一天，关仁甫给他寄来一份《南风报》，他立即跑回宿舍躲进自己的蚊帐里偷偷地看。《南风报》是广西同盟会组织编印的报纸，它的宗旨是报道南方革命消息，宣传革命道理，以达到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卢焘看得入迷了，这时背后有人轻轻地撩起蚊帐，将他手中的报纸抢了过去，卢焘一惊，心想：坏了，这次坐牢定了！这时，抢去他手中报纸的人压低声音说：“卢焘，这次你跑不了啦！我抓到你的把柄了！”卢焘回头来看，原来是本班同学朱德。朱德满脸带笑，他轻捶卢焘的肩膀说：“刘皇叔大哥，你放心，小弟不会告发你的。”因为卢焘从南方来，懂得许多革命道理，而且他年纪较大，为人又和《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一样忠厚，所以同学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做“刘皇叔大哥”。

看见是朱德，卢焘狂跳的心终于定了下来。他轻声地对朱德说：“玉阶（朱德的字）老弟，你看了我的书可得帮做点事，物色一下你所熟悉的人，谁倾向革命并意志坚强的，就发动他们订阅一份。”朱德生于1886年12月1日，比卢焘小4岁，所以卢焘称他做老弟。朱德表态道：“没有问题，我的几个密友都很倾向革命，也很想看南方的进步刊物，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谈心，怕你不信任。现在你这样说了就好了，过后我会找机会跟他们谈谈，他们也一定会

高兴的。”正当他们谈得津津有味的时候，课间宿舍的巡丁又走过来巡查了，卢焘立刻敏捷地爬下床，迅速把报纸密藏到床底的一块活动地板下。

据曾任云南陆军总司令、后在江西任军长的金汉鼎（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在20世纪60年代纪念卢焘的回忆文章说：“……一天晚上，在自习室里，邻座的田钟谷向我说，一队（分科前）有个同学卢焘来和我们谈关于订阅广西宣传革命的刊物《南风报》的事，你看订吗？我高兴地说，我们两人合订一份。这样，每当有暇，我就暗地阅读。有时，我和田钟谷、范石生三人找寿公（卢焘）谈论革命道理，因而知道他是一个革命宣传者兼实行家。看到他的气度，都是那么雍容和蔼，同学们只要和他认识，就感觉他亲切可敬。过了两个月，他就被挑选为特别班生，提前分科，使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一些，但他仍时刻关心革命学习。不知他从哪里拿了一部清廷禁书《洪秀全演义》给我们秘密传阅，宣传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革命纲领，鼓舞了我们的革命勇气。”

据曾任滇军师长的李文汉（新中国成立后在云南文史馆工作）回忆说：“卢焘同学，由广西到云南，是有目的。到昆明后不久，他先到标营里当司书生（文书），由标营考入陆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他除热心求学外，就不断地向可谈的同学宣传革命道理。以后随营学堂并归讲武堂，我就常和他在一起，知道他是一位有革命热情的志士。后来我和他同被挑选为特别班生，提前分科，我和他的自习室座位很近。当时广西发行（我记得是桂林印的）《南风报》，就是宣传革命的刊物。他在同学中征求订阅。我与杨如轩合订一份，看后增进不少革命道理和勇气。不久，他又接到广西寄来的明末归玄恭所写的《万古愁曲》一书，他刻写油印分赠同学，同时又把黄山配所写的《洪秀全演义》暗中给同学传阅，卢焘就是这样在同学中传播革

命思想的。”

进步的同学们看到了进步的刊物和书籍，南方的革命热潮鼓舞了他们的革命斗志。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卢焘、朱德、范石生、杨慕、邓泰中、田钟谷、李云鹄、胡瑛、杨希闵、李文汉等 10 人，一起床就精心洗梳了一番，换上干净整洁的军服，穿上锃亮的皮鞋，扎上腰带，陆续来到讲武堂东边的翠湖风景区碧漪亭边的一个树荫遮蔽的角落。落脚坐定后，卢焘宣布：“今天我们 10 兄弟来这里开会，主要歃血为盟，义结金兰。”接着，范石生从怀里掏出一瓶酒，倒进事先准备好的一只青瓷大碗里。田钟谷手持一把尖刀，另一手从地上的口袋里抓起被捆住双脚的一只公鸡，将尖刀靠近鸡脖子，口中还念念有词。念完，只听公鸡一声尖叫，鲜红的鸡血喷了出来，流进了那青瓷大碗里。卢焘示意大家围坐在酒碗四周，他用双手捧起瓷碗，庄重地和大家环视了一下，然后对天盟誓：“我卢焘同朱德、范石生等一班兄弟 10 人，今日在讲武堂结义为异姓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完，他立刻端了瓷碗，喝了一大口。

接着朱德端起酒碗念道：“我朱德同卢焘、范石生等 10 人结为弟兄，愿同生死。”范石生则说：“我同卢焘、朱德等 10 人，今后就是生死兄弟，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同心同德，同甘共苦，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之后，余下 7 个兄弟都按年龄大小依次盟誓。10 兄弟全部盟誓之后，找到一家菜馆，让厨师把那只公鸡褪毛煮好，又要了一些菜，高高兴兴地饱餐了一顿。此后，他们几乎每星期聚会一次，交流看法，讨论各种问题。那家菜馆就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点。同时，范石生的家就在翠湖附近，就经常邀请卢焘、朱德等人，到他家里做客，范的母亲每次都热情招待，常常留他们在家里吃饭、过夜，使卢焘、朱德等倍感亲切，从此他们彼此更亲密无间。

#### 4 记忆超人,品学兼优,深受校长教官器重

讲武堂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注重学生的身体锻炼,培养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全体学员就迅速起床,叠被、整队上操,早晨训练有柔软体操、器械体操或集体跑步;上午两次学科,两次训练;下午自由器械体操或唱歌、集体跑步;晚上自习两次。夏天没有暑假,只有每周一个休息日。平日除了睡觉吃饭外,几乎没有多余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夜间睡觉以后,也还常有紧急集合的练习。学员们很快适应了紧张艰苦的学习生活,大家都自觉地锻炼身体和自己的意志品质,越辛苦越觉得充实愉快。

卢焘也和大家一样,事后他常对部下和身边人讲:“在讲武堂那个时候,我学习很舒服,又没有什么顾虑,家嘛又离得老远,也没有什么亲戚,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由于卢焘无比地勤奋刻苦,加上他的基础扎实和天生的军人气质,很快就成为讲武堂的高材生,学科、术科和普通学科都取得优异成绩,名列全班前五名。尤其是体育课,他拉的单双杠,最多时可拉上一百二十上下,各项动作要领完成得非常漂亮,令人叫好,成为全校拉单双杠的冠军。而他的密友朱德则是跳远冠军,范石生是射击冠军,当时学生们羡慕地称他们为“模范卢朱范”。更令人佩服的是,在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等学科学习时,卢焘则更显示出比其他学员强得多的领会理解能力。大部分学员需要花很多时间才弄懂的问题,卢焘多半是教官一讲就明白了。有一次,他当堂提出一个问题,还把教官问住了。因此,各科教官经常点名要他站起来回答问题。

卢焘还有超人的记忆力。有一天,讲武堂总办(校长)李根源亲自带领全校几百名学员到滇池附近进行野营训练。各项训练完成之后,李校长顺便让学员们参观一下大观楼及其周围的风景。自由

活动结束后，在大观楼前集中听李校长训话时，李校长突然向全体学员问道：“今天在这里野练和游览，你们有什么发现？或有什么感想可以提出发问？”全场默然很久，无人提问或回答。卢焘环顾左右一下，就高举右手，表示有所发言。李校长一看就说：“卢焘，你有什么要提问？”卢焘答道：“我发现大观楼的对联做得很好。”李问：“你能背得出来吗？”卢焘当即把那副长联 180 个字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全场鸦雀无声，同学们个个注目卢焘侧耳倾听。只见卢焘镇定自如、抑扬顿挫地背诵道：

(上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州，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蘸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周香稻，万顷晴纱，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下联)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卢焘背完，李校长很惊奇地问道：“你到此地有多少次？”卢焘说：“今天是第一次。”李更加惊奇，又问道：“你对这长联的评价如何？”卢焘答道：“上联描绘大观楼风光，歌颂了我国大好河山，鼓舞人们奋发向上；下联概括了中华历史风流人物，可是格调低沉，鼓吹人生虚无、躲避现实的消极思想。我们作为新军学员，应积极进取，摒弃下联的厌世思想，为我国受苦民众建功立业。”卢焘说完，李校长连加称赞：“说得好，说得好！”并当即向在场的全体学员称赞卢焘的这种非凡记忆力和领悟能力，号召同学们向卢焘学习。这副长联，一般人反复多次阅读也是背诵不出来的。从此以后，李校

长对卢焘更加重视，时常关注他的学科成绩。

从滇池返回学校不久的一天下午，李根源通过教官叫卢焘去他的家里座谈。卢焘一到，李便对他说：“同学们都称你为‘刘皇叔大哥’，说明你在同学中威望很高，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看在眼里，我很久以前就想找你谈些事，可是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这一想法一直耽搁到今天才能面谈。”卢焘不知总办找他说什么事，在总办面前很是拘谨，只在那里静静地坐着听李总办的发话。可是李总办这时却不说什么，只在他旁边的墙上勾开一块砖头，便在里面取出几本书递给卢焘。卢焘接过来，翻着看，却有孙中山、章太炎、黄兴等同盟会领袖人物的文章。卢焘惊喜地对李总办说道：“原来你家里也藏有这类禁书啊！”李总办微笑道：“如果我家里没有这类书，你这个常在同学中秘密散布不轨言论的学生早就断头了呢！”此时，卢焘觉得一股热流在全身涌动。他兴奋极了，想不到李总办也是同盟会员，还有一些行动神秘的青年教官，如刚从广西调来的蔡锷协统（字松坡，湖南宝庆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随营学校教官、总理等职，是李经羲在广西任巡抚时的得意门生，这次调来云南也是李的关照）、李烈钧、罗佩金、李鸿祥、唐继尧、刘存厚、顾品珍、方声涛、雷飚、赵复祥、谢汝翼等，他们是不是也都是同盟会员呢？他们当中绝大部分近来都曾得到李总办的担保和保护啊！

此后，卢焘与李根源、蔡锷、李烈钧等学校领导和教官们的来往更加密切，情谊更加加深。

## 5 参加云南“重九”独立起义，荣获“二等功臣”

1910年7月中旬的一天，李根源校长又一次叫卢焘到家里谈事。一进门，李又从暗壁里取出一封信，把信页摊开后，他即用手指着上面的几行字。卢焘引颈去看，只见上面写着：“近日武昌当局及

清廷暗与英法等签订卖国条约,民众对此极其义愤,我共进会代表民众进言劝止遭侮辱,我等已与文学社密约,倘清廷一意孤行,我等将以武制之。”这是武昌同盟会领导人写给云南同盟会组织的一封信。卢焘看完这段文字,兴奋地抬起头来对李说:“总办,倘若武昌共进会对清廷采用武力,我们昆明将持什么态度?”李双手叉腰说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武昌举事,我们昆明定当遥相呼应。这次叫你来谈,就是让你在同学中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

1910年8月下旬,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第一期甲乙丙三个班的100多名学员毕业了。云贵总督李经羲亲自出席了毕业典礼。在对学生发表训话时,由于李总督身体虚弱,讲话声音太小,于是就让坐在他身旁的李根源总办代为传达。李根源大声传达道:“督办说,督办的云贵总督可以不做,而讲武堂不能不办。”

毕业后,全体学员全部分配到云南陆军第十九镇当下级军官。卢焘被分配到第十九镇(师)三十七协(旅)七十三标(团)三营后队(连)准尉见习生。其协统(旅长)是蔡锷,三营管带(营长)是李鸿祥,驻防昆明城郊。临分手时,卢焘与朱德、范石生等人,还组织同盟会各小组最后一次学堂聚会,商量起义事宜。他们已经接到指令,到新军以后要做好士兵群众的工作,争取他们同情革命,鼓励他们对清朝统治的不满情绪,为起义作好准备。

将要和朝夕相处亲密无比的好朋友分开了,卢焘心里十分难过,他依依不舍地与同学话别,特别是即将各奔东西的10兄弟更是难舍难分,他们互相勉励,互道珍重,互相祝福之后,就踏上了各自的征程。卢焘来到三营后,不仅管带李鸿祥、标统罗佩全都是同盟会员,而排长文鸿逵也是同盟会员,所以卢焘一到部队以后,士兵的群众工作,就做得有声有色。一天,卢焘到后队去参加士兵会议,散会后几十个士兵把他围在中间,大家争先恐后地问:“听说武汉新军造反了,占领了总督府,是真的吗?”“是呀!”卢焘兴奋地说。一个士兵说:“那咱们这里什么时候起事啊?”“这我就知道了,但

迟早总会有这么一天。”卢焘说：“朝廷腐败，鱼肉百姓，弄得穷人没有活路，在外国人面前却是一副奴才相，拿中国的财富去讨外国人的欢心，这样的朝廷迟早要被人民推翻掉。”大家都点头赞同。卢焘进一步解释说：“你们看川汉、粤汉铁路及我们昆明到安南的铁路，本来中国的铁路应由中国人来修，可朝廷偏把主权让给外国人。外国人控制了铁路，就等于朝廷在卖国。以后外国人就可以通过铁路将我们国家的矿藏资源运到他们的国家去，这样不是吸我们中国人的血吗？”卢焘越说情绪越高涨：“现在广东、四川、湖南、湖北人民起来反对，成立了‘保路同志会’，政府不但不支持，还派兵镇压。真成了卖国有功，爱国有罪了。”“这个鸟政府，真是混账！”有人骂了一句。卢焘看看大家，然后说：“现在我们是军人，每一个军人都应当为推翻旧王朝的统治，建立新中国作出贡献，报效祖国！”1911年4月、10月，广州起义、武昌起义先后爆发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潮流，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昆明也不例外，一场酝酿已久的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呼啸而来。

1911年10月30日，也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云南“重九”独立大起义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晚上8点20分左右，卢焘和战士们正要洗澡入睡，突然接到命令：所有官兵务必于晚上9点钟之前，全部列队到协部门前集合接受战斗任务。

晚上9点钟前，一队一队的士兵陆续来到协部门前，他们站定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剪辫子，全体士兵毅然地把象征着屈从于清朝的辫子剪掉，一面面中间写着“汉”字的旗帜扯了起来。

9点整，领导起义的全体指挥官一同到场。借助几十盏马灯的光亮，卢焘看到蔡锷协统一身军服，站在了最高指挥官的席位上。不一会，蔡锷就快步走上临时搭建的土台子上，用他那特有的冷静、高亢的声音说道：“三十七协的弟兄们，清廷专制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针毡、生灵涂炭。现在武昌首义，四处响应，皆欲扫除专制，复我民权，我辈军人为国民一分子，与其

被疑缴械，徒手待戮，何不持此利器，同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山河，兴我汉室为愈耶！果能如此，诚汉族之荣，军界之光也。”

下面数千名官兵齐呼三声：“革命军万岁！革命军万岁！革命军万岁！！！”大家呼声刚落，讲武堂总办李根源接着站起来讲话，他大声地说：“同学们，兄弟官兵们，同盟会云南组织决定，云南从即日起脱离北京而独立，立即成立共和军政府，同盟会诸公公推蔡协统为临时革命军总司令官，请问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官兵们又一次齐呼“革命军万岁！”的口号，表示拥护赞成。

接着，蔡锷布置战斗任务：命令七十四标及炮标二营所属部队由城南、校场等方向进攻云贵总督署为一纵队，由他率领指挥；命令七十三标及炮标一营所属部队由城北巫坝等方向进攻省军械局为二纵队，由李根源总办率领指挥。之后，又宣布了几条战斗纪律和有关规定。

蔡锷宣布完毕，雄壮的起义部队便在茫茫的夜色中，朝着各自的进攻目标，快速地向省城昆明进发。大约晚上 10 点 20 分，李根源总办所率领的第七十三标的 4 个营，都按预定的计划，分别到了城北、城东的阵地进行布防。卢焘所在的三营及炮标一营，在城东正面进攻省军械局；一、二营从城北入城进攻省军械局腹背之西北面。约 10 点半左右，正式起义的枪声从城北的五华山，圆通山打响了。紧接着蔡锷率领的七十四标和炮标二营，分别在城南、城西及在城东的七十二标三营和标炮一营也枪声大作。平时夜间死一般沉寂的昆明城，顿时四周枪炮声隆隆震天，拖着红色尾巴的流弹像飞蝗一样四处飞蹿。重九之夜，昆明战斗异常激烈，以云贵总督李经羲、第十九镇统制（师长）钟麟同为首的帝制军人，也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整个起义过程，战斗最为激烈的就是李根源总办指挥的 4 个营，在军械局、五华山、圆通山等处，特别是三营和炮标一营，在正

面攻击军械局时，清兵凭借有利的地形，加之兵多和火力强猛，负隅抵抗，使革命军久攻不下，相持鏖战。同时清军又以诈降手段，诱杀了不少革命军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革命军群情激奋，蔡锷、协统和李根源总办亲自到前线督战，官兵们个个奋勇争先，不怕牺牲。他们立即组织了敢死队用炸药将军械局正大门的围墙轰开一个缺口，并快速趁势冲入。这时罗佩金标统（团长）率领的一、二营在攻下圆通山之后，又及时占领了军械局西北腹背的银元局和兵工厂，此时，清军守敌发现三面受敌，于是方圆数里的军械局内混乱一团。卢焘所在的连队是打前阵的，排长文鸿達（讲武堂甲班二期毕业）在进攻五华山南麓之红棚子（城东军械局大门附近）时，就身先士卒，破哨上山，露出半截身子勇猛射击敌人，最后被敌人的机关枪扫射，胸部中弹如蜂窝，壮烈牺牲。次日清晨5时多，卢焘与一名同是见习生的王姓同学，一同冲上军械局的城头，当王姓同学将要把手执的共和五色旗插上城头时，不幸被清兵枪弹击中倒下，卢焘见状立即飞步冲上去，一把驳壳枪把火力点内的清兵打倒，接着举起义旗，振臂高呼：“诸位兄弟快上呀！快上呀！”后面大部队的战士们接着蜂拥而上，有的从炸开的洞口窜进，有的爬墙而上，有的破门而入。一时间，城东、城北的两路革命军几乎全部打进了军械局，歼灭了大部分顽敌，也有一部分清兵主动缴械投降。

农历九月初十早晨，天刚放亮，捷报传来，省军械局已被革命军攻破，军心大振士气高昂。随着城南、城西炮兵向总督府发射炮弹，革命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直接冲进了总督府。但李经羲却找不见，后来战士们在总督府东北面的四集堆一个名叫肖呆保的巡捕家里，把李经羲缉拿。李当时表情木讷，被捕时仍未清醒过来，他根本无法弄清起义的由来。当北校火起时，有人来报为首起义的是李根源。李却不相信地说：“我待李根源不薄，想来不致如此，且他刚才还见了我才下去的。”过了一会儿，他又接到报告，说蔡锷、罗佩金率兵入城与李根源汇合在一起造反，李仍不相信说：

“蔡锷我曾以心腹寄之，绝不至如此。”李被押至蔡锷设在江南会馆的指挥部，当他一眼看到起义的指挥官原来都是自己最信任的人时，当场就昏死过去了。

总督府的其他几个帝制派的要员，也得到了不同的下场。如第十九镇钟麟同统制，于初十上午八时多骑马在五华山阵地准备逃跑时，被义军战士击中战马倒下，然后他仰天长叹：“我钟麟同命运尽矣！”随即掏出手枪准备自尽，但被身旁的苏执事官（秘书）及卫兵竭力阻拦，钟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将枪口对准苏及卫士，将他们赶走，然后开枪自尽。第十九镇总参议（总参谋长）靳云鹏在当夜指挥清兵抵抗时，伤了手指，于当夜便扔下钟统制独自潜逃。当晚他伪装成车夫，抬一顶空轿子混出了城，11日晨乘火车逃往安南。兵备处总办（军械局）王振畿溜得更快，他在督练处听见炮声便化装潜逃，出小西门时，看守城门的义军战士从他身上搜出了手枪，怀疑他是奸细，将他送到指挥部。与此同时十九镇本部参谋长杨集祥也被抓获送到指挥部。鉴于这两人平时作恶多端，均以反对革命为能事，被指挥部下令处决。

云南“重九”独立起义，共毙敌300余人，俘敌2000余人，伤敌400余人，革命军牺牲官兵150余人，受伤200余人。农历九月初十下午，临时革命军总司令蔡锷宣布起义成功。这次起义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加速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推动了云南各地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使云南全省在短短的10多天里就全部实现了独立光复，从而结束了清朝在云南260多年的统治和千百年来的封建专制政体，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云南取得的划时代的胜利。

1911年11月10日，革命军在昆明五华山成立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公推蔡锷为都督。都督府下设参议院和军政部、参谋部、军务部等机构，李根源任参议院院长兼军政部部长。与此同时，军都督府还召开军人庆功大会，纪念缅怀在起义中英勇牺牲的

革命仁人志士，表彰奖励在起义中表现突出和作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卢焘在这次起义中，由于作战勇敢，毙敌多名，因此也荣获了军都督府授予的“二等功臣”光荣称号，并获得政府的奖金。同时，卢焘也由见习生直接提拔为七十三标三营后队三排排长。

## 第七章

# 奉命援川，促其反正独立

### 1 响应号召援川，升为后队队官

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正值川事危急，武汉吃紧。辛亥武昌起义后，四川省响应起义的力量由于反动派的镇压而分裂，四川省会成都仍然控制在清廷手中，革命派只在重庆及川北广安、川东万县、川南泸州等地起义成功，宣告独立，而这些各自独立的革命政权又面临清朝四川总督赵尔丰、清朝钦差大臣傅华嵩、清朝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等人的联合围剿。武汉方面更为危急，起义胜利后的武汉革命党人正与清军展开激烈的战斗。由于四川地处云贵和湘鄂之间，地势重要，如果川事稳定，对于武汉地区的革命势力将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因此，应革命派和独立各省的共同要求，云南军都督府决定出兵援川，并于11月11日讨论了“援蜀案”，标出三大宗旨：“一、天府之国，为形势所必争，川乱不平，则鄂无牵制；二、铁路风潮起，各省次第反正，川为赵、端所钳制，转不能独立，应扶助之，俾五族早定共和；三、赵、端大肆淫威，政学绅商，死亡枕藉，宜披发冠缨往救。”旋即组织援川军，以韩廷泽为总司令，刘存厚为参谋长，下辖两个梯团（相当于旅）。以谢汝翼为第一梯团长，顾品珍、张开儒、黄毓成助之；以李鸿祥为第二梯团长（后换杨杰任团长），张

子贞、黄毓英、杨发源助之。

1911年11月15日，援川军从昆明出发，分两路北上：谢汝翼率领第一梯团经东川、昭通入川，向四川叙府（今宜宾）前进；李鸿祥率第二梯团取道贵州威宁、毕节向四川泸州、重庆前进。卢焘随第二梯团出征，出发前卢焘被提拔为第二梯团步兵独立大队后队队官（连长），大队长为黄毓英。

## 2 古蔺人民央求部队不走，卢队官假借演习离开

援川军怀着崇高的理想，有着严明的纪律，朝气蓬勃，每天都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四川进军。作为连主官的卢焘，他总是身先士卒走在士兵的前头。晚上到了宿营地，他与其他连排干部还要考察地形，安排岗哨，布置宿营。夜间还要起身一两次，沿着他们设置的哨位进行巡查，并和哨兵们交谈几句。白天一路行军一路高唱着军歌，每天70里的路程也不觉得有多累。开始行军时，卢焘还担心群众不理解他们，害怕他们。于是，每到一地，他都十分注意向群众做宣传工作，和颜悦色地同他们交谈，命令士兵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许打骂老百姓，吃粮要米要给钱。他要让群众尽快知道，他们不同于清廷绿营队伍，他们是和老百姓的命运连在一起、为老百姓利益而战斗的共和军队伍。

当卢焘的连队行军快到四川古蔺县时，部队需要休整。卢焘即派人事先通知该县长熊某，让他给部队进城小驻两天，可是县长没有答复。晚上，卢焘率队来到该县，只见县府空无一人，里面财物扔得到处都是，被扔的东西中还掺杂着许多银元。卢焘猜测，县长可能是怕自己的队伍进城抢劫财物才仓皇逃走的。原来，该县长熊某闻讯援川滇军到来，误认为滇军是“天军”，吓得他惊慌失措，立即带领所有县府官员弃城仓皇而逃。经清点，发现库房还存有银元数万两，各种杂物一大批。卢焘从小就饱受战乱之苦，因此他对自己

的部下要求十分严格。他命令士兵把扔下的东西和银元看守好，不准移动，接着又派人去寻找县长熊某回来，交代清楚。第二天一早，熊县长转回来看见全部银元原封不动，其他财物也毫无损失，他真是愣住了，哪有这样纪律严明、见钱不要的军队？当卢焘向他表明态度之后，熊县长喜出望外，五体投地，感激不已。于是，他派人叫回所有的县府官员，百般热情地招待了卢焘的部队，并再三苦留部队多驻时日，不让开拔，深恐其他部队到来掳抢。卢焘一再说明部队不能久驻的原因，熊县长则说代表全县人民，还是一再苦苦央求部队多驻几天再走，卢焘实在无法应付，只好假借部队去郊外作野战演习离开古蔺，只留一小部分士兵看守不必要的行装。看到部队深夜未归，熊县长才知卢焘演习之意。第二天，小部分留守的士兵也整装出发离开古蔺。

### 3 轻取合江，可笑黄大队长拉郎配

离开古蔺两天后，独立大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直占叙永。约一个星期后，援川军第二梯团各部队汇集合江县城附近。当时合江城内有两营清军驻守，闻讯援川军已兵临城下，清兵乱嗡嗡地喊叫一通，用从枪口装上火药的老式火枪放了一阵枪，便纷纷溃退，仓皇弃城而逃。卢焘所在的独立大队在大队长黄毓英的率领下，与张子贞营在后面向敌军猛追十多里，两营敌军顿时分崩离析，有的跪地求饶，有的逃进深山，干起了土匪的行当。援川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合江。

轻取合江之后，部队又在合江休整了两天。晚上，卢焘和黄大队长同在一个王姓人家住下。王氏家资万贯，养有一女如花似玉，合江城内许多纨绔子弟曾使媒求婚，可是王家父女总是缄口不应。王氏早几天前就听说卢焘在古蔺驻军的故事，现在又见到卢焘年轻帅气，以为还未结婚，于是产生了嫁女儿给卢焘的念头。当晚，在

饭桌上，王氏有意命女给卢焘及黄大队长斟酒。王氏问卢焘：“卢队官，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卢焘答30岁。王氏夸赞道：“唷，三十，年刚三十在军事上就已崭露头角。才华非凡，才华非凡！”卢焘说道：“卢某庸才，在世上碌碌无为，要论才华非凡，我们蔡都督才是。”王氏见卢焘把话题扯到一边，心里有些扫兴，但他又接着问卢焘：“你是何处的，家里还有什么人？”“晚辈”西宜北人，家里有老母、妻子和两个女儿。”卢焘轻松地答道。

王氏灰心了，他对卢焘说：“你在外面有作为，怎么还不把家小带出来？”卢焘沉重地说：“谈何容易啊，内人不知诗书，活动不便，加上我目前薪水很低，怎么养得了他们？”

王氏此时仿佛又见了一线希望：“薪水没有问题，你如果不嫌弃的话，我王某可以资助你一把。”卢焘当即表示谢绝：“不用不用，我们军人四海为家，不必麻烦王老板！”

吃完夜饭，晚上睡觉时，卢焘与黄大队长同房。黄问卢焘：“卢队官，刚才王老板跟你说那么多话，你懂得他的意图吗？”“谈家常事，有什么意图。”卢焘随便敷衍着。黄大队长笑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为啥老问你的家小，餐中为啥又叫他女儿来给我们斟酒？”卢焘懂得其中有蹊跷了，但他坚定地说：“人家的心意我理解，但是我也绝不迁就。”

黄大队长认真地说：“这不是什么迁就不迁就，如果考虑到自己的生活和前途，我想答应这门亲事也无甚要紧。”卢焘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内人虽然不知书识字，但我在外奔波这么多年，都是她在家服侍我父母，若我在外又另娶一房，那岂不伤天害理吗？！”黄大队长见卢焘如此坚定，最后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 4 克泸州，卢焘名声大震，杨杰嫉妒报复

占领合江以后，12月中旬，第二梯团向泸州地区进击。当时，

泸州城有赵尔丰的一个巡防营和端方的一个团。赵尔丰的巡防营和援川军刚一接触交火，就溃不成军，狼狈而逃。后来援川军第二梯团与端方的守敌，经过并不激烈的战斗，就夺获快枪300余支、洋台炮数门、马匹50匹、铜钱7000串等，接着先后控制了纳溪、泸县、隆昌、江安、南溪等川南繁华之区，并在泸州与川南总司令（四川革命军）但懋辛会合。与此同时，援川军第一梯团也占领叙府、自流井（今自贡）等地。

泸州是川南水陆交通的枢纽，其地位仅次于当时大西南的重镇重庆。援川军攻下泸州后，于当天举行了入城仪式。泸州城内各界群众闻讯革命军要入城，于是就自发地集结了近万名群众，打着标语横幅，夹道欢迎援川革命军进城。革命军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呼声，爆竹声，响震连天，盛况空前。有的群众还拿出鸡蛋、干粮和开水慰劳革命军。特别是欢迎的人群中，时不时又有人打听：“谁是卢队官啊？”“卢队官在什么地方？”“我们想见卢队官！”……而这些话，都让走在部队前头的新任团长杨杰（云南人，后曾任陆军大学校长）非常不满，他心里暗自骂道：“他妈的，我杨杰堂堂团长你们不找，却要找我的部下姓卢的小兵。”由此，杨杰不仅对泸州群众产生了不满情绪，而且对卢焘也产生了嫉妒之心。

仪式结束后，革命军在泸州休整10多天，卢焘的连队驻扎城内的城隍庙里。一天晚上九时多，团长杨杰命令卢焘立即带兵赶到已被收编的川军一个排的驻扎营地。不等卢焘明白怎么回事，杨杰即下令士兵实弹伏地前进，向正在酣睡的川军士兵开枪平射，川军士兵在梦中惊醒已来不及武装抵抗。因士兵都睡在地面上，所以全排川军士兵几乎全部被打死。这时，卢焘才知道是杨杰，因在进城仪式上泸州群众对他这个新团长没有给予卢焘般待遇，所以嫉妒而引发报复行动。卢焘非常痛恨这样残暴的长官，当晚返回营地后，他立即找到黄毓英报告事件的经过，并打算辞职

走人，但经过黄大队长的反复开导和劝说，他才放弃了这个念头。过后不久，援川军总司令韩廷泽经电请蔡锷都督批准，杨杰被就地免职。

## 第八章

# 奉调援黔剿匪

### 1 野猫溪治恶，平定有功直升大队长

革命势如破竹，形势瞬息万变。令人欣喜的消息不断传来，攻克泸州不几天，资州发生兵变，督办粤汉、川汉的铁路大臣端方被部下砍了头。他从湖北带来的那个团被打垮后，自动撤退沿长江东下返回湖北了。又过了几天，成都方面传来消息说，四川总督赵尔丰垮台了。原来，人称“屠夫”的赵尔丰接到云南革命军进攻及端方被斩的报告后，又见湖南、江西、陕西、山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纷纷独立，深感四川局面无法控制，便把政权交给了资议局。不久，革命党人在成都成立了中华民国四川军政府，四川宣布全川独立，尹昌衡任都督，张培爵任副都督。

更令人欣喜的第三个消息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了。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月底，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正式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宣布1912年为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自此，不但结束了清王朝260多年的统治，而且也结束了2000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的一个伟大的胜利。

1912年元月上旬，援川军第二梯团从泸州抵达山城——重庆，与川东都督夏之时，副都督张培爵会师商议北伐时，得到南北议和的消息后，遂在重庆待命月余。重庆，简称渝，别称“雾都”，地处长江上游，是嘉陵江、岷江、沱江、乌江等数江的交汇处，也是当时大西南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和商贸、军事中心。

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不朽功勋。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胜利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为形势所迫向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时，袁一方面接受了清王朝的政权，北方各省的军队在他控制之下，一方面又被革命阵营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气焰嚣张，不可一世。袁当上了大总统后，立即下令停止北伐。云南军都督府蔡锷都督也怕引起滇川战端，于是电令援川军的两个梯团迅速回兵昆明。

1912年3月上旬，云南援川革命军两个梯团，分别从自贡、重庆返云南。但卢焘所在的第二梯团独立大队，应新任贵州都督唐继尧的请求，蔡锷都督命令独立大队从重庆援黔剿匪。援川胜利后，云南军都督府蔡锷都督考虑到，唐继尧、李鸿祥、谢汝翼都是老同盟会员，在资历上不相上下，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员，同时又同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任过教官，并皆为云南重九起义中立了大功的人，于是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李鸿祥任第一师师长，驻防昆明；谢汝翼为第二师师长，驻防蒙自。

独立大队接到命令后，立即从重庆开拔黔北。1912年5月7日下午，当部队行至江口县（今重庆市武隆县）属的野猫溪时，因为天热，加之行军疲劳，黄毓英大队长在后面略为休息。当黄大队长与几个卫士骑上大马走了不远时，路旁密林中突然有人向黄开枪射击，黄当场倒下身亡。前面队伍闻听枪声后，立即赶回救护，但已来不及了。这时整个队伍人心浮动，种种怀疑层出不穷，弄得人人惶惶不安，气氛十分紧张。在万分危急之际，卢焘泰然自若，立即与

另外两个后队主官紧急商量，及时果断地控制了现场那一触即发的骚乱之势，从而使全大队官兵安定下来，不致闹出大事。晚上，部队宿营休整时，另外两个后队主官，恐怕部队再出乱子，两人就一致推选具有较高威望的卢焘兼代指挥独立大队，于是卢焘当即命令各中队集中清查人数，结果发现第三后队一中队有两名士兵潜逃。经过缜密地调查了解得知事情的真相。原来黄大队长由重庆出发时让卫兵驮了几袋军饷，在行军中，黄怕士兵领饷后中途逃跑，于是下令途中暂不发饷。当时许多士兵对此充满怨气，其中三后队一中队的两个士兵就恶向胆边生，在部队路过野猫溪时，假借去路边密林里解手埋伏。当黄大队长一行走到他们的埋伏地时，他们便向黄大队长一枪射击，然后想趁机打劫军饷。但由于前头队伍回救及时，所以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卢焘想：财聚则人心散，财散则人心聚，前车覆，后车戒。于是，他立即命令军饷官于当晚连夜把军饷发到各后队的全体士兵手中。次日上午，在安葬好黄大队长之后，卢焘率领独立大队继续向贵州方向前进。一个星期后，卢焘顺利地把独立大队全部带到了贵阳，新任贵州都督唐继尧（云南人，曾任讲武学堂教员、同盟会员）当即正式委任他为独立大队少校大队长。

## 2 奉命黔东剿匪，感化土匪改邪归正

1912年6月上旬，云南军都督府在昆明召开援川革命军庆功大会，卢焘荣获“援川”和“复兴”（指从清朝统治下光复）两枚勋章，奖金200银元。

1913年元月，由于黔东铜松一带匪乱为患，卢焘由贵阳调任铜松支队长，驻防铜仁，其主要任务是剿匪。铜松指黔东的铜仁、松桃一带地区，此地区与湖南的湘西及川东南交界，山高林密，地广人稀，自古以来是土匪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铜仁是贵州的东大

门,也是黔东地区的政治、文化、商贸、交通、军事中心。卢焘率队来到铜仁地区之后,他几乎走遍了铜仁地区的各个县。除铜仁、松桃外,他北到沿河、德江、印江,南到玉屏、岑巩、镇远、三穗、天柱、锦屏、黎平等县。1913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卢焘率队到黎平县巡查,部队驻扎在一个庙宇内。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卢焘与几个支队领导和卫士们正在庙内烤火取暖。忽然听到室外有人吼叫道:“不因为我老娘,你们不会捉到我!”卢焘感到惊奇,是什么人说这样的话?于是就问卫士:“什么人在外面说话?”卫士回答:“刚才捉到一个土匪,现捆绑在外面。”该土匪进门后,卢焘见他战栗不止,就叫他坐下烤火,他不敢坐,士兵就强迫他坐下来。卢焘问他:“刚才你在外边说什么话?”他不敢回答。再三追问,他看卢焘并无恶意,才说出他因政府出花红(悬赏)要捉拿他,所以不敢回家。今天是年三十晚,因为想到老娘在家无人照顾,所以才冒险回家来看看老娘,就被捉了。卢焘听了觉得此人也还有孝心,其情可嘉,就对他说:“你还有机会回来看看老母,我老母还在广西,数年都未能见面尽孝啊!”又说:“你既然有此孝心,就应改邪归正,回家照顾老母,不能再去做匪抢人。”那土匪连连磕头应诺,卢焘就叫卫士给他放绑,并送他二十块银元,叫他买一斤肉和一只鸡回家与老母过年。此人拿了银元感激不尽,非常高兴地走了。

当了支队长后,生活有了保障,1913年春节过后,卢焘便向唐都督请假,带着几个卫士回广西庆远姐姐家(1910年其家人又从宜北老家搬到庆远姐姐家),第一次把全家老小接到高原山城——贵阳,租住在今贵阳市公园路一带的一间民房里。贵阳,是贵州省会城市,从唐朝就开始建市,历经沧桑,城市建设当时已初具规模,名胜古迹有甲秀楼、黔灵山、花溪等。由于地处云贵高原中部,海拔高达1071米,一年四季多为茫茫雾霭、阴雨连绵的景象,特别是冬末春初,天寒地冻,阴冷潮湿,这样的气候使长期生活在热带广西的家人感到难以适应。与家人已天各一方四年了,卢焘见到苍

老的母亲、辛劳的妻子以及两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女儿，他觉得实在太对不住她们了。在贵阳家里，他几乎一有空就与家人聊聊、讲讲家乡话，让家人感到亲切温暖。母亲把他离开柳州后家里的情况，编成家乡的山歌告诉他说：“别人吃干饭，我家喝稀饭。平时缺油盐，过节无鱼肉。别家杀鸡鸭，我家吃红薯。女儿受人欺，回家抱娘哭。”当了解到当年他在柳州不辞而别到今天，家里老母和妻女艰辛地生活过来时，他不禁泪如雨下。如今与老母妻女团聚在一起，真是其乐融融，幸福无比。刚把家安顿在贵阳，卢焘本想多陪家人几日再去部队，可是唐都督一再催促他返回黔东的部队。一家人从广西初来乍到贵阳，人地生疏，自己不能照顾他们一下，又匆匆准备离去，卢焘的心里可谓十分难受和矛盾，他真舍不得离开他们。然而，这一切似乎被母亲发现了，母亲安慰他说：“儿呀，家人虽需要照顾，可是国难当头，你应该先国家后家人，你去吧，愉愉快快地去，而且要立战功才回来，若不这样，我就不高兴了啊！”卢焘抹着眼泪，二话没说就离开了家人，返回远在黔东的部队。

铜仁到松桃一带，是当时黔东地区匪患的重灾区。那时，那一带常有一股惯匪，经常拦路抢劫来往的客商，掳掠百姓财物，地方长年受忧不安，百姓怨声载道。当地政府不但无能为力，有的甚至官匪勾结，纵匪为患。卢焘奉命率队驻防黔东后，铜松群众纷纷要求驻军尽快帮助消灭惯匪。有一次，卢焘亲自带领几十名精兵强将赶到松桃通往湘西的地方，他们穿着便衣乔装打扮成一帮商人，挑着货物，每人在腰间暗藏着一支驳壳枪，故意在土匪出没最多的地方来往，第一、二天均不见动静，他们以为走漏了消息，其实上匪早已跟踪了他们，但土匪警惕性也高，恐怕上当，所以只尾随窥视，不敢贸然行动。第三天下午，当卢焘一行走到一个山坳上（即土匪经常“关羊”的地方）即将进入湖南地界时，他们便假装休息，并故意把10多挑的货物，如烟土、银元等摆出来。这时，早已在坳口两旁山上密林深处虎视眈眈的匪帮，看见那么多的财物，都垂涎三尺。

了,只等“关羊”。突然间,只听几声尖锐的口哨声在山间吹响之后,30多名土匪立刻从两边的山上俯冲下来,匪徒们有的手端着单针洋枪,有的打着土炮,有的手执大刀,有的高喊“检查”,喊杀声,枪声,一时大乱。卢焘眼明手快,首先开枪把从北面山上冲下来走在前面的两个土匪打死,其他几十名训练有素的战士,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奋力开枪还击。不过10分钟,这场剿匪战斗就结束了,当场打死土匪19人,其中匪首2人,其余土匪全部缴械投降,缉拿归案。部队方面无一伤亡,这股横行多年的惯匪终于被一网打尽,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13年7月,卢焘带队到天柱县剿匪。一天,卢焘刚从乡下巡查返回驻地准备换洗时,门外便有一个不速之客提着装有两大碗肉面的篮子,站在院子中间,他说要送给卢长官吃,几个卫兵叫他走,他硬是不走,说一定要见到卢长官吃上他的这一碗面后,他才走,否则就是不走。卫兵们无奈,只好让一个卫兵进屋报告卢焘。卢焘也感觉到蹊跷,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给自己送来面食?面食里是不是有人放毒?考虑了一会儿,卢焘决定走出去看个究竟。来到院子,卢焘看到此人有点似曾相识,但一时又想不起来。犹豫间,只见那人把竹篮一放,立即下跪叩拜,并大声地说:“谢谢大恩人,卢支队长!您不认得我了?”卢焘觉得奇怪,天柱这个地方,只是今年初带队去黎平巡查时,路过一次,也没有什么熟人,他怎么会认识自己?卢焘上前扶起那人起来便问:“你是什么人?拿两碗面来做什么?”那人面带笑容并很恭敬地说:“去年腊月二十八日,长官您送给我20块银元,给我买了一斤肉和一只鸡回家与老娘过年,后来我拿余下的钱,来到天柱县城开了一个小食面摊子得以维持生活,这是您周济我的大恩大德啊!昨天听说你又带部队到我们这里来,所以就拿着自己做的两碗面来拜见您,就当做我的一点点心意哦!”卢焘听了,才恍然大悟。于是,卢焘还向那人嘘寒问暖,鼓励他自食其力,改邪归正,做一名合格的好公民。

1913年4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命令川、鄂、陕等省都督会联合攻击据渝和宣布独立的熊克武、杨庶堪部。接到云南军都督府蔡锷将军和贵州唐都督的紧急电令，卢焘于同年8月上旬，奉命率队离开黔东援渝，被编入黄毓成旅。当卢焘的部队赶到重庆时，熊克武、杨庶堪已基本控制了重庆的大部局势，卢焘的部队也只参加了一些后期的零星的扫尾战斗，之后不久卢焘又奉命率队返回贵阳。

## 第九章

# 大理平乱，奉命率队回滇支援

### 1 慈母忧儿贪枉财，孝儿耐释消母虑

1913年9月中旬末，卢焘率队从重庆回到贵阳。在回贵阳途中，他想回到家母亲一定十分高兴。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他踏进家门看见母亲时，母亲面带灰色向他白了一眼，没有跟他说一句话。这时妻子没有在家。他以为妻子有对不起母亲的地方，母亲才借着自己回来的机会发泄心里的积愤。母亲未说话，他不好直言问母亲受何委屈，只好把大女慈祥拉到身边附着女儿的耳朵低声问道：“你妈妈近来跟奶奶争吵过吗？”女儿眼珠骨碌碌地转着，回忆着，然后摇着头否定道：“没有呀，她们没有吵过。”母亲坐在卢焘对面，她向卢焘扫了一眼，好像有什么忍受不了，倏地从凳子站起，转身走进内室，并且把门“咣”的一声关上。卢焘好像也被那扇门扇了一下，而且扇得身子摇晃，眼前发懵。

妻子买菜回来了，她见卢焘闷闷地坐在那里，以为女儿没有给他倒茶，使他生气。于是她叫女儿道：“慈祥，怎么不给你爸爸倒茶，爸爸走这么远的路回来很累，你这么大了也不会想想。”女儿给父亲倒了茶，可是卢焘仍然毫无舒态，满面愁容，这真是让妻子感到莫名其妙。本来，长期分离，难得团聚，见面时应该欢欢喜喜，可是

现在室内却充满沉闷气氛，真令人惆怅不快。

妻子把饭菜弄好了，卢焘猜想母亲肯定不出来和自己吃团圆饭了，可是出乎他的意料，妻子去开门叫她时，她却随即出来。全家人都围坐在桌边。吃饭前，母亲终开口跟卢焘说话了：“慈祥爸，你小时候我常教育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要不义之财，你还记得吗？”“母亲教诲，我怎么不记得呢。”卢焘答道。

母亲斥责说：“既然如此，那前一段哪来的不明不白的两百块钱呢？”卢焘立刻转愁为喜，他终于知道了母亲对自己生气的原因了，他向母亲解释道：“原来母亲为这事对我生气，那两百元钱是我在援川军时，立了战功，云南军都督府奖给的。”

“什么政府奖给，你可不要因为自己当了大队长，就可以随意取拿不义之财。”母亲仍然冷冰冰地说。卢焘和颜说道：“是呀，那两百元钱确定是政府奖给的，只是上次我交给你的时候，由于走得太匆忙，来不及给你说明这钱的来历而已。”

这时外面有报告，卢焘便对妻子说：“慈祥妈，快去开门，我的卫士回来了。”此卫士姓郭名纲，河北沧州人，武师出身，武艺高强，是卢焘带兵在黔东剿匪时，当地一位“枪老大爷”（即当地武师老大）将当时在黔东农村教武的郭纲，推荐给卢焘当贴身保镖（此人后来曾任卢的警卫连长等职）。郭卫士来到桌边，卢焘即问他：“你把事情办得怎么样了？”郭纲边把挎包挂在墙上边说：“都办好了。”卢焘给郭纲移来凳子，叫他坐下来吃饭，又给他倒了一杯酒说：“你来得正好，你要替我当个证人。”“什么证人？”郭纲问。卢焘母亲接着问他：“小兄弟，你们上次去四川打仗，有办法搞到些外水吗？”郭纲停了饭菜说道：“能捞到什么外水，我们的队伍纪律十分严明，我们的官兵除了有的立功政府给点奖金外，如卢支队长就得到了政府的200元奖金，其他分毫不得。”未等郭纲说完，卢焘即起身到卧室找来了两枚金光闪闪的勋章，拿给母亲及妻儿看。

这时母亲压抑心里数月的疑团，终于被消除了。她高兴地说：

“汝能如是，吾心慰矣。”这样，一家人又有说有笑，高高兴兴地吃了一次难得的团圆饭。

## 2 平定“大理事件”，避乱返回柳州

卢焘与家人在贵阳刚刚欢快地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云南军都督府蔡锷将军又电令卢焘，立即率队回滇待命。于是卢焘带着全家老少，率领所属部队匆匆向云南昆明进发。1913年10月初，卢焘率队顺利返抵昆明。在安顿全家老少住下之后不久，11月上旬末，卢焘又接到命令，率队转赴大理，援助张文光平定“杨春魁之乱”，此时卢焘的部队番号，又改为都督府直属独立大队，卢焘继续担任大队长。

1913年11月，蔡锷将军因病离滇赴京调养，袁世凯则任命贵州都督唐继尧为云南都督，调李鸿祥为民政长，调谢汝翼为迤西镇守使。唐继尧由贵州回云南时，因已得知李鸿祥有反对之意，对李十分戒备，除了带回滇籍军政人员外，还带来黔军一个旅助威。

同年12月8日，云南发生“声援二次革命”的大理事件，即大理哥老会首领杨春魁(又名杨辉五)勾结新军第四团第三营叛变，杀害了原同盟会越支部领导人，于是唐继尧上任仅两天后，就不得不“派兵剿抚”。当时，刚赶到大理的卢焘，立即率队协助时驻大理的新军第四团张文光团长，及时平定了暴乱，处死了发动暴乱的杨春魁等为首分子。事后不久，唐继尧又相继撤销了迤西镇守使谢汝翼和民政长李鸿祥两人的职务。12月19日，唐又将张文光团长(兼大理提督)骗到腾冲杀害。23日，还指使谢汝翼的部下连长何荣昌，到滇越铁路的宜良糯租车站，上车将准备外走的谢汝翼打死在车厢里。

其实，这些事件的发生，都是唐继尧回云南后，一手操纵的排除异己的做法。唐继尧虽然也是同盟会员，但他并非是一个好的同

盟会员。本质上，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政客，只要于己有利，甚至可以轻易背弃同盟会的革命纲领，他始终都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早在 1912 年 5 月，卢焘由渝率队援黔途中，应屠杀贵州自治学社人上而当上贵州都督的唐继尧之请，也为他“肃清”贵州各地势力而“分头迎击”，打败了欲返家乡的黔军席正铭、陈开釗等部。所以，卢焘已看透了唐继尧的丑恶嘴脸，对他的所作所为非常不满。

1914 年 2 月，大理事平后，卢焘觉得云南政局复杂，地方混乱，不如返乡，另谋出路。于是，他向唐继尧以请假为名，离开大理，返回昆明，带着几名卫士及眷属，乘坐火车绕道越南经香港、广州返回广西柳州，辞归故里。

由于卢焘平易近人，平常待兵如亲人，官兵关系极好。所以当他离开大理时，曾有一段非常感人泪下的小插曲：即当他的部下近 600 名官兵，知道老长官此次名为请假，实则远去的消息后，都自发地来到大操场，列队洒泪相送，依依不舍。

据李文汉回忆说：“……大理事平之后，卢焘觉得云南政局复杂混乱，于是坚持回桂。临行前集合数百名士兵讲话，谈到要分别时，全营官兵不约而同大哭起来，卢焘也挥泪不止，他掉转而望着后方，哭声才暂时停下来。我当时在镇守使服务，听到这一消息甚为感动。因为这一营官兵是同卢焘从 1911 年从云南出发援川，再转贵州，如今又返回云南，几年时间同甘共苦，共过生死患难，亲如手足，所以才会这样难分难舍。”

## 第十年

# 转入黔军

### | 刘显世电邀来黔襄助，卢焘思考再三终答应

1914年3月中旬，卢焘携着眷属及卫士从广州刚抵广西柳州不久，本来打算在柳州休息一段时间后，再择日送老母和妻女回宜北老家。可是不过几天，贵州新任都督兼都军刘显世就几次急电到柳，力邀卢焘到黔襄助。原来，在卢焘奉命由川入黔剿匪的一年时间里，时任贵州护军使的刘显世，看到卢焘带兵有方，作战勇敢，而且知识渊博，军事能力又强，觉得卢是一个难得的军事人才，但只由于卢当时隶属滇军，所以使他无法提拔使用。当他知道卢焘因对唐继尧不满在大理坚持回桂的消息后，他让部下经过多方的打听联系后，才了解到卢焘返桂后在柳州、庆远等地落脚的联系方式。于是他叫司令部侍从人员，立即将几份紧急电报陆续发到柳州、庆远，力邀卢焘到贵阳与他共事。

刘显世，字如周，贵州兴义人，他读过私塾，进过县学，还考取过廪生。后来助其父刘官礼办理团练，参与镇压会党起义，开始他的军政生涯。在他父亲的安排下，刘显世出任西路巡防二营管带，也参加过地方新政。刘显世其人，阴险、毒辣，有“笑面虎”之称。他继承其父在兴义经营多年的地盘和实力后，随时窥测方向，力图向

外发展。辛亥革命后，刘显世前往贵阳，混入贵州军政府。他依靠其堂弟刘显潜经营的根据地，通过留学日本的弟弟刘显治打开与外界沟通的渠道，这就是他夺取贵州政权的基础。

武昌起义成功后，接着是云南的“重九起义”成功。在形势的影响下，贵州也跟着宣布独立。这时刘显世还在由兴义去贵阳途中。当时任军政府枢密院院长的张百麟对刘显世很赏识，认为“刘才可用”，于是任命刘显世为枢密员兼军事股主任，并且给他由兴义带来的徒手兵都发了武器，扩充为一个标。此后，刘显世的势力日渐扩张。唐继尧“假途来虢”入主贵州，担任“代理都督”。此时，唐继尧已走上建立军阀独裁统治之路。他积极投靠帝国主义势力，禁止外地进步思想的传入，大肆扩张滇军，加强地方武装，由亲信刘显世掌握。1913年，袁世凯为了加强对云南的控制，把蔡锷调离云南，任命唐继尧接管贵州政权。1913年11月1日，刘显世以陆军少将出任贵州护军使，独揽全省军事大权。

刘显世为什么电邀卢焘来贵州呢？大概有以下原因：一是因为刘显世起家是依靠滇军的势力。唐继尧带滇军回云南后，贵州的武装力量就显得很薄弱。但是反对袁世凯的贵州势力却在不断扩大，刘显世为保住他的地位，就必须扩大武装。因此，他当上护军使后，首先就是整编陆军。扩大军队就需要大量的军事人才充当骨干，因此凡有军事才能的人，他都四处网罗。二是刘显世的地位得于滇军，所以他对滇军有好感，而卢焘曾是滇军大队长，又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三是卢焘随唐继尧来贵州任铜松支队长时，军纪较好，又为人笃实，刘显世对他很有好感。因此，刘显世得知卢焘脱离滇军已回到柳州后，即发电邀请卢焘来贵州。

连续接到刘督军的几份紧急电报之后，卢焘的思想斗争确实也很复杂。他认为刘显世和所有军阀都是一丘之貉，只是表面故意敷上一层进步的油彩，在宣传上尽量标榜自己的开明和进步，有时也能迷惑一些人，但是他们的骨子里都是为了争权夺利，割据称

王。当时，莽莽神州，纷乱迷茫，广西的混乱与黑暗与贵州不相上下。正值风华正茂的卢焘，又何忍无视现状，自我悠闲？刚刚卸去长年奔命在外的军职，结束长年远离亲人的痛苦，迎来家人骨肉终于团聚的欢乐……想到这些，他真的不想再去从军了。可是，当他把贵州刘督军的急电和他的想法告诉母亲时，母亲却不同意他的想法，母亲鼓励他说：“男儿当志在四方，家有贤媳，无须挂念。”得到母亲的支持，卢焘几经考虑，终于又打消了放弃的念头。于是，同年4月初，卢焘又带着眷属及卫士经庆远、思恩、荔波、独山、都匀、龙里等地，北上贵阳。从此，卢焘的历史就与贵州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到达贵阳后，卢焘借住现位于公园北路冯松生家里，冯是他在龙州时的“金兰”故交。把家安顿好后，卢焘才到省都督府找刘督军报到。刘显世见到卢焘，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立即嘱咐部下安排几桌盛宴招待卢焘一家老少及随从卫士。出席招待宴会的除了省军政几位要员和侍从人员外，刘显世当时还特地叫他的亲外甥、时任贵州护军使署副官长兼贵州警察厅厅长王文华（贵州兴义人，字电轮）及其他将领数人，出席宴会作陪。宴会上，刘显世来向卢焘敬酒时，还叫侍从人员把一个内装1000块银元的大布袋，送到卢焘的桌面，并郑重地说：“寿慈老弟，路上辛苦了，这点心意是都督府给你来贵阳的旅费和安家费，请收下。”卢焘恭敬不如从命，立即笔挺地站起来，向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说：“谢谢督军大人恩赐！谢谢长官关照！”之后，刘显世在卢焘及侍从人员的作陪下，又来到卢焘母亲和妻女所坐的桌子，给卢母及妻女敬酒，刘显世夸赞卢母说：“你老人家真是教子有方哦，为我们国家养育了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才。”卢母谢谢了刘都军的盛情款待。那一夜，卢焘觉得是一生中最荣幸最幸福最快乐的一个夜晚。刘督军等军政要员饭毕离开宴席以后，卢焘与王文华等黔将们，仍兴高采烈地留下喝酒，交流思想，畅谈形势，切磋战术，十分开心。从此以后，卢焘与王文华就

有了亲如兄弟般的莫逆之交，成为当时贵州军界中，一对年轻的好搭档。

王文华是贵阳优级师范学校毕业，思想活跃进步，他是当时贵州军阀集团和兴义系“新派”的典型代表。看到舅父刘显世一再电邀来黔相助的卢焘，为人思想并不守旧，又因其“人较长厚，才亦非凡”，没有野心，“较易驾驶”等特点，所以他也非常放心地与卢焘交朋友。

1914年5月上旬，卢焘到督军府上班的第一天，就被刘督军委任为贵州东路巡防第一营管带，驻防镇远。刚到镇远不到两个月，卢焘就接到命令，速回贵阳另有重任。卢焘赶到贵阳时，刘督军就叫他去协助王文华将部队的旧建制改成新军建制，以便尽快与其他各省接轨。同年7月，贵州新军成立，全省共分6个新编陆军团建制，总兵力一万余人。督军刘显世，参谋长戴戡，王文华自兼新编陆军精锐第一团团长，卢焘为第一团团附兼第三营营长，驻守贵阳。第二团团长彭文治，第三团团长吴传声，第四团团长张作青，第五团团长熊克永，第六团团长和绍孔。

## 2 宣传“新派”思想，成立贵州模范营

1914年9月，王文华之胞兄王伯群（后曾任国民党交通部长）由上海回到贵阳，发动贵州革命派反对袁世凯图谋做皇帝的活动，王伯群是王文华的哥哥，名文选。留学日本期间，曾加入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时，回国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创办《大共和日报》，又加入统一党为干事。王伯群是刘显世的外甥，能接近刘，所以他是梁启超和蔡锷与贵州联系的主要人物。梁启超在策划反袁时，把云贵看做改良派经营的“区区片土”，是发动讨袁的理想地方。他在天津会议上提出两个问题：一、中国任袁世凯如此做法，国亡与否？二、同是国民，任他为此，以后还有救国之日否？于是大家赞成起义

讨袁。当时王伯群在会上说：“当局（指贵州）意向，文华能左右之，所部虽成军日浅，气锐，可以一战也。”后来王伯群把天津会议的情况转告王文华，要他“秣马厉兵，应时起事”。王文华在护国运动中态度非常坚决，这与其兄的影响，不无关系。当时刘显世及一些保守派人物，认为反袁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这些恐袁言论，激怒了王文华，他愤然对刘显世说：“吾誓与共和同命，事在必行。爵使（按：当时刘显世已被袁世凯封为子爵）请以第一团兵变告北廷，杀身灭族，文华自当之，幸而有成，名利仍归爵使。”慷慨激昂，大义凛然。由于王文华等激进派的推动，后来刘显世才被迫宣布独立和讨袁。卢焘与王氏兄弟俩朝夕相聚，分析局势，意志相投，反袁称帝态度坚决。他们磋商，要反袁达到目的，必须招练新兵，掌握武装力量，培养军队骨干，灌输革命新思想，为反袁作一切准备。于是，他们决定筹备成立新军模范营，但是当时贵州缺乏人才，便由卢焘去信邀约云南的讲武堂同学李雁宾、胡瑛、范石生、李云鹄、洪鹤年、朱泽民、杨复光等 10 余人来黔襄助。1915 年 4 月模范营成立，卢焘兼任模范营中校营长。

模范营的主要任务，就是抽调各团基层军官来营里进行轮训，每期 4 个班，即按班、排、连、营分班，每班约 40 人，每期两个月。培训的内容，主要以政治教育为主，兼训文化、军事理论及军事训练。培训的方法，都是按照同盟会在云南讲堂的那套组织、活动方式等来进行，每期毕业后即分配到各部队充任排、连、营级干部。模范营开办招生后，确实办得红红火火，令人刮目相看。当时，广西、湖南、四川、湖北、云南等省军务部门，都先后派员到贵阳来学习取经。可是，同年 8 月袁世凯操纵的筹安会酝酿帝制，袁氏并拟 12 月自称洪宪皇帝，贵州当局的守旧派刘显世、龙建章（省巡按使）不但不反对，反而致电拥护袁世凯称帝。这样，已办了近 8 个月，培训了 4 期 700 名基层骨干的模范营，也随之被解散了，全营官兵分配各营听候命令。

卢森与王文华创办模范营虽然时间短暂，但也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和预期的效果。通过模范营的思想鼓动工作和其他学习训练，给广大黔军官兵刷新了思想，对他们坚定反袁的革命决心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为黔军官兵准备参加讨袁战争作出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后来在护国讨袁战争中，黔军广大官兵作战勇敢，战功卓著，大多都是从模范营培养出来的。如因讨袁有功，后又屡次升迁，并相继就任贵州省省长的袁祖铭、彭汉章、周西成、毛光翔、李燊、王家烈等都是当年的模范营的学生。

## 第十一章

# 参加讨袁护国战争

### 一 袁世凯称帝，云南护国军兴

1915年8月13日，袁世凯一手操纵的筹安会在北京成立，并发表酝酿恢复帝制宣言，全国一片哗然，反对声不绝于耳。当消息传到贵州后，模范营的全体学员义愤填膺，他们纷纷说：“几千年来 的专制皇帝已经推倒了，袁世凯怎么还要当皇帝，真是不知羞耻，我们坚决反对！”12月13日，袁世凯竟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推翻刚刚成立不久的共和政体，公然宣布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并定于1916年元旦举行登基大典，自称“洪宪皇帝”。为了挽救革命，反对复辟，孙中山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戮此民贼”，由此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反袁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模范营解散典礼会上，王文华、卢焘都先后发表了讨袁讲话。王文华作了重要讲话之后，卢焘接着说：“袁世凯身为总统，背叛国民，复辟帝制，卖国媚外为儿皇帝。我们都是民国军人，要誓与国家共存亡，决不与袁共天地……眼下紧急之事是，请大家回去后加紧教育所属官兵，讲明国家大势，专制是祸国殃民，唯有共和才能救国救民，捍卫共和乃军人天职……”卢焘讲完后，全体学员都纷纷表态，慷慨激昂，赞成义举。

12月25日，蔡锷将军等人首先通电各省，共同反对帝制，宣告云南独立，并护国兴军。之后广西、广东、陕西、浙江、福建等省也纷纷通电拥护，宣告本省独立。然而，以刘显世为首的守旧派的贵州当局，不仅态度消极，而且还与袁世凯的集团代表暗中往来，企图阻挠过境的云南北上的护国军。贵州在地理上与云南紧密相连，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滇黔两省有深远的历史关系。如果贵州不响应云南起义而落入北洋军之手，云南就会失去屏障而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云南起义前，王文华就多次与刘显世联系，力劝贵州响应。刘显世是一个思想保守的贵州军阀，他既不满意袁世凯不给予他将军的头衔，又慑于北洋军阀力量的强大。为了保住地盘，他想保持中立，既不敢得罪云南，暗地里又向袁世凯讨好。他不仅拒绝了云南的倡议，还把云南准备起义的情况，密报袁世凯。但是，云南起义时，为了壮大声势，在云南独立通电中，不管刘显世同不同意，蔡锷就把他的名字也列上了。刘显世知道后慌了手脚，从12月28日起，陆续向全国发出通电，一再声明云南起义与他无关。他在通电中有这样一段话：“自前月以来，闻蔡（锷）戴（戡）出京，迭电京探询，不知所往。适闻滇省军官，对于帝制问题，反对甚烈，私揣蔡戴或将来参与其事。唯以夙昔公谊私交，不应以揣测之言。预以上闻，已一面将滇省暗潮，随时密呈统率处，请设法消弥；一面迭电唐（继尧）任（可澄）切诘，此时不宜有特别举动，前后陈处及劝滇之电，不下十余次。区区苦衷，天日可表。”从这段电文中可以看出，刘显世不仅表示自己一身“清白”，并未参加起义之事，而且还为他劝告云南与密报表功。总之，此时刘显世对护国起义的态度是：①不赞成，否认自己参加；②将情况密报袁世凯；③主张联省压迫云南放弃独立；④宣布全省戒严，力图保住贵州地盘。袁世凯对刘显世的表现当然满意，并给予嘉奖，称刘“素明大义，且受世袭封爵，当与国家共同休戚，竭力设法惩治乱徒，抚缉军民，建立奇功，当受上赏”。刘显世受宠若惊，为了进一步讨好袁世凯，在云贵交界处大举

筑路,以增强贵州西部的防务,并派代表日夜兼程赴滇,力阻滇军入黔。

云南起义后,贵州的情况是:一方面刘显世极力反对与阻挠起义以讨好袁世凯,另一方面则是以王文华为代表拥护起义的力量积极活动。卢焘与王氏兄弟的观点一致,因此他也是积极主张响应起义的。当时王文华正值英年,对袁世凯的称帝哪里忍受得了。于是他约乃兄伯群等往见母舅刘显世,陈述出兵响应云南起义的意见。力劝刘显世当机立断,通电响应。刘显世对这位血气方刚、盛气凌人的外甥很反感,但因实际兵权掌握在外甥之手,不便表示拒绝,只好婉转推托说:“事关重大,切不可轻率作出决定,致贻后患,必须召集全体在职人员和地方绅士共同商定。”王氏弟兄以情势紧迫,一再催促刘显世先行通电表态。刘显世不得已,只好召集所属各厅处长及地方绅士郭子华、文征明、陈廷策、陈茂枢等共 18 人在督府内的梅园开会,这就是决定贵州是否起义的“梅园会议”。

曾有罗焕奎口述,周杏村整理的一篇文章《贵州护国前夕的梅园会议》,对梅园会议的描述极具体,也很精彩。罗焕奎当时在南明区警察署当署长,他说有一天接到警察厅长李映雪的命令,要他到督军署梅园执行警卫任务。他站在会议厅旁,对出席会议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大家的发言,他也听得明明白白。但因事关重要,从来没敢向任何人说过。事隔几十年,他才口述出来。据他说,梅园会议,王文华、王伯群也被邀请参加。人到齐后,刘显世略述开会大意,绅士郭子华首先发言:“袁项城在小站练兵有年,门生故旧遍天下,同时部下能征惯战,将士以百万计,可以说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就是清朝皇室,也要仰仗他。现在全国各地都属于他的势力范围,他要称帝,可以说已具有足够的把握,成功是必然的趋势。区区滇黔两省想出兵讨伐,无异以卵击石。如果有人主张出兵,不仅他本人定遭灭门灭族之祸,也会带累我们地方,贻祸全省人民,此事

决不可轻举妄动。”郭子华的话还没有讲完，王文华就已按捺不住心中怒火，抢着起立讲道：“袁世凯虽然兵多将广，但他只能在北方称雄，而且只限于过去一段时期。大家要知道，他已经是一个过时的军事人才，甚至连他本人也承认是一个‘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人物，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军事家。目前他的部属，大都将惰兵骄，风纪废弛，是一群乌合之众。兵多将广又有什么用处？在政治上，近百年来，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不知牺牲了多少仁人志士。现在窃国大盗袁世凯竟敢违反潮流，背叛民意，悍然称帝，不义之师，终必归于灭亡。我们为了维护民国，出兵讨伐叛逆，恰是顺天应人之举。堂堂正义，谁曰不宜？我敢断言，不出旬日，不但西南各省定要出兵声讨叛逆，就是长江一带的省份，也要出兵北伐，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我们维护民国应尽的职责。如果有人阻止出兵，就是叛逆，就是国贼，其罪等于窃国大盗袁世凯，人人得而诛之。”王文华这一通义正词严、慷慨激昂、声色俱厉的发言，使会场静了片刻。郭子华有些下不了台，又不敢反驳王文华。他想利用刘显世既是王文华的长官又是母舅的身份，把王文华压服下去。于是他笑着说：“六哥（刘显世行六），你能不能驾驭部属，如果驾驭不了，干脆就请你自动下台，让我们自己来干，免得危害地方。”王文华听到这里，再也忍耐不住，拍案而起，骂道：“你是什么东西，敢在会场中当面侮辱一省的长官，谁是你的六哥？你凭什么要他下台？你不过是一个满清王朝的家奴，是一个已经解职的贪官污吏。你这老贼，利欲熏心。难道现在又要再一次充当新朝的帮凶？为了维护我们的民主国家，我非杀你不可。”说完话，随即拂袖而起，离开会场。这次会议也就不欢而散。

这次梅园会议虽然不欢而散，但它对促使刘显世响应护国起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刘显世召开梅园会议后，态度仍很暧昧，甚至还向袁世凯密告：“文华辜负天恩，自外生存。臣统驭无方，罪合

万死。”同时，刘显世还解散了王文华所控制的模范营。到 1916 年 1 月 27 日，刘显世才以贵州都督的名义宣布“反对帝制，永保共和”。但是，刘显世举义显然是被迫的，主要的动力，出自黔军中的青年军官。他们是爱国青年，大都受过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有较强的反封建意识，希望中国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能走上民主共和的道路，使国家独立富强起来。因此，在王文华积极反袁的号召下，青年军人皆做其后盾。此外，贵州人民自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对袁世凯的称帝十分愤慨。声讨窃国大盗的声势逐日高涨，震撼了刘显世的统治集团。当时的《贵州公报》发表了《卫黔即以卫滇》的文章。舆论对刘显世首鼠两端、模棱两可的态度，给予了严厉的谴责。其实，梅园会议之前，以王文华为代表的黔军进步军人与滇军中杨蓁、邓泰中等进步军人早有联系，如王文华早在 1915 年 12 月中旬就私下派黄齐生等军官赴云南昆明与滇军联络，双方商定共同反袁。这样，以王文华为代表的强硬派迫使刘显世宣布起义，但在刘显未宣布前，黔军早在 1916 年 1 月 10 日前就出兵湘西，1 月 19 日王文华抵镇远后，兵分三路挺进湘西与北洋军对垒。最终黔军以少胜众，在湘西击败了兵多将广的北洋军。王文华领导的黔军也因此大出风头，使地瘠民贫、一向被人瞧不起的贵州在护国战争中赢得了荣誉和地位，这是后话。

由于贵州当局迟迟没有表态独立，卢焘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其母说：“筹安会，召乱也，志士反对，义举也。”于是，卢焘与王文华、李云鹤、袁祖铭、胡瑛等，曾合谋起义，拟通过起义迫使当局宣布独立，然后组织护国军南下广西、广东，并将家母及妻女送回老家。当卢焘把他们的这一计划，又讲给母亲时，其母坚决反对，并说：“广西继起反对，又安归乎？”这样，卢焘、王文华等人，只好等云南方面的消息了。

12 月 27 日，派去昆明联络的军官给王文华打来了特急密电称：昆明已同意他们的要求，所有黔军均已列入护国军编序，任王

文华为东路护国军司令，范石生为参谋长，辖黔军3个梯团，进攻湖南湘西，王文华、卢焘等人，欢欣鼓舞，兴奋异常。王文华立即召开各团营以上高级军事会议，进行传达部署。

蔡锷将军通电各省后，立即成立了云南护国军政府，唐继尧为军都督。护国军共分3个军：蔡锷为第一军军长，出师川、湘；李烈钧（江西人）为第二军军长，出师广西、广东；唐继尧兼任第三军军长，留守云南。另外，还组织挺进军，黄毓成为军长，作辅助和相机行动。决定传出后，各部都在紧张地作好开拔前线的准备。袁世凯闻讯云南护国军动了真格后，立即成立了“征滇临时军务处”，并紧急调集其精锐部队曹锟、张敬尧、马继增、陈宦、冯玉祥等，号称十万大军南下川南、湘西、湘南等地摆开战场，企图阻止护国军北上。一场新的战争从此拉开了序幕。

1916年元旦过后两天，王文华立即召集驻贵阳附近所属部队官兵，到贵阳大操场，举行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讨袁誓师大会。会上，王文华首先宣读了云南护国军政府的决定和命令，并宣布了黔军的调整方案，卢焘被任命为黔军第二团团副。王文华宣布完毕，参谋长范石生接着带领大家举起右手，宣誓效忠共和，力讨袁贼，誓词为：“拥护共和，我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国休戚，万苦千难，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宣誓毕，大家振臂高呼：“打倒大卖国贼袁世凯！”“拥护共和！”“共和万岁！”……女师教员杨文华当场咬指血书：“勿忘国耻！”大会致电云南，呼吁共同举兵。整个会场，真是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大有“不破楼兰终不还”之英雄气概。

## 2 彭文治叛逃，卢焘临危受命

誓师大会结束后，各部队随即向各自的目标前线开拔。一时间，滇、黔联合组成的护国军第一军，由云南、贵州边境，兵分七路

向川南、川东、湘西进军，与北洋军开展护国作战。即由护国军第一军军长蔡锷统率滇、黔等4个梯团及滇军第二旅，统称北路护国军，戴戡任黔军北路护国军司令官（辖黔军张作青、熊克承、和绍孔三团），分别经云南昭通、贵州毕节、遵义三路进入川南、川东；由黔军将领王文华统率黔军3个梯团及1个民兵游击队，统称东路护国军，分别经贵州镇远、铜仁、天柱、黎平四路进入湘西。卢焘任副团长的黔军第二团（团长彭文治，一营长窦居仁，二营长张春浦，三营长程云）驻铜仁，称左翼军；第一团（团长王文华兼任，团附傅杰，一营长袁祖铭，二营长胡瑛，三营长朱毅晋）驻镇远，称中路军；第三团（团长吴传声，一营长陈安邦，二营长蒋如松，三营长李世荣）驻天柱，称右翼军；民兵游击队（支队长王华裔）驻黎平，称机动辅助军。

与东路护国黔军对峙的袁世凯北洋军总指挥是：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统辖周文炳旅、汪学廉旅、卢金山旅及湖南汤芗铭部、安徽倪嗣冲部、范国璋第十二师、张作霖第二十七师、冯麟阁第二十八师各1旅，总兵力3万余人。

东路护国黔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采取的作战方案和部署是：多设疑兵以分散北洋军的兵力，然后集中精锐兵力袭击北洋军的战术。中路第一团进攻晃州、沅州，北路（左翼）第二团进攻麻阳，南路（右翼）第三团进攻洪江。三路军以攻至辰溪会师为第一战斗目标。

东路护国军各分路黔军，在王文华司令官的统一指挥下，于1916年1月20日前陆续到达各自防区驻防，并以最快的速度做好战斗准备。当黔军各部在开赴湘西途中，卢焘所在的左翼军黔军第二团团长彭文治，在铜仁道尹林炳华的鼓动下，于1月21日在行军中弃职叛逃投降北洋军，于是王文华立即电令，由第二团副团长卢焘接任第二团上校团长，并任命龙伯沧为副团长，张春浦兼参谋长。全团辖三个营和一个独立连（从安顺急调增援），以及一个民

兵敢死大队。一营营长窦居仁，二营营长张春浦，三营营长程云。独立连连长马龙骧，民兵敢死大队长胡刚。全团总兵力 1600 余人。

据时任第一团三营十一连排长林子贤回忆说：他们从镇远到玉屏，沿途看见第二团团长彭文治的布告：“云南倡乱，咎由自戕；蔡锷到滇，人心彷徨。黔守中立，固我边疆；不附云南，不背中央。谕尔居民，决勿张皇。”王文华对这种公然反对讨袁的行动，火冒三丈。当他得知彭文治弃职叛逃北洋军后，于是立即果断电令卢焘接任团长，并要求卢焘要尽快驳斥彭文治的荒谬言论，整顿部队，鼓舞士气。临危受命的卢焘，来不及多想，就立即命令停下整顿，利用三天时间，先后召开了营团高级干部会、班排连下级军官会，以及全团官兵会，以此团结统一全团官兵思想，振奋大家精神，明确护国宗旨和目标任务。通过整顿，二团军心稳定，士气高涨，人人都为讨袁护国请战。1月 28 日，卢焘率部按期进兵湖南漾头司（与铜仁交界处），与北洋军第六师师长马继增部相持于麻阳。

话说民兵敢死队成立的有关情况是：在护国军各路抵达黔湘边境后，王文华司令觉得东路护国军势单力薄，于是就在当地招募了一批以胡刚为首的民兵敢死队，这支敢死队后来在打败北洋军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胡刚是贵州贞丰县人，在辛亥革命时，运动新军，输送弹药，是一位有功于革命的人。贵州光复后，军政府任胡刚为管带，率兵一营驻防思南。唐继尧入主贵州后，对原有部队不能相容。最初将胡刚营改编为巡防军，后调兵包围缴械解决。胡刚被解除武装后就变成了老百姓，但是他与湘黔接壤地带的大拉洞水银矿以及铜仁、辰溪等处汞矿工人相处甚好，矿工们欢迎他到矿区。当时兵荒马乱，各矿停工，矿工们无业可就。王文华出兵湘西，自感兵力不足，认为这批矿工可以补充兵员。于是他写信给胡刚，表明愿意收编这批矿

工为护国军。胡刚得信后很高兴，立即和矿工们商量，矿工们听说打北洋军，欣喜若狂。胡刚振臂一呼，蜂拥而至者达 800 余人之众，还带了不少刀、矛、土枪等器械。胡刚当即把这批人带到龙溪口，王文华赞扬他的勇气，立即拨发九子枪、毛瑟枪各 100 枝，拨 400 人补充第一团各营，其余 400 余人编为敢死队，充第二团由卢焘指挥。敢死队分为两个分队，挑选矿工中最机警、勇敢、素能服从的韩容荣和令狐配两人任分队长，胡刚任大队长。

### 3 与强敌马继增相持在麻阳

据 1916 年 3 月 15 日上海《民意报》“麻阳战事之实况”记载：“黔湘地势上之关系，麻邑古名将城，在湘省之极西，地属沅州。地势如长蛇，西北与凤凰连界，东面与芷江犬牙相错，东北与辰溪接壤，东南地势极高，山岭重叠，牛角坪小径直通晃县，计程约 90 里，由麻阳沿河而南 7 里至童湘溪，由童湘溪折西行 13 里至小坡田，该处地势极险，乃麻属之咽喉要隘，也系铜仁来麻阳必由不得之道，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如此描述，麻阳的军事地理位置之险要可略见一斑。如此地形对卢部非常不利。加上当时北洋军驻扎在湘西十几个县的兵力达 3 万余人，仅驻守麻阳就有马继增第六师周文炳、卢金山两旅约 6000 人，麻阳之南面芷江则有敌军汪学濂旅驻守，且武器精良、粮弹充足；而黔军卢焘部仅 1600 余人，且装备极简，布衣草鞋，补给困难，双方力量悬殊极大。因此，在力量上对卢部则更为不利，面对如此的处境，卢焘毫无畏惧，他认为攻克麻阳不仅是本部即将面临的大仗恶仗硬仗，而且也是左右整个东路护国军东进胜败的最关键的一次战役和主战场。所以，此仗一定非胜不可。

然而，敌我双方谁也不敢贸然轻进，双方都处在试探性的对峙

当中。固守麻阳的敌军，企图以其优势的兵力震慑和压服黔军，马继增认为黔军力弱，不堪一击，并狂妄地写信威胁黔军说：“贵州兵单饷绌，器械陈旧。若是我们愿意打仗，早已饮马滇池了。希望你们不要侵犯麻阳。”卢焘认为骄兵必败，应抓住敌军这个弱点，主动出击。

1月30日，东路护国军王文华司令下达进军湘西命令，四路黔军如同箭飞一般，直插各自攻击目标。当日清晨，王司令亲自率中路军第一团从镇远出击，一马当先，突入湖南晃县大鱼塘，2月3日晨，经过激战3小时，毙敌30余人，俘敌11人，缴获枪支、弹药甚多，占领晃州。当时正值过年期间，北洋军官兵头晚还猜拳行令，大吃大喝，正当他们酒酣耳热之际，突然遭到意外打击，万万没想到，此时会神兵天降，当下大惊失色，不知所措。北洋军看到黔军神速如龙，威猛如虎，轻捷如猴，顿时阵脚大乱。4日下午，一团又击破晃州败敌及其二营增援部队的恃险顽抗，又连克蜈蚣关。晃州至此成了王文华东路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右翼军吴传声第三团，由天柱相机进取瓮洞，2月3日进入湖南坪口寨，在泸平、矿山等处与敌军接战，毙敌4人，俘敌数人，击伤连长1名，士兵10余名。5日攻克黔阳，俘敌25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枝，银洋2万余元，其他军用器材、粮草、辎重无数。6日，吴部又乘势占领洪江。黔军官兵多生于山区，跋山涉水，如履平地，装备极简，布衣草鞋，步枪在肩，弹带系腰，作战时见敌即敞开卧下，就岩石林木，隐蔽其身，弹无虚发，俗称之为“麻雀阵”、“猴子兵”，盖誉南方部队之行军作战灵活也。而袁军来自平原，养尊处优，呢服革履，弹械箱笼，拉派肩夫，结队以随，且骄傲自大，纪律不严，因之屡战屡败也。

然而，开战七天过去，唯有左翼军卢焘第二团，因地形险固，加之我寡敌众，进展不大。但全团官兵们听到友军一、三团连战连胜、节节胜利的消息，个个都摩拳擦掌，士气极旺，誓与袁兵决战到底。2月2日，卢部前锋窦居仁营一分队通过夜间先由漾头司偷渡过

河，挺进半坡田打掩护，与此同时，负责打穿插的马龙骧独立连，以夜急行军的速度也挺进到北洋军的前哨阵地，并连续冲垮了敌军的排、连哨所，使后续部队陆续过河，分别进驻牛角坪、沙洞、竹坪溪等处，四面直逼包围了通往麻阳城系湘西重要门户的文昌阁，为后续部队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当时，正值新年春节，当地群众看到护国军战士讨袁士气高昂，都纷纷放弃过年，有的给护国军送饭送水送腊肉，有的主动带路，更有的甚至自愿参加了护国军或支前救护工作。看到群众如此支持护国军，卢焘原来沉重的心，似乎轻松了许多。

当时，据守文昌阁的部队是湘军田应诏（湘西镇守使）部两营，北洋军马继增部却以麻城当敌军之要冲，故调重兵扼守，文昌阁只留省兵两营把守，文昌阁附近的两翼也只部署了自己少量的部队。3日，卢焘一面致函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部守军连长陈国斌，陈述讨袁护国的利害，要求陈给予“假道进兵，限三日答复”，一面又派特使二营王排长（湖南当地人）前去文昌阁与田守军田排长（与王排长同乡）谈其宗旨。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现存的“麻阳战报”（1916年2月8日）载有的护国军王排长与湘军田排长当时的对话是，王说：“并无他意，不过因于冬防时间，而云南事起，恐土匪乘机起事，来此防守，保全地方。”田问：“以防匪，何必多兵？”王答：“奉省宪命令调遣而来，有无他意，实不得知。设一旦奉命向湘省进军，则麻城系必由之路，请诸君可暂避一时，我等决不犯湘。”并说：“如袁军今岁不至，明正我等定假道麻阳，直攻辰溪。否则，袁军一到，我等即与此之交战。唯商民并各机关人士，我等毫不伤害。”之后，麻阳县长雷某在接到消息后，立即派兵速向田应诏报告情况。田为了保存实力，于是主动撤防让路。5日，卢部大部队终于浩浩荡荡通过文昌阁，进逼麻属咽喉要隘的小坡田，直接威胁麻阳之敌。芷江北洋军驻军汪学谦旅闻报后，大惊失色，一边急电马继增、周文炳火速派队“救应麻阳”，一边请湖南督军汤芗铭飞电田应诏：“无分畛

域，加兵速救。”当日，马继增则派所部殷本浩营赶到麻阳增援，分兵把守距离麻阳城仅7里的童湘溪，而童湘溪到小坡田也只有13里。

与此同时，麻阳县长雷某也委托城绅夏建明、黄铭赴江口叩营求援。当时，小坡田守兵仅有一连，6日天刚亮，敌军便与卢部相遇，枪战不到10分钟，敌军陈连长见环城诸山，其峰顶皆被卢部驻守，仰攻极为困难，加之山径崎岖，不待援军赶到，就退回童湘溪与殷部守城。要隘小坡田失守后，麻阳之处守兵和援兵纷纷退回麻阳城附近的童湘溪、鸡冠寨、白马坳、天王庙之后山、官村、舒达坳及城内集结据守，敌军惊慌失措，此时马继增又分别从沅州急调第五团、第九团(团长陈静海)驰援麻阳，形势对卢部非常不利。一时间，麻阳城里城外可谓已众兵云集，岌岌可危，一场大仗一触即发。6日至9日，卢部与在麻阳城外闹的敌军几乎每天都有数次小战斗，占领了不少有利地形，使敌军陷入了田陇间，危急万分，但有时又被敌军复夺，如此相持数日之后，面对数倍之敌，卢焘于10日紧急召开了团营干部分析会，决定改变原来计划强攻的战术，采用声东击西的战略，以一小部分部队与童湘溪正面之敌周旋，以大部分部队投入麻阳攻城之战。并把决定及时电告了王文华司令，同时请求王派兵增援。

#### 4 激战三昼夜，勇黔军攻克麻阳

当时，敌我双方在麻阳的战事可以说是危急万分。现将当时敌军高层函电请示事宜摘录如下：

湘西镇守使田应诏2月9日致统率办事处的电文(现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是：“北京统率处暨陆参两部钧鉴：华密。麻阳于铣日危急，因芷江急，分兵往援，行至芷麻交界之齐天坪，被黔寇包围，不能前进，以致首尾不能照应，加以子弹告急，后无援军，且司令大军仍驻辰溪舟中，仅派一营援麻，实则少之……”

2月10日，马继增师长又致电统率办事处：“特万急。统率办事处钧鉴：顷据九团陈团长（清源）寒电称，殷营长于铣日午前八点，与逆匪在麻属童湘溪附近激烈酣战。至本日午后3时，敌焰愈炽，团长奉令率步兵营，并机关枪两挺飞驰援应，于是日午后四点到麻，即刻赴战。是夜，敌军枪火仍未少减。蒸日仍然激战，午后六点，二十一团三营赵景忠营长率全营兵，机关枪两挺来麻增援。据所获敌探供称，卦日分三路，计敌兵两千，意图包围我军，占据麻城，以便铜仁三千蜂拥前进。我军计定队日向敌两翼反攻，自拂晓至昏暮，酣战一日，故始欲退。现我军仍分兵固守童湘溪、天王庙等阵地，严加警戒。敌焰虽稍减杀，扼守要地，以待铜之援助，我军非用炮火，不足以匪寒胆，乞飞饬炮火来麻，以便大军容易进取。直日晚卢旅急谕：芷城危急，速率部属赴芷援助。因战斗激烈，队伍难以撤收。现命令周旅长一面酌派队伍驰赴麻阳，收容五旅退却；一面在辰溪选定阵地，扼要防守，以俟后队粗集，因结兵力，然后鼓励分进，务使歼尽逆寇，而振军威。谨闻，并祈代奏为祷。马继增叩。”（此电文现存于南京第二档案馆）。

王文华司令接到卢焘的电请后，立即电令照办。王见洪江已克，芷江后路又已断，且守敌为增援麻阳又分拨三营而去，内部十分空虚，为配合左翼军二团卢焘部攻克麻阳城，12日即命一团二营营长胡瑛率部攻打齐天坪，并调三团吴传声部由右翼截出，形成两面夹攻芷江。吴身先士卒，不幸在芷城东门外黄云桥阵地光荣牺牲。吴团长阵亡，全军悲愤至极，将士更加拼命，进攻更加勇猛。13日，敌军果然又从麻阳抽回两营星夜回援芷江。14日午前，王司令亲率一团一营袁祖铭、三营王天培两部增援芷江，迫使芷江敌军汪学谦部纷纷溃逃，当天晚上护国军完全占领芷江。

2月13日，王文华司令发动芷江之战后，卢焘见麻阳之敌已分兵回援芷江，于是立即趁机向麻阳守敌作总攻部署：即令一营窦

居仁部和独立连马龙骧部以麻阳之西童湘溪、天王庙等地作正面强攻，由民兵敢死大队胡刚部作辅助配合；令二营张春浦部绕道越山，包抄占领舒达坳一带山林，断绝通凤凰之路，攻麻阳之西北角；令三营程云部绕道官村，横截敌军后路，攻麻阳之东南面，形成了众兵将麻城之南、西、北三面包围（仅剩城东北面未能布兵包围）的态势。13日下午三时，卢焘下达总攻命令开始，一时间麻阳三面枪炮声隆隆，弹雨横空，敌军大乱一团，但仍顽固抵抗。此时，在麻阳城下，双方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攻守战，由于麻阳城墙坚固，护国军虽然多次组织进攻，仍久攻不下。正当战斗打至非常激烈的时候，15日凌晨二时，王文华司令立即调派一团袁祖铭、胡瑛两营及时赶到麻阳增援。王文华司令、范石生参谋长等，亲临前线指挥所督战。15日夜，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民兵敢死大队长胡刚与其分队长令狐配等人，率先以云梯爬城而入，白刃浴血搏杀，内外夹攻，至此麻阳已陷，护国军从三面陆续破城而入，与城内敌守军开展激烈巷战，敌守军马继增部见大势已去，纷纷向东北面的高村、江口、辰溪等地溃逃。经过三昼夜的激战，2月16日夜，护国军攻克湘西重镇麻阳。以大战恶战硬战称著的麻阳之役，最终以护国军的最后胜利而告终。麻阳之役，共毙敌达600余人，俘敌400余人，伤敌600余人，其中伤亡排以上军官近两百人，缴获各种枪炮、弹药、物资等不计其数，堆积如山。在战役中，护国军也阵亡100余人，伤300余人。1916年3月9日《中华新报》报道了“云南军都督、护国军总指挥唐继尧于2月18日致电各省麻阳之役大捷”的消息。

与此同时，2月12日，由黎平出击湘西的东路护国军游击队王华裔部，也攻克了靖县、道县、绥宁。

至此，东路护国军历时近三周的湘西作战取得了阶段性的战果。此次作战，东路护国军共行程千余公里，连打胜仗11次，毙敌1000余人，攻克麻阳、晃州、黔阳、洪江、芷江、会同、浦市、道县、绥宁、靖县等县城11座，致使北洋军第6师师长马继增因受袁世凯谴

责，愧愤难当，于 2 月 29 日服毒自杀。但袁世凯为了稳定军心，却发表策令说“该中将……忧愤成疾，军中暴卒”，并追赠马为陆军上将，从优议恤，颁发治丧银一万元。东路护国军以寡制众，以少于敌军近 8 倍的兵力，击败了袁世凯北洋军的 3 万余人之众，实在是可敬可佩，黔军从此也名震中国南方大部省份。

## 5 敌军二次反扑，护国军乘胜追击

1916 年 3 月初，护国军刚刚取得湘西战场第一阶段胜利后，袁世凯闻之马继增暴死，更是惴惴不安，他急令马继增下属第十旅旅长周文炳继任湘西第一路军司令，并增调重兵进入湘西，先后调集了四个混成旅由湘南开赴湘西战场，而护国军东路黔军也加紧战备部署。云南军都督、护国军总指挥唐继尧，也迅速调集第三军参谋长韩凤楼由滇东率一旅奉命抵达湘西前线，与王文华、范石生共同指挥湘西战事。其战斗部署是：令第一团继续担当中路主攻，固守晃州，进攻黔阳、洪江等地；令第二团继续担当左翼，增加增援部队，固守麻阳，截断北洋军南北联系，对湘西镇守使田应诏施加政治、军事压力，争取中立；令第三团继续担当右翼，固守沅州，派兵由洪江进攻溆浦，攻击北洋军左翼；令王华裔的游击军进攻武冈，牵制北洋军移动。同时把策动湘军反袁工作，作为护国军的应援力量来抓紧抓实，并将从云南急调赶到的炮兵、机关枪队及时分配到各团投入战斗。

3 月 7 日，敌军在湘西前沿各县对护国军大举反扑，北军第一路军司令周文炳，命令所部向麻阳高村、江市、岩门等地的护国黔军进攻。8 日，北军刘跃龙旅，向在南面武冈的湘军发动了进攻。3 月中旬初，北军胡林麟旅、汪学谦旅、卢金山旅等，分别向绥宁、洪江、黔阳等地反扑和围攻。

兵贵神速，机不可失。面对敌人的全线反扑，护国黔军奋勇抵

抗。卢焘所在的第二团，面对强于自己两倍以上力量的周文炳部，他毫无畏惧，在援军未到之前，就立即率部与当地民兵游击队一道，连续作战，分别在麻阳的高村、江市、岩门等地，与敌军开展正面激烈交战。后来在奉命赶到增援的新一团猛烈火力的支援下，经过四个昼夜的血战，打得敌人伤亡累累，溃不成军，四处逃散。在这次反击战中，第二团共击毙敌军连排长以上军官及士兵 400 余人，伤敌无数，俘虏数百，缴获各种武器和物资一大批，给北洋军予以了迎头痛击，沉重地打击北洋军的嚣张气焰。其他洪江、沅州、黔阳、武冈、绥宁等反扑战场上，也打得敌军落花流水，弹尽粮绝，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

护国黔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除了师出正义、士气高昂外，也与得到程潜为首的湖南护国军的有力支援是分不开的。程潜在湘西的招抚工作很有成效。湘西民军纷起，地方军阀又与之合流。各县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使全湘西反袁的浪潮更加高涨。到 4 月初，整个湘西，除常德、桃源、辰溪少数几县外，其余 31 个县宣布讨袁，盘踞在湘西的北洋军阀受到各县人民的包围。如龙山县义军在夹五里痛歼北洋军；新化县锡矿工人攻打县城；武冈县人民围攻县署，打开了监狱，释放反袁“囚犯”。当护国黔军攻击北洋军时，湘西父老子弟协助黔军进攻。人民组织义军到前线助战，妇女为黔军送水送饭。当地人民对北洋军则采取不作向导，不作侦探，不做挑夫，不供给军需物资，不供给油米菜蔬，破坏道路桥梁，在隘路设路障，对北洋军谎报军情等活动，使北洋军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军心动摇。

就在湘西、湘南、川南等地护国战事激烈的时候，全国又有广西、贵州、湖北、江西、江苏、山东、河北，甚至连袁世凯的亲信四川陈宦、湖南汤芗铭等省，都纷纷通电宣布独立。特别是滇、黔、桂三省独立连成一片，一致讨袁，直接威胁川、湘、粤，袁军更穷于应付。更令袁世凯惊恐不安的是，他收到了冯国璋等人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的密电。这个密电联名的除冯国璋之外，还有江西将军

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等人，这使袁不安地意识到，北洋军阀集团即将分崩离析，他已经失去了赖以称帝的力量，面临着灭顶之灾。这时，帝国主义各国也表示“除非立刻取消帝制，否则危险将不可避免”。袁世凯深感无路可走，尽管调集近 20 万军队镇压，但军心涣散，节节败退，在这样内外交困、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被迫于 3 月 22 日在北京宣布取消帝制，从元旦登基到取消帝制，袁世凯只做了 83 天的皇帝梦，就灰飞烟灭了。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后，却仍赖在总统的宝座上。这样，全国人民当然不能接受，护国军方面更不能接受，于是护国军将领纷纷发表通电，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 年 6 月 6 日，大独裁、大卖国贼袁世凯，终于在声讨和唾骂中暴病不起，一命呜呼。

在护国战争四个战场(川南、綦南、湘西、桂西北)中，贵州以有限兵力，承担了綦南和湘西两个战场的任务，抗击了四个战场中约占百分之四十的北洋军，以少胜多，对声援川南、桂西北两个战场，起到重大的作用。整个湘西战场，护国黔军以不足 4 个团的 5000 兵力，仅阵亡团长 1 人、军官 60 余人、士兵 300 余人的微弱代价，取得了牵制北洋军 2 个师 4 个混成旅近 4 万余人长达 2 个多月，并歼灭了 3 个混成团 5000 余人，击溃了万余人的辉煌胜利。正如蔡锷所指出的：“黔军此次出兵川湘，苦战辛劳。每能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略地千里，迭复名城。致令强虏胆丧，逆贼心摧。功在国家，名垂不朽。将来事定，论功行赏，中枢自有权衡。扬清激浊，社会必有公论。”蔡锷的这番话给予了护国黔军很高的评价，也是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后人称之为“护国湘西之战”。

卢焘作为东路护国军黔军第二团团长，两次冲锋陷阵在湘西主战场上，为护国军夺取讨袁湘西战场的全面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护国军的庆功大会上，卢焘分别荣获了“护国一级功勋”奖章和“一等嘉禾”奖章称号。1916 年 7 月，卢焘被提拔为黔军第二旅少将旅长，驻防铜仁。卢焘的老长官，王文华司令官也被提拔为黔

军中将第一师(仅此一师)师长,驻防重庆。范石生参谋长也被提拔为黔军少将师参谋长,其他黔军军官也均由排升连、连升营、营升团、团升旅等得以跳级提拔。

纵观卢焘将军在护国湘西麻阳两次重要战役中,无论从兵力、武器、后勤保障,还是所处的地形,都较敌军处于劣势。然而,卢焘将军为何又能累累以少胜多,以寡制众?究其答案,除了他本人有超强的军事才能外,关键的一着,还有他善于依靠群众无穷的力



担任黔军团长时期的卢焘

量。

如 1918 年湖南省志稿的作者在《关于麻阳辛亥革命及护国之役的原始材料》(现珍藏于湖南省图书馆内)一文中就写到：“……农历初六，护国军一营，声东击西。袁军未测其虚实，乃退据距城七八里之童湘溪等处。初八，护国军左路军卢焘部由羨头司达文昌阁与袁军激战数次，然袁军人众，且装备优良，其运输子弹粮秣之船，达 20 余艘，护国军仅一团，武器粗劣，其军需仅以少数马驮运，实未能及也。于是麻阳民众起而助之。麻阳虽处边隅，自闻袁氏毁约构乱，麻阳首当其冲，知识分子感忿然认为公敌。故袁军初抵麻阳，即张预立骂贼被戕之事。加以袁军至麻阳，纪律极坏，违反麻阳礼俗，更激动民众怒潮。麻阳最重妇女名节，有被欺者，全族引为奇耻，而袁军不知，到城即肆入民众房，索花姑娘，全城哗然。妇女尽避至乡间，袁兵又三五成群踪扰至乡。民众忿极，初扰试抗。有以花帕蒙首装为采樵妇女者，望见袁兵则四散佯逃，诱至无人，戮其人而夺其枪。有预伏多人于要路，冒称黔军，俟袁军过，则啸起擒之。袁兵以北人远来，未悉地形，而麻阳又山路崎岖，袁兵皆革履，即未遇敌，亦恒一步一颠，故索花姑娘至乡间者，辄有出无归。护国军知其然，遂特别联络民众，而民众亦极昵就之，称护国军为南兵，而称袁军为北兵。适值农历新年，四乡民众竟为南兵馈酒馈肉馈米馈炭馈菜水馈年粑，且竟为引导捷径，指示要扼，以包围北兵，并有自告奋勇请南军休息，愿前代杀敌者。袁军亦惧，一闻对方枪声，则以大炮机关枪步枪密集齐放，如度岁之爆竹，昼夜不绝声，南兵及民众则笑匿隐处不理之；俟其炮声稍停，又周围先后鸣枪，或放纸炮代枪，袁军认为敌至，又如前密集放炮。如是者数昼夜，袁军竟惊溃，一律退集县城，复由县城消遁，窜至高村，沿途抛弃枪支甚多。后袁氏曾增派一师来援，水陆路并进，声势浩大，终以不得民助而败。”

## 第十二章

## 参加护法战争

## 1 护法军兴，又奔次湘西

湘西战事平静下来后，1916年9月，卢焘即派人到贵阳把老母及妻子、女儿一家六口人，搬到铜仁随军居住。三女儿卢慈定，是他从柳州到贵阳任职后的第三个月出生的，长子卢慈仪，是袁世凯洪宪帝制前的1915年10月7日出生。

袁世凯死后，以反对袁帝制自卫、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制为目标的护国战争随之结束，黎元洪以副总统的资格继任了大总统。段祺瑞当上了国务总理，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袁世凯虽然死了，但其阴魂不散。护国战争刚一结束，北洋军阀就分裂了，形成了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以冯国璋为头子的直系，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依附他们的还有张勋、倪嗣冲、阎锡山等稍小的军阀。在南方军阀中，势力最大的是唐继尧的滇系和陆荣廷的桂系。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各自仗着帝国主义的支撑，横行霸道，争权夺利，使中国在摆脱了袁世凯独裁后不久，又陷入了军阀割据和混战的泥潭。

在这场军阀混战之初，清廷的孝子贤孙张勋，利用黎元洪和段祺瑞激烈的争斗之机，带领辫子军进驻北京，赶走了黎元洪，解散了国会，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闹剧。1917年7月1日凌晨三时，

张勋身着朝珠蟒服，头戴红顶花翎，带领复辟群丑 300多人进入清宫，跪请溥仪重登帝位：“臣等反复密商，公同盟誓，仅代表 22 省军民真意，恭请皇上收回政权，复御宸极，为五族子臣之主，定宇内一统之规。”于是，年仅 12 岁的溥仪，按照事前的安排，立即发布由立宪派首领康有为拟好的诏书：“收回大权，与民更始，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张勋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独揽大权。康有为被授予弼德院副院长兼太傅。

一时间，群魔乱舞，一群群的亲贵、遗老、遗少，像一池沉渣，一经搅动，都翻浮上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他们穿着清朝袍褂，脑后拖着有真有假的发辫，互相叩头作揖，弹冠相庆，狂呼“恭蒙明诏，日月重光”。然而，复辟不得人心，民意不能强奸，张勋即刻陷入了“普天同愤”的火海之中。

孙中山在上海奔走呼号，频频与各界人士接触，商议救国大计。他发表《讨逆宣言》，阐明“此次讨逆之战，匪特为民国争生存，且为民族反抗武力之奋斗”。阴险狡诈的段祺瑞，原先暗中支持张勋复辟，眼见驱逐黎元洪的目的已达到，摇身一变而成为“再造共和”的讨逆军总司令。他率领讨逆军进攻北京，缴了辫子军的械，赶走了张勋和康有为，迫使溥仪再次宣布退位。12 天的复辟闹剧，就这样在国人的唾骂中草草收场。

经过这场变乱，段恬不知耻地以“再造民国”的功臣居重新当起了国务总理。冯国璋则以反复辟“有功”，代行大总统职。段祺瑞重新上台后，就“一手遮天，目无余子”，公开宣称“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总统”，实行“欲奠定湖南以收复两广，同时奠定四川以制服滇黔”的“武力统一”政策。“约法为民国命脉，国会为法律本原。国会存，则民国存，国会亡，则民国亡。”如果听任国会解散，约法废弃，“则数十年革命事业的成绩，固全被推翻，而将来国家根本之宪法，亦无从制定。”

面对这些问题，孙中山又一次挺身而出，领导和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继续为争取和维护民主共和而斗争。此时，西南军阀因段祺瑞独揽中央大权断了问鼎中原之路。为了维护在护国战争中所取得的利益，对段祺瑞掌握的北洋政府采取反对态度，对孙中山表示一定程度的支持，其实是要借“护法”之名以谋私利。在护法运动中，刘显世对唐继尧亦步亦趋，想在滇系军阀独霸西南的行动中得到一些好处。

黔军中以王文华为代表的新派人物，他们的态度与唐继尧、刘显世是不尽一致的。经过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他们对孙中山坚决维护共和制度的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当王文华作为贵州军事代表去北京参加督军团会议时，他对段祺瑞的独裁，是真心实意反对的。这样，就和刘显世的驻京代表刘显治发生了摩擦。刘显治在段祺瑞的面前进行离间，并以贵州政治代表的身份排斥王文华，使王文华遭到了冷遇，一度被拒绝于督军团会议之外。一次，王文华参加督军团会议，会议决定当场向全国通电，草拟电报稿时，各地代表都默然，因为多数人是行伍出身，平时多由他人代笔。王文华拿过纸笔，一挥而就，即席诵读，文笔流畅，语惊四座。5月19日，当段祺瑞操纵督军团要求修改宪法及解散国会时，王文华以“根本大法，不容毁弃”而拒绝签字。因为对段祺瑞的逆行不满，王文华愤然离京，逸赴上海拜谒孙中山，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后又被孙中山委任为军事委员会成员。此时，王文华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转变。当孙中山南下广州时，他接受了孙中山的护法主张，表示“竭尽全力，扩张军备，以作孙中山后盾”。此后，虽然刘显世追随西南军阀，也通电拥护孙中山的主张，但其内心打算与王文华等却是大不相同的。

1917年7月下旬，孙中山与章太炎联名致电唐继尧、陆荣廷、程璧光（海军司令）等滇、桂、粤系将领，陈述了团结各方力量出师护法的重要，得到了响应和拥护。于是，滇、黔、桂、粤等省，立即组

组织了护法军，出师川南、川东、湘西、湘南、赣南等地。8月，黔军在重庆设置黔军总司令部，王文华师长升任黔军上将总司令，辖1师2旅，即第一师师长王文华兼，参谋长朱绍良；第一混成旅旅长卢焘，第二混成旅旅长熊克丞。整编后黔军共辖10个团，团长分别为袁祖铭、胡瑛、刘登吾、王天培、胡刚、窦居仁、李蕴奇、魏应鳌、黄不谋、袁克辉。卢焘率第一混成旅出师湘西参加护法战争，驻防辰州。

当王文华从北京转到上海筹措军械并与各方联络的时候，戴戡所率领的黔军熊克丞（又名其勋，广西南丹人）旅在四川遭到歼灭。戴戡由成都突围后，拥护段祺瑞的刘存厚已作好聚歼黔军的部署，在戴戡撤退的必经之地，沿途设伏，使黔军损失惨重。戴戡退至仁寿县附近的秦皇寺时，又遇到强劲伏兵，此时黔军已溃不成军。戴戡与护兵逃至小陶湾，被川军四面包围，他自思已无生还希望，乃自杀身亡。王文华得知这一消息，十分悲痛。因为在护国运动中，彼此政见一致，有较深感情。由于黔军熊克丞旅的覆灭，使黔军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一，所以王文华决心入川护法。一是响应孙中山的号召，二是为朋友报仇，为黔军雪耻。

1917年11月，站在北洋政府方面的四川刘存厚部在川南围攻滇军，吴光新的北洋军第四混成旅也在重庆遥相呼应。滇军节节败退，有被逐出四川的危险。唐继尧急电刘显世、王文华，催促黔军火速入川支援。时值孙中山号召西南各省北伐，王文华积极响应。他命令袁祖铭为纵队长，率黔军三个团出綦江。王文华率卢焘、胡瑛、谷正伦各部相随而进，唐继尧亲自坐镇毕节指挥。入川滇军布防于自贡、泸州、简阳、资中、内江、隆昌一带。依附北洋军的川军刘存厚、钟体道两个师倾巢出动，原驻重庆、永川、荣昌一带的周道刚师也加入对滇军的作战，加上吴光新的北洋军第四混成旅，其势汹汹，咄咄逼人。

王文华见川军和北洋军的势力较大，未敢贸然疾进。刘显世则一面与周道刚、吴光新文电往来，虚与委蛇，麻痹对方；一面令袁祖

铭部王天培营为前锋，袭击距重庆南面30里三百梯的吴光新所部北洋军。未克，仍退回綦江。11月下旬，滇军顾品珍部和支持护法的川军吕超部向重庆逼近，黔军此时才大规模出击，袭击重庆。袁祖铭一马当先，猛扑黄桷垭，进抵鹿角场。吕超部也进抵重庆附近的道钟庙。吴光新和周道刚害怕陷于绝境，12月2日仓皇逃出重庆。滇、黔军乘胜追击，于14日夺回依附北洋政府的川军所占的泸州，再度控制了川南。滇、黔军取得了护法战争的初步胜利。

当黔军入川护法时，孙中山于11月22日致电王文华，希望滇江上游黔军会攻重庆，然后顺流东下，直趋武汉，平定长江上游。但是滇、黔、川三省军阀，暗地里各有各的打算。唐继尧作为滇、黔护法军总指挥，只想在西南建立霸主地位，无意出川东下；而川军的熊克武、吕超在滇、黔军进驻四川的威胁下，害怕自己的地盘被吞并，也裹足不前；而刘显世只想让王文华率黔军在四川站住脚跟，就食于川，以减轻贵州缺饷乏械的压力，并无远大的抱负。所以滇、黔、川的军阀对孙中山北伐主张，并不感兴趣。黔军中王文华及卢焘等将领态度鲜明，支持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在进驻重庆后，亟谋出师武汉。王文华曾向唐继尧、熊克武等建议：“乘势东下，与总理命出湘的谭浩明军会师武汉。”但无人应和，致使张敬尧率北洋军进入湖南，于是孙中山拟定川、湘共进的北伐计划也就落空了。

黔军入川护法，实际上只达到了驱逐吴光新和刘存厚的势力，恢复滇、黔军对川东南控制的目标。当然，这也是唐继尧的真实思想。通过这次胜利，也助长了王文华等谋求向外扩展的野心。在当时南北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形势下，黔军在护法旗帜下入川，抗击了北洋军，从军事上、政治上看，对广州军政府的护法运动都是有利的，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也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1917年12月15日，唐继尧在重庆召开滇、黔、川三军将领会议。这次会议公开打出了“靖国军”的旗号，其目的是征服四川，控制西南，问鼎中原。唐继尧、刘显世分任总司令和副司令，并委熊克

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再次确立了滇系军阀的盟主地位。刘显世得了副帅一职，踌躇满志，唯唐继尧马首是瞻。但是，黔军中的王文华等将领一向拥护孙中山的护法号召，他们的想法和唐继尧、刘显世并不一致。不过迫于形势，不得不附和“靖国即护法”，“靖国必先靖川”的主张，以扩充自己的地盘。

孙中山当时处在有政府无军队的情况下，确有难言的苦衷，原想要滇、黔军出川北伐，不希望西南各省置北伐于不顾而作窝里斗。唐继尧的所谓靖国，只不过是借孙中山的名义，借护法的名义而独树旗号去欺骗群众，而达到其称王称霸大西南的目的而已。

“靖国之役”发动的借口，是因为刘存厚曾接受张勋的“四川巡抚”的委任，充当段祺瑞统一南方的先锋。其中真正的目的是驱逐刘存厚，以巩固滇、黔军在四川的地位。此时，川东、川北、川南均为“靖国军”所控制，刘存厚的部队被压缩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一带。北洋军阀为了从湘、川用兵，以扼杀护法军政府，再次起用刘存厚，任命他为四川督军。1918年元旦，刘存厚在成都宣誓就职，于是“靖国军”加快了驱刘的步伐，分三路进攻刘存厚，各路均节节胜利。1月20日，袁祖铭率黔军主力入驻成都，一时名声大噪。王文华致电孙中山报捷，黔军受到了护法军政府通电嘉奖。2月24日，广州军政府电委但懋辛为四川省长，吕超为成都市卫戍司令兼代四川省督军。唐继尧不予理会，竟于次日在毕节行营，以“靖国军”总司令名义，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同广州军政府对抗。这样，“靖国军”与广州军政府就发生了矛盾。

1918年初，黔军在重庆又整编为3个纵队1个混成旅，第1纵队队长袁祖铭，参谋长张春浦；第2纵队队长李云鹤；第3纵队队长韩建铎，参谋长何应钦；第1混成旅旅长卢焘，仍驻防湘西。

3月2日，孙中山为解决四川问题，曾致电王文华，主张四川军、民分治，并指责唐继尧，独行己见，置护法军政府于不顾。孙中山的电文，表明了在四川人选诸问题上与王文华的主张是接近的。

同时，也表明了孙中山对王文华和西南军阀抱有很大的幻想。但是唐继尧不但不听孙中山的规劝，反而以“盟主”地位委任退驻陕西的刘存厚为“援鄂”、“援陕”各路司令。唐继尧深知，滇军人数不及川军三分之一，非笼络住黔军、不足以巩固其地位。因此，他任命王文华为“援鄂”第三路总司令，并伙同刘显世要熊克武把重庆镇守使一职让给王文华。当时王文华、王伯群兄弟正在省内谋夺刘显世的权，刘显世是有所察觉的。他想，只有把王文华安顿在外，贵州才得安宁，所以极力赞成王文华为重庆镇守使。王文华当然高兴，急不可待地宣布就任。但又遭到川军的全体反对，几致动武，此职遂无形中被取消。

孙中山为维持与西南军阀的联合，稳定川局，合力北向。对四川人选，不得不采取折中办法，正式委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省长一职，则委任杨庶堪担任，但终不遂唐继尧之意。5月，唐继尧在刘显世的支持下，由毕节赴重庆，先被推为“五省靖国联军总司令”，后又以“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居。

“靖国之役”在四川排挤了北洋军阀的势力，进一步稳固了滇黔军阀在四川的地位。在当时南北两个政权对立的局势下，打击了北洋军阀在四川的追随者，对巩固和提高广州军政府的政治影响，应该说是起到一定作用的，但就实质而言，仍属军阀混战。

“靖国军”驱逐依附于北洋军阀的刘存厚，川军与滇、黔军的矛盾又明朗化起来。主要是滇、黔军所控制的川中、川南、川东三路，均为四川富庶地区，这当然就引起了具有相当兵力的四川军阀极度不满。刘存厚败逃后，熊克武怂恿滇、黔军东下援鄂，好让他独占四川，并公然排斥孙中山所委任的四川省长杨庶堪，力图将黔军势力排挤出重庆。而滇、黔军占领了四川富庶之区，又怎肯甘心放弃？因此，对熊克武的怂恿，置若罔闻。特别是王文华，早已将重庆视为己物，并宣称“吾黔商务与渝城有莫大关系……不能仅视为川省之一治区；我军夺自北军之手，牺牲甚巨，非欲占川省之地，乃欲得战

略的要点，并以维持川黔商务”。唐继尧也表示：“黔军守渝已成不易之事。”这当然是为了霸占重庆，强词夺理的论调。王文华六个团的兵力，支持毫无实力的杨庶堪设省署与熊克武对抗。因为杨庶堪的省长一职是孙中山委任的，所以，王文华此举，客观上是拥护孙中山的任命，奉行孙中山的主张。滇、黔军密谋“倒熊”之时，滇、桂军阀利用南北和议，加紧同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勾结，进一步孤立和排挤孙中山。孙中山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他曾一度把解决川事的希望寄托在王文华和黔军身上。他认为王文华“独能审察世界大势与社会思潮，有发展民族精神，增进人类幸福之抱负”。随着滇、桂军阀与吴佩孚签订《救国同盟草约》，唐继尧炮制的“川滇黔促进会”成立，护法军政府危在旦夕。由于贵州地处川、滇、桂之中，贵州军阀未在《救国同盟草约》上签字，王文华又对滇、桂军阀不满。因此，孙中山把出兵剿灭滇、桂军阀的希望，寄托在王文华身上。他致电王文华：“西南成败，在此一举，若舍此不图，贻误滋大。”王文华与孙中山多次函电交驰，作出了要剿平桂系军阀，平定西南的姿态。但他此时为夺得四川地盘的实惠所吸引，同时又加上被川、滇军队所牵制，赴桂讨陆（荣廷）之事，也就只是口号而已。

讨桂不成，“倒熊”之事却在积极进行。“倒熊”黔军的实力，只有袁祖铭、李云鹄、韩建铎3个纵队旅，为充实战斗力，又将长期驻守湘西的卢焘混成旅调到重庆。同时，还有全部滇军和部分川军。经过激烈战斗，熊克武的势力虽然被驱逐出川东，但重庆已成为“倒熊”、“拥熊”各派武力争夺的焦点。

1920年6月3日，川军6个师联名通电，反对唐继尧、刘显世为联军总司令、副司令。嗣后，川军大规模出击，滇、黔军一时反处于守势，直至7月初才完成后方的集结，开始反攻。在滇、黔军的追击下，熊克武与刘湘退至川北。7月18日，黔军与其他“倒熊”部队攻克成都。“倒熊”之战始告一段落。

## 2 爱护官兵，慎理疑案

话转 1917 年 8 月，卢焘奉命率部由铜仁分两路移防湘西辰州时，驻防遵义的第八团某连排长韩某从遵义发一封信到湖南辰州家里。此信经遵义邮局检查（每次军事行动前军方例行检查），发现信中写有“先杀本营官佐，后杀辰境客商”一句，认为必定是阴谋造反言论，邮局将该信内容急电报告贵阳刘显世督军，请示处理。刘当即电令卢焘旅长将韩排长就地正法，卢焘得到刘督军的电令后颇为震惊。他考虑到行军作战尚未开始，内部就有内奸作乱，不利于战斗，若先将这位韩排长正法必乱军心，影响其他更为不利。他深思熟虑一个晚上之后，就立即电令第八团团长胡刚火速到旅部商量，研究对此事应如何处理。起初，胡也无良策，当卢焘问到韩排长平时为人及一些生活嗜好时，胡想了许久才说：“韩排长为人品德淳朴，没有其他不良之处，就是好赌钱，这是最大的缺点。”这一句话却触发了卢焘的一番思考，他对胡岗说：“我是广西人，赌钱有‘大杀四方’的俗语，要赢别人的钱常叫做杀他的钱，因此断定这个‘杀’字的用意作这样的解释。”

于是，卢焘为慎重起见，就对胡团长说：“现在要委屈你几天，就住在我这里，等韩排长的部队到达铜仁集中时，你就带我去暗中认识一下韩排长。”3 天后，韩排长所在部队由遵义附

1917年，卢焘旅长与团长胡刚（左）  
摄于铜仁旅部门前



近县的营地到达铜仁时，卢焘就在胡刚的陪同下来到韩排长所在部队的驻地，暗中辨认了韩排长，卢焘觉得韩身材高大、相貌斯文，言语平凡，不像粗野、阴险之徒。卢焘心中有数之后，各路部队也陆续从黔北、黔东到达铜仁集中，每个部队一到铜仁不管人数多少，卢焘都及时到驻地作动员讲话，说明此次赴湘作战目的，提高官兵思想认识，激发官兵爱国爱民之心，鼓舞官兵斗志，并暗中观察各人动作情况。约一个星期后，全旅官兵全部到齐时，卢焘就在旅司令部召开了全旅排长以上军官军事会议。会场设在旅司令部楼上，主席台背后墙上挂着一排指挥刀架，每个刀架下面都写明各团、营、连、排主官的名字，每位军官一进会场门口，就由数名警卫员分别带到主席台背后墙边，对照名字把指挥刀依次放在刀架上，然后回到指定位子坐好。韩排长左右也事先安排好监控人员的座位，以备万一。会议由参谋长主持，卢焘发表讲话。卢焘首先讲明此次部队开赴湘西作战的目的、意义和要求，然后就问：“这次出发铜仁之前或途中，是否有人写信给家里或亲友？”这一发问顿时让在座的近 60 名军官都感到十分惊讶，大家不知如何应对，都默不作声。几经提问，仍然无人回答，于是卢焘大声地问：“哪位是韩排长？”韩立刻起立敬礼回答：“我有写过！”“是不是你写过信回家？”卢焘随即从桌面的公文夹取出刘督军的特急电报，拿给大家提示，韩排长立刻下跪带哭求饶，卢焘又大声喝责道：“军人不能下跪！”追问数次，韩才说出在遵义准备出发的时候，他曾写过一封信寄给家乡辰州的一位朋友。再问信的内容，他稍想一下就如实说：“约他们等我回家时，大家来赌钱……”卢焘当场大训他一顿，韩说：“我想赢他们的钱，因我们湖南说赢钱叫‘杀钱’。”经他这么一说，卢焘觉得与他原先和胡团长研究分析的想法相吻合。因此，当场宣布免去韩的排长职务，降为事务伙食兵。这一公案真相大白，韩幸免冤死，使全旅官兵大为感动，他们敬佩卢焘将军处事慎重果断，爱护官兵亲如手足，而全旅官兵也因此受到启发教育，振奋精神，为后来黔军在湘

西护法各战役中取得的节节胜利起到积极作用。

还有一件事，据卢焘的族侄卢仕廉（曾随将军到贵阳读书，后在贵州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撰文回忆：那是 1949 年我随部队驻施秉时，有一位六十多岁摆米粉摊的老人，我曾经为寿公当过厨师，他告诉我：“那歇子（时候），我常听人家摆（讲），卢公部队驻桃源时，非常关心士兵，他经常下营房查夜而总是脚尖着地，不声不响，谁都不知道。有一次，他走到一座营房，不时听到哭泣哀叹声，卢公把营房记下来，第二天找营、连长查问，查出有个士兵几夜来都是如此，别人问他，一声不吭，只是摇头，抹泪。卢公命令连长叫他到指挥部来，人们知道后，都为这个士兵担心，心想不知他犯什么法，惊动到指挥官，看来是凶多吉少。”

“军人都行军礼，可是这个士兵一进指挥部见到卢公就下跪磕头，痛哭起来，卢公一点也不生气，还亲手把他扶起来，给凳子坐，给烟抽，这个士兵很受感动，心也定了，便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道出真情：‘家里来了信，说母亲已经病了一个多月，弟妹还小，无人照料，现在又不能请假，开小差又要挨枪毙，人不能回，钱又没有，怎不伤心流泪。’卢公查实以后，给他回去的费用，准假回家照料母亲，看看弟妹，并嘱咐他，母病未愈，可以续假。这士兵听后又扑通地跪下，叩头发誓：‘我一定回部队，一生跟着长官。’在旁的官兵，无不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这名士兵就是后来一直在卢焘将军身边从做贴身警卫到生活秘书和厨师的彭济美老副官。卢焘将军遇害后，彭济美副官仍在卢家生活到 20 世纪 50 年代去世为止。可见，卢焘将军对部下是何等的尊重，与他们亲如手足，同甘共苦。

### 3 遭遇冯玉祥，鏖战蟠龙坳，三战三捷

段祺瑞闻讯西南唐继尧、陆荣廷等纷纷拥护孙中山，组织护法军，出师湖南、四川讨伐自己后，立即从全国各地调集他的嫡系部队和地方的杂牌军到湖南、四川布防。特别是湖南已成为全国各色军队的集中展览场所，调集到湖南战场上的北洋军第八师、第二十师及安徽的安武军、山西混成旅、第十六混成旅等，加上湖南两个师总兵力近6万人。这些军队大多都是北洋军从北方各省临时抽调过来，指挥权既不统一，又不协调，士兵厌战情绪又高。如安武军有新旧两个系统的互相对立，与其他北洋军也不合作。山西混成旅还是被骗上火车南下的，出发时上级骗他们“开到湖北换防，并不打仗”。但到了湖北又开往岳阳，到了岳阳又开往长沙。当由长沙出发时，士兵们知道不是“换防”，而是开往前线打仗，因此都拒绝上车，直到上级答应增发饷3个月，才无可奈何地上车。此外，原来一直站在北洋军旗帜下的湘军，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歧视，于是他们打着“湖南人不打湖南人”和“湘人治湘”的旗号，也宣布自立，自护国战争袁世凯派兵进湘以来，湖南人民十分痛恨这些身穿国军制服、明火执仗的北洋军强盗。然而，旧的强盗刚被赶走，现在新的强盗又来，因此北洋军所到之处，人民纷纷逃避，奋起反抗，支持护法军。当时，因为许多有识之士曾经断言，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决不会成功，袁世凯没有成功，段祺瑞也更不会成功。

辰州，地处沅江中游，是湘西政治、军事、文化、商贸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也是当时湘西最大的城市。

1917年10月，卢焘率部按时抵达湖南辰州后，立即进行了周密的布防。旅司令部和直属队驻辰州天宁山学校大院，独立营驻辰州城内，第八团驻辰州附近的乌宿一带，第九团驻北溶一带，第十团驻柳林汊一带等地，全旅三个团形成“品”字形摆开。同时卢焘还

及时主动与当地官员联系沟通，广泛做好当地群众的思想宣传工作，严格要求部队遵守当地群众纪律和风俗。卢焘部队防区面对的敌人，就是北洋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安徽巢县人），驻扎桃源。该旅在护国战争中，曾被袁世凯调到川南对付护国军，但也被护国军打得七零八落。护国战争结束后，该旅刚回到湖北休整补给完，又被段祺瑞急匆匆调到湖南湘西前线，官兵士气低落，厌战情绪自不待言。卢焘深知敌情后，要求各部队加紧备战。他与参谋长等旅领导，经常深入各部队驻防一线，开展调研，观察地形，联络地方官员和群众，制订作战方案，鼓舞官兵意志。

1917年11月上旬，北军冯玉祥部小股部队经常到南军卢焘部防地发起挑衅，卢部官兵群情激愤。当时冯部7000余人，卢部仅3000余人，且北洋军装备和穿着都比南军优良。当冯部闻之与其相距近200多里对峙的是南军卢部时，非常轻蔑地说：“羔羊迎猛虎，送食人口！”1917年11月8日，冯部大部队却傲慢地逼进离辰州约120里地的沅州附近，以先发制人的态势侵犯南军领地。卢焘闻讯后，也不甘示弱，立即率部星夜赶去迎战。次日晨，战斗在番龙坳打响了。开头，冯部似乎旗开得胜，但当冯部前沿阵地正打得血急脑热的时候，送弹药的却总跟不上来，最后因前沿部队的弹药不够使用，被卢部打得呜呼哀哉。同时卢焘还指挥部下巧布疑阵，用美孚（煤油）空油桶燃鞭炮伪装机关枪助战，以迂回战术分兵包围北洋军切断后路，使这场战斗不到一个上午冯部主力就丢下阵地，纷纷往后溃逃，此役冯部伤亡200余人。

面对强于自己两倍多的敌军，卢部又如何击败冯部呢？原来在大部队未赶到前线阵地的时候，卢焘将军就事先派30多名侦察兵化装成当地老百姓，赶到敌后将原来准备好的数千份劝降告白书，分别散发在冯部运送弹药的各道路之上。告白书内容说：

“警告冯部官兵，冯旅长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此次南犯实为受人利用，即受段祺瑞所指使，段意在借刀杀人，让冯部与我军交战

耗损人力物力,然后可壮其势力,统治北方。然冯旅长不识段之奸计。我等奉孙大元帅之命,讨伐不义,若你等愿替段贼卖命,顽固抵抗,可以抛头弃尸于野,使家中父母妻子流泪哭泣。此种说法是否成理,望诸位官兵三思,贵州第一混成旅旅长卢焘叩上。”

冯部许多官兵对段祺瑞本已恨之人骨,对孙中山也莫不仰慕,现在再看见这些纸条,无不怒从心起,于是弃甲丢戈,不愿再战,很快出现了上述的战斗结局。

第一次出战失败,冯玉祥以为胜败乃为兵家常事,不以为然。事隔不及两月,又连续命令在番龙坳上与卢部打了第二、第三仗,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 4 与冯玉祥商议“剿匪保商,安境息民”

正当卢焘率部在湘西辰州番龙坳与北洋军冯玉祥三战三捷的消息震撼当时朝野的时候,1917年11月中旬,云南军都督、西南护法军总指挥唐继尧,广西都督、西南护法军副总指挥陆荣廷,贵州都督、督军刘显世,湖南暂时维持军民两政办公处主任王汝贤(不愿内战,驱逐省长傅良佑,临时以此职代行省长职)联合通电各省,宣布成立湘黔联军总指挥部于湖南辰州,任命卢焘为中将总指挥,统辖驻湘西湘黔联军6支部队,即湘西军政长田应诏,驻防麻阳、黔阳、凤凰、乾城;湘西游击军司令张学济,驻防沅陵上游及辰溪一带;湘军旅长周则范,驻防芷江、会同、靖县、溆浦、绥宁;湘军省防团长林德轩,驻防永顺、保靖、龙山、桑植;黔军第一混成旅及黔军独立团(后增援),驻防与北洋军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对峙的最前线沅陵以下一带。这样,卢焘将军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军务如山,战事不断。他不仅要管好带好黔军的一个多旅,而且还要管好协调好湘军的4支部队,6支部队的布防相间距离又都是数百里,而广线长,每到一个部队检查,往返都要六七天,还有协调指挥战

事等等，他真的累得够呛啊！

1917年11月16日，大独裁者段祺瑞在湖南、四川前线部队节节败退和全国人民的怒骂声中，被迫通电辞职。此后，护法战争就转入了相持相守阶段。

冯玉祥在番龙坳三战三败给装备极简、待遇极差的南军卢焘部队后，他真是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百思不得其解。他反复自问：“我冯玉祥堂堂一个国军将领，怎么三战三败给一个省军将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特别是闻讯卢焘升任湘黔联军总指挥，湘军又投靠南军时，他更是气得要死。于是，他放下傲慢的心态，寻找失败的原因。他将怠战的官兵找来，打以军棍，起初被打的惧其威严，不敢实说。后被打得无法忍受，才将拾到的“告白书”说了。冯看后，不由火冒三丈，捶胸顿足。于是，立即命令部队休整，不再出战。他想：“我当初出家统兵，意在维护正义，而今却为军阀利用，连年征战，使百姓涂炭，倘若长此以往，我岂不成为历史罪人？”冯想了又想，便决定给卢焘写一封信，请求卢不再以己为敌。信写好后，即派手枪连连长吉鸿昌给卢焘送去，信上写道：“卢旅长惠鉴：冯某前段行动粗鲁，率兵侵犯贵部，今天想来于理不容，然卢旅长虚怀若谷，以维护正义为宗旨，可以容纳悔过自新之人，如蒙见谅，从今以后，至愿各自息兵，以保商安民为盼。冯玉祥叩上。”卢焘阅后，当即给冯回信道：“冯旅长惠鉴：来函诵悉。冯旅长是非分明，卢某钦佩。然卢某认为冯旅长之‘各自息兵，保商安民’说法尚欠妥。因当今地方盗匪尤为猖獗，百姓屡遭其害，我等若不将之剿除，怎能‘各自息兵，安商保民？’故与冯旅长磋商，能否改为‘剿匪保商，安境息民？’湘黔联军总指挥卢焘叩上。”见到卢焘复信，冯玉祥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说“改得好，改得好！”这样，卢、冯彼此互防的心结也消除了。

从此，卢、冯相处3年，彼此各守防地，地方群众也幸得安居乐业，免于战乱之苦。期间，他们彼此像走亲戚一样，经常你来我往，互相走访。冯曾以故宫殷周铜鼎、乾隆御用砚墨、古字画等礼物赠

送卢。卢则以贵州土特产茅台酒、火腿、盐酸、蜜糖和慈酒等赠送冯。卢、冯两人已由原来的南北对峙者，变成莫逆之交。当时，地方人士赞誉卢、冯为“陆抗羊祜”再见于今世。

如当时年仅 16 岁(补充兵)就给当地游击队(主要剿匪)司令张学济当护卫兵(即警卫员)到 1922 年、后来成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县人，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间，在他所写的《我的教育》、《参军》、《入伍后》、《连长》、《船上》、《哨兵》等作品中，多处描述到当时湘西社会的安定和对卢焘的崇拜及敬仰。据美国著名作家金介甫(译音)在 1992 年出版的《沈从文传》(符家金译，湖南文艺出版社)著中写到：“……当时辰州有三支部队，一支是湘西军政长田应诏，一支是黔军旅长卢焘(湘黔联军总指挥)，另一支是游击队司令张学济，辰州是沅江流域中部当时最大的城市，但其城市人口不过五千户，而驻在这里的 3 支部队就有士兵约 2 万人，整个辰州地区驻军约 5 万人。与这 3 支部队对抗的是统率 1 万北洋军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他住在沅江下游的常德。沈从文回忆当时的对抗形势说：‘这一边军队既不向下取攻势，那一边也不向上取攻势，各方就保持原有地盘，等待其他机会……’沈在《船上》(1925 年)中，又写了军人们在开拔途中，梦想此去升官后，要像黔军卢焘旅长那样，骑着大马出去拜客……”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金介甫的文中，可见卢焘将军在湘西 3 年的功绩和威望。

护法战争结束后，卢焘将军荣获“护法功勋”奖章一枚，同时还荣获湖南省授予“剿匪有功”奖章一枚。

## 5 母亲寿辰不收礼，奉调湘西地方苦留

在湘西与北洋军相安无事之后，卢焘又把家属从铜仁搬到湖

南辰州随军居住。1918年12月,适逢他母亲70寿辰,湘西各界父老念及卢焘将军对湘西的重大贡献,于是自发地纷纷前来给卢母祝寿。当时各界人士共集筹得两万块银元,几个代表用一个特制的大的红布袋装好,抬来送礼,卢焘再三拒绝,坚持分文不收,立即命令第八团团长胡刚、警卫连连长犹国材等人悉数退回。据贵州电视台在20世纪90年代初录制的卢焘将军专题片《风雨送君归》中,将军次女卢慈明对现场采访的记者说:“我父亲驻扎在湖南湘西辰州的时候,遇着我祖母的生日,辰州商会筹送了20个人挑的东西,一个人挑一千块钱,这是我亲眼看见的。看到他们挑来摆在那里,不久又挑回去了。我父亲告诉我说:‘这钱不能要,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

1920年4月,驻湘西黔军奉命全部调回铜仁驻防。消息传开后,湘西各界父老乡亲苦苦挽留不放,黔军所雇佣的船只全部被地方群众半夜放走。因此部队不能按时成行。后来,刘显世督军一再电催返黔,卢焘也再三向各界群众解释部队才得启程,但卢焘一家9口人(四女卢慈达,1917年9月15日生于铜仁;次男卢万水,1918年8月16日生于湖南辰州)及侍从、警卫共50多人,仍被挽留。几天后,侍从人员只得从外路雇来船只,只说运送军物,才使得卢焘一家老少连夜上船离开辰州返回铜仁。卢焘将军在湘西驻军3年,一方面与北军冯玉祥以“八”字相约,各守防地,剿匪得力,地方人民稳定相安,各业复苏;另一方面卢焘将军治军严明,驻扎湘西3年秋毫无犯,深得民心。因此,从上述两例可略见一斑。

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是1920年元旦,有一位自称是从北京来的客人,来到司令部求见卢焘将军。经过警卫的严格盘查和询问后,将军终于同意接见这个姓王的客人。看到此人,听到他的名字后,将军立刻联想到十多年前在桂林骗去他衣物的王某不但名字相同,而且相貌仍依稀可辨。于是一阵寒暄之后,将军便问:“十多年前,在桂林有一个叫卢亮畴的人,你认识吗?”王某大言不

惭地说：“认识，认识，一年前还见过他。”面对他颇得意的样子，将军昂然微笑地告诉他：“我就是卢亮畴！”王某顿时大惊失色，瞪眼注视将军一下，就立即下跪伏地不起。将军双手把他扶起来说：“你受惊了！”因为此时此地的卢亮畴已非十多年前在桂林穷困潦倒的游子，而是名震西南的湘黔联军总指挥卢焘将军，王某怎么不受惊吓呢！将军后来吩咐兵弁备餐招待了王某。进餐后，王某那种不安的神态，久久才略为平静下来。经过了解，当年桂林一别之后，王某曾转赴汉口、上海等地读书，毕业后又曾在北京教书，如今登门拜访卢焘将军，其目的就是求请将军帮他在家乡找一份好工作。第二天，将军二话没说就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自带到贵阳去见刘显世督军，不久刘督军委任王某为荔波县县长。可见，卢焘将军不计前仇，胸怀宽广豁达。

## 第十三章

## 奉命代理黔军总司令

## 1 高层内部现裂痕，急赴渝稳定黔军

1916年下半年，护国战争胜利后，王文华由于功勋卓著，到重庆后当上了黔军第一师师长。从那个时候起，这个贵州少壮派（也称“新派”）的政治新星，就开始了他自己的打算。他认为自己的舅父刘显世思想守旧、顽固不化，已不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但舅父又不自量力，仍独霸督军和省长这两个大权，对此他十分恼怒。于是，他想通过政治革新来改变贵州目前落后的政治状况。他与其兄王伯群、妹夫何应钦等人，打出“新派”的旗号，联络了前自治会社员和一些国民党人等，组织“少年贵州会”，创办《少年贵州报》，办补习学校，演话剧，开讲演会，发动改造贵州的政治活动，宣传“军民分治”；在军队中，则重用保定生（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等等。这些活动，的确给当时的贵州带来了不少的新气象。卢焘思想开放，自然支持王文华，站在王文华一边。

1917年春，任可澄（贵州安顺人，曾任云南省长）卸任回到贵州后，从事续修贵州省通志工作。当时王文华从重庆回到贵阳过年，就去拜访任可澄（任曾是王在贵州优级师范学校的老师）。王文华想利用任可澄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任可澄也想到用王文华

达到自己的政治欲望，两人都想从刘的督军和省长两职中挖出一席。因彼此问心照不宣，就互相勾搭起来。当时全国也正掀起军民分治的浪潮，王氏兄弟总想让舅父让出督军和省长的职位来，督军由王文华来干，省长由王伯群来当，但刘显世死不肯放。王氏兄弟眼见舅父不肯让位，也不想逼得太紧，于是退而求其次，争取先由任可澄取得省长职位，过渡一下，这样才会对他们兄弟有利。这样，王氏兄弟遂倡议召开了一非正式的政治会议，商讨贵州的政治改革问题。大家推任可澄为会长。会议是在省府内的梅园“柱筑轩”召开，几次派人请刘显世参加，刘显世都避而不见。会议提出了几个问题：一是废督（军）留省（长），二是废道设厅等。消息传开后，刘显世对人说：“废督就是逼我死。”如此这个会也等于白开了，任可澄什么都没有捞到。

王文华回到重庆后，一面抓紧黔军军权，向外发展；一面清除黔军内部异己分子，对外则等待时机。他常说，既然文的不要，那就准备武的了。1917年7月，黔军在川连续几次进攻川军取得了胜利，于是王文华通过云南唐继尧的压力，迫使舅父刘显世同意，在重庆成立了黔军司令部，王任黔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在川黔军（当时黔军在川有两旅），这时的王文华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刘、王虽是舅甥关系，王文华又为刘显世的侄女婿，但刘显世封建顽固，迷信北洋军阀武力，初时依靠袁世凯，袁死后又投靠段祺瑞。幕后有以郭重光为首的耆老会支持，左右有熊范舆、张协陆、何麟书的策划；并派其弟刘显治为驻京代表，与段联系；又联络宪政党首脑任可澄，与梁启超、唐继尧互通声气，以巩固其在贵州的长期统治。而这一切与王文华为代表的“新派”拥护孙中山向外发展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

早在护国二次反扑战期间，刘显世就通过唐继尧密谋派韩凤楼参谋长去湘西夺取王的兵权，但未能实现。1916年8月间，当贵州选举地方代表准备参加国会期间，王文华与熊范舆等两派竞选，

又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夺。特别是王 1918 年主张在贵州修两条铁路(即黔渝、黔桂),由华侨赵某承包一事,更是受到郭重光、张协陆等的反对,至此双方矛盾趋于加深。

以刘显世为代表的兴义系军阀,是一个封建宗法集团,它的主要成员非刘氏的血族姻亲即门生故旧。如它的“四大台柱”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郭重光四人,都与刘显世有各种亲密的关系。这些人主要是立宪派。他们闭目塞听,虽有满腹经纶,却目光短浅,抱残守缺。而王文华、王伯群弟兄,虽然是刘显世的外甥,但是在政治思想上,与刘显世的旧派是不一致的。自辛亥革命以后,刘显世在政治上追随滇系军阀,成为附庸,这是王氏弟兄以及卢焘、何应钦等新派人物所不满的。在帝国主义侵略,军阀割据的形势下,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出现了新的觉醒,他们对民主革命是拥护的。这在“拥袁”(世凯)还是“倒袁”问题上,两派鲜明地表现了不同的主张。

新派的形成,主要是一批辛亥革命前后从戎或从政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留学日本的,有进过云南讲武堂或贵州模范营的,他们多少受过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的熏陶。如王文华在辛亥革命前就较多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卢焘辛亥革命前就参加了同盟会,做过地下革命工作。在云南讲武堂又接受过新的军事知识,不仅自身革命意志坚定且竭力传播革命思想。自结识王文华、王伯群弟兄以后,过从甚密,常在一起畅谈国事,见解相同。因此在新旧两派斗争中,卢焘的思想,始终是趋向新派的。

新旧两派的分歧,还表现在对待广州革命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态度上。刘显世历来就把北洋政府视为正统,在护国运动中,他的态度极为暧昧,反袁是被迫的。在护法运动中,也是假护法之名以谋私,借孙中山之名以扩充实力。而王文华、卢焘等对孙中山的拥戴是真诚的,他们排除一切阻力,不畏北洋军的强大,率领黔军,浴血奋战,立下功勋,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有功绩的。

1918 年下半年,刘显世、刘显治两兄弟对外甥王文华的所作

所为更有了戒心,一方面作了维护权位的安排,另一方面也作退步的打算。然而就在这时,刘派(兴义系)的几个头面人物,又连遭不测:财政厅厅长张协陆自杀,改由段家榕(王妻兄弟)担任;政务厅厅长(相当于现在省府办公厅职能)陈廷策被枪击受伤,居家养伤,避祸不出,由周鸿滨代理;省议会议长张彭年畏祸离省出走等。留下来惹人注目的是熊范舆、何麟书、郭重光及黔军将领袁祖铭等。刘氏兄弟此时更想除掉这个“不孝”的外甥。

1919年,王文华与袁祖铭的矛盾已很尖锐突出。这是刘显治有意挑拨的结果。王、袁都是刘显世的老部属,王以亲戚关系,被提拔得快些,袁也随着王一步一升,成为王的得力助手。护国战争胜利后,王升师长,袁也升任团长。入川护法,袁又被升为纵队长。刘显治为了挑拨王、袁关系,1919年初以袁在川作战有功为名,建议其兄刘显世组建黔军第二师,任袁为第二师师长,以示酬勋。其实他的目的就是一面削弱王的兵力,一面挑拨王、袁之间的感情,想以袁制王。任袁为黔军第二师师长的命令发表后,王心里极为不满。

此时黔军已变成二师一旅,即第一师师长王文华兼,参谋长朱绍良;第二师师长袁祖铭;第一混成旅旅长卢焘。全军共辖十个团,团长分别为何应钦、胡瑛、刘登吾、王天培、窦居仁、胡刚、魏应鳌、张春浦、谷正伦、王祖绳。

1919年底,待袁祖铭从成都回到重庆后,王文华将袁所部归还建制(黔军原以团为单位,直属黔军总司令部)抽空了袁的脚根,使袁成为一个空头师长,并调袁为黔军总参议,削了袁的兵权。袁祖铭因此恨王入骨,王文华由此种下了祸根。黔军内部开始产生了明显的分裂。1920年,袁祖铭以前敌总指挥的名义,还到成都指挥作战,在袁从成都赶回重庆时,已是黔军回黔的前夕。王文华恐袁祖铭为刘显治利用,破坏团结,把袁完全排出黔军之外。刘显治以袁制王的计划也就归于失败。后来,1921年袁祖铭在上海买人刺

杀王文华和 1923 年袁以“定黔军”回黔夺取王系政权，皆由于此因结果。

“倒熊”之战，黔军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滇、黔军与川军之间的矛盾又逐渐激化起来，促成了川军两派的联合。“倒熊”军攻克成都后，吕超就任川军总司令兼三省联军副总司令。王文华、袁祖铭与滇军将领，向吕超提出要控制四川军权、军需的无理要求，意在否认吕超的川军总司令，遭到了吕超的拒绝。不久，三省将领拟设联军司令部于重庆，迎唐继尧入川主持。王文华、石青阳和赵钟奇三人分别代表黔、川、滇三军担任联军司令部筹备员。联军司令部之设立，名义是出兵北伐，实际是滇、黔共治四川的手段。

由于桂系军阀的破坏，广州军政府无法召开国会。唐继尧想乘机移国会在重庆，以便控制广州军政府，方便向北洋政府讨价还价。而黔军为了使长期据川合法，所以也支持唐继尧的主张。袁祖铭、胡瑛与部分滇、川将领联名致函广州军政府，邀请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率议员来渝召开国会。不久，70余名议员先后到渝。但是，随即川、滇、黔军的混战重起，国会还是无法召开。

熊克武全师退到保宁以后，实力未受损伤，并尽量扩充军备。为了要驱逐滇、黔军，熊克武主动与退至汉中的刘存厚弃嫌修好，相约共同对付滇、黔军。刘存厚打出“靖川军”的旗号，熊克武则以“川人治川”为号召。吕超部队大多数也转而支持熊克武。于是形势逆转，滇军节节败退，纷纷电请黔军支援。然而黔军也被迫在合川、重庆间设防，自顾不暇，无法支援泸州一带的滇军。滇、黔军在长期混战中，消耗甚大，已成强弩之末。

黔军在合川沿涪江布防，企图阻止川军的进攻。在大河坝与熊克武的部队相遇，黔军不支，退出合川，只得向重庆方向收缩防线，而川军已形成包围重庆之势。黔军在无饷、无弹的情况下，已经是将无战心，兵无斗志。

1920 年 7 月以后，贵州兴义系军阀集团内部王文华和刘显世

的新、旧派系权争愈演愈烈，矛盾迅速激化，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争权之战即将上演。这时，王文华在川的黔军日子也不好过。原来曾多次被滇、黔联军驱逐出成都的四川督军熊克武，扬言要在年底前将客军驱逐出境，并打出“驱逐客军，川人治川”的口号，联合川军各部，分路向客居成渝两地的滇、黔联军，开展大规模的反攻，使得滇、黔联军纷纷败退到成都等地。考虑到黔军一旦被驱逐川境，停止对外扩张，连生存都有困难的可怕境地，王文华真是伤透了脑筋。可是，偏在此时，唐继尧正欲“问鼎中原”，但又恐被王文华掣肘，于是私下密电刘显世拟免去王的黔军总司令职务，乃以韩凤楼代之，不料此举为王所悉。同时，刘显世还亲自草拟了王文华十大罪状的通电。在这非常紧要的关头，王文华下定决心先发制人。于是，他立即与参谋长朱绍良、二旅旅长谷正伦、三旅旅长胡瑛等密议，一面借口赴沪治病，以避刘之嫌疑；一面托词黔军伤亡颇众，由第一旅旅长卢焘来收拾残局回黔。实际上王文华是在实施其回黔夺权的计划。

王文华为什么叫卢焘担任代总司令呢？一、他考虑到黔军中的一些黔籍将领，如谷正伦、何应钦等都是野心勃勃的人，如果叫他们代理总司令，总司令的宝座有可能被挤掉；二、如果以其他任何一人代总司令，内部难以平衡，将会造成争夺和内讧；三、卢焘是客籍（广西）将领，一向为人忠厚持重，素无野心，而且与将领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以他代理总司令，阻力甚小。王文华叫卢焘代理总司令，对稳定黔军有一定的作用。

1920年8月初，卢焘在铜仁接到王文华总司令电令赴渝协助整顿黔军。当卢焘将情况向刘显世致电请示时，刘复电仍驻原防，卢焘对他们舅甥之间紧张关系略有所知，当时的的确左右为难，于是迟迟不敢开拔，这是刘显世有意不支持王文华，借以削弱王的力量而这样做的。后来，王文华又向卢焘一再来电催促，卢焘才命参谋长与第九团团长窦居仁率所部先行开拔。过了几天，卢焘亲自率领

第十团续进，第八团及他的家属仍留驻铜仁。

卢焘赶到重庆后的第二天上午，王文华总司令立即召开了黔军在川的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会上，王文华首先宣布黔军即将回黔的决定，然后对黔军的整顿、今后的去向、下步的工作和措施，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特别对黔军回黔问题，作了比较具体而全面的部署安排。会后，卢焘与谷正伦、胡瑛、朱绍良、符诗容（总司令部总参议）等人，根据王总司令的指示精神，把黔军重新整顿编序，共整编为五个混成旅，由窦居仁、谷正伦、胡瑛、张春浦、何应钦分别担任一、二、三、四、五旅旅长，何应钦为参谋长兼五旅长。一旅辖毛以宽、胡刚2团，二旅辖彭汉章、王天培2团，三旅辖陆荫辑、吴传心2团，四旅辖张俊之（又名行伟）、匡文汉2团，五旅辖宋超、易柒黔2团。

整编完成后，各部队已迅速到位，王文华看时机已经成熟，于黔军回黔的前夕，又一次召开高级将领会议，会上，王文华宣读了整编的人事命令和黔军回黔的要求，他强调说：“刘显世名虽督军兼省长，实际上无异傀儡，被郭、熊、何等人所包围，一切都听他们发纵指使。这次黔军回省，主要任务在‘肃清君侧’，但仍拥刘为领导，而另组适当人选分别负责政务。”王的意思，就是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还宣布：他要赴上海就医，总司令一职交由卢焘将军代理（迫使袁祖铭退出黔军），以三旅旅长胡瑛为总指挥，二旅旅长谷正伦（安顺人）为副总指挥，总参议符诗容负责总部日常工作等。王深知卢为人正直、仁慈、宽厚，要他代，不敢不代；代了，也不敢真正取而代之。散会后，王文华又单独叫谷正伦、司令部警卫营营长孙剑锋（又称勤梁，系王的亲血表弟，也是刘显世二儿子的亲郎舅）等人，到他的卧室谈。第二天，各部队都分别召开了全体官兵会议，传达了总司令部的命令、决定。第五旅由于何应钦旅长时驻贵阳，由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将军前去该旅进行传达。同时，各部队还对回黔的有关事项作了具体安排。1920年10月14日上午，重庆晴

空万里，艳阳高照，卢焘此时正式出任代理总司令。在握手告别他的老上司王文华后，就骑上棕红色的大马，统率黔军五旅万余人，离开了黔省子弟征战了5年的川渝大地，浩浩荡荡地向故土贵阳开进。不几天，王文华与他的参谋长朱绍良等数十人，并迫使袁祖铭随同赴上海。

黔军回黔时，王文华曾发电报给刘显世，大意是黔军在川作战多年，经过多次战斗已疲惫不堪，现决意放弃四川回贵州。由卢焘代理总司令，谷正伦、胡瑛为正副指挥，率领部队，主动撤出重庆，陆续回黔。刘显世接到王文华的电报后信以为真，拟派侄儿刘敬吾为宣抚使到遵义劳军。

## 2 “民九事变”纷繁复杂，镇定自若巧妙平定

接到黔军即将回黔的消息后，刘显世为应付此举早有暗中安排：一面拟派侄儿刘敬吾届时表面前去遵义宣抚，一面暗中调兵到贵阳护卫。于是就在9月初，就分别急电黔西北游击司令刘显潜（兴义人，与刘系堂兄弟）、时驻湖南洪江的巡防军统带王华裔，各率所部秘密来贵阳戒备，同时暗中联络袁祖铭，在内部倒王活动。而王华裔恰在此时发出声讨其兄王文华的通电，局势日益紧张。

10月20日，黔军先头部队到达遵义，后续部队都在21日前陆续抵达黔北遵（义）桐（梓）一带，并根据命令都在所在驻地统一休整待命。在遵桐一带休整期间，卢焘在胡瑛、谷正伦、符诗容、杨季襄（卢焘的副官长）的陪同下，分别到各部队看望官兵和作精神讲话，鼓舞士气。刘敬吾到遵义后，见到部队整整齐齐，装备精良，与王文华原说的是两样，觉得事有蹊跷。于是，在遵义他到处打听部队动向。胡瑛警告刘敬吾说：“你来宣抚，没有其他变化就算了，如果发生变动，你要负责！”刘敬吾又听到对当局大为不满的很多言语后，立即电告贵阳。刘显世接电后，感到不对头，采取紧急措

施，连夜给刘显潜、王华裔发出加急电报，命其率部火速赶到贵阳。但后来调到贵阳的，只有刘显潜部张三元、凌国先、王梅村各一营，王华裔部仅到一连，想要续调的，已缓不济急。当时，刘显世在贵阳的部队仅有督署的一个警卫营和何应钦的一个预备团（何当时任贵州讲武堂校长、预备团长、警察厅长等职，驻贵阳），总兵力3000余人，加上急调过来的几个杂牌军，总数也不过5000人。但何应钦是王文华“新派”的人，根本不听他指挥。而所急调过来的都是杂牌地方武装，纯属乌合之众，装备简陋，无战斗力。再者依附刘显世身边的一大批文人也是弱怯无力。这时，刘显世觉得非常悲哀，只有坐以待毙。

按照王文华总司令的计划，部队到达遵义休整时，胡瑛、谷正伦、孙剑峰即商量去贵阳执行“肃清君侧”任务，他们决定先由孙剑峰率警卫营进发贵阳，协同在贵阳的何应钦预备团具体执行。同时，又分别从一、二、三旅各抽一团，跟随包围贵阳四周之后，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据当时任警卫营副营长林子贤50年代在《贵州文史资料选辑》上撰文回忆：我与孙剑峰营长率警卫营随总司令部于10月20日到达遵义。到后，孙营长很紧迫地找副总指挥谷正伦，要他立即下达执行任务的命令，以便向贵阳前进。谷犹豫间，孙又找总指挥胡瑛。谷、胡商议后才决定下来。孙得到命令，回营召集各连长会议，议决：孙率步兵四连，和机关枪连先走；我率炮兵连随总司令部续进，领马百匹，以便运到贵阳。次晨，孙率部出发。我立即到总司令接洽，并有一百多驮行李，须由我向总司令部领马驮运。刚到总部，谷正伦一见面就问我：“你为何不走？”我把孙营长交代我请领马匹运行李的任务转告谷。他很不高兴地说：“你们已领有两百匹马，怎么还要领？”并催我赶快走。我也不客气，答复说：“孙营长叫我如何做，我只能如何做，如果不发马，我只有将行李驮子搁在总

司令部，我马上就走！”正说话间，代总司令卢焘闻声由寝室出来问我：“林副营长，你有什么事？”我说：“要请总司令发马百匹运行李，好回贵阳。”他当时也不问谷同不同意即叫副官长杨季襄拨马一百匹给我。第二天，我率炮兵连押着所有行李驮子出发，走了五天，到达贵阳，我和营部同驻盐行街一家盐号内。当夜，孙剑锋一再嘱咐我，要我常留营部，处理日常公事，他自己有必要经常出外应付。数日后，移住旧粮道衙门，大约是旧历十月初一（11月10日）那天晚上，孙召集连排长开会，并分配任务：第一连连长贺永顺率军两排解决驻福德街的游击队凌国先部；第二连连长陈子清率兵两排解决驻马棚街的游击队张三元部；第三连连长张文藻率兵一排逮捕郭重光；排长华云先和另一排长（已忘是谁）各率兵一排，分别逮捕熊范舆和何麟书；我率机关枪连向督军署警戒，并负责戒备老东门到大西门一线。我驻小十字派出所指挥；孙自驻粮道衙门营部，接受各方面汇报。（警察厅厅长何应钦——那时兼第五旅旅长，驻大十字警察厅署听取情况。）会毕，即刻派人分头执行。次日早晨九时左右，刘显世督军的儿子刘建吾突然交我一信，信内大意说：“希望我解除警戒，恢复秩序，以安人心。”我看了来信很觉诧异，认为这信应该写给孙剑锋，何况刘建吾又是孙的亲妹夫。我持信向孙详询，才知道刘曾先给孙写了信。孙诡称：“一切军事指挥，都是副营长林子贤负责。”因此，刘才给我写来此信。孙说后要我写回信，信里要说：“必须让警卫督军署的王梅村一营缴械后，才能解除警戒。”刘建吾得回信，立即转去并把王营的二百五十支九子毛瑟枪集中挑运来。并回信说：“王梅村从军多年，自带枪两支，希望许可他自带使用。”孙不允许，还要我写信追缴，并对我说：“得来后，我们两人分用。”我不同意再写信，孙即自己写回信，王终于把连枪两支缴来，孙则赠王两支马枪，此事遂了。各处解决游击队和捕人的武装陆续回报任务完成，随即撤销了警戒，社会秩序恢复。武装事变的一幕，就这样串演完毕了。次日上午十二时，各连排长汇报

各人执行任务的经过情况，并交出缴获的枪械、军用物品，有的还缴交金、银、钞票，又交有几支手枪。孙提取一部分外，当面奖给第三连连长张文藻、排长华云先手枪各一支，两人已将杀郭重光、熊范舆的经过向孙报告；派往逮捕何麟书的另一排长报告何已脱逃。我听他们报告说：“郭是拖到北门桥才割了头的，熊被杀后仍割了头来。何虽逃脱，但杀了他一家三口，其中有何的三岁幼子。”残忍至极，行同野兽，令人痛恨！我在重庆总司令部听到的：王文华召开高级将领会议时，就曾规定不准杀人，只想逼几个人下台，最多也只禁闭一下而已。不料孙剑锋执行起来，却肆意扩大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

不几日（即 12 日），总指挥胡瑛、副总指挥谷正伦，代总司令卢焘相继来省，共同筹商善后事宜。我奉孙剑锋命，往小关欢迎。同时，要我押着郭重光和熊范舆两个人头同去，意在向卢、谷等报功。我骑着马先走，孙命人用两个篾笼分装人头挑着随后。谷正伦先到，见了两个人头，面容上并没有什么愉快的表示，人头挑回来，就放在营部门前大树下。卢、谷、胡到后，卢先来拜见刘显世，在督军署大门外，卢即下轿步行到住在贵山书院旁的刘家公馆，卢对刘极表尊敬，而刘向以前辈自居，对人傲慢，见卢时，竟大闹情绪，坚决要求要离开贵阳。若不许他出走，他就要自杀。各方劝解都不听。此后，每次闹得很厉害的时候，他的家属就来大井坎王文华处，请王大姑妈（王的母亲，刘的胞姐）去劝慰。大家觉得让他这样闹下去不是办法。卢焘、何应钦、谷正伦、胡瑛、孙剑锋等聚商，不如准许他离开贵阳。决定由警卫营副营长林子贤率兵两连护送到安顺后，再由他自己的警卫营保护赴云南。但孙剑锋却不按决定做，他要我先把两连兵力埋伏在头桥一带，待刘来时，将刘的警卫营两连兵缴械后再放他走。孙说完，我坚决不肯接受。我当时的思想是：我知道孙剑锋和王文华是亲血表兄弟，和刘显世的第二个儿子是亲郎舅，尽管他内心有不可避免的矛盾，但表面上还要敷衍。要照孙的办法，与

其说是埋伏缴械，勿宁说是枪杀刘显世。再则，卢、胡、谷、何共同决定的办法，孙竟敢于更改。那么，我又何尝不可以不按他说的去做呢？于是我就坚决拒绝。记得我还不客气地对他说：“按你说的这样做，等于喊我杀刘显世。”当时他无话可说，也就不派人护送了。刘终于按预定日期（11月13日，刘被迫通电辞职退休）离开了贵阳。后来我才知道是王文华的母亲亲自送他到安顺，沿途都是住在天主堂或福音堂，托庇外国人保护的。

“民九事变”（即民国九年）虽然到此结束，但还留有余波，表现在执行者孙剑锋这段期间的活动上，及其与谷、何的关系上。而改编警卫团和防止滇军到毕节为刘显世“复辟”两件事，亦为我所深悉，连带在此叙述。

孙剑锋原是警卫营长，但在王文华策动这次“事变”的计划中，该营应改编为警卫团。团长一职由总司令部参谋长兼任，孙只是中校团副代理团长。因为他的资历还浅，不能由一个中校营长一跃而为少将团长。但他却认为这是何应钦整他的，企图分化他的部队。因而奉到命令一直拖延不改编，甚至躲起来不见面。（这时何应钦继任参谋长，总司令部已迁入督军署，该营亦随之迁入。）我知道他是受谷正伦的挑拨离间，但不好对他明说。隔了几天，他异想天开地对我说：“何应钦整我，我要到上海去找‘老总’（王文华），你来代理团长吧！”我当然不同意，答说：“你都不搞，我又怎样搞得了呢？”他马上哭起来了，又说：“如果让何应钦当团长，我就出不到头。不然，我们只有想法除了他！”我问他怎样除法？他说：“我们派胡德安充卫兵司令，等候何应钦出营门时，将他刺死，并将他的马弁手枪缴了，全部卫兵拖出去，事后再拖回来，我们报告就说是士兵叛变，杀死他的。”他越说，我越不能忍，截住他的话头说：“对敌人这样做是不得已，对本军参谋长这样干，难道不是替刘显世等报仇吗？干下来的结果，不但各旅团的官兵要责备我们，而且王老总也不能回贵州来了。我们警卫营是他素来很信任的基本部队，尤其是你，他

更是十分亲信的。为什么会叛变呢？即使叛变，也不会单单杀害他的参谋长，何况何应钦是他的妹夫，难道报一个兵叛就算了不成。所以我说这样就搞烂了。”他当然不会以我所说的话为然，但我不同意，他也不能干了。尽管这样，他还是不肯改编部队。后经我向何应钦、卢焘说明其意，卢从中转圜，径委他为少将团长，才解决了这个矛盾……

这次黔军回黔，所发生的“民九事变”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进程的必须结果，这一必然的结果也是由于黔军和贵州省当局“新派”与“旧派”权力之争，加之对外（占领川渝）扩张掠夺的停止，内部矛盾迅速激化而直接导致的结果。卢焘、胡瑛虽是这次“事变”的领导人，但他们都是客籍（胡是云南人），对于贵州内部的事情，他们都是不愿过多的干预和参加，但又被夹在中间，有时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装聋作哑和当鬼儡为上策，这次黔军回黔执行“肃清君侧”任务，实际都是由谷正伦和何应钦主持操纵，具体则由孙剑峰执行落实，特别是孙在执行过程中，又采取了肆意扩大主宰权力和过激行为，从而导致了事件的必然发生。

然而，由事件导致的后果，还是由卢焘代理总司令维持下来。11月12日，卢焘与谷正伦、胡瑛等回到贵阳，看到局势一片混乱，急忙安排善后。于是，卢焘以代理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告示：“照得此次改革，属为政治刷新。诛除首恶而外，并不株连一人……”11月17日，卢焘、胡瑛、谷正伦联合致电唐继尧说：“现刘副帅决意归里，无术挽留，准于铣日出省。省长一席，现已由各界拟公推志清（即任可澄）担任。督军拟废，焘等公同议决，称黔军总司令，并自11月18日起归联军总司令部钧座直接指挥。”11月22日，卢焘代理总司令又向各省通电：“黔省随西南各省之后，宣布护法，历年所。现联军副司令刘公辞职归里，所有全省陆军部整理事宜，交由黔军总司令继续担任。现在护法事业，尚未了结，本军计划于大局

计划,仍与西南护法各省一致主张,决不至有所变更。”12月2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复电贵阳卢焘代理总司令等说:“诸君出任艰巨,对于大局计划,仍与西南护法各省一致主张,甚为佩慰。望即本此决心,共策进行。”之后卢焘随即以黔军代理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命令:督军兼省长刘显世“因病回兴义老家休假”,督军职改称总司令,由他暂代;省长职由政务厅代厅长周鸿滨暂代。免去刘显潜游击军司令兼黔西道尹等职务;免去王华裔巡防军统带职务,所部各营一律解散,发配各旅调剂等等。同时,还给受害者家属给予了高额的经济赔偿。这样,因“民九事变”而紧张慌乱一时的贵阳,终于平静了下来。之后,卢焘随即派人到铜仁把全家老少接到贵阳,从此流离颠沛10多年的家,终于在贵阳得到了安定,家人终得团聚。



1920年8月，卢焘将军与王文华将军(左)摄于重庆黔军总司令部花园内

## 第十四章

# 出任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

### 1 公推出任黔军总司令兼省长

“民九事变”推翻了以刘显世为代表的对贵州封建统治长达 10 余年(刘任护军使或督军 11 年,都督或省长 7 年)的守旧派后,贵州的政局并不因此而安宁。首先,在总司令和省长的职位上,个个虎视眈眈,黔军五旅除了胡瑛和张春浦(四川人)外,其余 3 人都是贵州本地人,因此他们个个想争吃这两块“肥肉”,特别是谷正伦、何应钦,又是钩心斗角,还有王伯群、任可澄、符诗容等人,也在垂涎三尺。于是,他们互不相让,彼此抗衡。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后他们只好走了“折中”主义路线,由第三混成旅旅长胡瑛领衔通电各省,公推卢焘主持军事。1921 年 3 月 31 日,广州军政府召开会议,出席会议有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陆荣廷、唐继尧等,会议通过任命了顾品珍、卢焘分别担任云南、贵州总司令。1921 年 4 月卢焘正式担任黔军总司令。

据时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兼省师范学校校长桂百铸 20 世纪 50 年代在《贵州文史资料选辑》上撰文回忆:……政变后几天,刘回到兴义。周鸿滨以代厅长代省长。政变当夜,任可澄离开贵阳。刘

显世回兴义后，省长空悬，要找人接替。何应钦来问我：“任到何处去了？我们要找他做省长。”我说：“不知道。”何说：“我们找他做事，并不想杀他。”我推托不了，去找任的亲戚黄莳夫说：“你总知道任志清哪里去了。”黄先推诿，后允许去找。有人在任的祖茔发现了任的上轿（四人抬的轿），探出事变当夜，任坐四轿到祖茔宿了，第二天改乘小轿（二人抬的轿）到安顺。黄莳夫在安顺旧州找到任，说明来意，黔军总部派了一连兵迎任来贵阳，我受命迎接，在三轿一座庙中设了茶座。任到了三桥，乘轿前后，摆开一队人马，气象森严。任下轿后，神志颇不安。省署第一科张莲甫科长也去接，大家推张致欢迎词。张恭维任一阵，很不合任意。任自谦才德不胜，还须另择人选。任就职后（11月15日），何应钦操纵省议会，推选任为省长），为避嫌和减低目标计，不愿住省署，改在财政厅办公。政务厅各科随同迁去。当时，符诗容把持政权，李仲公任参事，襄赞一切。一次省署会议上，任、符因意见不合，争执起来。任任省长不久，自知不受人拥戴，暗自出走，把省长印送交了省署二科，附一短简交代。省政无人主持，何应钦又来找我说：“你总知道任到那里。我们知道他在北堂（天主堂），北堂并不是铜墙铁壁。我们拥护他，请他共同维持贵州。请你把我们的意思对他说。”我说：“我看，如在那儿，一定劝他出来。”这是我的应付话，实际头一天，我已见过任。

任出走后，藏在北堂。政变后，陈廷策和熊述之（熊范舆的弟）都躲到北堂，贵州历次事变，总有不少人逃入天主堂，托庇于法国神父。在何来见的前一天，陈廷策回家，我见到陈，谈到任；当晚就同陈去北堂看任。陈为人机警，嘱我和他隐身在灯的黑影里，免被他人识破。法国神父谭尚德原认得我，见我在陈室，通知了任，熊也跟出来。熊、任的住室较陈室隐蔽些。我们谈了一些外面情况，也谈了何应钦的话。熊发牢骚说：“熊铁崖死了，得不到照顾，别人倒得好处。”熊是借题说给任听。任当以眼色示我。过了几点钟，我才一人回来。

在和何谈话两天后，我才去回何说：“任不肯回来。”任出走后，大家要卢焘兼职代省长，但卢一再推辞。大概 1921 年元旦过后不久。何又来找我们及政务厅四个科长商谈说：“现在我们要卢（焘）代，卢不答应。你们可在中堂点起一对大红烛，中置省长印，请卢来；不来，还要去请，一定要请他来。只要骗得他来，就把他硬捧上去。”我们就照这样办，卢也就这样就职的。卢了解贵州穷，在讲话中谈到如何改进贵州时，提出一些数字，下面就有人喊：“算错了，算错了。”一切情况皆同儿戏。卢代省长后不久，我要求外调独山县，离开这个多事的贵阳……

任可澄继任省长是被迫的，因为他知道是把他作为王伯群主黔的过渡，军界实权人物并不真心实意地拥戴他。所以，就任时他宣称只当三个月，三月届满，另选贤能。此时，王伯群仍在上海，一时暂无恰当的人顶替，所以各界挽留，任可澄只得硬着头皮当下去。但是，一切被人把持，自己形同傀儡，身不由己，特别是在改选省议会时，因选举的各种表册混乱，议员纷纷质问任可澄，使其左右为难。于是，任可澄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 1921 年元月 24 日通电辞职，暗自溜走了。

任可澄溜走以后，谷正伦因与他是安顺同乡，希望他能继续干下去。于是，联络胡瑛、窦居仁等通电挽留。因任可澄已吃尽了当傀儡的苦头，去意已坚。所以，各旅团只好选王伯群继任省长，并请广州军政府任命。王伯群未到任省长之前，总得有个代省长才行。于是何应钦及各界推卢焘暂时兼代省长。

任可澄是刘显世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民九事变”中没有遭到杀害已属万幸。新派之所以让任出任省长，只是利用他的声望暂时维持，其实是要等待内定的省长王伯群归来，以便和平接任。

“民九事变”前，谷正伦代朱绍良为黔军参谋长，又是黔军的副总指挥。事变后，不仅没有捞到实惠，反而连到手的参谋长一职也

被何应钦夺去，心中大为不满，谷正伦与何应钦的关系日趋紧张。在选择省长问题上，何应钦几乎是一手包办，几次派人逼迫任可澄出山。谷正伦与任可澄是安顺同乡，尚能接受。但任可澄就任后，处处受到何应钦挟持，且已露出拥王伯群为省长，自己主持军事的真面目。于是谷正伦与任可澄结成同盟，并拉拢与自己关系较深的张春浦和胡瑛，与何应钦对立。当任可澄通电辞职溜走以后，谷正伦明知推王伯群为省长是新派早已确定的方针，且省议会又通过了议案，却节外生枝，推窦居仁继任省长。窦居仁与何应钦是兴义同乡，又是拥王伯群的一派。谷正伦的推荐，意在挑拨何窦之间矛盾。窦居仁自知难孚众望，再三推辞，谷正伦的计划才没有实现。结果，卢焘被推为代理省长。

卢焘以总司令兼代省长后，他也知道是处于缓冲位置。为了维护贵州的安定局面，避免发生内战，他采用了四川军阀的“防区制”，即将五个旅及警卫团的防区予以划定。第一旅窦居仁，辖毛以宽第九团、胡刚第十团，驻军铜仁一带；第二旅谷正伦，辖彭汉章第一团、王天培第二团，驻军黔东南一带；第三旅胡瑛，辖吴传心第三团、陆荫辑第六团、杨占元独立营，驻军黔西南及安顺一带；第四旅张春浦，辖黄道彬第四团、张行伟第五团和罗成三独立营，驻军黔北遵义一带；第五旅何应钦，辖宋超的第八团驻军贵阳，易荣黔第七团驻军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孙剑锋警卫团驻军毕节。防区的划定，是卢焘煞费苦心，多方协调才确定的。

此时，黔军已有近两万人，各旅情况也大不相同。如第三旅的胡瑛，第四旅的张春浦，自知是外籍，并无扩大势力的野心。第一旅的窦居仁，素无野心，且深感王文华的知遇之恩，誓死服从到底。唯有何应钦和谷正伦均有野心，实力又旗鼓相当，各有优劣。于是，二人开展了争取孙剑锋的活动。谷正伦乘孙剑锋踌躇满志之时，怂恿孙剑锋说：“警卫团的编制将近一旅，且武器精良，胜过任何一旅，只要将何应钦赶走，抓过第五旅，省长一席，形势所趋，非你莫属。”

谷正伦还暗示，届时会约张春浦共同拥孙。孙剑锋自命不凡，利欲熏心，也就做起省长的美梦来。何应钦明知道自己与孙剑锋的关系紧张，企图缓和，便将孙剑锋调到贵阳兼第五旅第七团团长，把易棻黔免职。这样一来，弄巧成拙，孙剑锋倒向的野心更大，机会更多了。

卢焘代省长后，决定3月22日召开第二届省议会。他准备先完成省议会的选举，待王伯群到任后，再邀集各旅团共同制定省宪。不久，广州军政府任命王伯群为贵州省长，王伯群到任前，卢焘继续兼代省长。但是，由于议会在正副议长的选举上争执不休，袁祖铭的“定黔军”又逼近省境。黔军内部纷争不已，贵州的所谓省宪，也就成了泡影。

王伯群被任命为贵州省长后，一直未能到任。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并就任非常大总统。湘、桂反对，滇坐视观望，唯有黔省首先通电拥护，并立即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派谷正伦、胡瑛两旅分别出师柳州、南宁，消灭旧桂系之势力。7日，孙中山大总统电令卢焘为贵州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由原陆军中将晋升陆军上将衔。

## 2 王文华被刺，“五旅相争”

王文华在政治上是倾向孙中山的，在西南军阀中，他是比较坚定主张以武力解决南北争端的。“民九事变”后，由沪赴穗拜谒孙中山，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因此他拥护孙中山的立场就更坚定了。据台北版的《革命人物·王文华》说：“……继奉命往浙说卢永祥，共起兵倒非法窃位之徐世昌及直系，永祥雅重文华，颇为听之。”说明王文华热心为革命政府而奔走，因此北洋军阀视王文华为眼中钉。一向对王文华怀恨在心的袁祖铭，此时已投靠北洋军阀，一心要害死王文华，既可除掉宿敌，又可做奉献给北洋军阀的见面礼。1921年3月16日，袁祖铭表弟何厚光收买杀手张克明，

在上海一品香旅馆前刺杀王文华。王身中三弹，抢救无效，次日殒命，后葬于杭州孤山。当消息传到贵州后，卢焘随即电令拿办肇事凶手和幕后策划者。他通电指出袁祖铭是杀害王文华的主谋，同时揭露袁祖铭刺杀王文华的目的在于“并黔附北”。这就表示卢焘在南北对峙中，立足于南方的坚定立场，同时对拥王派是一种慰藉，也说明了他对王文华有深厚的感情。为了表示对老上司王文华的永远怀念，鉴于当时不便出面，卢焘便特别指示当时驻扎兴义一带的第三旅旅长胡瑛，让胡在王文华家乡景家屯村头的狮子山峭崖上，并以胡的名誉镌刻了“王电轮将军故里”七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款署“第三旅旅长胡瑛题”，全长四米多，宽一米多，至今已成为当地一处旅游的胜景。此外，为了褒扬王文华在护国战争立下的功勋，1940年3月，中华民国政府追赠王为陆军二级上将，并按陆军中将阵亡例予以其家属抚恤安置。王文华一死，袁祖铭当即电告北洋政府：“并黔附北，不难达到目的。”北洋政府总理靳云鹏闻讯，立即通知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王占元拨兵四营，供袁祖铭攻黔之用。并要财政总长潘复拨款二十万元，作为运动黔军费用。把插手贵州的赌注，押在袁祖铭身上。

王文华死后，贵州新派失去了中心人物。军中互相猜忌，民间谣言纷起，祸变在即，人人自危，内部斗争也就随之复杂起来。黔军五旅旅长表面哀悼，实际上各有所图。谷正伦、何应钦等急欲扩充部队，争夺驻地，五旅争权，愈演愈烈。首先表现在何应钦和孙剑锋的扩军抓权上。当时，何应钦是第五混成旅旅长兼警察厅厅长，又是黔军参谋长和总司令部警务处长，地位可谓显赫。但是，第五混成旅仅有驻贵阳预备团的两个营和属于警务处的部分武装，在5个旅中，实力最弱。“民九事变”后，何应钦利用在贵阳之便利，乘卢焘、谷正伦、胡瑛等人尚在遵义之机，迅速将缴械后的刘显潜的游击队改编为第七团，以原游击队第一路司令易荣黔为团长，新编第五混成旅的实力，与其他4个旅不相上下。何应钦控制了以贵阳为

中心的防区。他因为与王文华的关系最亲，就俨然以王文华的继承人自居。

卢焘虽然已当上了黔军总司令兼省长两职，统一贵州军政，但当初真正实权还尚未掌握在手，因而也暂时未能“刷新”贵州政治，有时甚至难以控制局势。当然，事情主要不在于刘显世、袁祖铭的捣乱、破坏，而在于何应钦、谷正伦一伙正在崛起的新军阀代表人物的野心。从重庆回黔后，他们不顾原在重庆被赶出黔军的袁祖铭此时已投靠北洋军阀靳云鹏、吴佩孚，并已在武昌组织“定黔军指挥部”密谋回黔夺权的严重局势，而是围绕权位大闹“五旅争权”的丑剧。如1921年4月，何应钦、窦居仁竟密谋联络王伯群等人，企图在铜仁另组政府的阴谋。另外在派往援桂支持孙中山消灭陆荣廷之旧势的谷正伦，置孙中山先生生死于不顾，竟提前率部回黔与何应钦夺权，最后被何驱逐贵阳，卢焘出于好心还派兵送他出了关防才保住性命。后来谷旅的两个团长即一团团长彭汉章、二团长王天培，因不服谷、何的争斗，还带走了不少兵力叛变到湖北投靠袁祖铭。这是黔军自发生五旅争权以来最大的耻辱。二旅长空缺由一旅第八团长胡刚升任。

卢焘由代总司令、代省长被公推为总司令和省长，又被孙中山正式任命为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并不是依靠他玩弄权术而得到的，而是他碰巧遇到新派权力重新组合的机遇。当时第二混成旅旅长谷正伦和第五混成旅旅长兼总司令部参谋长、警察厅长何应钦之间的斗争，暗中甚为激烈，他们都想登上总司令宝座。卢焘及其他各旅旅长也深深知道，何、谷二人，无论是谁上来当总司令，内战必然兴起，人民将受祸害。卢焘一生忠厚老成，他的内心也不愿以一个广西人卷入贵州内争的漩涡。在那个时代，军阀割据视畛域为鸿沟，“某省人治某省”的所谓自治呼声，甚嚣尘上。他自知以客籍身份终难得到黔籍将领的真诚拥护，但他可以保持各旅之间的均势，不偏不倚。各旅旅长权衡利弊，也乐于同意这位没有野心的

人担任总司令职务。卢焘化解了一些矛盾，避免了一些战祸，对贵州人民来说是有贡献的。

### 3 实行“联川防滇”战略，确保贵州稳定

卢焘拥护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反对北洋政府的鲜明立场，与任可澄是不同的。任可澄上任之初，曾向北洋政府表示：“愿即贯彻如周（刘显世）在黔时调停大局之主张。”并企图说服卢焘北附。1921年4月15日四川《国民公报》载，“北廷又催任可澄进行联卢”，可见卢焘和任可澄是同床异梦。一方面，卢焘受革命思想的熏陶对孙中山竭诚拥护；另一方面，南方革命势力蒸蒸日上，所以卢焘不为所动并坚决与之斗争。当孙中山以非常大总统身份号召西南各省出师援桂和北伐时，卢焘不顾任可澄的干扰，积极响应。他派谷正伦、胡瑛两个旅赴广西援桂，打破了北洋军阀企图拉拢贵州的梦想。

卢焘在代理总司令期间，为防止刘显世再次借助滇军返黔，曾主动与川军弃嫌修好，实行“联川防滇”的战略。“民九事变”不久，卢焘即派黄国钧为代表到叙永与川军代表吴广顺谈判，拟用黔、川两省实行自主性质的联防来拒滇。联防后饷械各不相助，不受任何其他方面的指示，亦不向其他方面扩充战事。卢焘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他认识到主要的威胁来自云南，如果不事先与四川修好，万一滇、川联合，贵州就危险了。卢焘虽然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的，但他在滇期间，与滇省实力人物并无渊源。所以他对滇军的态度，一直秉承王文华的宗旨。当他就任黔军总司令时，即公开宣布：“一、滇军即日退出黔境；二、滇、黔关系从此解除；三、滇、黔对于时局的主张不必一致，以后黔省对外主张，滇省不能过问。”1921年3月1日，四川《国民公报》曾以“滇黔已脱离关系”为题发表文告。卢焘的这一主张，符合贵州新派多年以来极力想实现的处理滇黔关系的

总原则。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卢焘在与川军联系的同时，也派人与反对唐继尧的滇军顾品珍部联系，“实形互助，并进行联省自治政策”。此举之目的，在于多交友少树敌，而且是利用反对唐继尧的势力对唐加以牵制，以保障贵州之安全。

当时，卢焘的主导思想是确保贵州的稳定，避免与邻省发生尖锐矛盾。因此，他派朱绍良为代表到湖南接洽，订立湘黔同盟，其内容是：“两者相互扶助，力图保障自治，防止外侮。”这样一来，卢焘政权又多了一层屏障。1921年湘军攻鄂，湖北督军王占元乞求总统徐世昌派兵援助。徐世昌令曹锟发兵，曹锟、吴佩孚想乘机兼并湖北，派兵入鄂。川、湘两省军阀以湖北为唇齿关系，高叫“援鄂”。卢焘因为与湖南有约在先，也通电“援鄂”。不久，王占元被吴佩孚联合湘军挤出湖北，卢焘的“援鄂”便只能是一句口号而已。

#### 4 协调各方，维持残局

贵州，古称“夜郎国”，地处中国内陆云贵高原东面，山多，地少，人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历代王朝以来，贵州都是中国一个比较贫瘠的省份。加之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连年战乱，辛丑条约签约后，帝国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使这个本身先天不足的贵州，就显得更加闭塞落后。以经济为例，1903年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的洋纱，竟占中国棉纱市场的88.69%，如安顺府地处西南腹地，也是贵州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每年进口棉纱多达三四千包，仅黄草坝（今兴义市）每年输入印度棉纱就有一千包（每包重400磅）。新城（今兴仁县）“织布机据说有三千台……唯一的原料就是印度纱”。安顺等地“自洋纱输入侵夺土纱地位后贵州的纺织业全告停顿”。全省其他茶叶、烟叶、酒业、采矿业等手工业，也低迷不振。农业方面，多以苞谷（玉米）为主，收成很低。到1920年底，全省人口近800万

人，税收入库仅 386 万两。全省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吃不饱、穿不暖、住草房的民众比比皆是，到处可见。交通方面，则更为落后，全省境内竟无一条公路和铁路；治安方面，则匪盗如毛。其他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方面也十分落后。

当时贵州在政治上处于动荡的局面，军事上又处于四面受敌的困境。北面有投靠北洋军的袁祖铭，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积极筹组“定黔军”；在川、湘边界一带，又有上靠北洋政府，下联桂系军阀陆荣廷的以薛尚铭为司令的“靖难军”；在东南方向，有一向反对王文华的“游击队”司令王华裔驻扎洪江，联湘以扰黔东，联桂以窥黔南；黔西南方向，还有刘显世、刘显潜弟兄时刻准备复辟，刘显潜的游击队散处各地，极易乘机发难，如果一处告警，就会八方混乱。

此外，贵州连年天灾肆虐，匪患猖獗。自 1918 年以来，迭遭旱灾、蝗灾，又继以涝灾。1920 年春，又遭雹灾，受灾面积达全省之半，陷入饥馑之年。人民颠沛流离，饿殍枕藉，仅毕节一县饿死即达万人。全省等待救助的达 60 个县，灾民达 130 余万。当时，上海《晨报》等报刊都报道了贵州严重受灾的情况。据《孙中山全集》第 5 卷第 579 页记载：“1921 年 7 月 26 日，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职不久的孙中山发布《命财政部拨款救灾令》中，指出‘黔上年蝗旱之后，继以水灾，禾稼不收，生民荡析’，着财政部拨款交贵州总司令卢焘散放赈济。”尽管卢焘、任可澄远近呼吁，争取各方支援，然而外援极少；省内所谓义赈，实属杯水车薪。不少灾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铤而走险，沦为盗匪。还有那些散兵游勇，也成群聚而为匪，以其拥有武器，受过军事训练，往往成百上千，攻城掠寨。由于天灾人祸双重煎熬，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地各族人民的自发反抗也不断发生。如盘县、普安、水城、郎岱等地苗族群众，利用清水教起事，攻打县城，劫富济贫，反抗军阀及土豪劣绅。当地官府频频告急，军警进剿，此击彼兴。卢焘处此境地，实属艰难。为缓解困境，他不得不正视现实。无论对邻省军阀，还是省内各派势力，他

都采取调和措施,以维持残局。

## 5 宣布自治,振兴经济

面对这样的省情,卢焘主掌贵州军政大业后,他立即着手宣布新的政纲,改良政治,发达民权。在政纲方面,他首先召开了军政高级将领和高级官员联席会议,专题研究如何发展贵州经济,促进全省各项事业的发展大计,提出了贵州要“实行自治,恢复百业,改善百姓生活”的想法,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认同和赞许。自治内容主要以经济为主,涵盖军事、治安、交通、建设、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等。1921年1月28日,卢焘通电各省宣布:贵州实行自治,振兴经济。他的施政宗旨说:“此后施政方针,决当顺应潮流,实行自治。关于制定省宪,刷新政治,悉由民政当局主持。敝军确定军人不干政之原则。唯当整顿军纪,保境安民。”同时,成立了临时的省参事会,省参事会可以凌驾于省议会和各行政机关之上,审议全省行政要务,成了实际上的省政决策机构。在创立“省参事会”的同时,又出现了省宪研究会、省宪期成会等民间组织。省参事会的十位参事,多是各旅、团长的代理人,或视武人眼色行事的政客。省参事会的决定,没有各旅、团长的点头,也是行不通的。所谓自治,离了军人集团的支持,便无法执行。按照卢焘颁布的《省制大纲》规定:省长由民选,暂分行政区划为省、县两级,将原有的黔中、黔南、黔东三道撤废,添设教育、实业两厅,实行司法、行政独立。然而在有枪就有一切的军阀时代,又怎能摆脱军人干政呢?卢焘颁布的《省制大纲》,实际上也很难执行。鉴于贵州省议会自1912年成立以来,时逾9载。当年的议员,任期已满。其中不少人又与旧派有瓜葛,不改选便不足以代表民意,说穿了就是不足以代表当时军人之意。卢焘下令设立自治、选举两个筹备处,各设处长一人,成员若干人,分别办理改选省、县议会及地方自治设置等。

卢焘的这一做法不仅得到当时南方政府的肯定，而且也得到了各省的推广和效仿。如广西、云南、湖南、四川、陕西、福建、江西、湖北、江苏、山东、广东、安徽、河南等省，也纷纷先后宣布本省自治。接着，卢焘又连续分别召开了省府各厅（局）长会议，各道尹（地区专员）会议、各县长会议等，这几个会议的主题就是贯彻落实“自治”的内容和办法，及其提出措施和要求。让“自治”这个主线，从省到道到县得到层层贯彻落实。

为了加强和保证“自治”在全省范围的有效实施，在内政人事方面，他唯才是举，能者为上，打破了过去那种“任人唯亲”的用人办法和裙带关系。省议会由于时间紧，未能选举，所以议长暂缺，但过后不久公推方策（安顺人，1917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事）为第二届省议会议长。省府秘书长由王蔬农担任，副秘书长分别由孙竹荪、李之白担任。对省府的政务厅、财政厅、警察厅、建设厅、教育文化厅、民政厅、军事厅、农工厅、粮食局、水利局、地政局、盐务局、烟草局、银行及社会处、人事处、事业处、卫生处、保安处、新闻处等20多个厅局处长，还有近10个道尹，只作一些微调，基本保持原来不变；而对县长和其他地方官员，下令撤换一大批只想升官发财而不愿做事的人，任用了一大批能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军队中任用了一批青年军官代替年老体弱的军官。在经济方面，大力扶持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大力发展采矿、印染、纺织、农具制造、制革及茶叶、烟叶加工等行业，让手工业带动全省经济发展。在财政方面，整理财源，节俭开支，汰除浮沉，精简机构和人员，发行救国公债，整顿厘税，整顿盐务，推广矿业，提倡工商，繁荣贸易等。卢焘还以身作则，带头不领省长厚禄。为推行廉政，他还规定了从省到县不准请客送礼，兼差人员概不兼薪，不得受贿和侵吞公物，不得侵吞缺额饷银，不得挪用教育经费以及非星期日不得宴客等。同时，为了稳定局面和改革的需要，卢焘还特别成立了公款清理处，以平刚为处长，清理刘显世执政以来的财政收

支。结果,查明刘显世执政数年,他与刘显治和在上海开办群明社的蔡岳相勾结,从1915年到1920年,共吞没公款189万元,查无实据者,尚不在内。这是卢焘当政后采取的一项有力措施,揭露了刘显世执政以来贵州财政的弊端。因此,得到舆论的支持和好评。

在教育、文化、卫生、科技方面,则大办师范教育,提高教师待遇,普及农村教育,创办农村校点;允许新闻出版、刊物、演艺自由;鼓励个人从医,健全医疗机构;提倡讲科学,破除迷信等。在交通、建设方面,加大修通官道,计划修建公路、铁路;作好城镇建设规划、特别重点搞好以贵阳为中心,带动辐射安顺、遵义、铜仁、独山等城镇的建设和规划。在外交方面,主动加强与周边邻省搞好经贸、军事、交通、治安等领域沟通和协作关系,互派代表常驻联络。在军事方面,坚持不好战,不对外扩张,力避战事发生。在治安方面,重点打击匪盗,颁布有关规定,建立健全村规民约等。在民政方面,着重做好扶贫济困,防灾救灾,改善民生等等。

1922年2月6日,卢焘与齐燮元、刘湘、刘成勋等省领导通电揭露梁士治整理盐务为名,与稽核所洋员秘密结约,允废引岸。同年2月23日,卢焘、朱培德等黔滇将领通电,宣布唐继尧罪状,吁请孙中山下令讨伐。同日,孙中山致电滇、黔、桂三省北伐制止唐继尧回滇,痛斥唐“违抗命令,不顾大局”,要求各军迅速“严行制止,勿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

的确,当一个省长真不像当一个总司令的那样单纯、容易。总司令只管军事、作战,而省长则是内政外交,行行样样,包罗万象,可谓从上管到“天”(对中央负责),从下可管到“地”(对老百姓生活冷暖的负责)。卢焘军政一身,其军政公务繁忙的程度,那是不言而喻了。每天,他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开会或批阅文件,就是下到各道县各部队进行检查、调研及视察工作。所到之处,他不摆架子,不讲形式,不搞特殊,要求接待一切从简,深受群众的称赞和拥护。

据卢仕廉撰文回忆：1942年我在国立榕江师范读书，常到榕江场坝街廖制鞭炮商号玩。有一次，廖老与我拉家常，他说：“你见过卢公（卢焘）吗？记得民国十年，听说卢公队伍要过我们榕江，那阵子，县政府，地方上的绅士、大商号，都忙着筹备欢迎，还准备将红毡毯从将军码头，一台阶一台阶地铺到石板大路口。直等到第五天下午，才见来了八条船。靠岸后，官兵陆续下船，岸上来迎接的官员等了好久，还见不到穿将军服、马靴的卢总司令。他们正在纳闷间，忽然见了几个穿军装的照顾一位身着长衫、脚穿布鞋的高个子下船，然后有个军官模样的走上前来找县官，告诉他们：‘卢公到啦！’负责铺盖红毡子的县兵们立刻忙着把红毡铺上，县官、绅士、豪商们也急忙上前下跪，卢公一看，首先要他们不要下跪，然后指着码头上铺着的红毡子温和地说：‘不要这样做，好多老百姓还没有衣服穿，有的连蚊帐都没有，我们能踩着红毡子走路吗？’于是硬要搬走红毡子后，他才上路。可是鞭炮是禁不了，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当地民众都赞颂寿公（卢焘）是个忧国忧民的大官。”后来，当地政府为了纪念卢焘将军的这种高风亮节，特地将这个码头命名为“将军码头”至今。

卢焘主持贵州军政后，所颁布的“自治法案”，确实给贵州上下带来了新的气象，使各方面的事业也都有了明显的好转。见到实行自治给全省带来可喜的变化，于是，卢焘于1921年4月2日又通电各省，主张“由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他在通电中说：“迩来自治思潮弥漫全国，武人政治已不适于生存，亟宜顺应潮流，由各省自治进而为联省自治，黔省改革，即以此为正鹄。”卢焘的主张，不仅得到卢永祥（浙江）、赵恒惕（湖南）、陈炯明（广东）、刘湘（四川）、陈树藩（陕西）、顾品珍（云南）等省一致赞成和响应，而且也得到北洋政府作为宪政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之后，卢焘又制定了一个联

省自治纲要：“(1)联省制系依法则之结合，造成真正统一，不受第三者之牵制；(2)联省手续依省宪法案办理之，凡属非法之事，概不拒绝，彼此有互助协商又务，及应得各项权利；(3)联省自治法则与规约，以简单易于明了而与共和国之约法不相违背为宗旨……”

1922年3月11日，由川、黔、湘、滇、陕五省联合举行的“五省联省自治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到会有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湘，贵州代表李仲公，湖南代表刘同之、李湘皋，陕西代表张实生、高翰音，云南代表徐虚舟等，会议改定名为“川、黔、滇、湘、陕联合会”，今后每年轮做东召开一次，经费由五省当年平均分担。本次会议讨论的议题是：①省既实行自治，以后应如何促成联省自治实现；②五省联防事宜，及对大局应如何主张；③援鄂陕如何进行等。之后，五省都互设了办事处和互派了代表，使五省的各项工作交流和往来不断，彼此都得到不少的收获。

卢焘上台后，他不喜欢用政治手腕玩弄人，只是一心一意地为着贵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着想。他作为一个外省籍人士，能够在纷繁复杂的贵州军政中，从中斡旋调和贵州军政内部高层人员的矛盾，避免暂时的战祸横生，站稳脚跟，狠抓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使得全省松一口气，地方一度平安，这是非常不容易和难得的。特别是他采取“自治法案”的治省治军措施，实属全国独创，且所取得的成效，也是全国有目共睹：据资料记载，1922年，贵州省全省注册工厂310家，电力由原1917年的75千瓦增加到1.56万千瓦，纺织工人达1.8万人，比1920年增加1万余人。1921年，贵州全省财政入库达628万两，比上年增收242万两，当年财政支出416万元，财政收入收大于支，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据张任民(曾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议，后去台湾)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春秋》杂志98期上撰写的《往访黔军总司令兼省长卢焘将军》一文中说：“……那次(即1921年10月第一次到

贵阳拜见卢策动北伐事宜)我在贵阳耽延两月,下榻于卢氏公馆(贵州书院系公房)。当时黔省治安甚好,虽地方贫瘠,但人民安居乐业。据卢氏向我谈及,他做了近两年的贵州军政长官,从未杀过一个匪盗,也不发动或发生过一场战争。至于当时环绕贵州的几个邻省,如川、湘、桂、滇,则匪盗如毛,无不战乱频仍,烽火不息。故我当时之视贵州有世外桃源之感……”

1984年,我国著名资深记者陶菊隐在《记者生活30年》(中华书局出版社)中,叙述了自己当时以记者的身份在贵州采访的所见所闻,对贵州实行自治和联省自治带来的社会稳定及繁荣予以了充分肯定。

可见,卢焘领导下的贵州,能得到一个军队中高级将领如此高度的评价,这在当时的中国,还真是绝无仅有的。

## 6 派兵援桂,改造广西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广东革命政府非常大总统。桂系军阀反对最烈,一些省份采取观望态度,卢焘首先通电拥护。孙中山号召西南各省,首先剿灭陆荣廷,然后挥师北伐。卢焘立即响应筹备出师广西,并发表了《讨桂宣言》,斥责陆荣廷祸桂,“不行自治而行专制,私窃总裁而祸粤,依附北庭,卖省求荣”。此时,担任贵州南路卫戍司令的谷正伦,因与何应钦争斗,很想外出立功,扩充部队,再图回黔执政,于是要求立即出师广西。接着,驻扎兴义一带的胡瑛旅,也因分区地瘠民贫,养兵、扩军皆难;同时觊觎黔西南与广西百色一线,由军队保护输出鸦片,可获大利,军费有着落,私人也可发财,名利双收。所以也表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要求出兵讨桂。恰在此时,孙中山派张任民来黔与卢焘联系讨桂之事。卢焘同意谷、胡二旅出师讨桂。一来是响应孙中山的主张,二来可减轻

贵州的粮饷开支，同时也可以缓和贵州内部的摩擦。

于是同月下旬，卢焘将军即令谷正伦旅为第一纵队（孙中山任谷为讨桂军第四路军司令），辖彭汉章、王天培两个梯团，从独山经南丹、河池、宜山（庆远）出师柳州；胡瑛旅为第二纵队（孙中山任胡为讨桂军第五路军司令），辖陆荫辑、吴传心两个梯团，从安顺经紫云、望谟、凌云、百色，顺右江东下出师南宁，以消灭旧桂系陆荣廷之势力。卢焘认为，此次黔军南下讨桂，不仅时间紧任务重，而且意义非常重大。因此在两个部队分别开拔广西前线时，他都亲自到场给部队作精神讲话，强调不管行军或作战，都要严明军纪，不得损害沿途民众或地方的利益。当谷旅长至广西南丹时，得知庆远城内有一支陆荣廷部队准备迎其交战。消息传回总司令部后，卢焘将军立即电令谷部：庆远仍历史古城并军事要地，此仗非胜不可，但切记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地方利益。两天后，谷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庆远城与陆部开展激战，交战时间是在白天下午两点钟左右，一时枪声大作，全城大乱，街民闭户，小贩弃摊躲避。当时正值陆部午饭休息，有的洗澡，有的上街，大部分都在匆忙之中出逃。一些在营士兵仓促还击，形成两相对峙，但不到天黑陆部便缴械投降。据记载，这次战斗黔军伤之极少，陆部伤亡较大，但对民众和社会破坏很少。这次交战中黔军纪律尚好，除军事行动外，别无忧民事情。次日各小贩去收拾摊铺时，钱货俱在，城内的各公共设施和建筑也基本完好，广大群众民众由此对黔军十分敬佩，称之为铁军。事后，由于时任宜山县长段学纯逃躲不归，为此谷正伦经电请卢焘同意，即委任随军高参龚献之接任县长职务（龚系宜山县城南街人，早年与卢焘、张铁城从事秘密反清活动，同盟会员，后随卢在贵州军中任职）。庆远战斗结束，黔军稍作休整几天后，于6月30日攻占广西重镇柳州。8月2日，又与滇、湘、赣联军攻克广西首府桂林。与此同时，南路黔军胡瑛部也配合粤桂联军攻克百色、南宁，但因疟疾流行，又遭土匪袭击，部队损失较重。12月，孙中山

在桂林设大本营，召集各路讨桂军筹商北伐大计，谷正伦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彭汉章、王天培分别担任中央直辖黔军一、二旅长，中央直辖黔军隶属于李烈钧第一路军，拟北伐时攻击赣南、鄂东。后由于黔军内部纷争，所有讨桂黔军先后回黔，至此黔军援桂之役结束。在长达半年的时间中，孙中山改造广西的目的基本达到，旧桂系之势力也被打得四处鸟散，溃不成军。

## 7 家乡力邀回桂主持军政大业，林俊廷率三万饥军来黔投奔

陆荣廷在遭到讨桂军的打击后，退守庆远（今宜山）、百色、泗城一带。陆自知败局已成，乃推林俊廷为广西自治军总司令。林俊廷也知道自己难孚众望，于是以“桂人治桂”相号召，推举卢焘回广西任总司令。当时在湖南的李品仙和在香港的祝三多、黄天香等广西人，也曾推举卢焘主持广西军政。但是，一心想当桂军总司令的刘震寰却反对卢焘回桂。在此广西内部纷争的混乱局面下，卢焘不愿再卷入广西的内部斗争。于是在1921年9月3日他向广西通电表白，自己既无意回桂，亦无意于黔。卢焘的这一态度，说明他胸怀坦荡，对名利极为淡薄，同时也表明他对军阀混战感到十分厌倦。

1921年10月，被孙中山出师讨桂的陆荣廷残部林俊廷（广西防城人），率领被粤、湘、赣联军打得四散逃窜的旧桂系残部3万余人，来到贵州投靠卢焘将军，以求生存，愿意驻扎黔南的独山、荔波、罗甸、望谟、贞丰、册亨、安龙、兴仁、兴义等一带，为贵州的烟土过境作保护、打击匪盗、稳定边境治安以及帮助群众发展生产等效力。卢焘与林俊廷过去曾在柳州、庆远一起当兵，既是老战友，又是老乡，如今林有难有求于自己，如不收容于情于理都过不去。于是，他首先与省议会负责人商量，该负责人认为既然桂军来黔也是帮助贵州，桂军暂时留黔他没意见。接着，卢焘又召开高级将领和有关高级官员会议，将桂军暂时留黔的情况，向大家作了通报和征求意见，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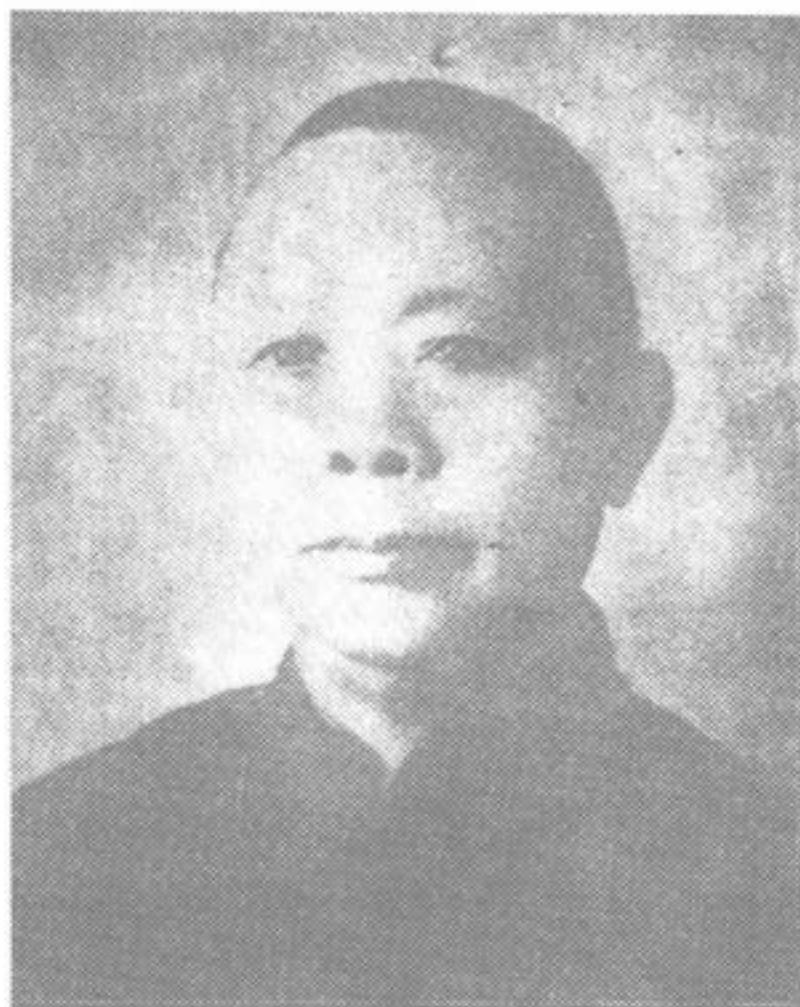
了大家的理解和同意。随后,卢焘以总司令部的名义,任命林俊廷为黔桂讨贼军第一师师长。

桂军在黔南驻扎期间,并不干什么坏事,就像林当初承诺的那样,不仅与地方民众相安无事,而且对贵州的边境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林俊廷看到自己的部队在卢焘将军和贵州省人民的大力帮助下,渡过了一个个难关,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于是专程赶到贵阳,千谢万谢卢焘将军和贵州当局的关照,并于次年初带着桂军离开黔南返回广西。

### 8 不要厚禄,不建公馆,不娶姨太

卢焘就任省长后,参谋长兼第五旅旅长何应钦就开列了总司令兼省长每月月薪及各项开支经费预算单送交卢焘审批。单内开有总司令兼省长月薪 500 元,加上交际费、马夫费、应酬费、服装费等等一连串项目,共计 3000 多元。卢焘看后,用手中正拿着的点水烟的纸捻,把第二项以下的其他各项,一项项地点穿成洞。何笑嘻嘻地说:“总司令,这个不好嘛!”卢焘说:“这 500 元我全家都用不完,那么多的项目哪里用得完呢!”过后,卢焘对朋友说:“如果那时候我都要那么多的钱,下面一连串人都将会效仿去发财了,这是贪污行为啊!”

民国年间,凡在贵州当过督军、总司令、都督、省长或在外做过大官的贵州人,几乎都用巨款或公款在贵阳修建自己富丽堂皇的公馆。如刘显世、袁祖铭、周西成、彭汉章、毛光翔、王家烈等都有公馆,唯独卢焘没有修建公馆。卢焘在贵阳安家落户,数次搬家,住的都是普通平房。1913 年,卢焘第一次把家属从广西宜北老家搬到贵州时,租住公园路一间平房。不久,全家搬到昆明,后又搬回广西。1914 年,刘显世电邀卢焘到黔,卢又把家搬到贵阳。从此基本上长住贵阳。开始,借住于公园北路冯松生家里,冯是在龙州时相



民国时期贵州省省长卢焘将军

识的故交。不久，又搬到双槐树段家，因卢焘曾参加过护国运动，段家怕受连累，逼着卢搬家，于是卢只好在省府后街买了一大间平房。住几年后，家属又随军搬到铜仁和湘西辰州。1920年，卢焘任黔军总司令时，全家住在贵山书院公房。1922年，袁祖铭率“定黔军”回贵州夺权，卢焘引退，全家搬出公房，先后住在冯松生家、次南门大马槽邓绥琪家和金井街（今富水路）朱汉吟家。之后，又搬到隔壁张廷光旅长家，这时省长周西成帮卢焘代买下来，共五间房。

1939年2月4日，日机轰炸贵阳，金井街房屋全被炸毁。最后

卢焘在北郊小哲溪的半山寨，买得三间农民的旧平房和屋侧一小片菜地，并起名为“半日山庄”，是以抗战期间全家常到此躲避空袭半天而命名。后来，卢焘把环境略加修整，旧房侧面增建三小间矮房，作为他自己的卧室和书房兼会客室。另外修一间作为老太太念经拜佛的经房，房前西侧开辟一小块菜地，五口之家（孩子们大都已独立成家了），蔬菜可以自给。他又把东侧原来的柴门，改修为传统式的朝门，朝门上悬挂他亲自书写、木刻的“半日山庄”四个大字。门两边贴有一副对联：“身亲垄亩田陌事，人在锄鋤烟水乡。”围墙边沿植树栽竹，桃李相间。半日山庄前面是一片广阔的田坝，住在那里，可以饱览田园风光。卢焘说：“我住在这里，环境幽雅，空气新鲜，可与农民共享田园之乐，胜过城里的大官别墅。”

在堂屋里，卢焘亲笔写有两副对联。中堂的对联是：“栽柏成柏，栽松成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堂屋两边的对联是：“衣食最难，为人切莫偷安，偷安即成困境；福禄不大，处世要能耐苦，耐苦自见坦途。”卢焘既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也久经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常说：“为人要有志，处世要谦恭，治学要专心，生活要耐苦，办事要公道。”

卢焘虽住郊外山村，可是军政要员、社会人士，乃至平民百姓，都和他常来常往，宾客不断。达官贵人来访，不是坐汽车就是坐黄包车，而卢焘进城往返，从来不坐黄包车。不论早晚，也不管急事要事，他都是健步行走。有个家乡青年在闲谈中问他：“太公，你年近古稀，每次出门为什么不坐黄包车？”卢焘笑答道：“坐黄包车虽然花不了几个钱，但我是健康人，为什么要让别的双脚代步呢？这无异于叫人背你走路，其心何忍啊！何况自己步行，还可以锻炼身体嘛！”

在闲谈中，家乡人曾问过卢焘：“寿公，人家当总司令、省长都有公馆，你为什么不修建卢氏公馆呢？”卢焘却回答说：“当总司令也好，省长也好，不是当一辈子，最终还是平民百姓。那些公馆还不

是用老百姓的钱财来修的，子孙后代不能坐享其福，必须靠自己奋勇创业才是。”卢焘的言行，给予了后辈们深刻的教育和启发。

卢焘 39 岁就当上了黔军总司令兼省长，人又长得高大英俊，可谓名噪一时，当时贵阳城内许多富豪商贾，都想攀附这个相貌堂堂、年轻有为、权倾一方、名震西南的总司令兼省长卢焘将军，他们从各种渠道了解卢焘的家庭生活情况，都想把自己的千金小姐或亲戚的美女嫁给卢焘做姨太太（当时社会娶几房姨太太很正常，特别是当大官更是不用讲了），有的甚至托人做媒，公开向卢焘提出。卢焘听后，总是又气又好笑，并严肃认真地谢绝了这些人的所谓好意。早在卢焘当旅长的时候，有一次铜仁县举行军政要人集会盛宴，主会者通知赴宴官员要携姨太太或伴女陪同。卢焘极为反感，当即拒绝赴宴。他认为这既失了官仪，败了官风，助长了社会上不正风气的盛行，也丧失了官员本身的人品和尊严，辱没了自己的太太。20 世纪 40 年代初，有一天饭后，卢焘将军一家人在看相册消遣，当翻到杨森（四川广安人，曾任四川、贵州两省长）一家的照片时，卢焘在旁边逐一介绍了杨家人，听到杨有几个姨太太，卢焘的侄女卢小姑大声地说：“你们看杨森这些大官，哪个像我们的大伯这样讲良心，哪个不讨几个小婆，只有我们老太爷，仅有我们伯母一个哦。”

## 第十五章

# “定黔军”回黔夺取政权

### I “定黔军”，袁祖铭伺机报复

1920年9月，在重庆黔军整顿中，被王文华排挤出黔军的“守旧派”将领袁祖铭（字鼎卿，贵州安龙人）和刘显世的代理人张彭年，为了洗雪旧怨，报复王系政权，在北洋政府段祺瑞、吴佩孚的支持下，曾两次在武汉组织“定黔军”回黔夺权。第一次是1921年5月，即“民九事变”后，卢焘及兴义系“新派”掌握了贵州政权。北洋军阀把插手贵州的希望寄托在争取卢焘北附，所以对袁祖铭并不十分重视。但是卢焘始终拥护孙中山，坚定地站在广州军政府一边。1921年4月2日，他通电声明：“护法宗旨，始终不渝，北政府不由法律产生，为西南各省所否认。”“所谓焘输诚北方，显系有人造谣。”通电发出后，北洋政府知道卢焘不可动摇。于是，把希望寄托于袁祖铭。

“定黔军”原计划5月1日从武汉出发，由王占元派鄂军孙传思师为后援，经鄂西取道四川酉阳进攻贵州后坪，先占领黔北各地。当时，黔东一带为李烈钧部滇军驻扎，袁祖铭估计，李烈钧原与贵州兴义系旧派接近，可以拉拢作为同盟军。这样，直捣贵阳更容易了。可是，当袁祖铭的“定黔军”紧锣密鼓，准备粉墨登场的时候，

从贵州、西南，乃至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发出了一连串反对之声。卢焘也通电谴责袁祖铭：“乃受北方 20 万元的贿赂，见利忘义，倒行逆施。”四川和云南的通电说王（占元）无故开衅，请为制止援黔之举。黔人明白表示：“鄂军深入黔，是甘心祸黔。黔人虽死，不忍甘受。”旅鄂黔人和湖北军界，不少人甚至直接向王占元进言，多方阻挠。一连串反对之声，首先在舆论上给袁祖铭、王占元和北洋军阀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再加上卢焘派人与熊克武、顾品珍、赵恒惕等川、滇、湘执政者在 1921 年 2 月至 5 月达成了联防协议。于是，川、湘两省均以已宣布实行“自治”为名，拒绝袁祖铭的“定黔军”假道。这就给“定黔军”回黔造成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1921 年 4 月底，旅长胡瑛领衔通电，表示“一致公推卢代总司令寿慈担任黔军总司令，主持黔政”，“决与护法各省一致行动”。5 月初，李烈钧又率滇军离开镇远赴粤参加讨桂战斗。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意味着“定黔军”一时间在贵州既无内应，又无同盟军，袁祖铭和王占元的原定计划被打乱。于是，王占元认为“定黔军”已无用，便于 5 月下旬，强令解散，袁祖铭只好溜回北京。6 月 20 日晚，袁祖铭在北京万陆宾馆门前，遇刺负伤。他所组织的第一次“定黔”也就瓦解了。

袁祖铭虽然第一次“定黔”失败了，但他想争夺贵州政权的欲望并没有减退。而黔军“新派”的内部争权，使贵州陷入极度混乱，又给袁祖铭造成了“定黔”的有利时机。

第二次是 1922 年 3 月，袁祖铭在湖北武昌收集社会游勇散兵和黔军叛逃投靠他的彭汉章、王天培余部，组织“定黔军”准备回贵州夺取政权。“定黔军”约 7000 余人，袁自称“总司令”，彭、王分别担任旅长。3 月 25 日，袁在武昌通电宣布“定黔军”回黔夺权，并兵分两路经湖南湘西进入贵州黔东。袁祖铭为人思想守旧，心胸狭隘，但很会投机钻营。在重庆被王文华排挤出黔军后，他一直对王

耿耿于怀，伺机报复之心非常强烈。但苦于无实力无军队，于是就跑到湖北投靠北洋政府段祺瑞、吴佩孚之流，得到了他们的弹药和军饷的支持。等到羽翼渐丰的时候，袁祖铭开始疯狂地实施了他的复仇计划：一是1921年3月在上海买凶（其表弟）刺杀前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二是对当时电令拿办他的现任黔军总司令兼省长卢焘一直怀恨在心；三是卢焘是王的人，他要回黔推翻王系的政权等等。

## 2 不甘弱势，刘显世积极“复黔”

在袁祖铭投靠北洋军阀，组织“定黔军”之时，刘显世及兴义“旧派”则投靠滇系军阀，也积极进行“复黔”活动。1921年1月，刘显世按照唐继尧的意图，在昆明宣布就任广州军政府的第七位副总裁。刘显世和唐继尧联合组织军队，由滇军提供两个师，唐继尧任总司令，刘显世任副司令，设行署于毕节，声称“即日誓师，联合旧部，进攻黔省，削平内乱”。在唐继尧、刘显世联军咄咄逼人的声势下，卢焘政权不得不采取一些应对措施：①积极争取外援，与四川熊克武、湖南赵恒惕（炎午）建立联防；②为了安定贵州内部局势，卢焘及“新派”首先推出名望较高的任可澄代理省长，又促请王伯群回黔，借以缓和反对派。但是，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1921年2月7日，顾品珍在云南发动政变，唐继尧仓促外逃，刘显世的复黔美梦也就随之破灭了。

刘显世对他掌握的政权被夺，始终是不甘心的。因此，他又采取另一个复黔计划。一方面他派人活动贵州省各种团体，想通过这些团体对他“致电欢迎”，实现和平复黔；另一方面，派人联络袁祖铭、薛尚铭和王华裔等流亡于贵州省外反对“新派”的武装力量，准备在5月份，从东南西北四面，一齐向贵州进攻，用武力夺取政权。但是，这两种打算都没有成功。各团体不愿致电欢迎他，袁祖铭等也未能如期发动进攻。刘显世只有率领原贵州游击队两个团，于5

月初从云南宜良、罗平向贵州兴义边境进攻。结果被驻扎兴义的胡瑛旅打得大败。胡瑛部队欲乘胜追击，但滇军总司令顾品珍出面调停。5月21日，顾品珍致电卢焘和胡瑛，要求前敌各军，克日撤回，退驻黔边。卢焘为缓和滇黔关系，也就命令胡瑛部撤回原防。刘显世所带的部队，也被改编为滇军，他的复黔美梦，再一次破灭了。

1921年7月，刘显世只身离滇赴鄂，急电袁祖铭南归，共商大计。在北京遇刺负伤，刚刚痊愈的袁祖铭得信后，匆匆赴汉口与刘显世会面。于是，袁、刘又联合起来了。因为这台闹剧的前台总指挥是袁祖铭，打的仍是“定黔”旗号，所以大家仍称之为“袁祖铭定黔”。

这次的袁、刘联合定黔，情况和前次大不相同。第一次“定黔”，依靠的是湖北王占元调拨的外省军队，这次主要依靠黔军自己的力量。袁祖铭曾说：“鄂援中止后，内部同志，群相团结，力主自动讨贼。”袁祖铭和刘显世利用往日的威望和袍泽关系、私人感情，在黔军中进行分化拉拢的活动，收到了很大效果。到1921年12月止，暗中加入“定黔军”的贵州军队，大致有王天培、彭汉章和王华裔所部。在西南有刘显世的游击队凌同光、詹善义2个营，加上溃退于水城一带的游击队张三元残部的1个团。袁祖铭认为“定黔”时机成熟，致函京城卫戍司令王怀庆说：“铭候款项得手，即兼程驰归。以人心之向背及实力之多寡衡之，黔局之定，或不出两、三月也。”12月15日，经过王怀庆的疏通，北京政府致电驻汉口的两湖巡阅使吴佩孚：“希就近与袁部接洽，设法扶助，俾定黔局。”不久，袁祖铭又得到吴佩孚的10万元和大批枪械的援助，可谓羽翼已丰。

第二次“定黔军”回黔的消息传到贵州，刚刚得到喘息近两年的贵州800多万民众，眼看全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又将被袁祖铭这个军阀夺走时，全省上下掀起了一股反对袁祖铭“定黔军”回黔的浪潮，人们愤怒声讨、唾骂袁祖铭，纷纷请求卢焘派兵将袁军阻击在黔省之外。各道、县的官员也纷纷动员组织地方武装

和群众，积极做好抗击袁军的各项准备工作。黔军五旅各将领更是纷纷主动请缨，力主向袁开战。省议会及各厅局官员，也主张武力伐袁。于是，卢焘立即命令总司令部向各部队发出电令，要求各部队立即作好讨袁的战斗准备。即令驻防铜仁的第一旅窦居仁将军，迅速将所属部队拉到玉屏、岑巩进行一线布防；令驻防独山第二旅胡刚将军，将所部迅速向东北的凯里、镇远、三穗等地，前移数百里布防；令驻防遵义的第四旅张春浦将军，将所部迅速东移思南、石阡、余庆等地数百里布防；令驻防贵阳的第五旅何应钦将军，也将所部及时调整到开阳、贵定、龙里一带布防；令驻防安顺的第三旅胡瑛将军，也将所部及时东移贵阳附近的修文、清镇、花溪等地布防。到4月上旬，黔军所属5旅都已按照总司令部的要求进行布防完毕。特别是在黔东的3个旅，已形成了“品”字形的“口袋”阵布防，只等袁兵一到，总司令命令一下，则将袁兵一网打尽。

在一场大战即将爆发之际，“新派”内部又陆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胡瑛旅团长吴传心，张春浦旅团长张行伟，新充实的胡刚旅（原谷旅）团长魏应鳌，何应钦旅团长易荣黔等军官，有的已暗自私通了“定黔军”，有的甚至已公开叛投“定黔军”。如张春浦旅长就将公开叛投的张行伟团长处死等。

然而正巧在这时，正当贵州全省上下正在准备对付袁祖铭率军回黔夺权的关键时刻，4月中旬初，被唐继尧驱赶到黔西一带的滇军五旅范石生、蒋光亮、杨希闵、杨如轩、杨池生（均是与卢焘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等，闻讯袁祖铭要率军回黔夺权的消息后，他们纷纷来电声援卢焘，并都自愿归从卢焘领导，为贵州驱袁效力。同时，他们都以急行军的速度，分别赶到都匀、惠水、长顺、平坝、息烽等地集结待命，听候卢焘指挥。范石生、杨希闵等人，还亲自赶到贵阳找到卢焘说：“寿慈同学，你还记得当年我们10同学在翠湖边义结金兰所讲的话吗？今天袁氏欺人太甚，你卢兄有难，我们同学定当帮助你！”看到老同学在自己的危急关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卢焘真是思绪万千，感慨万分。

### 3 力避战祸，交出省长大权

面对一场即将来临的大内战，出身贫苦、饱受战乱其害之深而又爱国爱民的卢焘，此时真是心绪复杂。他想，“定黔军”兵力不足一万，而自己正规军就有1.8万余人，加之地方武装，全省的总兵力已超过2.5万人。再有云南5位同学的滇军1.5万人，自己对付袁祖铭的总兵力已超过4万余人。因此，这次若与袁祖铭硬打起来，无论从兵力或地形或武器或群众基础等，自己都比袁强了数倍，所以可以说击败袁是小事一桩，胜利在握。但仗一打起来，必将导致社会混乱，生灵涂炭。那时候，卢焘每次回到家里时，已经75岁高龄的老母亲，都反复地劝他说：“战争之事，能避则避，为将为人都当如此。”于是，卢焘遵听母命，立即果断地下达命令，这仗不打了！并速令总司令部参议兼秘书长周素园亲自去督促省议会去电袁祖铭，表示自己愿意让出省长的位置。“定黔军”进入湘黔边界后，就发布了《定黔军誓词》、《定黔军指挥训词》、《定黔军讨逆檄文》、《告黔省同胞书》和《告省外青年书》等，大肆谴责王文华、何应钦、谷正伦、王伯群、孙剑峰、胡瑛等，唯独不点卢焘之名，这是卢焘审时度势、急流勇退的结果。仗不打了，还“欢迎”袁氏回黔就职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即引起了黔、滇将领的强烈反对，特别是黔军五旅将领纷纷来电责问卢焘：“为什么不打呢？我们就这样白白把权力让送给他吗？”“你总司令不打，我们自己也要打他这个姓袁的！”有的将领甚至怒骂。

听到全体将领的愤怒和埋怨声，卢焘也十分理解他们的心情，从他个人来讲，他也很想打，出出这口忍了多年的气，但考虑到地方和人民这个大局，他还是坚持“和为贵”的方针。4月下旬，他立即召开了所有的黔、滇将领及省议会，省政府及各厅局高级官员紧

急联席会议，阐明不打的原因和目的，陈述孙中山北伐的主张和意义。他慷慨地说：“杀人争城，徒苦吾民，吾不忍为也，今政府整军粤峤，方将威弧北指，扫荡中原，诸君有志，曷若联系赴粤，以戮力于国家事业乎？”但是不少将领还是一时不够理解，仍然坚持要用武力讨袁。如窦居仁旅、张春浦旅、孙剑峰警卫团等部队，仍然与“定黔军”在黔东、黔北等地，发生了不少的小战斗。打得最为激烈的是窦居仁旅团长周西成，在铜仁全歼了王华裔所部，王华裔在战斗中被击毙。不管部属们怎样埋怨，但是卢焘将军仍然耐心在黔、滇将领中斡旋，他一再对他们表示说：“我是广西人，无意与贵州同胞争夺地盘。贵州这个地方太穷了，也养不起这么多的军队，我们还是到广西广东去，拥护孙中山先生北伐革命，为国家的事业尽力，何必在这里你争我夺呢？”经过多次力劝，所属部属和滇军五旅终于都服从了卢焘的决定，准备南下广西广东参加北伐革命。当袁军快到贵阳时，何应钦向卢焘建议说：“总司令应到福音堂吉牧师处一避，以防万一乱兵伤害。”卢焘瞪眼直视何应钦说：“我身为黔军总司令兼省长，我的部队不能保护我，贵州 800 万百姓不能保护我，要一个外国人来保护我？”何应钦看到卢焘横眉冷眼的颜色，便不敢多言。1922 年 5 月 9 日，袁祖铭进入贵阳。10 日，不费一枪一弹，卢焘将军在省议会代表原来的班子移交政权，并亲手将省长大权向袁“和盘交出”。当他将省长大印用红布包好，亲手交给袁祖铭时，袁祖铭假作谦让，笑嘻嘻地说：“寿慈，这个还是你掌为好嘛！”卢焘微笑着说：“鼎卿（袁的别号），你回贵州，所为何事，不就是为这个而来吗？”袁祖铭顿时满面通红，引得在座的人哈哈大笑。这一插曲，成为当时人们的笑谈趣话。

## 第十六章

# 支持北伐，统率黔滇大军挥师南下

### 1 德高望重，公推就任黔滇联军总司令

一场一触即发的大内战，就这样在卢焘将军的力劝斡旋下，终于避免了。从此，贵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卢焘将军的这种“不争权不争利”的高尚情怀和品德风范。卢焘将军卸任省长后，立即召开黔滇军高级将领会议，大家公推卢焘为黔滇联军总司令，但滇军司令张开儒不愿受卢节制而独自去职。于是卢焘将军将黔（黔军大部）滇军 10 旅 3 万余人，分成两路军南下广西。第一路军归黔军窦居仁任总指挥，滇军杨希闵任副总指挥，统率黔军一、二旅，滇军一、三、四旅，由独山经荔波、思恩、宜山至柳州，称为右翼军；第二路军归滇军范石生任总指挥，黔军何应钦任副总指挥，统率滇军八、九旅，黔军三、四、五旅，由独山经三都、从江、融县、柳城至柳州，称为左翼军。两路大军计划在柳州会合后，再继续南下梧州及广东。

### 2 浩荡南下，攻克广西重镇——柳州

1922 年 5 月 3 日，卢焘将军亲自统率的黔滇两路大军分别从独山浩浩荡荡南下广西。由于两路大军人多马多，行军途中时有人

踩马踏禾苗之事发生,为了搞好军民关系,卢焘还特意电令两路大军指挥官不许践踏禾苗的命令。电令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青苗芸芸,为人民终岁托命,乃查日来本军驮马竟有任意践踏青苗者……应即严令查禁。”命令下达后,全军肃然,行军小心谨慎,再无类似事发生。两路大军在进入广西地界后,所经沿途各县,均遭到又卷土重来的陆荣廷残部所谓的广西自治军的微弱抵抗。1922年6月20日,两路大军都按原计划分别到达广西军事重镇柳州西、北郊外集结,准备进攻仍据守城内的自称广西自治军总司令的林俊廷和中央军第七军军长刘玉山两支部队。与此同时,卢焘从报上看到了留守广东的陈炯明已叛变的消息。6月16日,陈指使其部下叶举炮击广州观音山的总统府,妄图逼迫孙中山元帅下野。这一消息使黔滇联军各将领大为震惊,从而更加坚定了他们支持孙中山北伐的决心。27日天刚拂晓,卢焘将军下达攻城命令,左路军由北门以东作正面进攻,右路军自西门以南作背面强袭。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桂军不支,于28日凌晨弃城四散。大部分人逃往南宁,少部分人或东向桂林或西窜宜山。28日早晨,柳州百姓出门迎接卢焘两路大军,到晚上八时两路大军才入城完毕。此后黔滇联军在柳州驻休月余。8月15日,广西自治军韩彩风部由南宁欲进攻柳州,当韩部行至迁江时,卢焘即命谷正伦(后又回黔军任总参议)率黔军两旅到迁江与韩部开展激战,韩部溃败向宾阳北部逃窜。

### 3 北上桂林,晋谒大总统孙中山

在柳州休整期间,卢焘将军还北上桂林大本营晋谒孙中山先生请示北伐事宜。卢焘向孙中山建言,建国必先建军。鉴于当时北伐以粤、赣、川等军为主要力量,国民党本身无自己的正式部队,各省军人皆拥兵自保,并互相排挤,你争我夺,各省领导多口是心非。

卢焘还向孙中山陈述了建立国民党军的必要性，认为只要国民党有了自己的军队，才能有北伐实力为本钱，才能“先礼后兵”征伐北洋军。卢焘建议，以滇黔桂三省军队为基础，在广西招募兵源，扩充到10万人。在桂林开设干部速成学堂，培训连排干部，半年为一期，一年则可基本完成建军计划，经费方面由广东筹拨。孙中山经过反复考虑，认为此议可行，遂下广州与各方商洽筹集军饷，拟照议实施，但是遭到胡汉民和汪精卫等人的极力反对，认为是“养虎为患”，最终此事告吹。对此，卢焘非常气愤，憋着一肚子的气，回到柳州。孙中山要他担任滇、黔、桂三省联军总司令他也不愿干了。

#### 4 意见不一，黔滇联军分道扬镳

卢焘从桂林回到柳州后，又马不停蹄地指挥他的黔滇联军按照原定计划继续东进。1922年8月28日，黔滇联军左右两翼部队顺柳江经象州、武宣夹江而下，所经沿线广西自治军的韩彩凤、陆云高、陆福祥部惊慌失措，全线溃退。9月25日，左右两翼部队胜利会师于桂平郊外。桂平是桂东南一要邑，在柳江、郁江交汇处，是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在桂平休整期间，卢焘召开了联军高、中级将领会议，就陈炯明叛变后以及今后联军的去向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和讨论。大家认为，广西土地贫瘠，难以供养这么多的客军，而广东地方富饶，应当乘胜南进，打垮陈炯明，协助孙中山革命。但遭到黔军多数将领的反对，他们想留在广西，养精蓄锐，然后再打回老家去与袁祖铭争权夺利。面对这样的情况，加上孙中山身边人的不信任，9月28日，卢焘只好辞去联军总司令职务。黔滇联军随即分道扬镳，就地解散，各走各的路。此时，滇军由杨希闵担任司令，拟东进广东；黔军则由谷正伦代理指挥回黔，卢焘只带20多名亲信和警卫，东下梧州经广州转香港赴上海作私人考察。

## 5 就任滇黔桂联军总司令

到达广州后,由于长途跋涉的艰苦,跟随卢焘身边多年的堂弟卢江川(系卢贴身卫士,曾任警卫营副营长),因病去世了。卢焘在悲痛中处理了自己堂弟的后事后,正准备赶赴香港时,闻讯范石生、杨希闵及桂军师长刘震寰(广西柳州人)、师长何中权等人,应陈炯明之约已来到广州,于是派人找到了他们。原来,从桂平分手后,滇、黔军的日子太困难了,还得到了桂军刘震寰师长的接济。陈炯明自从背叛孙中山以来,遭到各界人士的谴责,心中始终惶惶不安。当他得知滇军已陷困在广西桂平大湟江口时,他觉得这是拉拢滇、桂两军的最好机会,于是立即电邀范、杨及桂军刘震寰来粤洽谈合作事宜。卢焘见到范、杨、刘后,耐心地劝说他们万勿依附陈炯明。范说:“寿慈兄放心,我们这次来见他,主要是想从他那里要得一批供给而已。”陈炯明看到他们愿意与自己联合抗击旧桂系沈鸿英,当即给滇、黔军送了广东毫洋 10 万元,军服 12000 套,干菜若干船等。10月 15 日,卢焘与他们在泰安客栈一起商量了下一步的对策。他们认为,陈军漫无纪律,洪兆麟等不学无术,只知卖包子,岂能军乎?若我军一下,此无纪之军,非鸟兽散不可。他们当即决定,得到这批财物的接济后,滇、桂大军可即将大举入粤讨陈,支持孙中山北伐。同时,又公推卢焘任滇黔桂联军总司令,刘、杨分别为联军副总司令,范为总参议,黄梦年等为参议。之后,他们又及时将这个决定计划,通过在香港孙中山的代表古应芬、邹鲁 2 人,向孙中山通报了情况,此时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听后大为惊喜。范、杨、刘则及时返回广西梧州作好南下准备。

10月 20 日,卢焘一行坐船到香港准备回桂看望还滞留在柳州的黔军。卢焘到港后化名卢德寿住在一个小旅馆。第二天,有一个不速之客把陈炯明的信交给了他。信中表示希望卢焘与陈炯明合作反对孙中山,卢感到惊讶。他想,这是陈炯明派密探跟踪,如果

不答应与他合作，必遭暗算。于是，他改变回桂计划，打算化装转赴上海作私人访问。

## 6 陈述北伐要领，争取各方支持

1922年10月下旬的一天，卢焘在香港正好接到了孙中山从上海转来的亲笔信函，要求卢见信后立即赶赴上海面商要事。11月初，卢焘与十几名侍从人员在香港买票登上北去的火车，拟到汉口再转赴上海。但火车刚开到湖南长沙时，就遇到了铁路工潮，火车停运了数日。于是，卢焘便去拜会了时任湖南省省长的赵恒惕老朋友（卢任湘黔联军总指挥时，赵是湘军旅长），他力劝赵说：“陈（炯明）之不可助，他背叛孙中山，违反潮流，非败不可也！”后果如言。

火车开运后，卢焘一行刚到汉口，便听到孙中山大总统已由沪赴粤的消息。这时，又应吴佩孚（山东人，时任直系军阀首脑）之约赴洛阳。吴于洛阳城郊迎40里，10万人夹道欢迎，盛况空前。晚间设宴，谈及中国大局形势，吴佩孚用筷条蘸酒，写一“醢”字（音海，剁成酱之意）于桌子上说：“我捉到孙中山就要将他这样。”卢焘大不以为然，很不高兴地站起来：“孙中山先生是我卢某的领袖，不得如此无礼侮辱。”并要离席。吴佩孚连忙赔笑说：“请坐下，寿慈兄，我是开玩笑而已，请勿见怪。今日不谈政事，不谈政事。”

吴佩孚在宴请卢焘的当天，曾以军用专线电话与北京协和医院住院的冯玉祥通话。根据当时冯的病情，德国大夫不许冯见客，因系吴佩孚亲自来的电话，只得破例准许通话。吴在电话中问候冯之病情后，立即说：“有一位你所最敬佩的南方军人要见你，你能猜中否？”冯在协和医院的特等病房中不假思索，立即回答曰“定是卢寿慈（卢焘）将军”。听筒这一头，在洛阳吴佩孚的身旁的卢焘亦听到耳机中冯玉祥的声音，与吴相视而笑。

第二天，吴佩孚用专列（火车）送卢去北京，冯玉祥派其参谋长鹿钟麟用一部美国福特牌轿车到车站迎接。两边车门各站两名卫士，车内坐椅以花纹漆皮（羊皮）装饰。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冬季是雪泥遍地，卢焘一对老棉鞋，满是雪泥污水，见此轿车高级豪华不忍下足，后念及此乃主人盛意，遂踏进车内，卢此时虽已官至陆军上将，但农民朴实的作风仍甚浓厚。

卢焘此次去北京，一方面想去看一看冯玉祥，两人在湘西虽然站在不同的立场对峙，但是彼此仰慕，互相尊重；另一方面，他戎马倥偬十多年，从未到过北京，也想趁此机会浏览一下北国风光。时值早春正月，北京异常寒冷，这是生长在南方的人初到这里的第一个感觉。

冯玉祥派鹿钟麟用最摩登的福特牌小轿车将卢焘接到六国饭店后（当时北京最富丽堂皇的大酒店）便向冯玉祥作了报告。第二天，冯玉祥不顾协和医院德国大夫禁令，坚决要接见卢焘，旧友重逢，虽然冯在病中，仍然十分兴奋，在病房与卢作了一个多小时畅谈，奉茶就座，彼此叙述别后情形。冯性格豪放，谈到在湘西的一些趣事，开怀大笑。卢则彬彬有礼，也谈到西南的情况。最后，卢谈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他认为现在国家很乱，群雄割据，但民主共和、统一国家是不可阻挡的革命趋势。他还谈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认为孙中山是了不起的人物，希望冯支持孙中山，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些谈话及后来书信往返，卢焘均力劝冯玉祥投向孙中山先生，这和后来冯玉祥将军之赞助北伐进而参加北伐是不无影响的。

卢焘与冯玉祥每次会晤后，回到六国饭店，都感到北方冬季的新奇，外面寒风凛冽，屋内则温暖如夏，冯为他准备的头等客房之中，连皮袍皮裤都穿不住，室内室外，宛若两个季节。于是，卢在脱下皮袍之后，马上在室内寻找热源，经过仔细的观察之后，终于在床下发现了一根暖气管。他不禁暗笑自己是乡巴佬进城。20世纪20年代，在南方生活而第一次到北京的人，当然不知暖气为何物，

更不用说卢出身于劳动农民家庭，当了军官后又一贯廉洁奉公，不事享乐。

离开北京，告别冯玉祥后，卢焘将军一行又乘火车南下，应大元帅府革命军总参谋长李烈钧的邀请转赴上海。在老长官宽大的办公室里，卢焘叙述了他晋谒孙中山时曾建议建军的经过情况，以及别后西南的各方面情况等。李说：“孙大元帅不了解你。”李劝卢仍回广东协助孙中山，并立即写信叫卢带到交孙中山。卢焘说：“你是我的老长官，应当服从命令，我可当邮差而去，但是不担任任何职务。”1923年元月初，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带来，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立。”《宣言》还第一次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元月30日，孙中山《致卢焘函》（见《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71页）说“……一时小挫，不足为大贤累，幸努力为国奋斗，苦心人天不负也……”

1923年2月30日，卢焘从上海回到广州。历时整整两个月的北方之行，使卢焘将军的收获颇丰。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对孙中山的北伐革命形势有了更深地认识和了解，同时也对各路军阀对当前革命局势的看法有所了解，对争取他们支持北伐有所帮助。

## 7 协助范石生击退李易标部，并将陈炯明逐出广州

回到广州的当天，卢焘就派人把李烈钧的信送到大本营转给孙中山。当晚，他还及时把已率部到广州附近的肇庆一带待命的滇、桂军将领杨希闵（时任滇军总司令）、范石生（时任滇军师长）、刘震寰等人召集到他所住的广州长堤广泰来旅馆开会研讨讨陈事宜。大家认为，目前的广东局势，不能再旁观坐视了，必须拥护支持孙中山领导北伐，实现统一中国大业。

1923年3月2日，孙中山在广州东郊农业试验场大元帅府召

开了滇、桂、粤将领会议，卢焘将军也出席了会议。会上，孙中山说：“今次回广东来，是要统一滇、黔、桂、粤诸军，造成统一的中华民国。”并宣布今后转入“讨贼时期”，所讨的“贼”是指南北一切军阀。同时，明确当前的军事方针，划定各军部的防地。任命沈鸿英（广西鹿寨人）为桂军总司令，驻防肇庆及西江北岸；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驻防北江；刘震寰改任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命东路讨贼军第四师师长吕春荣在罗定一带驻防。

3月3日，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正式组成，孙中山为大元帅府大元帅。谭延闿为内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胡汉民为总参议，程潜为军政部长，徐沿桢为广东省省长，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建立的革命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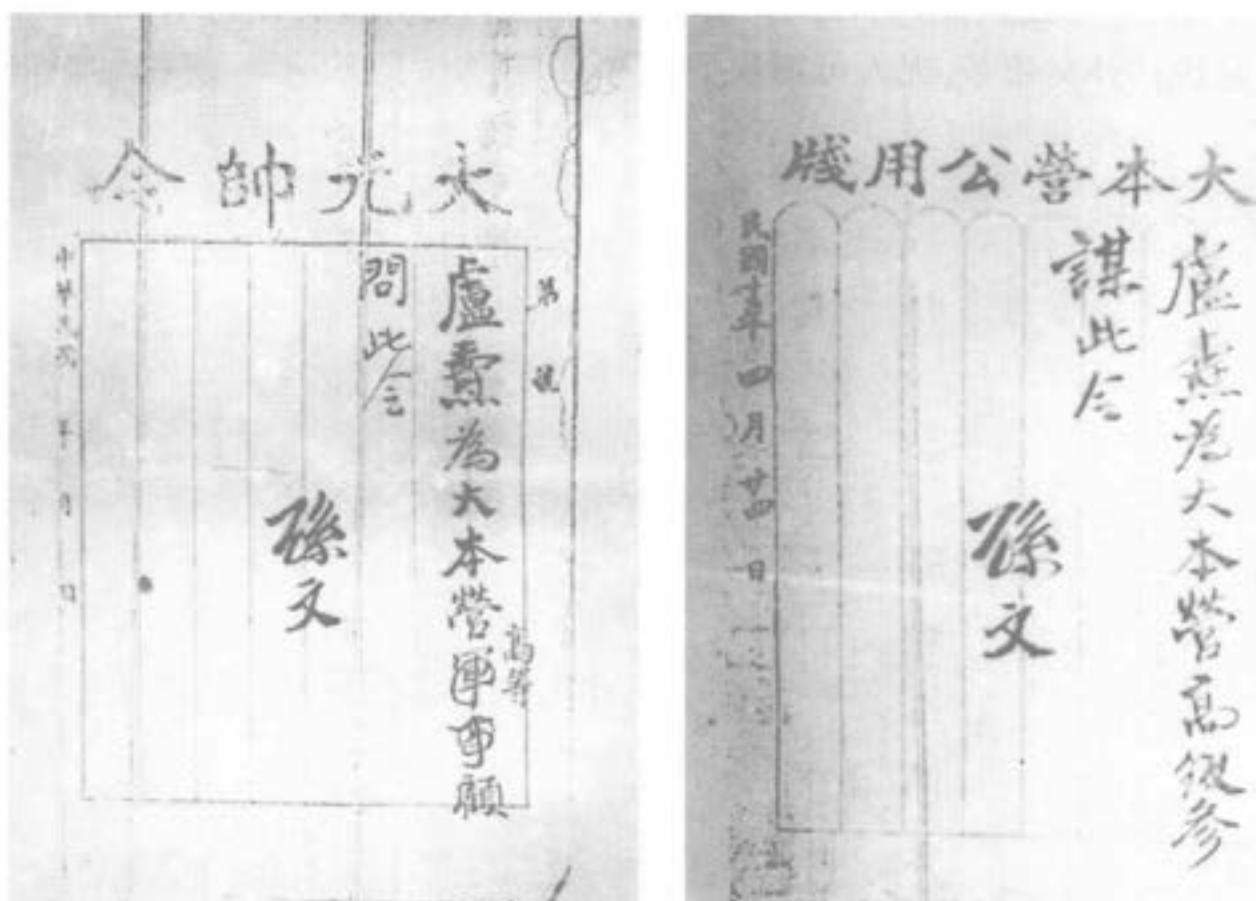
4月14日，沈鸿英在新街发表宣言，诬蔑孙中山“开府称尊，抗拒中央”，宣布就任广东省督理，请孙中山下野，由此正式发动了武装叛乱。沈鸿英率领18000人叛军，集中兵力攻击观音山，以李易标为中路指挥，李根云为左路指挥，沈荣光为右路指挥，另留6000人为预备队，部署在新街、石井之间。

此时，范石生师已由近郊的花县移进广州北郊的大北门、越秀山、小北门及白云山一带的防守。卢焘将军闻讯后，主动前往范师指挥所，协同范一起指挥战斗。在大敌当前，卢、范看到敌众我寡，难以抵御时，遂向刘震寰总司令发去急电请求支援。同时，孙中山也亲自到农业试验场的滇军司令部督师，准备与沈叛军开展大战。

4月16日（农历三月初一）清晨，沈军开始进攻。李易标部围攻白云山麓忠烈祠的滇军范师，李根云、沈荣光两部则奔袭农业试验场滇军总部（有总司令杨希闵和滇两师防守）。16日这一天的白云山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面对沈军的疯狂进攻，卢焘与范石生两个将军都镇定自若地在一一线指挥。滇军官兵也个个英勇，将校以上皆奋不顾身。如第十团长徐德在城北负山督战时，被敌弹打伤；第九团营长杨朝元在率部向前猛冲时身重数弹不幸光荣牺牲；连长田

嘉谟，排长林春生、王圃廷等中弹光荣阵亡；连长王宝珍、张定安、童应扬、田嘉谷，排长胡起华、董朝卿、马文贵等皆负伤。令人欣慰的是，卢焘、范石生将李易标击退，取得了防御作战的胜利后，又接连协助杨总司令一举收复了农业试验场的永胜寺等阵地。18 日午后 3 时，昼夜兼程的刘震寰部韦冠英师赶到广州城北支援卢焘和范石生。在强大的火力攻击下，沈军不得不缴械投降。

取得消灭叛将沈鸿英的第一阶段战役的胜利，孙中山并不满足，他要把沈氏叛军和陈炯明部彻底消灭或赶出广东。4 月 23~30 日，滇桂粤联军近 10 万人，连续作战，乘胜追击，将盘踞在广州城内和近郊的陈炯明残部、沈鸿英叛军等，统统赶出了广州。



1923 年 4 月 24 日，孙中山大元帅给卢焘将军的委任手令

### 8 三次婉拒大本营北伐革命总司令要职

在广州协助范石生击退沈鸿英叛军后，卢焘便打算去香港暂住一段时间。临走时，4月21日，孙中山即委任卢焘将军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北伐革命军总司令（此时蒋介石仅任粤军参谋长），卢焘把委任状来回三次退了回去，不愿就职，并连夜乘船到香港，准备转赴上海。第二天，孙中山又派邹鲁等到港追促卢焘返粤就职。但是卢焘觉得在孙中山左右的人物胡汉民、汪精卫等，对他不信任，意见相左，如自己就任这个总司令的要职，将不利于北伐军大本营的团结统一，因而他一再婉言推辞。4月24日，孙中山又委任卢焘将军为大本营高等顾问和大本营高级参谋时，他才敢于接受这两个闲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卢焘将军曾叹息说：“孙文死了，无人可用我了！”

## 第十七章

## 地道大孝子

## 1 惊悉母逝，几千里外奔丧

卢焘将军自 1922 年 4 月 20 日，离家到独山统率黔滇联军挥师南下广西、广东，至今已整整一年没有回到贵州。早在 1922 年 11 月，他北上奔走几省因铁路工潮滞留长沙时，就收到母信说，8 月 16 日因不慎跌下床，导致中风。当时卢焘就想立即赶回贵阳侍候母亲，但公务在身还未完成，加之滇桂联军还在广西等候南下广东，并到处战火烽烟，使之不能抽身回黔侍母，继续北上履行公务。直到 1923 年春从沪返粤后，就连续收到了老部下胡刚、田凤丹、刘俊三位将军的函电，说其母的病情好转，饮食尚好，这样卢焘误以为母病已好了，甚为安慰。4 月 4 日，在香港时又得田凤丹将军转长子卢慈仪及次女卢慈明的信函，说祖母病情加重，催促回黔。但当时正值沈军叛变，广州面临大战，加之川黔战事又起，卢焘只好先致电贵阳安慰慈母。自 4 月 16 日滇桂联军合攻沈鸿英叛军后，卢焘将军几乎连续三天没有合眼，与范石生等滇军将领，在白云山一线指挥所指挥战斗。直到 4 月 24 日接到孙中山委任状，战事也渐平下来后，卢焘将军才向孙中山请假，买船票与侍从人员经香港（铁路战事已停运，西江水运战事也已停运）转上海顺长江而上。可



卢焘将军母亲莫氏太君

是5月15日刚到汉口，刘少南、杨孝先、张建中三位将军，又转电致湖南的侯厉霜将军转汉口军方代转卢焘，说其母已等不到归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卢焘将军悲痛至极，当即在汉口叩天设灵成孝。5月16日（农历四月初一），在湖北军政领导的关照下，卢焘将军乘

长武快车赴湘回黔奔丧。车到长沙时，湖南省长赵恒惕，亲自来到火车站迎接卢焘将军，并将抄致广州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代转贵州省刘显世省长（袁祖铭回黔又叫刘来接任卢焘）一电及参谋长王承荫、副官长林笠耕等将军促归各电文交给他，这时卢焘才真正知道，其母其实早在农历三月初一就辞世了，当时正是粤中战斗开始之时，到现闻之已整整一个月时间了，真是转眼阴阳两隔啊！随后，赵省长即派一连的兵力及费用，护送卢焘将军，转船经湘西返黔。由于沿途有兵护送，可谓一路绿灯，畅通无阻。5月31日，卢焘将军终于带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来到慈母临时停放的地方，长跪不起，泪水长流。

## 2 守制3年，辞去一切高官，众称“大孝子”

卢焘的母亲去世时，家里孩子都还小（大的仅17岁，小的才3岁多），仅靠夫人覃清德女士是不行的，所以当时其母的后事都是卢焘将军在贵阳的部下和唐继虞督办、刘显世省长等人帮助处理的。卢焘回来后，前来为其母吊丧的省内外军政要员及社会各界人

士，仍然络绎不绝，送来的各种挽联挽词和唁电多达数百条。按照家乡广西宜北的风俗，卢焘将军将在家为慈母戴孝守制三年，而且在守制期间也不能公干或为他人办事等。1923年7月，卢焘将军分别致电孙中山和杨希闵、刘震寰等人，辞去大元帅府大本营高等顾问和高级军事参谋以及滇黔桂联军总司令等职务。在家专心守制，并写出了充满缅怀及孝意的《卢焘哀母启》，现将其抄录如下：

呜呼！焘自去年辞母回桂，因事留滞，经岁未归。吾母病，不及侍汤药；吾母歿，不及视含殓。吾母以民国十二年夏历三月初一日辞世，已阅三月，而焘奔丧始至，憔心泣血，抢地吁天，为痛无纪极矣！焘自有生以来，幸能成立，以与国中诸大君子周旋，不至见弃于人，皆由仰承吾母义方之教，今已不可再聆慈训矣！苍苍者天，从此永为无怙无恃之人。窀穸未安，勉当大事。忆母生平，肝肠寸磔也。母姓莫氏，广西宜北人，系出名门；幼娴礼教，归先考泰留公，勤俭诚朴，和易爱人，家庭内无閴言，邻里尊为矜式。先考怀抱壮志，投笔从戎，恒不忧内顾也。甲申乙酉间，匪乱蔓延，先考为地方官绅所推倚，为军中向导，慨然远行，时焘方岁余，母乃襁负，偕同邑中妇孺，流离避乱于岩穴山菁中，险难荆棘，病困饥寒，千苦万状，无所告语也。丁亥岁，匪乱且平，先考寻得母子匿所，偕归，灰心进取，鹿车共挽，陇亩躬耕，此时四壁萧然，父任耕，母任织，焘未成人，亦能任侍事，先考夜课焘读，焚膏不断，母辄燃藜助之。父母期爱，欲有成立，寸阴分阴，无弗惜者。焘年十二，先考命焘往从姊婿郭礼轩学，人有以年幼独子，不忍远离，劝吾母者，曰：“吾与若父，不欲以溺爱误学龄也。”壬寅秋，先考见背，是冬，姊婿亦将继歿，愈复伶仃孤苦，嗣母为焘娶于覃氏，盖为乡中望族，谓曰：“汝成年，当志四方，内助有媳，勿以为念。”焘于是始泣母出，就济军事，旋迎母于柳州。时清廷失驭，国事日非，焘与同志张铁城、王威洋、陈晚峰、曹清桂、易麦秋诸君，运动革命，所谋辄阻。戊申六月，桂省大府索之急，别母走香港，母挈媳及

幼女孙，旅寄无依，悉倚十指为活。越岁，得友人韦君钦武资助旋里。己酉，焘至滇，考入陆军讲武堂，至辛亥八月毕业，九月反正与援川之役。壬子夏四月，应唐督命至贵阳，秋八月迎母来黔，未一月，援铜仁，不及小憩。癸丑七月，奉命援渝，九月返贵阳，以政府奖金二百元之母，母恐非义之财，焘以实白，且言奉母教无敢妄为。母乃色喜，曰：“汝能如是，吾心慰矣。”冬十月，奉母至滇，甫三日，又有援大理之役，疲于奔命，年中无两月聚者。甲寅春乃辞职，奉母旋里，取道越南、香港、广州、柳州、未抵里门，奉刘督急召，五月乃至贵阳。乙卯冬，帝制事起，同志多反对，焘以白母，母曰：“筹安会，召乱也，志士反对，义举也。”焘乃与王君电轮、李君云鹄、袁君鼎卿、胡君蕴山，合谋义举。将奉命东下，拟送母复旋里，母不，喟然：“广西继起反对，又安归乎？”已而果然，帝制亦旋消灭，战事解决。丙辰秋，迎母于铜仁。戊午四月，奉命援湘，己未八月迎母于辰州。庚申四月，奉命援渝，又奉母援湘。己未八月迎母于辰州。庚申四月，奉命援渝，又奉母寄寓铜仁。是年九月，总黔军回黔，冬月乃自铜仁迎母入省后，家人骨肉始克团聚。中多变故，定省仍疏，或至上廬，母忧。且喜有孙男万金、万木、孙女庆槐、柳槐、贵定、铜仁、铜重、贵筑，绕膝承欢，含饴为乐，聊慰迟暮。而母每操作如昔，一以勤俭为本，并欲垂为家法经言，恒其德贞，吾母诚有之也。壬戌三月，定黔军兴，焘以母命，力避成祸，退而闭门侍母。无何滇军入桂，有讨贼之举，假道贵阳，坚约以偕，且以时局大义相责难，值桂军将领函电交至，迎焘回桂，而定黔军袁总指挥复加援助，为黔为乡为友，遂有不能不出之势，夏历四月二十日别母而行。呜呼！此行遂与吾母永诀，竟不得迎母还乡，焘为名教罪人，通于天矣。是役也，奔驰于桂粤湘鄂京沪间，事以愿违，不得要领，思母之心，一日数转。去冬十一月在湘，始得母函，谓八月十六日跌床下，致中风，亟返黔侍疾，属以牵师羁縻，加以烽烟满地，身欲奋飞，卒不可得，度日如岁，迄于今春，中间迭得胡君寿山、田君凤丹、刘君俊三各函电，言母病状，肝肠寸摧。忽接次女一函，言祖母饮食

尚好，差为一慰。三月十九，在香港得田君凤丹转到内子及次女函，催归又急，中心如碎。二十日买舟沂汉，时川黔战事既起，跬步荆棘，乃先电慰吾母。此电已不能达母之目矣！是月三十日，刘君少南、杨君孝先，张君建中转到湘中，侯君厉霜来电，吾母竟不及待焘归而长逝矣！虽得噩耗，未得时日刻，即叩天设灵成服。四月初一渡江，乘长武快车赴湘回黔奔丧，长沙赵省长炎午傀赠，派兵沿途护送，并抄来致广州滇军杨总司令绍基代转黔刘省长周公一电及参谋长王君承旗、副官长林君笠耕促归各电至，是始确知吾母于三月一日弃世。呜呼！吾母辞世之日，正粤中战斗开始之时，距焘闻噩耗已及一月，战祸相寻，交通多梗，各方知爱诸公之函电及家属之音问动，辗转达涉及旬月，道途困人，悲伤曷极已矣。焘今长为无母之人矣。今遵遗命，以时方多故，非归葬之日，就贵阳择地浅厝。谨述吾母生平，困苦行略，及所以教焘而望焘者，乃在致力国家，而焘不克肖，无以承母志慰英灵也。终天之痛，何日已哉！倘蒙当世君子，鸿博健华，锡之铭诔，以彰母德而光泉壤，殮存之感，金石不渝矣。苦块之中，语无论次，伏乞矜鉴，棘人卢焘泣血稽颡。

### 3 滇黔军阀兵戎相见，大孝子从中斡旋

袁祖铭得到北洋政府的支持，与刘显世联合定黔成功之后，又得到当时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暗示，将委以西南重任。自民国以来，唐继尧一向以贵州为云南的附庸，他看到袁祖铭踌躇满志，有独霸西南的野心，心怀忌恨。再加上刘显世受到袁祖铭的排挤，在唐继尧的面前效申包胥秦庭之哭，希望唐继尧协助他回黔复辟。于是唐继尧施展狡计，在袁祖铭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令其弟唐继虞率滇军张汝骥、吴学显部，于1923年春，突然大举入黔。袁祖铭仓猝调兵堵击，一再溃败，只好退往川南，并自任黔军总司令。唐继虞进驻贵阳后，自任贵州督办兼省长。由于刘显世对唐继尧，历来紧跟，亦步

亦趋，唐认为刘是他可靠的附庸，不得不加以抚慰，而且让刘主黔，他仍是太上皇。因此，唐继尧就动员唐继虞把省长一职让给了刘显世。袁祖铭退到四川后继续得到吴佩孚的支助。他统领援川各军，并联合“反熊”的川军，攻下成都，把熊克武驱逐出川。吴佩孚以袁祖铭倒熊有功，特授予陆军上将衔，于是袁祖铭声威大震。但是吴佩孚又顾虑袁祖铭的势力继续扩大之后难以控制，便把他调离成都，安排为川黔边督办，利用他去牵制滇军。袁祖铭自己认为威高势大，亟欲向外发展。首先，他要把滇军驱逐出黔境，以报鹊巢鸠占之仇，并免后顾之忧。于是，他在重庆把黔军扩编为3个师，分别由王天培、彭汉章、周西成担任师长。另外设3个独立旅、1个补充旅和2个警卫团，兵力达5万之众。与此同时，吴佩孚又扶植杨森回川主掌军权。杨森当然不容袁祖铭盘踞川南，他联合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等反袁，同时煽动川南各地团防阻塞给养，弄得黔军给养困难，军饷拮据，十分狼狈。

1924年10月，袁祖铭在四川难以立足，就在重庆组织黔军五路回攻贵阳，要驱逐滇军唐继虞（任贵州督办，云南人，唐继尧之弟）。这也是历史上袁祖铭实行的第三次“定黔”行动。当时形势非常紧张，战争又如山雨欲来，人心惶惶。地方各界人士纷纷前来找卢焘商量，请他出来周旋，谋求和平解决，以免发生战乱，百姓遭殃。卢焘虽然还在家中守制期间，但是为了地方人民免受灾祸，当即义不容辞，愿为地方安危排难而奔走。他一方面说服唐继虞让出黔政，率师北伐，声援浙江卢永祥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支持南方政府。卢焘对唐说：“黔军客蜀中，环境艰苦，不忘桑梓，势所必然，蓄意进兵，其锋方锐，兵法所谓兵哀者胜，此殆似之。且君昆仲先后建节于黔，固已无异桐乡，宜留去思，以传达千古，今如周旋鞭弭，势必荼毒生灵，揆诸仁人君之心，何忍出此！为君借箸以等，亟宜率师北伐，声援卢何，则丰功震于海内，大名垂于汗青，以此易彼，得失显然，唯君图之！”唐继虞听到卢焘的陈述后，考虑再三，最后终于同意让出黔政。于

是，卢焘立即电告袁祖铭，定于某日起程赴渝会商。

当时乌江以北，从刀把水、遵义到桐梓一带为股匪占据活动地域，一般商旅都裹足不前，视为畏途。而卢焘却不怕艰险，由贵阳坐滑杆凉轿用两班轿夫昼夜兼程，七天到达重庆。袁祖铭等感到惊奇，为何来得这样快速（按一般行程，要走两个星期才能到达重庆）？当时卢焘坐轿经遵义过匪区时，当地匪首闻听是卢焘过路，不但不打扰，反而一路伙食招待送出匪区。这位匪首就是后来周西成主政贵州时代招安来的曹天泉旅长。卢焘到重庆后，诚挚地告诉袁祖铭说：“我已说服了唐继虞让出黔政，你就不必动用武力。”这样袁也高兴。因此，袁和在川的黔军将领都称卢焘为和平使者。当年冬，黔军回筑已到离城30公里的沙子哨，而滇军还在贵阳城里未全部开走，形势又紧张起来，战争一触即发。卢焘又亲赴沙子哨与黔军商量，说服他们等滇军走后再入城。而滇军唐继虞还想要城里各界筹给几万银元才肯走出。后来由卢焘与邮政局长张伟卿担保，叫滇军先出城到独山后再把钱送去。唐就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前走出贵阳。第二天清早黔军第一师师长彭汉章即率领黔军才陆续入城维持治安。卢焘又到城北大小关一带监视黔军进城情况，终于顺利地解决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战祸兵灾。唐继虞到独山后还打电报来要钱，卢焘借故推诿了事。因此，贵阳居民和黔北一带群众都称卢焘为“活菩萨”。后来，广西的白崇禧对卢焘说，在贵州人们都称你为活菩萨，这不容易啊！

唐继虞率滇军从独山经荔波进入广西宜北、思恩，到处掳掠，逼得老百姓四处逃难躲藏，当地人称为“红头军之乱”。滇军到宜北时，老百姓怕被抢劫，多把财物搬到山洞中去，滇军就烧辣椒熏洞，后来知道宜北是卢焘将军的家乡，唐继虞才命令部队撤走，不准骚扰。

1925年元月，袁祖铭在重庆遥控下，组织成立了“贵州政务委员会”（相当于省政府），委任卢焘将军为委员长，彭汉章掌握军事。卢焘将军深知袁祖铭的为人，于是拒绝就任，推丁宜中代理，但丁

仅做了三个月就出走四川，政务委员会至此告终。

#### 4 亲率黔军两旅师次独山，周西成省长赠地修建“慈母园”

1924年9月11日，孙中山为了促使唐继尧参加北伐，在广州召集的政务军事联席会议上，推举唐继尧为副元帅，并电促唐就职，率师北伐。唐根本就不信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再次拒绝就任副元帅职务。但是，对两广染指之心的恶性膨胀，促使他在云南大力扩军，组织“建国联军”，自封“联帅”。同时，开始与粤军陈炯明、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相勾结，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府。

孙中山逝世后，唐继尧认为自己担任国民党领袖，成为“未来的中国总统”的时机已到，竟于3月18日在云南自行通电，宣布就任“副元帅”。企图以替补出缺之办法，取孙而代之。接着，唐继尧以解决驻粤滇军为借口，发兵东侵。

唐继尧东侵广州必经广西。于是他乘桂境李宗仁、黄绍竑部与沈鸿英军队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派员至桂向李、黄二人游说，要求借道，并允以四百万两鸦片烟土作为酬佣。李、黄二人深知唐之野心，更怕上当受骗，但对能否挡住唐部进攻没有把握。因此，在对唐是迎是拒的问题上采取了拖延应付的态度。他们表面上与唐的使者虚与委蛇，暗地里急电广州大元帅府，要求派大军支援。

唐氏侵粤入桂的部队以建国滇军的名义分为两路，唐继虞为第一路总指挥，约三万人，号称五万人，由贵州之榕江，向桂柳边境进发；第二路总指挥龙云，约三万五千人，亦号称五万人，分由百色、龙州向南宁进发。他们的计划是两路大军同时占领南宁、柳州后，会师下广东。李、黄用省议会及民众团体的名义去电遏止，唐继尧以“本帅大计已定，师行在途，不便中止”等语回电遏绝，并且加快了进军速度。

在广州坐镇大本营的代帅胡汉民，见形势危急，即成立旨在拒唐的“援桂联军”。援桂联军以范石生为第一路司令，李宗仁为第二路司令，黄绍竑为第三路司令，李济深为第四路司令。

与杨希闵等滇军将领不同，范石生对广州革命政府忠心不二，况且讨伐唐继尧，打回云南去也是他的夙愿。接到大本营命令，范石生立即行动，率领全军4个旅共约一万五千人出发西上。其先头部队数千人由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杨蓁率领，于三月上旬从水路至梧州，再乘船西进，抵达贵县，同桂军黄绍竑部队会合。在贵县，范石生和李、黄二人会商了作战计划，并且由范石生起草，以李宗仁、黄绍竑、范石生等人名义，联名发出声讨唐继尧的通电。

面对孙中山逝世后唐继尧的野心膨胀，滇桂又要爆发战争，广西家乡人民又将遭受战祸的紧急形势，卢焘将军又坐不住了。1925年3月底，应广州政府的电邀，卢焘将军立马取道川汉赴粤，与胡汉民代帅、总司令谭廷闿（祖庵）等面商援桂事宜。随后赶赴广西梧州，与黄绍竑会合到南宁八塘，与李宗仁督办等商议，如何对付唐氏兄弟及龙云事宜，并答应及时返黔准备率兵援桂。1925年5月，卢焘将军经与时驻成都的黔军总司令袁祖铭、驻贵阳的贵州省长彭汉章、驻重庆的贵州督办王天培、驻赤水的贵州会办周西成等人商量，亲自从贵阳等地，借调黔军两旅约7000余人，来到独山集结编整待命，并亲自担任贵州援桂军总司令兼总指挥，准备率部南下广西合围滇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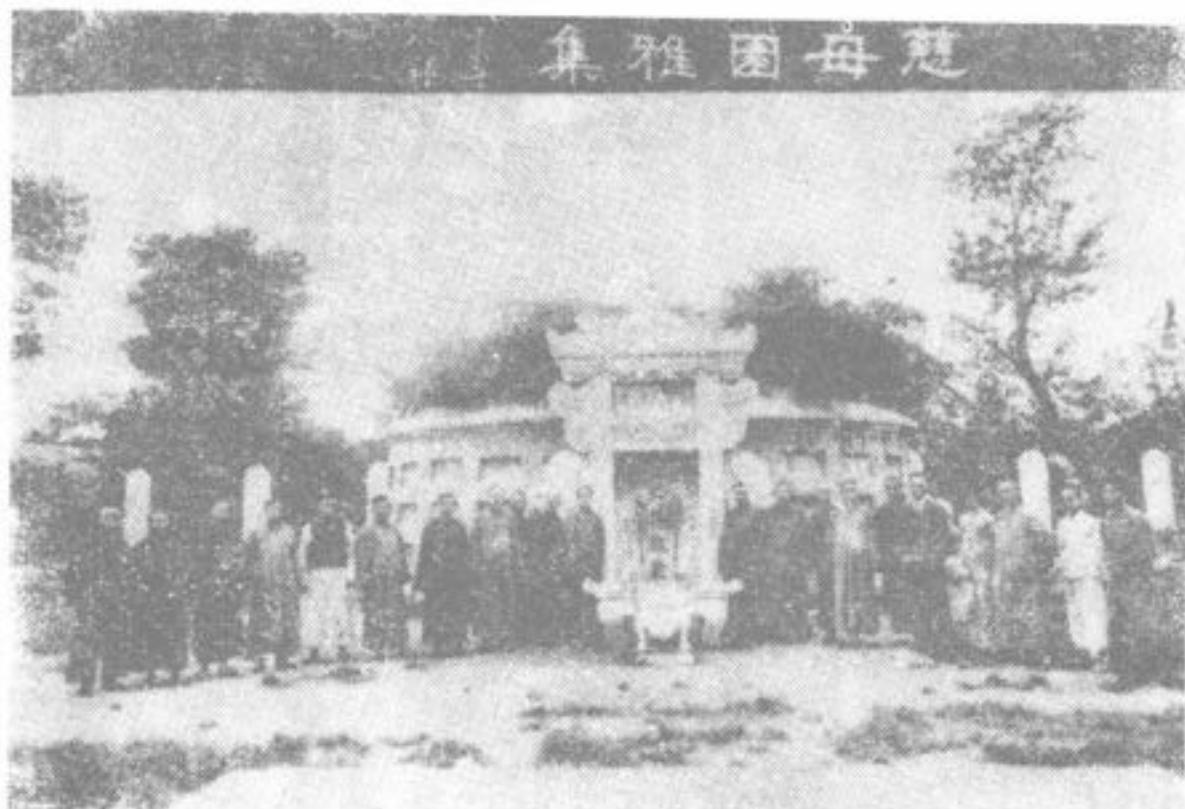
当时龙云的部队已占南宁，而唐继虞的部队尚逗留在贵州，未入广西，两军会合实际的时间还需一个多月。这样就为联军能以劣势兵力各个击破唐军提供了可能。联军的总方略是先在广西境内分别打败龙云和唐继虞，然后范石生军乘胜回云南驱逐唐继尧。其作战计划是，首先歼灭龙云在宾阳附近高田圩的部队，然后围攻南宁，将其全歼。黄绍竑率一部和范石生军担任这方面的攻击任务，李宗仁担任柳州方面的防御任务，白崇禧则迅速解决沈鸿英残余部

队，然后部队向柳州集中。

按此计划，范石生率领全军由贵县经覃塘、黎塘、新圩越过南宁、宾阳大路南侧的高山，向南宁、宾阳大路（那时尚未有公路）的六塘、五塘前进，任务是截断宾阳附近滇军的后路和阻止南宁滇军的增援。黄绍竑部伍廷潭 1 个团、俞作柏 2 个团和邓竹林、罗浩忠两个多营共四千多人，向宾阳展开正面进攻。

滇、桂两军开战不及一月，滇军就分别在南宁、宾阳、柳州等战场节节败退，以唐氏兄弟大败而告终。6 月中旬，正当卢焘将军即将率领黔军开拔广西前线时，突然接到广州胡代帅急电，说刘、杨叛变之事已解决，援桂之师可移作援滇。之后，又接李宗仁、黄绍竑急电，亦云唐、龙已崩溃，所有援桂之军，请即援滇等语。经了解，粤桂战事已平，滇无可援之必要，于是卢焘将军遂通电凯旋。

话说卢焘在贵阳为慈母守灵 100 天后，即将慈母浅殡于六广门外普昭寺背后，打算 3 年后迁回广西宜北老家安葬，并想举家离开贵州回广西生活。1926 年 5 月，周西成（贵州桐梓人）接彭汉章任贵州省长，他知道卢焘的这个打算以后，为了挽留卢焘将军在贵州定居，并能协助他主持贵州军政大业（周系卢的老部下，他十分敬佩卢的为人和高超的军政才能），他通过省府常务会讨论，将大西门外金锁桥侧近六亩地赠送给卢焘作为迁葬慈母的墓地，并吹嘘这块地的风水很好。可是，有一位阴阳先生则说这块地不好，一眼望去正是城墙垛口，犯“锯子煞”。此话传到周西成耳里，周西成十分气愤，便将这位阴阳先生予以严惩。周西成的用意很明白，如果卢焘将母亲葬在贵阳，他就可以留在贵阳，今后周西成就可以得到卢焘的协助。卢焘很重义气，他不信阴阳先生那一套，同意将母亲安葬于周西成的赠地，并起名“慈母园”，意为不忘慈母的养育之恩。坟墓修建前后近两年时间，墓高 5 米，直径 6 米，墓碑两侧，各有石凳数十张，石碑林共 81 面，每块石碑均为贵州全省共 81 个县的各县县长所送，还有石马、石狮等奇异地兽数种。坟墓采用省内外友



1930年1月，卢焘将军与广西省长俞作柏派来贵州联系工作的广西代表合影于慈母园卢母墓前

好的军政要人、社会名人的悼唁、电唁、挽诗、挽词近百条刻就的小石碑围砌而成。数十面碑林就刻着卢焘的《哀母启》以序排列。“慈母园”大门对联和墓志铭是曾经书写北京的“颐和园”三字的70高龄的我国大书法家严寅亮(贵州思南县人)先生所写。“慈母园”大门的楹联是：“春晖寸草夜郎道，明月梅花慈母园。”曾任贵州省督军、都督、省长的刘显世和曾任滇军军长、贵州省督办兼省长的唐继虞两人也分别为卢焘母亲莫太夫人像题了词：

宜北名家，粤西望族，习礼明诗，粼厚姻睦，画获遗风，卷芳施躅，教子成名，荷天宠禄，宝婺星沉，究檐巷哭，绣像铸金，其人如玉。

侍生刘显世敬题。

有子克孝，母慈可知，有子克仁，母贤可知，我闻卢母，既贤且慈，宜其有子，仁孝冠时穆穆。母仪昭昭，壶范瞻拜遗容，为之作赞。  
世愚侄唐继虞敬题。

“慈母园”的规模和气势，据说在当时的贵州是少见的。后来，卢焘在慈母园内修建了一栋三间两层的楼房，以便留人看守母亲坟墓。房后青松翠柏，房前河水环绕，风景优美，且近城边，进出方便。卢焘将军遇害后，也葬于“慈母园”。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由于城区扩大，贵阳市人民政府就将卢焘母亲及卢焘烈士的陵墓一起迁移到城西十多公里（往遵义公路边）的老阳关，修建了“卢氏陵园”（也称“卢焘烈士陵园”），供后人瞻仰凭吊。

## 第十八章

## 致力黔桂两省交通建设

## 1 巧支袁祖铭北伐，为建设贵州奠定基础

1925年元月，当时贵州驻军颇多，卢焘向贵州省长彭汉章建议，以工兵筑路，开发黔桂间的公路交通。彭表示同意，并由卢焘与广西黄绍竑（会办）、李宗仁（督办）联系。广西同意修建由柳州至宜山直达南丹六寨公路，贵州修由贵阳至独山麻尾公路与广西衔接。彭汉章曾筹集鸦片四百担运到广州、梧州出售，作为开办公路经费。贵州成立路政督办署，由卢焘负责一切路政事宜。当卢焘前往广西交涉各项有关公路事务时，彭汉章一反前议，把所筹集的鸦片全部运往湖南洪江出售。因此，贵州路政便胎死腹中。

1926年，彭汉章与周西成矛盾日深，结果被迫出走湖南，另谋出路。周西成主掌了贵州军政大权以后，卢焘对周西成的看法是少壮有为，虽然头脑封建，但有建设地方事业的决心。因此，卢焘有心从旁协助周，望能振兴贵州。周对卢则视为长辈，极为尊重，除了生活上特别关照卢之外，还聘卢为省军政顾问。凡军政要事，周常找卢商量。不久，周西成接受广东革命政府领导，就任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这时，袁祖铭在四川各军联合驱逐客军的情况下，被迫撤回贵阳。周西成觉得袁带兵回黔，有碍于巩固他的地位，也

增加了贵州的负担，便与卢焘商量，如何使袁祖铭早出贵州，以除后患。卢焘说：“袁祖铭野心大，善投机，一心想向外发展，他不会安心蛰伏于贵州。”于是周西成故意对袁毕恭毕敬，特别招待，不致反感。卢焘对袁虚表理解同情，希望他出师北伐，驰骋中原，创建大业。卢说：“鼎卿，你应在这时投向广东革命政府参加北伐才是出路……”袁乐意地说：“好！我做总司令，你做副总司令。”卢焘答应得很爽快，表示愿意与袁并肩战斗，共同北伐。但谈到成行时间卢焘则借故推诿说：“你先走一步，我后来就是。”后来周西成在贵阳公园孟草亭设宴招待袁祖铭及部将，以表饯行。散席后，周西成特约袁祖铭和卢焘三人在亭内交谈。袁、周卧床抽大烟吞云吐雾，卢焘一向不抽大烟，坐于床侧。他们高谈阔论，谈笑风生。周西成故意把话题转到星相学上来。周首先观看袁的面相说：“鼎公是国家大器之相，应领军掌握中原。”周又转眼看看卢焘的额头说：“寿公额部两边此时驿马不明边地暗，目前不宜远行。”袁也应着说：“对！对！寿慈后一步来可也。”周借谈星相，投其所欲，使袁不致怀疑。

随后，袁祖铭以参加北伐为名，任左翼军总指挥，辖第九军、第十军向湘西进军。但是，当时吴佩孚还有相当实力，袁祖铭犹存观望之心，对有关北伐的作战计划，他按兵不动，不积极执行。在蒋介石、唐生智的密谋下，1927年1月30日（即旧历新年除夕），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根据唐生智的部署，在常德以“团年宴叙”为名，突然捕杀了袁祖铭及其参谋长朱崧、第二路军总指挥兼第四师师长何厚光。当时的具体情节是：唐生智令其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设鸿门宴宴请袁祖铭，周斓怕引起袁怀疑决定以常德商会会长曾春轩出面以请年酒为名宴请。1927年1月27日，正当袁正与同僚和部属在司令部打麻将的时候，就接到常德商会会长曾春轩的请柬，请柬云：

黔军袁总司令麾下：

春节即将来临，琼英傲雪，山海欢腾！民得安康，仰仗神兵东来；国有宁日，还期王师之北上。衡岳峰高，不敌凌云剑气；洞庭水阔，难阻怒马飞踢。感佩之余，五内萧然！值此良辰佳节，敝会略备菲酌，欲与之欢庆新春，聊表我会拥军之情。敬请袁总司令及同僚务必赏光，届时专登辕门，恭迎大驾，幸勿见却！

常德商会会长曾春轩 谨拜

当时，袁接到请柬后，就与同僚们商量，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此时袁的参谋长朱崧提醒袁：恐怕是鸿门宴，不去为好。但是，袁不以为然，自以为重兵在手的他轻蔑地说：“他敢动我，我踏平他。”于是，1月30日下午，在常德商会会长曾春轩亲临黔军总司令部面请袁等人时，袁仅带副军长何厚光、参谋长朱崧和数十名卫士前往赴宴。果然，一出现代版的鸿门宴正等待着他们，当晚袁等一行人，就在宴会上被周斓所设伏兵乱枪射杀，无一生还。袁祖铭毙命时年仅38岁。至此，曾经纵横西南10多年，显赫一时的西南军阀袁祖铭就像一颗匆匆而过的流星瞬间泯灭了，后人有诗感叹曰：

川黔鏖战苦相煎，十载功名付硝烟。  
不是生来无帝相，只缘路窄不通天。

2月5日，唐生智又根据蒋介石密令，在汉口以“统率无方”为词，将前来拜谒的彭汉章逮捕，关押至8月12日处死。此乃后话。

袁祖铭出走湖南之后，周西成很想干一番事情，对内主张“廉洁政治”，整顿治安，创办一些实业。对外，想从广西打开一条出路。卢焘向周西成提出建设贵州公路事业的具体方案，并愿奔走两广联系，争取两广当局对贵州各项建设的支援。

## 2 贵州的第一条公路和第一辆汽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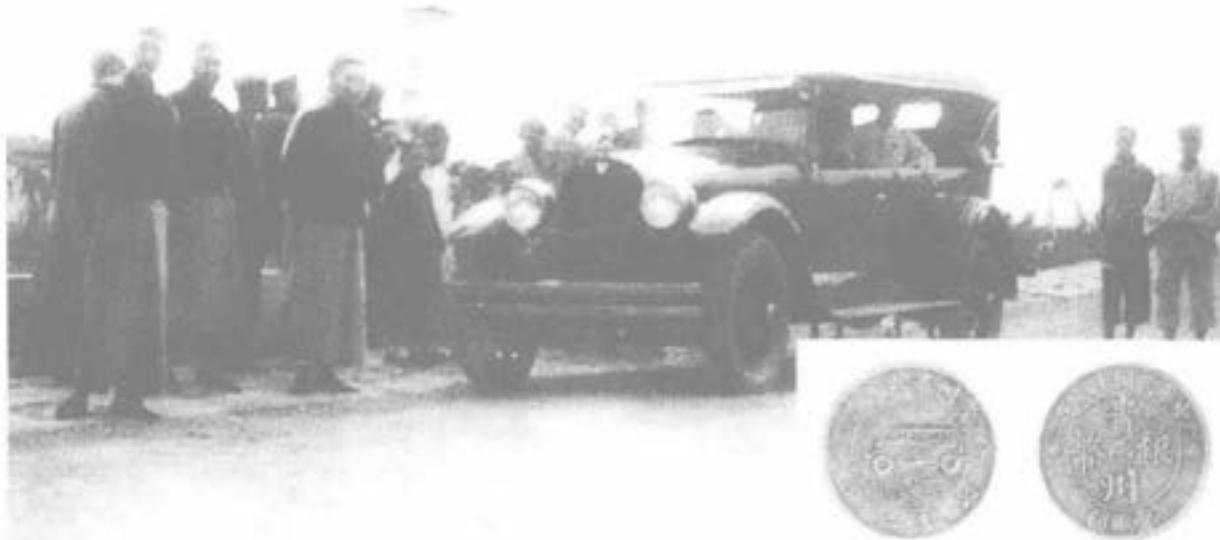
听到卢焘提出修路的方案后，周西成大为赞同卢焘的建议和方案，便于 1926 年 8 月下令修建长 20 余华里、宽 3 丈的贵阳环城公路，这是贵州有公路之始，也是贵州的第一条公路。当时还发动全城中学生参加筑路，每人每日发小洋一角作为奖励金。

贵阳开始修筑公路前后，一般人不知公路之用途何在，有反对的，也有讥讽的。卢焘反复考虑：得想个办法首先买一辆汽车运到贵阳来示范，以便打开人们的眼界，使大家知道修建公路是为通行快速的汽车，有利于交通运输。1927 年春，卢焘亲赴香港买了一辆福特牌七座篷汽车返梧州。当时在港友人都感到奇怪，贵州没有公路，汽车怎样开得进去？皆笑卢焘是办蠢事。但是卢并不动摇，他到广州聘请一个汽车司机叫曹孝端，广东人，李济深的汽车司机。卢到广州，李常将自己的专车供其使用，卢看到曹孝端驾驶技术熟练，便征求李济深的同意，暂时借用曹司机随车到贵阳，并负责培训新的司机。卢焘和曹孝端一路把汽车从梧州用船运到柳州，又由柳州转运到贵州榕江，然后用两只小船搭拼起来装上汽车运到三合县（今三都县）。当航船快到三合时，夜间突然大雨不止，河水猛涨丈余，载装汽车的两只小船被水浪涌进船内而沉下江底。当天夜里，卢焘通宵不眠，他观察船桅杆没有移动，知道船车还在江底原地。便出赏百元大洋，请熟悉水性的船工潜入水底探明汽车情况。数人下水几度反复同激流搏斗，终于得知汽车仍在船上。两日后，雨霁天晴，河水下降。卢焘又出赏百元大洋，奖赏船工把沉船连车拉出水面。然后把汽车拆散，从三合开始用人力挑、抬，辗转达十多天才运到贵阳。以大西门外紫林庵内作为停放汽车场所。当汽车司机把汽车全部复装完毕后，试车不着火，经过几天反复检查，都查不出毛病来，汽车还是不能启动。

当时有贵阳电厂技术员黄福成(广东人)来观看汽车，并协助曹孝端一起检查汽车发动机的毛病所在。当黄福成怀疑电瓶线路上有问题时，问曹，但曹对汽车修理方面并未精通，也说不清楚。黄福成将电瓶线路纠正之后，叫曹试车，曹上车踩启动器，马达便轰隆隆地响起来，汽车可以开动了。当场观众莫不惊喜欢呼。他们立即去请来卢焘，并将汽车开到省府门口，请周西成上车，沿着环城公路转了一圈。当时周西成对曹教端和黄福成二人大为赞赏，每人给奖金大洋一百元。为了扩大宣传效应，周西成还决定于3月上旬在新建的环城公路上，举行了一次汽车行驶演示活动。同时为确保安全，周西成还特别颁布了一张布告：“汽车如老虎，莫走路当中，若走当中路，死了无处告。”那时正值贵阳开运动会，汽车开到团坡运动场上去转了几圈，全场轰动。城里居民奔走相告，家家户户扶老携幼，上街观看汽车飞跑。当时前来观看演示活动的各界群众将10多里长的环城公路两旁围得水泄不通，欢呼声此起彼伏，轰动全城。这是贵阳有汽车之始，也是贵州的第一辆汽车。

接着全省动员，分头修建贵阳南至独山南寨，西至安顺，北至遵义桐梓3条主干公路。经过两年多的努力，3条公路建设均初具

卢焘将军与周西成省长在贵州省第一辆汽车试车现场视察



规模。在此期间,广西方面也已修通从柳州至河池的公路。

1927年,周西成下令将路政局扩大为路政总局,直隶省政府。并令各县成立路政分局,开始修筑长途公路。规定凡“公路经过地方,由路政分局督饬各区,征集全县民工分段负责修筑,限期完成”。“工程事宜,由路政厅指派工程员分赴各县指导工作,并设置巡员往复巡察,督促进行。”“并且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参加筑路,命令各地驻军上路做工,还采取以工代赈办法,让灾民参加筑路。筑路经费由省金库负责。”“一时雷厉风行,勘测裁道,路工塞途。”先后动工的线路有:贵赤线,自贵阳经乌江、遵义、桐梓、温水、土城而达赤水与合江的轮运相接,全长400余公里,1927年1月11日动工,次年4月27日遵义北至桐梓的公路通车,通车里程220.61公里;贵西路,自贵阳经清镇、平坝、安顺、镇宁、关岭、安南、普安、盘县而达云南平彝,全长约400余公里,民国十六年3月开工,次年1月通车安顺,长154.46公里;贵南路,自贵阳经龙里、贵定、都匀、独山而达麻尾入广西南丹,全长334.67公里,1928年春开工。自贵阳至甘粑哨一段,长121.5公里。此外,陆家桥经麻哈(今麻江)至下司的陆下线约40公里,于民国十七年春动工,当年12月通车;贵阳至定番(今惠水)的贵番支线,全长约50公里,民国十八年春动工,周西成在世时,路基修至青岩;由清镇经黔西、大定(今大方县)至毕节的清华支线,全长约280公里,于1928年动工,周西成在世时仅修了部分路基。

从1926年8月~1930年6月,在近四年的时间内,“共计修的马路有两千余里,修筑桥梁大桥十座,小桥有一百四十余座”,周西成在世时,全省通车公路约一千里。据当时代理运输处长吕济的呈文,1930年3月28日,全省共有客车2辆(城镇汽车),货车6辆(长途汽车)。客车专作公车使用,货车于安顺、乌江等地营业,并开始筹组“贵州先导汽车运输公司”。

1929年5月22日,蒋介石因忌恨周西成与桂系联合,在挑起

蒋桂战争的同时,指使黔军四十三军军长李燊与滇军龙云合谋,以两师兵力进攻贵阳。周西成在奋力抗击李燊、龙云的联合进攻中,阵亡于镇宁县境内的坝陵桥。李燊夺取了贵州政权,但是,他坐镇仅有18天,便被毛光翔赶走了。周西成一死,贵州的公路建设也就暂时停止了。

鉴于周西成上台后,为贵州人民所作出的贡献,1930年元月20日,贵州各县代表和南京政府代表在周的家乡桐梓县为他举行了公祭和葬礼,万人上山为周西成悼念。卢焘将军悼唁周西成的挽联是:

(上联)千古河山等一枰归黑白分明君复何憾,  
(下联)百城坊表无双谱回忆艰难故旧我遐心。

为了纪念周西成,卢焘将军与平刚、华之鸿、桂百铸等带头筹资,为周西成塑立铜像。6月1日,周西成铜像在贵阳北门外黑石头建成,后来被称为铜像台。

1931年春,卢焘赴桂督促广西尽快修建丹(南丹六寨)池(河池)公路,以衔接已通车的贵阳至独山麻尾公路,连接大西南。次年秋,卢焘将年初因帮助云南烟土过境云南商人特奖的2万银元,分文不留,全数送给广西省政府(路政局长莫树杰经收)作为建设丹池公路经费。李燊被赶出贵州后,毛光翔继任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1932年冬,毛光翔与副军长王家烈,为争夺贵州大权矛盾加剧,终至兵戎相见。结果,毛光翔被赶走,王家烈继任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上任后,贵州与广西继续合作,终于完成了黔桂公路的建设。1933年秋,黔桂公路终于在黔桂交界处麻尾隆重举行了全线通车典礼仪式,出席仪式的两省最高领导李宗仁、白崇禧、王家烈及国民政府西南政委会特派川黔桂实业视察专员、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代表胡畏三中将等,都称卢焘是“西南交通建设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在通车典礼仪式上,胡畏三还郑重写下了“西南动脉”的特别题词。后来,为了纪念黔桂两省人民的友谊,独山、南丹两县政府在黔桂公路的交界处,树立了四块碑记:一是黔桂公路标志碑;二是胡畏三题字碑;三是《会勘沟通黔桂交界马路碑记》,记录当时为修筑黔桂公路,黔桂两省公路当局有关官员及技术人员会勘之事;四是黔省公路局局长熊杰(冠英)为黔桂公路竣工撰写的志序碑。此外,公路北侧的鲤鱼山上还刻有王家烈题写“界锁黔南”、南侧的龟山上刻有李宗仁题写“康庄利民”共8个遥相呼应的摩崖大字。

话说丹池公路建成后,莫树杰建议南丹六寨车站起名为“寿慈车站”,以纪念卢焘将军为修建黔桂公路所作出的贡献。卢焘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黔桂公路是千千万万黔桂人民所流的血汗,甚至牺牲了不少的生命而建成的,本人虽出了一点力,但微不足



卢焘将军(左三)与周西成省长(左五)到贵阳环城公路工地视察

道。若车站以卢某命名，岂不是贪千万人民之功为己功，怎能抬头见人？”最后，当地政府只好仍以“六寨”原名，命名六寨车站。

### 3 中国大西南铁路的第一个筹建者

据 2006 年 7 月 25 日《人民铁道报》刊载《卢焘的铁路梦》文章记载：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集中力量打内战。西南各省抗日呼声不绝于耳。卢焘将军又主张建设西南铁路，开发大西南，使西南成为抗日大后方。他建议云贵出烟土、两广出钱，运烟土到香港，两年可获利 5000 万港元，建立西南银行，筹备铁路基金。于是，卢焘又奔走两广、云贵，分别同陈济棠、李宗仁、王家烈、龙云等四省首脑商量之后，又赴香港通过汇丰银行大班（经理）何世光的介绍，与加拿大铁路商人接洽，当时加商有几千英里铁路材料可以投资西南铁路线路，拟从当时的广东钦州龙门港为起点，经广西南宁、柳州至贵阳到达云南昆明。加商派人协助两广首先测绘钦州龙门港为起点码头。铁路筹建了一年多，突然遭到广东陈济棠反对，认为铁路以钦州为起点，经南宁，方便了广西。他主张改从三水为起点，经梧州到柳州，这样广东就可以控制广西。由于两广意见分歧，各有打算，铁路筹建工作终于停顿下来。与此同时，卢焘并不灰心，于 1935 年秋还亲赴南京分别找到副委员长冯玉祥、国防部长何应钦、交通部长王伯群等老朋友、老部下，陈述建设西南铁路重要性，并请求他们去说服蒋介石筹款建设西南铁路。可是蒋非常冷淡地说：“你们想哪里去了，眼下消灭共匪的资金且不够，还搞什么铁路！”这样，卢焘将军为西南铁路建设筹建近两年，奔走几个省，结果徒劳无功。但在中国历史上，他毕竟已经成为中国大西南铁路的第一个筹建者并永载史册。

如果时间倒流，卢焘将军能够看到他的梦想——西南铁路网络如今已经变成现实时，他一定会欣慰地微笑。

## 第十九章

### 三度赴邕调停,化解蒋桂“六一”矛盾

#### 1 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三封紧急电报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并指使汉奸在冀东和察哈尔、绥远两省成立傀儡政权。国民政府仍然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妥协投降的政策,不但不抵抗日本的侵略,反而着手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迎合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并镇压“一二·九”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接着,蒋介石调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去攻打坚持抗日的工农红军。对西南各派的势力,蒋介石则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进行分化瓦解,特别是要彻底解决桂系。1936年5月1日,国民党中央常会主席胡汉民在广州病逝,广东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探悉蒋介石要瓦解两广的阴谋后,便乘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机,于1936年6月1日,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号,发动抗日反蒋运动,史称“六一”事变。

1936年5月,已引退多年的卢焘将军与云南省主席龙云代表李云鹤,从昆明到广州参加胡汉民的追悼会。当时两广军政要人云集广州,密谋反蒋。6月1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把陈济棠和李宗仁所部改称为“中华民国抗

日救国军”，并任命陈济棠为西南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6月2日，两部会向南京发出“通电”，吁请中央领导抗日。6月4日，西南各省将领联名发出“通电”，请西南两部会明令北上抗日。两广的党群团体立即响应，并发动抗日示威活动，一时全国为之震惊。两广各团体更进一步通电全国，指责蒋介石在华北对日节节退让，自招亡国之祸，要求蒋介石取消所有已签订的屈辱协定。面对这种局面，蒋介石的对策是：一方面，电告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责令他们必须遵循国民党五中全会“努力和平、不惜牺牲”的决议案，顾及国家安危，不得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他调兵遣将，向两广进逼，同时暗地进行收买活动，以分化陈济棠的内部，拆陈的台，孤立广西。

6月上旬，卢焘和李云鹄特从广州赶到南宁与李、白、黄等人会晤。据卢焘后来说：“我对李、白主张抗日，反对蒋的卖国投降主义，我是坚决支持和拥护的。可是他们内心是要倒蒋，我觉得不是时宜。因为他们发动‘六一’运动，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们要坚决干下去，我也不宜多说话，说了如泼冷水。”于是，卢焘和李云鹄只停留几天，就分别到柳州照料农场和返回昆明。

1936年6月下旬，卢焘离开柳州到梧州，当他刚买了船票准备上船往广州时，柳州邮政局长杨蓬侣正急匆匆赶到码头大声呼喊：“卢公！卢公！哎呀，我找你已很多地方了，幸好追到这里遇见你哦！”卢焘问：“究竟是什么事情，逼你这样急呵？”杨即从口袋取出有李宗仁、白崇裕、李济深三人分别打到柳州给他的电报，内容大致：即到南宁面商要事。卢焘当即退了船票，由梧州专署派专车送他连夜赶往南宁。

## 2 以第三者身份出席广西最高军事会议，陈述化解矛盾的关键和意义

到达南宁后，李、白等人即找卢焘密谈关于当时广西局势应如

何应付南京事宜，当时蒋已分化了广东，陈济棠已下野跑香港，余汉谋又投蒋并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广西孤立，抗日反蒋运动的重心已由广东转移广西，李、白骑虎难下。“六一”事变后，广西在军事方面作了部署，把原有的两个军扩充为四个军，分别由廖磊、夏威、李品仙、钟祖培担任军长；临时成立空军，编为三个大队，以林伟成为司令。“六一”事变之前，李、白与原十九路军蔡廷锴早有联系，蔡廷锴对李、白积极支持，号召他的旧部将领到广西集会，并编成一个师，以翁照垣任师长。广西方面，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曾组织群众团体的代表三百余人，准备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到了香港，迫于形势，又折回广西，请愿之事未果。为了要扩大广西的声威，李、白邀请一些有声望的反蒋人士来广西，李济深、蔡廷锴、章伯钧、彭泽湘、邓初民和抗日救国会杨东荪等人，都曾到广西，为李、白撑腰。

此时，蒋正陆续调动三四十个师嫡系部队，从湖南、贵州、广东对广西进行三面包围，战争一触即发。起初，李、白主张打不赢就退到越南去，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借此机会可找蒋的麻烦。卢焘认为，这样做只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不可取，李、白等问：“焘公有何应策？”卢焘说：“只有和平解决才是上策。”

此话一出，让在座诸位大员均大为不解，即请卢焘说其意义何在？卢焘说：“你们抗日是假，倒蒋是真，如今陈济棠下野，广西孤立无援势成骑虎。”他还打比喻说：“蒋介石现在是个桶，我们全国各方好比是各块桶板，大家与他这只桶联在一起，不能散乱，如果把蒋这只桶打掉了，大家都散了，一时谁也管不了谁，这就全完了，这也正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正好为它进攻华北帮了大忙。目前国事日非，需要团结抗日为主，不能倒蒋，倒蒋必乱，如果跟蒋硬是火拼，那我们广西先遭殃……”李、白诸人瞠目，又问：“那么寿公又有何见教？”卢焘说：“我建议你们明天召开全军将领会议，特约我以第三者身份出席会议，这个和平方案由我提出，这样才不致使军师以下将领对你们有所误解，如果大家认为可行，再议和平解决

的办法,向南京提出条件商讨一切,同时我们也要做好各项应战准备工作,作政治和谈的后盾和最坏的打算。”

李、白等人听到卢焘的慷慨陈述之后,便立即召开在邕的广西最高官员会议进行商讨,大家欣然同意卢焘的建议。次日,临时军事会议如期召开,会上李、白、黄等人,就抗日救国之事和目前广西处境之艰难,先后作了讲话。待他们讲完,卢焘即起立发言,以他个人见解对目前国内形势和广西的处境作了具体分析后,接着提出了应和平解决广西之困境以及和平团结一致对外,才能挽救中国之危难的意见,与会的诸将领都感到惊奇皆鸦雀无声。卢焘发言完毕,各位将领皆同意卢焘的提议,并请他出面向南京言和。就这样,第一步就从客观上不仅解除了李、白、黄等人对各军师将领以下难以启齿的顾虑,而且也揭开了各军师将领不愿打内战的思想苦衷。卢焘的发言打破了当时焦躁沉闷的空气,大家都喜形于色。

### 3 “六一”事变前夕的贵州形势

话说两广“六一”事变前夕,贵州的反蒋形势也是非常激烈和紧张的。

据陈集忍、邵斌从现存于贵州档案馆馆藏 328 份有关贵州抗日救国军的电文、布告等资料中,整理出来的《两广事变与贵州抗日救国军档案史料便览》记载:1935 年 1 月,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派薛岳率“中央大军”入黔,主要是乘机占领贵州地盘,把王家烈和第二十五军吃掉,因为黔桂毗邻,素来友好合作,加上黔桂粤三省早已签订了军事协议,如蒋介石对其中任何一省用兵,三省之间都要互相援助,结成了反蒋集团。但这个协议也早就被蒋介石侦察所悉,所以蒋对王家烈早已不满。此时,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借“追击”红军之名,派廖磊率第 7 军入黔,表面上“追击”红军,其

实也是暗中支援王家烈。在薛岳率“中央大军”入黔后不久，蒋介石也亲自飞抵贵阳坐镇，直接指挥了王家烈第二十五军，将第二十五军调到黔北作第一线，而“中央军”则摆在乌江南岸，迫使第二十五军与红军在遵桐之役的几次激烈战斗中，都遭受惨败。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利用金钱、高官，收买了王家烈部的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长，使王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光杆军长。这样，王家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35年4月6日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4月9日，蒋立即批准王的辞呈，但为了怕王逼反，蒋又施其欲擒故纵的手段，抛出一线钓饵，给王一个第二路“追剿”总指挥和军事参议的空衔，随后又命张学良用飞机把王家烈挟持到武汉去。至此，贵州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入了蒋介石的手里。1935年5月2日，蒋介石亲自在贵阳主持会议，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薛岳为贵州绥靖主任，顾祝同为贵阳行营主任。黔政更迭后，蒋介石就命顾祝同专主黔军（25军）改编之事。黔军改编后的番号为“中央军”102、103、121、140、新8共5个师，每师3团，废旅，因而裁减了大量黔军军官兵，同时又于1935年6月将黔军大部调往四川涪陵、鄂西等地。不久，又以“经济拮据”为借口，再次大量裁减黔军，并遣返贵州原籍。

由于蒋介石大量编遣黔军的行为，遭到黔军官兵及从政官吏的普遍不满，他们把“亡省”之痛，试图演成武装反抗，“以雪亡省之耻”，提出“黔人治黔”的口号。1935年底，就在黔军点编完毕他调过程中，以黔军行营参谋长张銮（铁丞、少将）、第1师参谋长穆守先（少将）、旅长周芳仁（少将）为首，组织原第2师参谋长成铁侠（少将，湖南人，后加入共产党，47年率部起义）、第9纵队司令黄福安（上校）、第11纵队司令王泽龙（上校）、纵队司令曹天泉（上校，重庆人，后出川抗日为国捐躯）、纵队司令毛景周（少将）、副旅长兼团长江华荣（上校）及地方实力武装陈佩琼、王海平、莫凤楼、曾云清、周纪元、杨德乳、杨昌龙等，打出“25军独立运动”旗号，唱响“为吾

省争省格,为西南争主义,为国家争正气”口号,在安顺、普定等地,公开举行兵变,拉出1、7两团及独立团全部人马,向黔桂边境撤退,进行联桂反蒋活动。

1936年6月中、下旬,已撤退到黔桂边境数月的黔军,获知前黔军总司令、贵州省省长卢焘,因赴广州吊唁胡汉民留桂,正在协助李宗仁白崇禧谋划举行反蒋的“六一”事变的消息后,便立即秘密派员到广西与卢焘将军取得了联系。这些驻扎黔桂边境的黔军将领,大部分原来都是跟随卢焘将军征战多年的老部下,现在正处于困境的他们,见到老长官如今正在为反蒋活动奔波,与他们的初衷不谋而合,真是高兴至极。因此,在两广“六一”事变中,由卢焘将军组织即将诞生的“贵州抗日救国军”,此时可谓如山风一样欲呼而出了。

#### 4 組建和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于南丹,保卫家乡广西

南丹,地处云贵高原东麓边沿,与黔南的独山、平塘、荔波毗邻,是桂西北通往大西南的战略要塞,也是黔桂边境交界的重镇。南宁会议结束后,卢焘便马上出面联络驻扎在黔南的贵州军官穆守先、曹天泉、周芳仁、江荣华、黄福安等人陆续到南宁与李、白、黄会谈,商议成立抗日救国军事宜。因为当时李、白最顾虑的是蒋嫡系贵阳薛岳部队从广西的西北部向河池、宜山、柳州腹地威胁,于是恳请卢焘挂帅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由桂负责武器装备和军饷供应,卢焘以贵州反蒋武装——贵州自治军、贵州民众自卫团等为基本队伍,广西方面则把由柳州地区民团指挥官尹承纲编拨三个民团大队归卢指挥,驻南丹警戒,贵州抗日救国军当时总兵力1.5余万人,全军编整为师、纵队、团、营等建制。同时广西还派总部军务处少将处长陆荫楫(贵州人)为卢的师长等。7月上旬,贵州抗日

救国军(对外称号)总司令部成立于广西南丹，并打出第二十五军的番号(对内称号)，卢焘将军任总司令，穆守先少将任前敌总指挥，王哲渔(广西上林人、广西驻黔代表、少将)、杨孝先(贵州人、广西驻黔代表、中将)为正副参谋长，陆荫楫为师长，张銮为副师长，成铁侠为师参谋长，覃文渊(少将、广西宜北人)为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兼军需处处长，其余还有贵州政界元老张彭年、张蕴良(两人均系贵州驻桂代表)，简孟平、郑海涛、甘凤章(贵州驻粤代表)，林炳华(广西宜山县人，少将，曾在贵州镇远任道尹、广西内务司长)，杨景星(广西人，少将)，郭绍樱、简保真(两人为广西宜山县人和卢焘亲戚)等人参赞其事。

总司令部统辖一师六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曹天泉，副司令陈佩琼(1950年被土匪杀害，烈士)、刘华延担任；第二纵队司令黄福安，副司令柳天华、彭治伦担任；第三纵队司令周芳仁，副司令曾云清、莫金印(莫凤楼大哥，早年跟随卢焘将军参加护法战争，后曾任卢焘将军副官)担任；第四纵队司令毛景周，副司令王海平(后支持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作被国民党杀害)、莫凤楼(1950年被土匪杀害，烈士)担任；第五纵队司令王泽龙，副司令周纪元担任；第六纵队司令江荣华，副司令席大明、杨德乳、杨昌龙担任等。

为了表明反蒋抗日救国的信心和决心，1936年7月下旬，卢焘将军在贵州独山南寨莫凤楼家中与诸将领商议反蒋抗日救国大计时，曾题诗与将领们共勉，即：

功在社会，德被人群；  
黔南柱石，桂北藩屏；  
声誉远播，举世知名；  
事业不朽，典范犹存。

当时广州越华日报等国内外报纸，都报道了卢焘将军在黔桂

边界就任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的消息，卢焘的家属在广州得知情况后，即赴香港暂避，恐受蒋介石特务之害。

贵州抗日救国军总部成立后，仅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人财物等各项要件就全部到位，卢焘将军一面指挥部队加快作好备战准备，一面面向南京当时之友好故旧冯玉祥、李烈钧、何应钦、程潜等人通电，以私人之交陈述己见，很快得到了冯、李、何、程四人的复电，支持和平解决广西问题。

据陈集忍、邵斌《两广事变与贵州抗日救国军档案史料便览》记载，现将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后在黔桂边境的一些活动片断摘录如下：

都匀县县长吴谦 7月 27 日呈省府电：“彼因中央军云集，地方官吏不为利用反多传递消息，不惜收买失意军人，强迫保安队组织抗日救国军，其组织及军实均桂军主持供给。”

贵州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王铸人 7月 14 日呈省主席寒电：“自粤事发生，黔省失意军人以自治名义，号召游勇士匪，到处骚扰，近又改为抗日救国军，以致黎平告警，锦屏再陷，都匀县长被架，丙妹、下江倾告失陷。”

大塘县县长刘定淀电鼎 7月 21 日呈省吴主席养电：“都匀学生多次前来三合一带，替桂军宣传，并散发传单、标语。”“8月 29 日又呈报：“抗日之名鼓动知识分子，其参加者颇形踊跃。”“沿桂黔边各县，时有不肖青年投入匪党，以此匪势增加。”“卢焘、穆守先、陈秀清（佩琼）、刘华廷、现集中董托一带，番号仍旧，人数增至 2000 余人，枪弹尤多，并有高射大炮等。”

省府情报（7月 21 日）：“前二十五军第四旅旅长周芳仁，率……叛兵，将榕江县城占据……查周逆此次之敢于公然入据榕城者，系受桂方之指使，其部队来源，前次失败时残余部队，计约一团，完全交由叛军营长张吉安率领，榕、锦、丹江一带散伏，并于东

南路之著匪毛秉权(景周)、王泽龙等联合,此次得到桂方赞助,由穆守先指挥入黔扰乱东南两路。

省府情报：“黄福安、柳天华、彭治伦为首,活动于开阳、息烽、修文、黔西一带,口号是‘誓师抗日、统一华夏,打倒虚伪政府’,大旗上书写‘抗日倒蒋救国军’,并佩有臂胸章符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和小册印刷品,标题是‘弟兄们最近的言论’,攻打开阳县城,杀死县长和警佐等。”

省府情报：“王泽龙领导的纵队又称‘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二路军和贵州东南义勇军’,其宗旨是‘响应西南,义旗高悬,组织劲旅,现命集中锦、柱、黎、榕一带,待命动员,以雪国耻’。纵队下设团、营建制,攻陷过绵屏、天柱、剑河县城,任命县长和税务局长等职,广泛张贴‘打倒中央军’、‘贵人治贵’等标语。9月,又将郭纵队罗启疆旅收编。”

.....

为了营造浓厚的反蒋氛围,广西当局还将全省大、中、小学校提早从6月1日停课放假,组织大、中、小学校教师、学生,以宣传抗日救国的名义,分别到全省各县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即大学生到外县宣传,中学生在本县宣传,小学生则在本乡宣传,宣传队分若干组,每组10~12人,由1~2名教师带队。

据当时正在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李绳规在《忆广西“六一”运动》记载：“.....我组12人,组长刁剑萍,我组分派到南丹县宣传。.....大约是6月9日上午10时,六寨镇召开群众大会,我们宣传小组被邀参加。时任国民党广西第七军军长廖磊在会上讲话,大意是:(1)日本侵占我们东北,中央采取不抵抗主义,不战而退,将整个东北送给日本鬼子,现在我们要北上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广西实行征兵制,我们有信心打倒日本鬼子。至于征兵年龄,18岁

到 20 岁为列兵，32 岁到 48 岁征为输送兵，凡符合年龄者，大家要踊跃应征。②中央派大军云集湘黔桂边境，重重包围广西，这是有意阻挠广西北上抗日。这样不怀好意，从今天起，市面上不准用中央票，谁违反了就军法从事。③我们要过去所谓好仔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思想扭转过来。现在是好仔才当兵，好铁才打钉。④大家要有自信心，我们广西子弟最刚强，天生会打仗。我们不怕打仗，我们要建设广西，复兴中国。”

“……这样在南丹由南而北，从北又转西，又由西而东，兜了一个大圈子，为时 20 天 …… 后来有个别群众对我们说：

‘学生哥，你们还不回去？听说六寨到独山一带局势很紧张了，上面交代了，万一发生了战事，沿公路线附近的人，都要搬迁到山区，那时井水、河水、小溪水等都要撒放毒药，以防中央军打进来’。听到这些消息后，大家心里更是惶惶不安。我们人地两生，恨不得马上离开南丹反校 ……’

另据村山、素青《宜北道上拾零》记载：

“……地方读书的人少一点，文化程度较低，现在虽然每个乡村都已有了学校，可是学生仍然不多。但人物却相当秀气，小学生更加好，他们多是聪明活动的，一点也不畏缩，不怯懦。每次我们去宣传，替我们翻译的小朋友，都是‘口如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听的人很满意 ……’

## 5 蒋桂和谈，救国军解散复员

1936 年 9 月 3 日，南京即派程潜、朱培德、张居正三大员飞南宁谈判议和。不久，双方达成协议，蒋介石接受广西提出的和平条件，李、白、黄随即也通电拥护中央决定。随着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贵州抗日救国军自然失去了依托，南京国民政府和黔桂两省政

府即分别下令解散、收编。对参加反蒋抗日的救国军的高级军官除解除通缉令免予处分外，还安排工作，当然也有的则继续隐伏草莽，有的则被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匪论罪受到残害。

与蒋介石和谈告成之后，卢焘将军所组织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即在南丹解散复员。各项事务清理完毕后，便将余下的20万银元开办费和不少军用物资，当时总司令部一些将领提出作为遣散费上报私分，有的部属甚至还想把一些枪械拉走拿去私用，卢焘认为遣散费已发足，怎能提出额外要求，特别是把枪械拉走流入社会，那将是贻患无穷，所以他坚决不同意私分余款和私自带走枪械，下令违者按军法论处。后来这批款项和军用物资，卢焘将军派专人专车全数送回南宁，上缴广西省政府。

1936年9月中旬，贵州抗日救国军南丹总部遣散完毕，卢焘就北上黔南，南下宜山、柳州、融县等地视察部队复员士兵的安置情况。数日后的便去广州看望家人。

当年10月，贵州省主席顾祝同，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先后聘请卢焘将军为顾问；1937年3月，贵州绥靖公署薛岳主任又聘卢焘将军为顾问。

卢焘退出军政界多年，数次拒绝高官厚禄，为什么又在“六一”事变后，挺身而出，甘冒风险去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呢？一般人多不理解。据卢焘将军生前的回忆：“我之所以出来，甘冒风险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一是为了解救广西之危，万一蒋桂之间真的打了起来，贵州抗日救国军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二是以救国军的名义，我才有资格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和平解决的建议。试想，如果没有总司令的身份，只是一个老百姓，如何去提建议，又有谁理睬你呢？”

贵州抗日救国军的组成成分比较复杂，其基本力量除了反蒋军高级军官组织的兵变部队及黔桂两省地方实力武装、各县青年学生等外，还有黔桂两省中共地下党员参加组织策划指挥的。如中

共贵州省党的创建者之一，时任黔军何知重师参谋长的黄大陆同志，曾代表二十五军奔走云南，指出危害西南者系蒋氏而非红军，提出了“积极防蒋消极防共”的口号。黔军被蒋改编时，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成员林青、邓止戈、秦天真、黄大陆等同志均在安顺、感水军中及时提出了“不关饷不开差”的口号，使黔军广大官兵反蒋情绪高涨，哄走了顾祝同派来的点编人员，为张銮、周芳仁、江荣华等带走黔军3个团举行兵变提供了方便。又如贵州抗日救国军第四纵队司令毛景周（贵州龙里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在贺龙部队任教导团团长，并被国民党两次通缉）就任用共产党人余汉生（即秦天真）为纵队政治部主任。前敌总指挥穆守先等兵变高级军官，都曾向余汉生表示拥护支持共产党，并愿意跟共产党走。贵州抗日救国军虽然成分复杂，但是他们的反蒋抗日是一致的。

贵州抗日救国军以黔桂边区为基地，数月内发展1.5万余人，活动范围遍及黔南、黔东及桂西北等几十个县广大区域，这充分说明了蒋介石反动集团早在当时的全国人民心中就不得民心，两广事变与黔军哗变正在此时交织在一起，这也是时代的必然，所以广西、贵州反蒋抗日瞬间呈现燎原之势，这就更充分显示了黔桂人民的爱国热忱。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的时候，曾称赞福建、两广、西安事变为“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中共中央当时也肯定“贵州抗日救国军”是“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和“带有进步与革命的性质”（均见陈集忍、邵斌文）等。

## 6 复员为民，淡泊世事

从黔南视察完后，卢焘便到宜山郭府（姐夫家）小住了几天，随后又要赴柳州等地视察。当卢焘与随员要搭乘公路汽车前往柳州时，原总部警卫连长郭纲已准备好原总部的一辆小车，请卢焘坐车

起程。卢焘坚决不坐。他说：“我已解职复员，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了，不能再坐这个军车。”郭纲说：“现在虽然复员，但路上治安仍是不好，万一发生事情我何以交代。”卢焘不顾郭的劝说，脱下了中山装布服，穿起原来的长衫，自己购票乘公路车到柳州。

卢焘到柳州乐群旅社住了几天，办完各事之后，又乘车前往融县长安镇（桂北重镇，今融安县城），因接近贵州界，军队较多。卢焘到达之后，他找旅店投宿，处处客满。实在无法，幸得某旅店经理的特别照顾，在四楼顶上将经理房间让出暂住一夜，卢焘千谢万谢这位经理。卢焘放下行李洗脸完毕后，就写好一张电文叫旅店伙计往电报局拍发南宁。电报局人员一看是卢焘名字所拍，就将这电文稿送到陈专员那里（当时柳州专署陈专员也在长安巡察），因事前未闻卢焘到长安的消息，而今突然闻知卢焘拍发电报，陈颇为怀疑。于是下令有关方面寻找卢焘所住地址，他们找来找去，很久不能找到，后来也到过卢焘所住的旅店查旅客登记簿，均无此人，真是怪事啦！最后该旅店经理才说：“这里倒有一位穿蓝布长衫的老人和一位中年人（即警卫连长郭纲）来住宿，因无房间，我就让四楼顶上私人住房给他们暂住一宿，但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于是派来查问的人员上楼推开房门一看，就是赫赫有名的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陈专员马上赶来拜见，并请卢焘到专员寓所去住。卢焘说：“这里楼高空气好，就住在这里很不错嘛，这位经理很好，他特别把房子让出给我住。”专员一再请求，卢焘就是坚决不走，陈专员无法，只得作罢，于是就派来卫兵层层守卫，从底层楼口直到四楼都有卫兵站岗。半夜卢焘睡醒后听到楼上楼下有人说话，盘问不休，他就起来看，才知道专署已派很多卫兵前来守卫，对上下旅客夜间出入很不方便。次日就请专员撤回卫兵。陈专员说：“我们有保卫您老的职责，您不能如此。”经过几次要求，最后只得让四楼门口留一名卫兵才了事。由此可见，卢焘将军并无官气，真是平易近人。

卢焘在长安期间，与当地官员及地方人士都相处得很融洽，他

们把救国军民团的复员情况向卢焘作了汇报。卢焘得知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也感到快慰。他要离开长安时，地方人士请他留下手书做摩崖题字，以资纪念。卢焘欣然写下“云深”两个大字。后来该县将此二字各放大为一米见方，镌刻于城南灵寿溪穿山出口处的老君洞岩壁上（今融水县城南郊），字距水面4丈余，那刚劲浑厚的字迹，如今尚清晰可见。老君洞又名灵岩、真仙岩，外形似一只下山猛虎，虎口伏地而开，洞口宏大敞开，前厅宽阔，有一天然钟乳石，形如太上老君，银须白发，栩栩如生，故名老君洞。唐宋以来，即以其雄奇、灵秀、深幽而闻名遐迩。宋太宗曾颁“御书碑”于洞内，并封老君洞为真仙岩。明朝大地理学家徐霞客曾在洞内住了13天，并在其游记中写道：“持火把从老君洞后入，但见千柱层列，百窦纷披，前之崇宏，忽为窈窕；后之雄旷，忽为玲珑，宛特奥隙，靡不穷搜。”历代达官显宦、文人墨客，为老君洞留下了大量咏颂诗文、游记、碑刻和摩崖等珍贵的文化遗产。



1936年9月，卢焘将军在广西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城南南郊老君洞题字“云深”

## 第二十章

### 抗日民族意识强烈，渴望和平统一

#### 1 捐款支援十九路军，赴安徽等地慰问抗日将士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然而，虽已脱离军政界多年的卢焘将军，却仍然关注形势的发展，经常以岳飞“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和“还我河山”等爱国民族意识教育身边的人。1938年初，卢焘将军将自己经营林场所得的1万块银元，汇给在抗日前线的十九路军将士。同年5月，已年近花甲的卢焘将军参加了广西省抗日慰问团，先后前往第五战区长官部所辖的正阳关、田家庵、信阳、合肥、徐州等地慰劳广西抗日将士。历时四个多月旅途上所见所闻，卢焘将军感慨良多，写下了不少杂文和诗歌。现将他在安徽路上所写的一篇杂文抄录如下：

6月16日晚十时，陈朝鸣（中将，字尚德）夫妇来送我上交通船，坐于船内，即嘱咐传令兵王泰（安徽人，27岁，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警卫）沿途招扶。殊不知夜深宪兵上来，即喊我出来，云此舱间乃官者所居，你是老百姓何得乱坐于此？絮絮不休。经传令兵几度婉言交涉，不行。我亦不能接受此肮脏气，亦即携我乾坤袋上岸。后又被传令兵跑上来拉我下船，坐于舱面，与众兵杂处。此处较宽，

空气亦较清爽，所谓此间乐也，适才闷气功，顿为之爽然。偶占五绝数章：

手挽乾坤袋，昂然步入舱。  
岂知鹰犬辈，不许我同房。

因是老百姓也，可视之，可欺侮之。可见国难未除，百姓看得贱。我又不知标语所云，军民合作，作何解也。

舱面同兵处，欣然得所哉。  
时来风送至，如顿足开怀。  
可厌茶奴辈，三呼始一来。  
饥肠时滚叫，此味却难挨。

老百姓，连茶奴都看不起，难怪人人都争做官，大约在此一着也。我会知之，可惜晚矣。

传令兵王泰，诚明真可爱。  
抑强扶弱者，使我心尤快。

从卢焘将军所写的这篇杂文，可见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卢焘将军民族意识强烈，抗日战争期间，卢焘将军十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见到简葆真写了一首抗日的诗，他也步和两首：

(一)

博施济众圣犹难，安得金堆似土峦。  
极苦却嫌天地窄，退思翻喜室庐宽。  
斯民罹尽千般劫，何处吹来一味酸。

但愿中原多杰士，共歼倭寇等闲看。

(二)

追思盛世数炎黄，往古今来倍感伤。  
蠢尔虾夷亡自取，敢将媚骨傲严霜？  
思古哀今吊柳州，离离禾黍有谁收。  
立鱼驾鹤都无管，独叹长江空自流。

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他当即又写一首诗：

原子一枚敌恐慌，二枚原子敌投降。  
长崎广岛成平地，再炸东京灭日皇。

## 2 闲居仍关注国事，计划力劝李宗仁进行和平统一祖国大业

卢焘将军晚年，身体健康，饭量正常，无论是坐家、走路都是身躯平直，步履稳健。进城往返步行十余华里，行走轻松。将军离开军政界多年，但从日常生活表面看，好像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实他的内心仍是为国为民忧心忡忡，经常阅读报纸，或叫家人给他念新闻。有一晚，谈到淮海战役打响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蒋纬国的装甲部队都用上了……后来又谈到有关“和谈”问题，将军说：“自古以来，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装甲部队参战，你们看嘛，有什么用。”

北京解放以后，“慈母园”里的收音机收到广播，“西南各省，即将解放，对爱国人士都要加以保护……”将军心里很高兴，经常到城里与孙竹荪、张伟卿等以搓麻将消遣之机，议论迎接解放的事，有时到深夜才提着那根黑竹手杖回来。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是卢焘经常对后辈青少年提到的古训。卢焘晚年并不安于闲居，而是时时关怀国家大事，渴望祖国和平统一。1948至1949年

间,卢焘内心对当时国事的想法和打算,只能私下跟可靠(能守机密)的子女透露和商谈。

据将军长子卢慈仪撰文回忆:

1948年春,父亲作为广西宜北县国大代表准备赴南京参加政府召开的国民大会前夕,他私下跟我交谈,说此次到南京开会,他本人的主要目的是想与李宗仁交谈国共合作和平解决争端问题,从而早日达到全国和平统一。当时李宗仁是北平行营主任,也正在准备与孙科竞选副总统。我理解了父亲赴京的意图,并认为父亲的想法是对的。但是我根据当时的形势,向老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认为李宗仁正热衷于竞选副总统,对他的建议不见得重视,而且国民党自认为他们的武装力量还很大,这时去向李提出和平谈判问题,也难以采纳。何况李的后盾——桂系武装力量很有限,无足轻重,向来李、白相依,即使李有此想法(和谈),白崇禧也不见得会同意。我还进一步提醒父亲,南京蒋帮特务如麻,自己的言论和行踪不得不注意,就是李宗仁也少与他来往为宜。父亲觉得我的看法是有理有据的。他考虑了以后,便说:“到了南京再说吧!”

卢焘到了南京参加国民大会期间,亲自耳闻目睹当时的现实情况,确实令人失望,事与愿违。

1949年11月1日前后,卢焘从贵阳北郊半日山庄急忙走到大西门芦花溪路卢慈仪住处叫他准备去重庆的费用。卢焘说:“李宗仁到重庆来了,我要去找他,希望他立马起义,正是其时。”他们正在准备当中,又见报载李宗仁飞昆明并将到筑一行,这样就不需去重庆了。当时人民解放军已挺进湘黔边境,贵阳形势紧张,省府急于搬迁,谣言四起,市面紊乱。过两三天,消息传来李宗仁从昆明飞走了,有的说飞往广西桂林,有的说飞到香港去了。卢焘惋惜地说:“浪子不回头,由他也!”



1946年秋，卢煮将军与友人杨舜城（时任民国政府行政院参事）两家亲属同游黄埔港、白云山后，到黄花岗李德三等七十二位烈士墓前合影留念

## 第二十一章

## 推动黔、桂、粤长期合作

## 1 保持互访，加强联系

卢焘将军十分重视黔桂两省的关系，早在他主掌贵州军政开始，两省就互派了驻省代表，签订了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合作协议，以及坚持了高层互访和沟通等等。从继任他的袁祖铭到后来的谷正伦，贵州省长职位前后虽然换了 14 人，但除了顾祝同、薛岳等四五人外，其余大部分曾经都是卢焘将军的部下或同事，所以两省的关系不但一直得到延续下来，而且还得到不断地充实和加强。当然这中间关键的作用，就是主要靠卢焘将军这位大红人的牵线，卢焘将军已成为黔桂两省关系的主要联系人。

从 1921 年起，李宗仁讨伐旧桂系军伐陆荣廷时，李就曾派其部下总参议张任民到贵州与卢焘联系军事方面的支持，得到了卢的帮助。从此，双方代表如王哲渔（广西）、黄桂丹（广西）、张蕴良、杨孝先（贵州人）、麦慕（广西）等，或长期驻留，或时来时往，总是络绎不绝。

1924 年李宗仁、黄绍竑协力讨伐陆荣廷，打败了沈鸿英，基本统一了广西之后，卢焘与新桂系头目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也进一步加强了两省的关系。不久，彭汉章主掌贵州军政时，卢焘仍为贵

州和广西的关系着想，遂向彭建议开发黔桂间的公路交通建设，彭表示同意，并由卢两次奔走广西与李宗仁、黄绍竑联系。

1925年10月10日，卢焘将军在南宁为西南路政事项奔忙时，闻知李宗仁其父培英在上海逝世灵柩返还桂林开吊后，卢焘将军除了自己送去挽联和丧礼之外，还代时任黔军总司令袁祖铭、贵州省长彭汉章、督办王天培、会办周西成等送上最新的上等中华缎祭幛和挽联一副，其挽词是：

有子建功名为西南数省千城百越山河发扬踔厉，  
此翁留模范知左右两江流域三军缟素感慨悲歌。

1925年前后，卢焘将军为了解决贵州修路、救灾等事务，先后奔走各地，与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冯玉祥、陆荣廷、李宗仁、黄绍竑、张任民、朱培德、何应钦、范石生、周西成、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等要员联系，并写了近二十封的求援信。如1925年6月，他给李宗仁、黄绍竑的公函是：

逞启者窃民(国)十四年六月十八(日)，焘在重庆，川黔边防督办、川黔联军总司令袁(祖铭)照会内，闻贵州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对于工商实业、教育行政、军事计划、行旅往来均感困难。贵州为桂、蜀、湘、滇四达之冲，自应亟策改进，疏理各路交通，一切办法以期发展便利筹办路政为要图，用特照会台端担任贵州路政督办一职，附送木质关防一颗，文曰“贵州路政督办关防”。所有应行创办事宜，筹备端倪，仍希随时会商办理事由，准此当即宣告就职。拟即先由贵柳长途马路筹商着手，至他各路再次第续策进行。查贵阳达柳州间或由荔波取道庆远，或由榕江取道长安路线。所繇尚待勘测。榕荔以上均属黔省区域，榕荔以下系属桂省区域。焘之职权责在贵州路政当无问题可言。所有桂省柳州以上一带区域，应俟贵署

筹商适当办法互相知照方能测线衔接，庶明权限而昭融洽，现当创办伊始尤以筹款人手为一重要问题。黔本贫瘠，久经兵事继以旱灾，喘息未苏，筹款自非易事。桂省方当军事之后，筹拨现款亦复维艰。焘以创筑贵柳马路关系两省交通，仍从两省通商货物着手。现拟商请贵署拨助洋六万元以作筑路基金。此款请由黔省运桂销售之货应纳入关印花税捐项下，计数划拨，较为两便。倘荷赞成此举，应请贵署令饬柳庆各局征取划拨，交柳（江）河护商局张局长隆材代收，实为公便。仍希见覆施行。

卢焘将军致李宗仁的信是：

德邻吾兄伟鉴：

邕垣小住，矫领珍厨，濒行复承馈赆千金，礼遇优隆，愧不敢受，匆匆放掉，未及握别。兄在奉讳期间，故未便渎扰耳！老伯大人灵柩想已运到珂乡，吾兄仁孝性成仰体尊人德心，妥安窀穸，节哀顺变。乡邦新奠，经纬万端，吾兄墨经治军，固我疆圉，造福桑梓，尤足以告慰阴灵也！黔桂路政，亟荷赞成。弟因尊重桂省主权，未便以片面之主张，迳提具体之办法。候兄与季公商定，示我端倪，或如何衔接融洽，期其无牴牾，庶可推行尽利。已曾函请哲民，代达此意。想蒙鉴及也。前具正式公函，商拨款事，如以为可，则请以慨助经费陆万元，拨交驻柳办事处主任张颂诚君代收，决无贻误。倘荷议决照拨，仍希电示通知。弟现未即至柳、行将赴沪转渝，兄电请交驻渝黔军总司令部王植之兄代转可达，较为捷速。弟到粤以来，所商路政赈荒等事，均荷国民政府当道（局）一致赞成，此因谭畏公汪精卫诸公有所商洽，雅意殷拳，复加维系，近日已定赴沪船票，又复退回。目下尚未能决放洋日期，亦不能不暂缓行程耳！何时成行，当再函达左右。

兹因卸任柳庆各属财政分处处长简君序良到粤还桂之便，特

属其赍书谒候，代达鄙忱。简君器俊宏深，才堪大受，实乡邦中矫矫人物，其人宗旨纯洁，久为弟所深知，年富隽才，实堪以为臂助，请兄与季宽兄致商器使，任何方面必能措置裕如。弟从不妄荐非人，兄试询之以言，课之以事，青萍结绿，拂拭愈光，当信弟言为不谬也。回忆间关入桂，途遇暴客，几有在陈之厄，承兄与季宽饬属优遇，实为深印脑海，极不能忘。因是愈觉黔桂交通，尤有开发之必要。否则两省工商实业、行政军事及一般普通行旅，几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矣。

弟到邕时，原拟从容计议，乃吾兄方当大事，季宽又以军事赴梧筹边，故未便作周南之留滞耳！弟之区区忧悃，端在社会事业，惟志宏而力微，终希将伯之助，吾兄携手助成路政，大名亦垂不朽矣！

专此敬颂礼安伏祝为国珍重！

十一月十号

1926年，周西成继彭汉幸主掌贵州军政，卢焘受聘为省政府顾问，周又曾三次派卢到广州与主政广东的李济深接触联络感情。1927年7月后，周又派其参谋长刘民杰两次随卢焘赴粤桂活动，并签订了“黔桂粤联盟协约”，接受粤桂军火援助。此间，广东省主席李济深也极力争取同贵州合作，通过卢焘沟通黔桂粤的联系。广东派谭克敏（贵州人）为代表，广西派马晓军为代表和梧州航空署长张子旋来黔与周谈判，交涉有关开发西南航空项目合作等。期间，卢焘还将其大女婿、时任贵州省军械处少将处长覃文渊介绍与他们相识。1929年间，李森、毛光翔、王家烈先后主政贵州时，同样也是继承前任的路线，仍然与广西友好往来。1934年，桂系当局曾先后派陈雄、陆荫楫为代表连续几次访问贵阳，商谈合作。王家烈也曾多次派卢焘等人赴邕回访联络。1934年秋，王家烈与李宗仁等人在独山南寨莫凤楼先生家签订了“粤桂黔三省互助联盟”条款。之后，其他的继任者们也从不间断两省高层的联系，并都聘卢

焘为省政府顾问。

## 2 互不侵犯，互相支持

在军事方面，黔省 1921 年到 1949 年间先后曾有四次大的出兵援桂：一是 1921 年卢焘派谷正伦、胡瑛两旅出兵广西讨伐旧桂系陆荣廷；二是 1922 年卢焘亲自率黔军所部和滇军旅大军南下广西参加北伐革命；三是 1925 年 6 月滇桂战争爆发，卢焘亲自率领黔军两旅出师独山待命（后因驻粤的桂、滇两军在广州发生叛乱和入桂滇军很快被击退而平定，卢焘才电请辞职），不战而停；四是 1936 年 7 月蒋桂“六一”矛盾，卢焘在黔桂边界广西南丹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保卫广西。1927 年间，按照“黔桂粤联盟协约”的要求，两广协助贵州开办了一家兵工厂，建立了一座大型无线电台，筹办了航空业务等，并当年就为贵州制造了一批枪支弹药。1933 年间，通过卢焘交涉，广西李宗仁在广州又帮助王家烈向陈济棠得到了 4000 支枪、100 万发子弹的援助等等。

自 1921 年以来，黔桂两省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在军事上，两省做到了既互不侵犯又互不掠夺，既互不战争又互相支持。1934 年冬，李宗仁、白崇禧对蒋介石围剿红军长征采取了“力避不战”的妥协态度，于是将桂系的主力部队廖磊的第七军移防黔南，避开与红军过广西、贵州境内的接触。在黔南，廖磊部与贵州王家烈的第二十五军，对红军过境贵州既不追也不打，按兵不动，让红军顺利过境，使蒋大为恼火，但又无可奈何。还有 1921 年 8 月，广西自治军林俊廷率三万饥军来到黔南投靠卢焘休养生息，卢焘也给予了极大的关照。两省的边境治安稳定，匪盗减少，各民族安居乐业，生产贸易往来不断。

### 3 长期合作，互惠互利

在经济方面，主要是贵州组织烟土过境广西出梧州下广东、香港出售，增加广西财政收入（烟土特产税是当时广西的大宗税种）。自1920年10月卢焘主掌贵州军政开始到1949年的28年间，除彭汉章、吴忠信、顾祝同等人任省长的七八年外，其余近20年的云贵烟土都经过卢焘的斡旋，每年全部向广西过境的烟土近2000担，给广西增加了很大的收入。如经过南丹、恩思两条线路进入广西转运的烟土最高年份达200万斤，仅庆远财政处1925年就征收烟土税达230多万元。1931年春，卢焘将军还通过个人的关系，将贵州当局当时收缴过来的一批烟土，赠送给广西省政府，李宗仁、白崇禧当即叫省财政厅长黄钟岳变卖得了10万块银元，加上自有50万元，便于当年夏天就在南宁开办了广西银行（即“南宁裕利银号”）发行“桂钞”。还有1932年春，云南商人运烟土2000多驮（马驮）经过贵州，贵州也有1000多担烟土，准备一同运往湖南过境。卢焘得知后，立即协调王家烈及商人，说服他们运往广西过境，并及时请莫凤楼先生派武装护送至南丹或恩思，再由白崇禧派兵护送滇黔烟帮过河池、宜山下柳州、梧州，不仅使广西增加了收入，而且烟帮也获了巨利。当时在广西境内护送黔烟帮的白崇禧部队分别有何文运、陈济桓、伍廷飚、陶钧、韦肇隆、杨景星等。与此同时，两省还在农业、工业、商贸等行业，加大了合作力度。农业、工业不仅广西给贵州输送大批的技术人才，而且还在贵州创办农业试验基地，合作开发煤、铜、磷矿，以及电力、木材、边贸等。

## 第二十二章

# 同情革命，支援红军， 向往延安，爱护进步青年

### 1 两次营救韦拔群，痛惜革命者

1915年底，韦拔群（广西东兰人，与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俞作豫等人创建百色右江革命根据地，广西农民革命运动领袖）刚从桂林政法学堂毕业返乡不久，云贵便爆发了讨袁护国战争。当护国军的募兵队伍到黔桂边界募兵时，久怀报国大志的韦拔群认为时机已到，于是变卖家产，购买了部分武器，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农民武装，跋山涉水，来到了正是讨袁战事紧急的贵阳，很快被编入护国北路黔军熊克丞团，并被任命为先锋营副连长。当韦拔群远从广西带队到贵州投军的消息传开后，此时已由贵州模范营中校营长提拔到护国军东路黔军第二团任团副的卢焘心里异常高兴，因为在黔军中的广西老乡毕竟太少了，于是在部队准备开赴前线时，卢焘特意抽空看望了韦拔群等广西老乡们。战争打响后，韦拔群带来的农民武装，由于缺乏正规训练，加上人地生疏，在几次战斗中伤亡很大，为此韦拔群感到很悲痛。可是，连长陆永芬（贵州人）却不以为然，对余下的士兵仍拳脚相加，把士兵当做牛马草芥一般，韦拔群多次劝告不但遭到拒绝，反而还说是“犯上”。1917年

初，陆永芬以“煽动军心、图谋不轨”的罪名，将韦拔群诬告并投入重庆监狱。当韦被害入狱的消息传到已升任黔军第一混成旅中将旅长兼湘黔联军总指挥卢焘将军的时候，卢非常气愤，他认为韦千里投军，报国志大，这个诬告他非要弄清不可。当年8月，卢焘趁到重庆参加黔军高级军事会议之机，直接找到刚刚提升为黔军总司令的王文华。王是卢的老长官，过从甚密，素来赏识和器重卢的军事才能。所以一见面后，卢焘就毫无拘束地把韦的情况反映给他，并要求将韦保释出狱。王听了情况后，当即向卢焘表态：朋友的事，我王某一定鼎力相助！次日，王就电请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批准，因诬告而被捕入狱几个月的韦拔群，终于在卢焘的保释下获得了自由。韦出狱后，正值贵州讲武堂招生，于是卢焘又出面找到王文华的妹夫、讲武堂校长何应钦说情，将韦保送到该校学习深造。由于韦拔群学习刻苦勤奋，成绩优异，毕业后直接被分配到黔军驻重庆总司令部任参谋。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韦拔群更是由衷高兴，他和进步青年军官一道经常偷偷学习《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勇敢地在军中宣传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思想，揭露旧军队的反动与黑暗，他曾以“愤不平”的笔名公开张贴“改革社会”、“改革军制”的文章，并把进步书刊盖上“愤不平”的印记，寄增广西旧友。韦公开宣传革命思想，在军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久又被军法处长秘密派人盯梢调查。1920年8月，卢焘由铜仁奉调重庆协助王文华总司令整顿黔军，到渝后卢与韦朝夕相见，韦经常把他的革命倾向和思想与卢交谈，得到了卢焘将军的支持。8月下旬，当韦的革命行动被泄露后，卢焘将军亲自为韦的秘密解押出走提供了方便。这样，韦拔群终于在1920年9月离开了多事的雾都重庆，沿长江东下上海转赴广州，见到了他日夜想念的孙中山。从此，韦拔群结束腐败的旧军队生活，走上了光明的革命道路。1936年7月，卢焘在广西南丹就任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时，知道韦拔群已早在几年前就被叛徒杀害后，非常惋惜地说：“太遗憾了，韦拔群才是真正的

革命者啊！”

## 2 支援红军，接济朱德

卢焘将军对朱德怀有特别感情，早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就与朱德、李云鹤、范石生等十位同学结拜为异性兄弟。1911年11月，卢焘奉调入川作战时就与朱德分手，一直未曾见面，卢焘在跟子孙儿女和家乡青年学生们摆家常谈古论今时，常常提到朱德的为人和友谊。他说：“我和朱德在云南讲武堂同被挑选入步兵科特别班学习，两人相处很好。朱德学习勤奋，文武都好，也爱运动，跳得最远，是全学堂的跳远冠军。他为人正直，重义气，乐于助人，也是同盟会员，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因此，我们两人性情相投，爱好相同，又是志同道合，所以结拜为兄弟。”朱德一直也不忘记卢焘。1928年春，朱德带领部分起义部队从广东转战到湖南南部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当时，与湘南相邻的韶关，驻扎有国民党16军军长范石生的部队，于是朱德派王佐（原系湖南地方武装首领，井冈山起义后队参加红军）带信到广州找到当时正在广州与李济深洽谈广东资助贵州公路建设事宜的卢焘，请卢焘说服滇军范石生不要与朱德为敌。朱德给卢焘的信，卢焘一直保存着，但到1939年2月4日贵阳被日本飞机轰炸时，信和家屋全毁。王佐说：“我来之前朱德对我说，你跟范石生的关系最亲密，只有你才能说服他，范才能不打朱德，现在老蒋时时都在想吞掉他，如果他还打朱，那不是削弱自己的力量，创造条件让蒋吃掉自己。”当时范确实与蒋在闹矛盾，王佐希望卢焘秉明大义向范陈述利害。王走后，卢焘即写信给范石生，叫他不要打朱德，认为“大家是同学，不必为敌也”。并希望范设法接济朱德军火物资等。后来，范石生果然听从卢焘的话，分别两次秘密派遣某团上校参谋长敬熔（四川人）、军部参谋韦伯萃（共产党员）带信前往红军防区找朱德，范信中写到：“春城一别，匆匆数载。

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找兴邦立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转言之论点，弟当勉励为助……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朱德接信后，立即安排了与范会面，并与范达成了合作的三条协议：一、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原则；二、起义军（即红军）改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的番号，隐蔽起来；三、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朱德为此由衷感谢地说：“如此厚爱，感激多矣，我部仅七八百人，编为一个团，但求保持建制，不求补充兵额。”就这样，朱德不仅解决了部队编制、番号的问题，而且还得到了大量的军火物资，使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 3 三次想赴延安找朱德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朝气蓬勃，无论在民主建设、民族统一战线、军民合作、生产建设各方面都有声有色，为中外瞩目。在中外新闻界的要求下，1944年5月间，由国民党中央宣部国际宣传部门组织了“中外记者团”到延安作短期的参观访问，该团共十余人，名记者赵超构和美籍记者艾泼斯坦等也是成员。卢焘好友孙竹荪的女婿周本渊是一位青年新闻记者，也参加了记者团前往延安。在延安期间，记者团得到朱德的接见。

据周本渊在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出版的《卢焘将军》中撰文《朱德总司令对卢焘的关怀》回忆：朱德知道我是贵州人时，他略有所思地说：“你们贵州有一位做过贵州陆军总司令兼省长的广西人卢焘，你知道吗？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我说：“认识，这位长辈卢老伯，他早已脱离军政界。日寇轰炸贵阳时，他家屋全毁，

现住在贵阳北郊的半日山庄，生活较清苦，他在贵州很孚众望。”朱德听后对我说：“我跟卢焘是云南讲武堂的老同学，护国、护法战争中的老战友，请你回到贵阳时，带个口信给卢先生，就说 I 欢迎他来延安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他住得惯，可以住下来，共商国是；如果住得不习惯，参观后可再回贵阳。卢焘是国民党中真正的革命军人，国民党太对不住他了。”中外记者团在延安访问一个月后，回到重庆就解散了。同年 6 月底，我回贵阳探亲，特地到半日山庄拜望卢焘，将朱德的口信如实转告。卢焘听了后，非常激动地说：“朱玉阶现在当了共产党的总司令，他还记得我，关心我，还邀我去延安，真使我感佩。”我还拿在延安拍摄的几十张照片给卢焘看。其中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记者团的合影。卢焘凝视良久，用手指着朱德的像，很兴奋地对坐在身旁的儿女说：“你们看，这就是朱玉阶大叔，几十年不见面了，他还是那样健壮。”

周本渊走后，卢焘好几天沉默寡言，思绪万千。有一天，他突然对家人说：“我很想到延安去看看，拜望我的同学朱德总司令。”子女们不敢反对，只委婉地说：“父亲要去延安，山遥路远，困难重重，而且要冒风险，恐怕难以去成。”卢焘听了，默不作声，可能他也想到确实存在不少的困难，只好作罢。

1944 年 7 月，日寇向广西进犯，桂林、柳州相继失守。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不到一月，失地千里，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进犯黔南的独山、荔波，威胁贵阳。广西、贵州当局紧急疏散，国民党政府机构也纷纷疏散后撤。卢焘全家老少从贵阳搬到黔北桐梓二女婿家避难。亡国之祸，危在旦夕。共产党主张抗日，反对投降，全国人民把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此，卢焘又想到延安去探望朱德。1944 年冬，王伯群在重庆病故。卢焘与王过去有较深友谊，他又是极重感情的人，怎能不去吊唁呢？同时，他也想到重庆后想办法去延安。他带着女婿李振麟（时任西南联合大学

副教授)随同前往,以便沿途照顾。他们到重庆后,住在广西省政府驻渝办事处。吊唁王伯群后,卢焘便直率地向该办事处主任杨孝先中将说明曾应朱德总司令的邀请,现在想到延安去参观访问。第一,请办事处拨助部分来往川资;第二,请办事处给予广西省政府顾问的证件和介绍信,以利沿途通行。杨孝先感到为难地说:“寿公,这件事我无权处理,须向广西省政府和重庆上峰请示。德公(李宗仁)、健生(白崇禧)都不在重庆,我必须电报向广西省政府黄旭初主席请示,同时向重庆有关方面反映,结果如何,再向你老人家报告。”两天后,杨孝先告诉卢焘,广西省政府长途电话答复,认为寿公年事已高,抗战时期,交通又很困难,去延安要长途跋涉,又有敌机空袭,很不安全,建议寿公不宜冒险远行。杨孝先还对广西省政府的回电作了分析,认为卢焘要去延安目标太大,可能会引起各方面注意。同时广西省政府也有不便和为难之处,怕负责任,不敢办理通行证件。因此,杨孝先劝卢焘放弃延安之行。卢焘细细思量,从重庆去延安,确非易事。他感慨地说:“看来延安我是去不成了,过些时候,我再去找李济深和蔡廷锴他们想办法。”他在重庆稍事逗留,就回贵阳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10月10日,共产党和国民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宣布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1946年1月10日,又在重庆召开了有共产党、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卢焘当时对国内的形势好转,由衷地感到高兴。他认为中国经过百余年的内忧外患,终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今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可以过和平幸福的日子了。可是政治协商会议才结束三个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一方面违反“双十协定”,撕毁政协决议,在美国支持之下,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掀起了全面内战。另一方面又大肆鼓吹所谓的民主,于1947年秋,在南京召开所谓的制宪会议。卢焘作为广西地方人士代表之一,应邀参加。

卢焘去南京之前,又萌发了去延安的念头。他先去柳州和在那里经营农场的儿子卢慈仪商量。他告诉儿子,准备去南京后找李宗仁,想请李宗仁设法帮助他去延安探望朱德。卢慈仪很理解父亲的心情,但是他觉得困难不少。他提醒老人,现在蒋介石大打内战,实行恐怖统治,对共产党人、民主人士,甚至同情共产党的人,都大加迫害,如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就先后在昆明被杀害。柳州、桂林等地很多民主人士,进步学生也遭逮捕。他力劝父亲到南京后,行踪和言论都要特别注意。卢焘说:“我知道目前的形势的确很复杂,但去延安是我一生的愿望,我总得去一趟,心里才能平静。”卢慈仪无法再劝,又不敢拂逆父亲的意旨,最后只好说:“如果你老人家坚决要去延安,那就将我们全家迁往香港,你看能办到不?”卢焘沉思良久,最后只说了一句:“我到南京后再说吧!”卢焘到南京参加制宪大会期间,内战迭起,形势紧张,他想到延安的愿望又成了泡影。

#### 4 关心爱护进步青少年

在贵州的几十年中,卢焘将军不论在位掌权,还是引退闲居,对于凡是“两广”特别是广西家乡来到贵州找他办事的人,他都予以热情接洽,提供方便。特别是对于有求进步的青年人,他都能量才适用或以推荐,使广西在贵州的地方政府中官达县长(知县)、专员(道尹)、厅(局)长和在黔军中官至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的广西人多达30多人,如王哲渔、林俊廷、郭绍樱、龚献之、张祖谋、周朝杰、简保真、桂三岛等。仅宜北县就有覃占鳌、蒙侠、覃秉政、覃文渊、莫树三、卢尹、覃文化、蒙继偕、卢扶明等人。对于被国民党打入监狱的革命进步青年有求于他时,他都想方设法,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如新中国成立前曾任贵阳市副市长陈职民(广东人)的儿子陈明忠,在广州中山大学高中部读书时,因思想进步,开展革命活动被捕入狱后,卢焘将军当即就通过陈济棠把他救出来,新中国

成立后陈明忠已成为我党的一名高级干部。又如在广西在贵州参加地下党活动的蒙炳、覃有莘等近 10 名青年先后被捕入狱后，卢焘将军都曾经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王家烈、龙云等斡旋，使这些革命进步青年都很快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被营救出来，让正气压倒了邪气。1948 年 5 月，卢焘将军在南京参加国大会议返回贵州时，顺道回到了离别 42 年的家乡广西宜北县探亲，他曾表示欢迎家乡的失学青年到贵阳去找书读，于是有八九个青年学生相继来到贵阳，吃住都在卢焘的家里，将军的家原来就有 13 口人，再增加这么多人，吃住就成了一大问题，但将军二话没说，让大家挤挤就行，为了勉励大家克服困难，将军还特意在大门贴上一副对联：“能咬菜根方是汉，安居漏屋乃称贤。”同时，他还常对青少年们说：“不管环境好坏，都要善于乐以自安，才能上进，才能有所作为。”

卢焘平易近人，喜欢跟后辈青少年摆故事，他善于用故事来启发教育他们。比如他常讲这样一个含义深长而且富有文学性的故事：

清朝年间，都匀有个陶八公，从小就勤奋好学而有胆量，十二岁成为童生，后来考取进士，进京当过官。有一年，都匀地方人士集资修复文峰塔（位于都匀城东龙潭口），修成之后，就请都匀府太爷去鉴赏（相当今日的剪彩仪式）。当府太爷出巡时，所经街道两旁群众必须回避，不许出来探望，独有十二岁的陶童生敢于站在门口观看。府太爷很不高兴，就命随员把这个敢于冒犯的小孩抓起来。陶童生毫无惧色的说：“我是童生，想看一看老太爷的风采。你是地方父母官，怎不允许老百姓观看呢？”府太爷没法，就说：“好吧！你真有童生之才，我带你去看一看试一试，如果没有其才，就判你父亲管教不严之罪”。那时文峰塔下面周围有十二棵松树，树比塔矮。府太爷就命陶八公以文峰塔为题吟一首诗。陶拿起笔稍思索一下就写：“小小青松傍塔依，塔高松矮不相宜，塔高已定松犹长，松长高时塔又

低。”这一首诗含义深长，启发教育青少年要有雄心壮志，奋发图强。后来陶八公考取进士，在京当官多年，地方人士无不吹捧他。当他弃官回乡以后，那些文人学士、豪绅对他又另眼看待了。有一次都匀地方一些学究邀陶八公到文峰塔下饮酒吟诗作乐。他们在酒兴方酣时行酒令，规定都以带偏旁的字作起头，每人作诗一首。

第一个说：“有水也是溪，无水也是奚，去了溪边水，加鸟变成鸡。得间猫儿强似虎，脱毛鸾凤不如鸡。”这是有意奚落陶八公。

陶八公不示弱，马上接着说：“有水也是淇，无水也是其，去了淇边水，加欠变成欺。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第三者看势不妙，怕他们闹翻脸，便抱着谁也不得罪的态度，作诗一首：“有水也是湘，无水也是相，去了湘边水，加雨变成霜。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这个故事，就是将军鼓励青少年的，为人要有志气，要有进取心，既不为有权势者所吓倒，也不能以势利眼光看人。他常说，人无贵贱，事在人为。要能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古来就有：“茅屋出公卿，棚门出大圣。”后来，这些青年学生个个努力争气，绝大部分毕业后都在贵阳当地找到了工作，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

据曾任贵阳市政协副主席孙家骐在《卢焘将军》一书中撰文回忆：

卢焘老伯和我父亲孙竹荪是多年挚友，据我所知约有50余年的友谊，互相往来非常频繁，诸事共商。子女辈的往来也亲如手足。卢老伯的四子卢慈仪与我是兄弟般的关系，现在都是70多岁的人了，虽然各居异地久不通讯和见面，彼此都仍感到想念！

现在可以回忆永不忘记的有几件事：当我在小学念书时，每当三月，卢老伯家都要邀请至亲好友去金锁桥外“慈母园”踏青。在那桃红柳绿，苍松翠柏，溪水潺潺的“慈母园”，到园的亲友是非常尊敬已故的慈母，悼念已故的慈母更感到子孙的孝意！那时我很小，



1949年，卢煮将军与亲属们在“半日山庄”合影留念

只知道好玩，到处跑来跑去，不懂得悼念老人的含义。最难忘的是卢老伯看我很小，摸着我头问：“有多少岁了，在哪里读书？”我回答在正谊小学读三年级。卢老伯接着说：“正谊是我们贵阳最好的学校，要好好读书，将来才能好好做事为人。”现在想起卢老伯的话虽不多，“好好做事为人”的含意，对我一生有很深远的意义，谆谆教诲永不忘记！1939年4月2日，日寇飞机轰炸贵阳，城市中心遭到严重破坏。火海一片，炸弹不停爆炸，老弱妇幼尸体遍地，处处是悲惨的哭泣声。木结构的房屋烧毁约一半，市民惶恐不安，畏惧心理难以叙述。为了避免再遭到日机的轰炸，政府动员市民疏散。卢家与我家就相互约定疏散到小宅溪避难，并搭盖简易瓦房和草房以避乱世。卢家的房屋取名为“半日山庄”，我家的房屋取名为“思危山居”。两家仅路面相隔，往来更如家人。当时我在大夏大学理工学院念书，离家较远，只好住读，但逢节假日我都要到小宅溪看望家人。一次回家时正碰上卢老伯，他见我回来，很高兴地问我：“都长

大了，在哪里念书，学什么，读几年级？”我都一一回答。卢老伯又接着问：“校长是谁？”我回答说：“校长是王伯群。”卢老伯说：“王伯群与我共过事，他是兴义县人，是日本留学生，当过交通部长，他的思想比较开明，这个人办学可以。”卢老伯很高兴地说道：“你学的是理工科，这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现在日本鬼子对我们武力侵略，占领东北，攻打上海，轰炸内地和贵阳，其中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他们科学比我们发达，武器先进。我们吃亏就是科学不发达，武器落后。再加上国内军阀割据，人心不齐，当然要受人家侵略……”卢老伯这一席话，当时我还不觉得怎样，认为都是那时存在的一些客观事实。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含有卢老伯对当时政府的腐朽无能的不满。卢老伯对我的关心和鼓励是非常殷切的，至今还难以忘怀。此外，卢老伯为人厚道，对人诚恳，办事正直，生活简朴等都是我一生敬佩的。

1949年11月14日，贵阳市解放前夕，卢老伯为了保护全市老百姓的生命财产，迎接解放，遂被国民党的反动军官刘伯龙所杀害。噩耗传来，全市人民十分悲愤。当时我正在“慈母园”老伯家中，闻听之后，又悲又气，不顾个人安危，便与友人共同奔去受害之地。到达后只见卢老伯遍体枪伤，躺在地上，此情此景，路上行人无不悲愤。我们同去的人根本不顾安危，当即将遗体用担架抬回“慈母园”。事后，我又同几位朋友和同学筹组治丧事宜，以尽到子侄辈的心意。



1948年，卢煮将军与女儿卢慈达（左一）、长外孙覃栋梁（右一）摄于广西柳州



1932年2月，卢焘将军部分子女、亲属摄于广州，后右一覃文渊，后右二卢慈仪，后左一卢慈定，后左二覃文化，中右一卢慈明，中左一卢慈达，中左二卢慈祥，前左一佣人，前右一覃栋梁

治丧委员会由军民共同组成。代表政府方面的有苏振华、杨勇、秦天真等领导同志，地方上的都是有声望有代表性的父老，我们是分工办具体事的工作人员。召开追悼会时，国家领导人朱德、李济深发来唁电。全市老百姓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前来悼念，人数达3万人以上。

卢老伯牺牲已经43年了，今年又是老伯110周年诞辰，特写此文，以寄托对卢老伯的哀思。

## 5 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自食其力

卢焘将军与覃清德女士，共养育子女8人。尽管将军一生戎马生涯、转战南北，军务政务特别繁忙，但他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即使在战乱频繁搬家的年代，只要家里每到一地，再忙他也要考虑

小孩的读书和教育问题，叫部下尽快帮其安排好。平常一回到家，他要求孩子们对人要尊敬礼貌，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空闲时，他就给孩子们讲故事，鼓励他们勤奋学习，教育他们长大后要自食其力，不要靠着父母“吃老本”，不搞特殊化，要为人民办好事，做好人，报效祖国，为国家多作贡献。同时他还常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教育子女们说：“为人要有志，处世要谦恭，治学要专心，生活能耐苦，办事要公道。”从他给8个子女起名所取的“慈”字来看，就知道将军对子女的教育和要求是仁慈的，希望子女们不要做出任何损国害民的事情。在将军的严厉要求下，他的8个子女中，除次子卢万水年幼时早逝外，其余7个子女个个都受到中等教育以上，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大女卢慈祥，师范毕业，嫁乡人时任少将处长覃文渊。二女卢慈明，师范毕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贵阳小学校长和贵阳市政协委员，嫁贵州省桐梓熊少逸（曾任周西城部下团长）。三女卢慈定，中专毕业，嫁土建工程师李松年（广东人）；长子卢慈仪，中山大学附中毕业后，黔、桂、粤、滇当局王家烈、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龙云及将军有关部属等高官，都曾经安排其到军政部门任职，但都遭将军拒绝。将军认为政坛复杂，男孩子不宜从政，让其从事实业为好，于是在李宗仁、白崇禧的倾力支持下，卢慈仪在广西柳州西北郊（现柳钢所在地）经营了几千亩的大型农场，新中国成立后已划归国有。卢慈仪后转至广州经商，曾



1997年10月，卢焘将军的儿子卢慈仪（左）与表弟郭忠凯摄于广州

任广州市政协委员,2007年8月中旬末(即本书写作期间)病逝于广州,享年93岁。生前娶澳大利亚华侨富商刘某之女刘佩媛为妻,生卢青还、卢青冰、卢青田、卢青兰四人,现分别居住在广东惠州、美国、香港、加拿大等地。五女卢慈达,广东中山大学毕业,嫁李荣波(广东人,曾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和泰国华商矿业公司任地质师)。七女卢慈和,贵阳师范毕业,曾在上海市政协工作,并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嫁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李振麟(山东济南人)。八女卢慈平,高中毕业,嫁河北国民党少将参议王虎臣(又名王孚忱),1945年9月病逝。

如今将军的孙辈们,分别在广州、深圳、香港、美国、加拿大、上海、杭州、太原、北京、柳州、宜州、环江、贵阳等地,从事教育、科技、商贸、建筑、餐饮、行政、军事等工作。他们当中,大多都事业有成,有的甚至身居要职或成为富商等。

## 第二十三章

# 造福桑梓,创办学校, 兴办农林场,关心地方政治

### 1 建议修整白龙洞

1922年5月,卢焘拥护支持孙中山北伐,率领黔军所部和滇军5旅南下广西。当部队途经宜山庆远休整时,卢焘将军率部将数人,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登上北白龙洞游览。在山上,他对陪同的当地官员说:“白龙洞很有价值,这里有很多名人题诗题词,一定要保护好。你们可通过集资或拨款把它整好,建凉亭,修好路,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参观游览。”说完,他当即解囊带头捐款1000元。当他在洞口一侧看到了张铁城和石达开的和诗时,也情不自禁地和一首:

从龙心在汉,策马快腾空;  
誓灭匈奴种,同恢祖国风;  
辟疆王志壮,报国一心雄;  
愿借当年剑,踏天割断虹。

张铁城的和诗为:

怒气满天冲，头颅掷半空；  
同胞溅血雨，民贼长蛮风；  
革命灵应显，吞胡志愈雄；  
壁留千古恨，余怨隐长虹。

石达开原诗为：

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  
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  
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

卢、张两诗态度鲜明，铿锵有力，曾轰动国内一时，不少报刊也曾纷纷转载，加以评注。据说，卢焘将军建议修整白龙洞，后来得到采纳。几年后，白龙洞的面貌便有了很大的改观。

## 2 创办贵阳两广中学

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都匀市民建主委的周朝杰（广东人，卢焘将军遇害时周是收尸人）撰文回忆：

1947~1949年，卢焘将军当选担任两广同乡会理事长，全体理事计有：王哲渔、张祖谋、伍白夫、周朝杰、李典科、蒋健民、梁兆源、梁培、曾剑光、王树森、陈自强。有一次在召开全体理事会议中，卢公即席提议说：“贵州人民生活艰苦，文化科学落后，文盲多。贵阳市是贵州省会，学校太少致使失学人多，我们住在这里，人人都应有关心后代的责任，我现建议利用同乡会房屋财产创办一所学校，请各理事讨论发表意见……”他又说，做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但

我们要有决心，困难就可迎刃而解。我们同乡会的房子虽被人占用，耐心说服交涉，是可以收回的。利用这个好条件为社会上创立点福利事业，学校办成后，各人的小孩读书就有了机会，这是好事嘛！当时与会者在他的感召下一致表示赞同。他又说“打铁趁炉红”，即席分配各理事任务，分别办理建校各种手续，指定伍白夫（是当时教育厅秘书长职）负责聘任校长、教员，并由陈自强、王树森、蒋建民等办理申请备案报告，由梁兆源、李典科（是当时房地产管理局工作人员）负责交涉收回同乡会能做学校的大房子（重点就是南门医学院占用的房子）。经多次交涉，无法收回，医学院院长朱懋根强调，他也是办学，不肯迁让。卢焘说：“我们可向上级有关部门、有关人士反映，争取社会贤达支持。”他说之后，有一天，他就约定王哲渔、张祖谋、周朝杰、梁兆源等一起去当时贵州省参议长平刚家，以办学相告，请求支持。平那时虽属模棱两可，唯唯诺诺，但经卢焘多次与他磋商，事情终于得到完满解决，医学院迁走了，学校成立了，由卢焘将军定名为“两广中学”（现为贵阳市第三中学），于1949年下半年正式开学上课，第一任校长是陈本昌，教导主任蒋平。

卢公住在贵阳市北郊区域外，离城数公里，在筹建两广中学过程中，经常步行到城里办理学校事务。由北到南不下十数公里，来回不怕困难，以履成步，任劳任怨的吃苦精神，在文化战线上为贵州造就人才，作出一定贡献。

### 3 关心广西省立十一中

在广西宜山，原省第十一中学（原宜山高中，河池市高中的前身）也得到他的不少支持和帮助。他认为，十一中是整个桂西北诸县培养人才的摇篮，要办好这所学校是整个桂西北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每次回到宜山的时候，都抽空去学校与师生们谈心了解

情况,有时还给师生们作传统教育或形势报告。遇到学校有困难,他则尽力帮助解决。20世纪20年代末,十一中刚恢复(20年代初曾停办5年),缺乏经费,于是他曾多次出面向广西的高层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求情,使学校得到了省政府的几次拨款。1935年,学校缺乏图书,他又慷慨解囊万余元捐给十一中,并委托曾留学日本、后曾代理过宜山县长的本地人黄人震等,到广州购买一批图书。当船返至梧州靠岸休息时,黄等人应朋友之邀,在旅馆打起了麻将,由于通宵“激战”,失去了警觉,被“抬轿人”把所购的书籍偷去了大部分,仅剩下《万有文库》等一小部分图书运回十一中,现此书仍存于学校图书馆内。后来,黄对此事曾多次向卢焘将军自省自责,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县中任教时,还经常向学生述说此事,告诫他们一定要远离赌博,以免贻误事业。1936年6月,中央用兵于桂,卢焘将军就任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蒋桂和谈后,就国军解散复员余下的20万元经费,在全数交回广西省政府时,卢焘只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即请省政府从这笔款项中,回拨1万元给十一中作为教学经费。1948年3月,卢焘将军在南京参加国大代表会谈期间,曾联合广西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尽快改善桂西北诸县交通和文化教育状况”的议案。

#### 4 兴办农林场

1932年12月(蒋介石政变后),引退多年的卢焘将军觉得闲着对不起人民,于是他返回宜山,召集亲朋好友,动员他们以造福子孙为宗旨,联合兴办农林场,为社会作点贡献。在他的倡导下,当时庆远城内的原国民党少将参议杨景星、原广西省府内务司长林耿凡、原国民党黔军上校参谋长郭绍缨、大商人简葆真等都积极响应,并与他联合创办了同德林场(今洛西镇妙调村背福岭)。该林场面积达3158.8亩,种松60万株、杉10万株、桐26万株。其经营形

式实行股份制,管理人员由场主出钱聘请,工人则招收农村中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并让他们搬到林区来居住,同时在规定范围内让他们垦荒种植各种农作物,以维持平常生活。该林场是宜山民国年间31个林场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效益最好的一个。其做法曾得到当时广西省政府的肯定和推广。新中国成立后,该林场归政府所有,现属国营流河林场管辖。1943年秋,卢焘将军还到柳州郊区与他人合作经营东古陵农场,先后种松140余万株、桐2.5万株,收入可观。

## 5 关心地方文化

在宜山、柳州兴办农林场期间,卢焘将军闲时还应地方文化人士之约,为出版宜山著名诗人璩宣仁《咏史百首》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亲自为该书题写了序言。其序言如下:

咏史之作,体裁有三。有咏事者,如李峤汾会王维夷门歌之类是也。有咏地者,如刘禹锡咏西塞山李太白咏凤凰台之类是也。有咏人者,如陶渊明咏荆轲江文通咏刘琨之类是也。体裁虽殊妥?皆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远瞻高瞩,动人感叹。所谓诗可以兴者,庶几见于前清许贞干先生,编遥集,集取咏古七律,以为程式。唐至明为四卷,清为十卷,搜罗宏富逸气喷涌,假中展读真有王处仲击碎唾壶之慨。而不意吾邑僻远之乡,竟亦有此珍宝也。吾邑湘帆璩先生素擅能诗之名,焘束发受书即知其敦品,历学裁成后进乡望最后而早岁徒戎于外,军务倥偬未获睹先生著作,乙丑归里始见读史百咏一卷。其论事也,可以开拓万古之心胸。其论人也,可以推倒一时之豪杰。然则非具才学识三者不能修史,非具才学识三者又何以咏史乎?先生生长边方挺然独出宝能于遥集,集外别树一帜,焘朝夕讽诵乡向往殊深,诚恐碎简零编,日久散失,负先生一片苦心。搜索集成帖,录付手民精印,以广流传而志钦仰云。民国丙寅岁

除日乡后学卢焘谨跋。

璩宣仁(1812~1835),字湘帆,宜山县桂鱼街人,16岁时考取增生(即一般秀才),以后在家读书作诗,不图进仕,咏史自娱。他所写的《咏史百首》是一部咏怀我国历史人物的诗集,全书为七言律诗,对自唐尧以下至清世宗为止的历代帝王、名臣名将、文学家、诗人及英雄志士,如秦始皇、荆轲、楚霸王、刘备、诸葛亮、李白、杜甫、赵匡胤、刘伯温、苏东坡、岳飞、黄庭坚等,共计104人,进行评论吟咏,一人一首,或讴歌感慨,或痛贬斥,皆发自肺腑,铿然有声,尤其诗律文采,工稳华丽,确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当时他曾抄寄给时任广西提督学政(学台)池春生,池阅后即予以复信并赠诗四首,极加赞誉:“竟有此才生此地,宜山草木亦精神。”

《咏史百首》出版发行后,曾在国内十分畅销。可见,卢焘将军对繁荣家乡的文化事业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6 关心地方政治,为地方人民说话

卢焘将军尽管晚年无一官半职,但他仍十分关心地方政治。1947年春,广西各地进行立法委员选举工作,柳庆专区仅有一个名额。当时柳州方面已推荐覃连芳(曾任军长,中将)和张任民(曾任广西绥署参谋长,中将)参加竞选,而庆远方面推荐指标却一个也没有,于是以卢焘将军为首联络了庆远地区的杨景星、林炳华、郭绍樱、简保真等60名知名人士,联名向省选举委员会推荐庆远街韦月石(韦月石曾在陕西任过师长、中将卫戍司令等职)参加竞选。并发出《宜山地方人士推荐韦月石竞选立法委员敬致父老书》,文书指出:“我柳庆区各县贤能伟人,代有杰出,而代表民意应不独付阙如,方足以代表真正民意。兹查有韦月石将军,为我地区适当

人物之一。韦出身乡里,走遍全国,民间实情了如指掌,若当选为立法委员,既可代表我区大众民意,且可为本省杰出人物之一,似为理想适当矣。现在选举即届临,同人等为求大众及国家选拔真才计,以客观地位爰将愚见及冒昧陈之,尚望我至爱父老,姐妹兄弟,暨地方贤达幸诸公垂察焉。”经省选举委员会批准,韦月石最后成为柳庆地区几名候选人之一。虽然结果韦没有当选,但却代表了庆远方面广大群众民众的意愿。

1946年夏,经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力荐,卢焘将军被广西各界群众推选为国民制宪大会代表,广西区域仅有22人。1947年8月,卢焘将军到南京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制宪国民大会,卢焘将军被聘为“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会长为孙科,副会长为曾琦、徐傅霖、莫德惠、张继,秘书长为洪兰友。

1947年11月,卢焘将军又被家乡广西宜北县各界群众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全广西共有99名代表。次年春,卢焘将军从贵阳乘飞机赴南京参加了国大会议。会议期间,卢焘将军曾联合广西其他代表向大会提交有关桂西北诸县交通、教育、卫生等落后的议案。尽管此议案后来不了了之,但也毕竟反映了一方民众的要求和愿望。

与此同时,1942年卢焘将军在柳州照料林场,借居超凡妹(即卢小姑)的“息尘寄庐”时,乃约张任民、阚德轩诸好友,一起拟文呈请广西省府转国府,明令褒扬先烈张铁城(辛亥革命被袁世凯杀害)。1944年5月,卢焘将军等收到了广西省府转来国府1月11日批准张铁城为革命烈士的通知书。这样,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近30年的张铁城烈士,终于含笑九泉。

## 第二十四章

# 晚年生活平淡，怜悯民众疾苦

### 一 生活简朴，乐于助人

贵阳地方人士评论卢焘一生为人，有“四不”、“三正”、“二爱”、“一乐”。四不就是不争权夺利、不修建公馆、不讨小老婆、不抽大烟。三正就是为人正直、办事公正、作风正派。二爱就是爱国、爱民。一乐就是乐于助人。他出身贫苦，又历尽沧桑，所以能体验时艰，体贴民情，不慕高官厚禄，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又乐善好施。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他都乐意去做。遇到别人有困难，他也尽力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支持。他不贪、不受贿、不取分外之财，堪称为政清廉的楷模。

20世纪40年代以后，卢焘将军的“公务”（自卸任省长职后，卢焘就很想归隐山林，无意政事。但客观上他不可能隐居，依然摇摆在军政界之中）似乎减轻了许多。除了1946年、1948年飞赴南京参加制宪和国大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居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有时到广西柳州、宜山照料农林场，小住数月，有时甚至还到滇、川、渝、鄂、湘、粤、沪、苏、皖等地旅游。卢焘将军晚年的生活非常简朴，住的“半日山庄”正堂中间，安放着装在高5尺、宽4尺镜框里的其母湘绣彩色坐姿遗像，像架前摆着一张香台，台上放上一

鼎形香炉和一瓶鲜花，台前摆一张八仙桌和几张油漆木器漆椅，当做用餐的地方。卢焘将军的卧房兼书房和会客室，室内放着一张书桌，两张藤椅，有时客人多了就从上房拿几张木椅来。壁上只挂一张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两边相架里放有几张他任军职时的照片和几张家庭生活照，在卢焘的家里是看不到蒋介石的照片的。

书架上放着各种线装书本，侧壁挂着一幅山水画，一幅字画。将军曾在房门写一对联，其中上联是“客来打，各去要，独居陋室看尔雅”，下联是“酒解愁，酒消忧，暇倚纱窗读春秋”。说明将军只有在客人来的时候才打打麻将消遣，其余的时间大多是在读书写字。

将军的穿着也很朴素，就是请客赴宴，也从没有见他老人家穿过高级的衣服。彭济美老副官曾说：“老太爷（贵阳群众对将军的尊称）当总司令时，除了检阅部队及大典时穿上挂衔的礼服外，平时都是穿普通军装，有时还穿便服或长衫，我想人家当大官穿得那样讲究，实在憋不住了，有一次就同老太爷讲，要给他做几套好衣服。你看，老太爷不但不赞同，反而瞪我一眼，说：‘你呀，睁开眼睛看了没有，多少老百姓现在穿怎样的衣服？……’说得我哑口无言。后来，我在路上看见那些穿着华丽的大官、公子、小姐们和一些穿经经、绺绺（贵州方言，即破烂衣服）的老百姓就想起老太爷的话，也体会到他老人家的菩萨心肠啊！”

在饮食方面，一般说来，在旧社会凡是当大官的，生活上一定是很讲究的，餐餐山珍海味，三盘四碟。卢焘却不然，早餐很随便，稀饭、糊糊都可，有时只是一杯鲜奶。中餐要到十一点等外孙儿女放学回来同桌吃饭，一般是两碟普通炒菜，一碟酸辣或一碟腌甜姜、一碗汤。一个星期吃一两次他最喜爱的清炖或红烧牛肉。将军很少喝酒，节日高兴也只是喝一小杯葡萄酒，平常基本不喝。

卢焘将军晚年的生活来源，主要由退休金，兼任贵州、广西两省政府顾问佣金，农林场收入，以及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王家烈、谷正伦、龙云、卢汉等诸好友和旧部属照顾接济等组成。尽管收

人不算很高,还有家里 13 口人的吃饭穿衣,礼尚往来等,但他仍然坚持乐于助人。如家乡来贵阳求学找工作的近 10 名青年吃住在他家,老部属和老乡亲友等生活困难的也找到他等等。

据将军讲武堂老同学金汉鼎回忆:1911 年滇军援川到重庆时与卢焘分别,直到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才在贵阳与卢焘重逢。知道他的生活很艰苦,经济多是旧属好友照顾,但是他是一个穷而好施的人,左手收进,右手送出。过去的部下或乡亲友人生活困难者找他,从来不曾让人空手出门。听说有一个副官曾多次向他求助,总没有使其失望而去。他的儿女们都觉父亲有点怪癖,都这把年纪了,有好东西不知自己享受,反而一一转送他人,自己却是受清苦。

抗战胜利后,我在柳州和卢焘见面,知道卢焘也想去广州,便约他们同行。他说:“你所到地方都有人接送”,并坚决不肯与我同行。后来杨孝先(系卢部下)送给他旅费,到了广州我们又相聚在一起,他带我到河南去看一幢两间铺面比较宽敞的房子。他说就是上次向他求助的那个副官,在日本投降后骑自行车来往于金城江柳州之间贩运旧货赚了钱买这间铺面送他的,那位副官没有忘恩负义。可见寿公威德的感人是那么深……

还有 1936 年“六一”事变结束后,卢焘到广州设法去找陈济棠和香港商人,叫他们来投资开发广西、贵州公路网和开发合山煤矿等事宜,他在广州逗留期间,自己在河南有一幢房子不住,却让在广州读书的同乡学生住宿,他自己去河南凤凰岗租姓潘的商人房子住。

## 2 不搞生日祝寿,不收受节日礼物

农历九月初一是卢焘将军的生日,无论是在任职还是离任期

间,他都极力避免别人为自己祝寿,1948年的生日,除了家人为他说几句祝寿的话外,别的什么也没办。那天,同乡族侄卢仕廉问彭老副官:“往年寿公的生日是怎样过的?”彭老抹抹白胡子说:“侄少爷,你不晓得,大概是上前年,老太爷生日那天,一大早,他老人家还没有起床,我们就看见村口那头有十多个人,挑的挑担子,提的提篮子向我们家走来,一看就猜出是祝寿的客人来了,我们赶忙去向寿公通报。他老人家知道后,连房门也没锁就跑到上房避开了。客人一进门就高喊:‘向寿公拜寿!向寿公拜寿!’我们说:‘谢谢阿叔、阿婶,大家的盛情,很抱歉,老太爷前天已去重庆啦!’他们哪里肯信,有一个人说:‘昨天我给人来看,还见他老人家在屋。’几个客人直闯到寿公卧房,一看,便哈哈大笑,说:‘你们看,房门都没上锁嘛!被子床铺还暖暖的呀!’他们断定老太爷是不会远出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自己带来的寿酒、寿菜、寿面(梳理成山形竖在盘子里,寓意‘寿比南山’)摆满一桌。除了一两个客人和带来的两位厨师下伙房外,其余的坐在堂屋与家人聊天。有的自管摆开八仙桌摸起麻将来,大概到十二点钟,祝寿的寿席都整好了,还不见卢焘回来,可能他们熟知寿公的性格,也不再追问,随便吃点便饭,悄然离去。第二天老早,寿公就叫我们把昨天来的客人一一请来。我问老太爷:‘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这个门一开,城里城外的客人就会相继而来,老百姓这样忙,生活也不怎么好,我们能大搞祝寿吗?这门开不得。’”彭老换口气接着说:“我们住湖南沅陵时,老太奶的生日,各界人士都送来寿礼,老太爷一个也不收。当总司令、省长时也是这样,有时离生日两三天就带我们出巡去了。”

“还有一次过年,有几家农民提着篮子给卢焘将军送年礼来了,你看将军怎么办,他马上叫家里人把红纸条写上各家各户的名字及地址压在篮子里,然后收到上房去,有的一定要篮子回去,将军笑眯眯说:‘不要急,等收拾好礼物以后再给你们嘛。’第二天一早,将军给每家封了一、两块钱不等的红包,连同送来的礼物,叫家

里人按地址一家一户地送去。家里人不理解纳闷，将军则说：“这些乡亲太好啦！这种年成，一年辛苦到头，生活还是很困难，送礼物是人情世故，我们领情就是，不能要他们的。””

### 3 水庙题联，与家人同乐

1949年冬，家乡来的几个年轻人和将军家人等围着旺盛的火盆取暖，将军给他们摆起龙门阵。摆的是“父母官”。他说：旧时人称县知事（县长）为“父母官”。某县知事，在任三年，廉洁奉公，体贴下情，政通人和，物阜民安，人们都叫他“父母官”。某晚，知事微服私巡，近鼓楼边（是乡民夜会聚集处），有奏乐弹琴、有男女对歌、有谈天论地、有谈时政、有道唐论宋，各尽其兴，热闹非凡。知事蹲隅察听，人皆不知。此时论时政的，皆赞当今知事是个“父母官”，唯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侃侃而谈：“我今年二十有五，家贫无室，既是父母官当爱民如子，我其子也，何不唢呐聚室，我说，知事非‘父母官’也。”知事听在耳里，记在心头，私询小子姓名住处。

翌日派差逮捕该小子，并出四门张贴：“为告示事，本官莅任数载，政通人和，物阜民安，盗贼敛迹，四境安宁，遐迩赞誉，唯有城东郊顽民阿三，懒惰成性，廿有五尚未立室，竟肆意诽谤父母官，依律拘之严办。谳定于七夕，施以最新刑事，受告示周知，届时临场观奇，门票每人五文，仰众民勿失机缘，切切此示。”

众闻告示后皆叹悔，彼夜鼓楼不该乱谈，阿三年轻，为人憨厚，有思直言，是谁告密于官？缺德，缺德。众皆为阿三的性命担忧。

开审之日，从寅时起，四境男女老少络绎而至。入场首门，无卒把守，只有二徒手看管盛钱大箩，众皆惊奇。正午时，鸣三炮，知事登台（台设在府内广场），一声令下：“提案犯上！”只见二吏押着阿三至台下。“既是刑犯，何不系镣铐？”众疑惑不解。忽听台上知事代审官高声讯案：“顽民阿三，某月某日夜于鼓楼下，为何诽谤本县

父母官？从实招来。”阿三从实招供不讳。场内人山人海，无不咋舌。

继而，代审官高喊：“阿三，尔该当何罪？”

阿三亦高声回答：“由父母官处置。”

又问：“今后还想不想娶妻室？”

答：“不敢再想了。”

全场哄笑，知事起身，向众宣布：“本官空负‘父母官’之虚名，任职数载，属有寒困而未婚娶而不察，何谓‘父母官’之有，此乃失职，负疚于民。唯本县清风，独力难济，今日奇审，实集众腋以成裘，赖众援为阿三成亲。”随命招盛钱巨箩上，鞭炮、唢呐齐鸣，新娘彩轿自台后而出，当场给阿三换上新装，系红绸大花，吹吹打打，万人送亲。城乡四境沸腾，传为佳话。

还有小哲溪村头公路边有棵古槐，树旁有座土地庙，经常有人去敬香，点烛烧纸钱，祈求神灵保佑。1948年春节，将军要侄儿卢仕廉写一副“只有一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不做半点事，朝来拜，夕来拜，叫我为难。”的对联贴在庙门两边。将军说：“以前曾有人写‘只有两文钱’，既有两文钱，给你一文，给他一文，就算了事，何必说‘给谁是好’呢？若写只有一文钱，才有‘给谁是好’的问题嘛。”卢仕廉连说：“对！对！改得好。”

#### 4 外出走访，联络老友吟诗自娱

卢焘将军晚年，还经常到云南、四川、湖北、江苏、上海、广东、湖南、广西等地走访旧属、老友，顺便旅游散心。闲空之余还经常与他们写信联络。如他在1947年给覃连芳（广西柳州人，字武德）军长写信时，就充满了乐趣：

武德兄：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那天，同车到柳，第二天就是今年的元

旦。我因忙于回贵阳过阴历年，所以天天过河问车，想到各朋友处问候都没有时间。想彼此都同一样的忙碌，故不得去面辞就偷偷地走了，实在我有罪了。到现在接你三月三十一日的信，说我实在是使你们想念我了。我亦不晓得怎样修得到，会使你们想念啦！我一不有德行，二不有言语，三不有政事，四不有文学，怎么会使你们想念呢？今天得你想念，是我平生可以无憾了。去岁因（要）开国大，两次同机，得你的益处很多，使同仁们不感困难，不受寂寞。你那活泼样儿，一勺之多的胡子，卓必（别）灵（林）的帽子，实在是使我常常想念，深印我脑际。每在好友面前，常说你的为人，像一团火一般，到一处就暖烘烘的，使人精神为之奋发。并且有经验，有理想，有谈论。这次被选入宪政实施促进会充当常委，就凭借你的经验，参酌你的理想，发出你的谈论，同国中的一班学者，折冲在议坛上面，一定收得到顶好的果子，一定不负几度的飞来飞去，受尽机车的劳顿了。切莫学那有其心无其政，有其政又无其心，就像平时常笑他们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大家唱高调，闹玩意儿，使老百姓常常望门而咨嗟。我想这次各党各派都是优秀分子，豪杰之士，冶在一炉，必能炼成一个原子能，来做救全世界纷争扰攘的基础，决不像过去那班的徒托空言，欺己欺人了。这是全国老百姓的心理，都作这样想，都作这样看。

你以为偃之言是不是呀！我的稀饭滚了，米汤冒出来了，我要去搅我的稀饭了，暂搁笔，下回再谈，完了。

卢焘三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早

1946年夏，卢焘将军从南京访友返回广西的途中，就写了不少自娱自乐的诗歌。现将摘录两首如下：

### 旅客衡阳

独宿旅馆，却是无聊，坐也不成，眠也不是，蹀躞床前，万端交

集。回思往事，萦回脑际。对此如豆之短灯，反引为至上之良伴。遂援笔成七绝数章，藉消永夜，非敢言以诗吟之，聊以当歌唱耳。

长天枯坐小楼中，似此行人莫与同。  
羨煞邻房看相子，滔滔不断论雉雄。

(我坐在这边，嘴都臭了)

为呼将伯去长沙，一路孤行倍思家。  
夜宿小房无帐挂，蚊虫咬得遍身花。

(遍身红点)

衡山初过又衡阳，满目疮痍实可伤。  
忍见难民沿户乞，故将节用解私囊。

(惜旅费无多)

夜宿桂林不能成寐，起而续衡阳之作：

浩浩衡阳记未清，匆匆行旅又登程。  
隆隆一夜经千里，隐隐朝曦薄桂林。

(火车之速也)

桂林一宿梦难成，起视庭前月半明。  
回忆柳州新亚室，朝朝稳睡不曾惊。

(吾妹早起轻行细语，恐醒我梦)  
不曾惊醒梦中人，藉此黑房养晦身。  
倘使他年犹健在，胜如府首作公卿。

(实在情形，非欺人语)

公卿我本无心作，十余年前先告脱。  
粗饭布衣甘淡泊，只求林下真生活。  
只求林下真生活，愿与二三终日酌。  
无事赋诗嫌落寞，有时还可叉麻雀。  
有时还可叉麻雀，最是人生真快乐。  
潇洒胸襟天宇阔，良朋佳侣常相合。

## 5 帮助农民争水

贵阳城北郊小哲溪背后,有一条从麻冲流来的山溪水,灌溉小哲溪坝的稻田和供当地农民饮水。1949年春,贵阳水利农牧局在麻冲隘口筑堤坝拦阻溪流,用水管接到城里做自来水(当时城里用水并不困难)之后,农民无水耕田插秧,叫苦不迭,怨声载道。他们就来半日山庄找卢焘将军告诉哀求,请寿公帮忙去找市长反映。将军二话没说,立即去信水利局说明小哲溪一带农民是靠这条小溪水养田活命,请他们把水管撤去。但是水利局没有体贴农民之所急,等待一两天不见他们行动,寿公就和附近农民一起把水管抬开,使水流下灌溉田亩,农民才得撒秧种田。后来市长何辑五给卢焘将军来信,表示道歉。小哲溪农民常念不忘这件事。如农民李树林的侄子林某1981年在麻冲对卢慈仪说:“老太爷太好啦,那年短(堵)水搞自来水,我们无水打田插秧,寿公就和群众一起把水管搬开,才得用水,那时我也参加行动,寿公为群众办很多好事……”

## 6 为桑梓请命,减免家乡粮税

1946年春,广西省议长蒋继伊(广西全州人,字伯文)电请卢焘将军以私人名义去找中央粮食部部长谷正伦(谷系卢老部下),说明广西沦陷后,损失惨重,又因连年旱灾虫灾全省收成大减,要求中央政府减免广西民国三十五年征借。将军义不容辞,立即飞赴南京拜访谷正伦,谷碍于老上司的面子,经请示中央批准,同意减免广西民国三十五年征粮50万担,并发还民国三十年和三十一年度的粮食库卷,消息转到广西后,全省人民欢呼雀跃。

事后,卢焘将军还给蒋继伊议长专门写了一封信,其信内容如下:

伯文吾兄议长惠鉴：

京桂晤谈，获益良多。……兹启者我省灾情奇重，承贵会恤恤民艰，叠次具情呼吁，更得吾兄不惮烦劳，飞京面陈谷部长，乃允减征借五十万担及发还三十、三十一两年度粮食库券，全是沾此亦可稍得喘息，不致颠蹶。但抚我虐我必有所表暴。故弟拟在此间敦请高明熟友，撰文作书，颂扬谷部长之嘉惠。于吾省以我出席国大之三十位代表及贵会两仪之名立一嘉惠碑于桂林，俾诸大夫国人皆所钦式。吾兄如同意焉，请即速示以便进行。专此敬请大安。

卢焘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于筑小哲溪半日山庄

## 7 不用公车，与民同车

1942~1943年间，卢焘将军在柳州照料林场，住在息尘寄庐与柳州市中学相邻。将军觉得闲时无事，就主动为在柳读书的家乡学生煮饭弄菜，忙个不停。他说：“那也是一种乐趣，人的生命活力在于劳动，也是为学生读书服务嘛！”1944年5月1日，国民党在柳州召开国民月会，会场在息尘寄庐对面约五十尺远。散会后，当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白崇禧到息尘寄庐来拜访卢焘。将军正在灶房里拿着吹火筒呼呼地吹火，烟灰腾腾。张、白进来就喊“寿公！”将军回头一看，是张、白和佩带长刀的宪兵进来，他赶忙站起拍着身上灰尘哈哈地笑着说：“健生（白）尚华（张）兄，平时你们两位不来，我正在吹火你们就来了……”

当时在柳州的国民党后勤部少将张蕴良经常问卢焘：“你到哪里，要不要车？”但他从来不去讨车坐。将军常说，步行既锻炼身体，又不浪费国家汽油，而且行动自由自在。将军住在小哲溪半日山庄，步行进城去近则三里远则七八里，从来不雇黄包车。他生活简朴、不摆架子、平易近人，这是众所周知的。

1947年春，将军从宜山返筑，那时还没有客车，坐的是直达贵阳的“黄鱼车”（私人或单位的运货车，通过专门搞外水的车霸与司机打交道才能坐上的），同车上贵阳的有明伦街卢用平等四人，因车头已满座，将军只好随大家上车厢，摆好行李垫坐。车轮滚动，车抛得很厉害，老人家虽不吭声，看他的神色是难受的。大约行了二三十分钟，车厢内的一个贵阳商人，发现老人家像是卢焘将军，非常惊奇，忙叫司机停车，耳语之后，司机和某商人亲扶将军出车厢，原坐车头的客人，即争相让坐，将军勉为其难，登上车头就坐。一车人哗然议论：“一个统帅过千兵万马的将军，与我们百姓同车，一点

官架都不摆，真是天下少有的啊！”

卢焘晚年生活照



日本投降后，有一次卢焘将军去南京，何应钦送他一把日军将领佩剑，回来时，卢焘穿着便装到机场乘班机到广州，当走到机门前时，宪兵一看，说：“你是老百姓，不能佩剑上机。”还想以带违禁品为名没收剑器。将军一点也不生气，只是向他指指剑鞘、剑柄。宪兵见刻有“赐寿公存，陆军上将何应钦敬赠”，立即换个面孔，敬上军礼，连声赔个不是。

## 第二十五章

## 回到阔别 42 年的家乡探亲

## 1 家乡人民万人十里相迎，盛况空前

新中国成立前，交通不便，要从明伦下柳州、上贵阳，走旱路，就要到宜山德胜才能搭车；走水路，就要坐船到宜山怀远才能搭车。要从外县进宜北县，走旱路，就要过思恩上马口洞，这条路是很少有人走的，大都由水路从怀远上船，到东兴为才的板庙上岸，爬十多华里的“闹样坡”到学强，再走一段较平的乡路到明伦。1948年夏，卢焘将军在南京参加“国大”会议结束后，回到阔别 42 年（1906 年卢焘 25 岁最后一次离开家乡）的广西宜北家乡探亲，就是从怀远这条水路经安马、长美、东兴、波元逆水而上，然后步行回到明伦的。

卢焘将军从南京回到宜山庆远郭姐夫家小住几天。在宜山，他特别交代郭姐夫唯一的儿子、商人郭云宾（其母为将军大姐，于 1939 年逃避日本飞机轰炸，病逝在庆远城郊“状元湾”村上）及其长子郭宴文（曾任国民党炮兵连长，时任宜山保安团营长）和其叔郭绍樱，一定要配合共产党解放宜山，不要与共产党为敌。叔侄三人听从卢焘将军的奉告，为宜山解放作了不少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郭绍樱任宜山县第一届政协副主席；郭云宾为县府建设科科员，其长子郭宴文在小学任教师，其次子郭忠凯参军回乡后曾在宜

山县财政局、计量所等部门工作；郭绍樱之子郭敬先为原国家一机部司级干部（已退休），其子女现均在北京工作。

之后，卢焘将军和长子卢慈仪便在郭云宾及其长子郭宴文、次子郭忠凯及桂西专署陈与参专员派的几名卫兵等人的陪同下，于5月25日到怀远，26日乘船返乡。出发前，将军怕影响家乡百姓和官员，不许随员告知家乡任何亲戚和官员。但船到东兴靠岸休息时，还是被当地的乡长和百姓知道了，他们立即电告宜北县政府莫树贤县长，县参议长覃文渊（已从贵阳回老家工作，广西省议员）。于是，小小的宜北县城从上到下，一片忙碌。莫县长一面派议长覃文渊率县府几名官员和几名县警，前往波元（靠岸码头）等候迎接；一面组织在家的其他县官及各单位领导做好郊迎及接待等准备工作。

话说卢焘将军一行自26日早晨从怀远乘船沿中洲河（即小环江）逆水而上返乡途中，曾先后在长美、东兴停船靠岸休息。27日他们在东兴乡拉打村靠岸休息时，却遇到了一件令卢焘将军很不愉快的小插曲：当天下午傍晚时分，卢焘将军一行下船后，因为人多需要找一个比较大的客栈投宿，当时船夫就带他们往时任宜北、天河、思思、融水四县联防主任覃忠家走。提起覃忠，卢焘将军立刻想到了民国二十三年初，宜北老家覃忠等几个年轻人毕业后曾到贵阳找他要求安排工作，卢焘将军当时二话没说，就给广西当局写信推荐他们，后来覃忠等人回乡后果然都得到了广西当局的重用安排。时隔10多年后的今天，船夫说要带他们去这个四县联防主任覃忠的家住，他也没有什么意见。当他们走到覃忠的家门前时，进门去联系住宿的船夫和郭云宾，就被覃忠的秘书覃恩泽赶出门外。与此同时，从覃家出来的还有另外3个人，一人手里拎着一只刨了毛的香猪，其他两人拿着刀和箩筐，他们是要把已宰杀过的香猪送去河边处理内脏的。见到这种情况，卢焘将军忍不住气，独自走进覃忠的家门，只见覃恩泽正在堂屋里跷起二郎腿抽闷烟。覃恩

泽见身着半新灰色长衫的卢焘一人进屋，便淡淡地向卢焘瞥了一眼，声色极其傲慢地说道：“老鬼，有什么事？”卢焘说：“没有什么事，只想在这里借住一宿。”覃恩泽悠悠地哈了一口烟雾，摇着右手：“覃主任不是饿钱的人，这里不能留宿。”卢焘和蔼地说：“老弟，我们是不得已才进你这里的，明天要赶去宜北县城，可是天快要黑了，你要逼我们这些有老有少的到什么地方去呢？”“真他妈的，你这老鬼口气还好硬，看我把你轰出门去你能把我怎么样？”卢焘脸色有些沉了下来，但声音仍然很温和：“老弟，那你帮我叫你们覃主任来好吗？”“他不在家，叫你滚就滚，别啰唆啦！”覃恩泽狠狠地答道。

卢焘将军想，再与覃恩泽讲下去，看来也是没有用处的，于是他临转身走的时候，从内衣袋里掏出了一张自己的名片，悄悄地放在八仙桌上，用茶杯压在下面。走出覃家门外，卢焘将军一行正准备往河边走时，一个中年男子怒气冲冲地走到覃家门前便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土匪，你们这些强盗，你们为什么捉我的猪来杀？”听见有人在门外叫骂，覃恩泽立刻从屋里冲到门外，用驳壳枪指着那中年男子，气势汹汹地说：“你小子可不要血口喷人，谁捉你的猪来杀？”“你还无赖，我老婆刚才给它们喂食时，你们过旁边就捉了一只，你们欺她是女人，她怕你们我不怕你们！”……卢焘将军一行眼看面前发生的一切，便知道了覃恩泽一伙的本来面目，于是他们不敢久留，就往船只停靠的河边去了。

卢焘将军一行走后不久，覃忠和他的三姨太才从后院的卧室起床准备吃晚饭。当他们来到堂屋的客厅时，三姨太就在八仙桌上发现了卢焘将军的那张名片，于是她立即把名片交给了覃忠，覃忠一看，突然大声一叫：“坏事了，坏事了，这是卢焘将军哦，是怎么回事？”此时坐在覃忠旁边的覃恩泽脸色突然由红变青，全身颤抖哆嗦，结结巴巴地说：“大哥……大哥……我……我……我错了……我……我有罪……”覃忠气呼呼地喝道：“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快去给我追回来！”

离开覃家，卢焘将军就打算再乘船一段到波元的亲戚家去住一晚，然后次日早晨再从波元登陆步行赶回宜北老家。正当卢焘将军一行的船只行过约一公里水面的时候，河两岸都有数人飞马过来，边跑边喊着：“卢公，卢公，覃主任叫你停船返回家里休息！”同时河面两岸还各有一艘小船从前方快速地划过来拦截。当两艘小船靠近卢焘将军一行的船只时，其中从左岸过来的小船只站着一个有官气模样的中年人，连叩三头，双手作揖地说：“卢公，老弟覃忠失礼了，老弟向你老赔罪来啦！请快转船到我寒舍叙叙吧！”站在另一艘小船上的覃恩泽，见覃忠主任对卢焘将军都如此五体投地时，他也扑通地跪在小船的甲板上求饶说：“卢公，我有眼不识泰山，我该死，原谅我吧！我过去确实干了一些对不起老百姓的事，今后我一定改正……”卢焘将军看见覃忠如此动情地挽留，加上天也快黑了，他终于同意掉转船头返回拉打住宿。

回到覃忠家，覃忠不仅命令管家把卢焘将军一行所住的房间铺盖全部换新，而且又叫覃恩泽等人迅速宰鸡杀鸭杀猪，叫来乡、村公所职员及本屯各家各户代表，在他家隆重举行了招待卢焘将军一行的宴会。宴会上，覃忠首先向卢焘将军对当天发生的事情作了自我检讨，然后代表地方长官向卢焘将军介绍了家乡的发展情况等，卢焘将军也发表了讲话，他传达了到南京参加国大会议的盛况和精神，并简要地介绍了他几十年来在外服务的情况，最后还对家乡的发展提出了他的个人意见。在讲到地方发展时，他特别强调了地方父母官要为广大民众谋利益，不要给老百姓添难题，做人做事，有权有势，都不要去干伤天害理的事情等等。

卢焘将军回乡探亲的消息传开后，十里八乡的各界群众都扶老携幼争相到明伦街，目睹这位地道从家乡本土走出去转战南北、叱咤风云 42 年的大将军的风采。5 月 28 日中午，正是明伦街赶圩的日子，莫县长亲自率领近万名各界群众，从县府大门到 10 里外的拉岳屯大路两旁，拿着欢迎彩旗，拉着欢迎横幅，等候着将军到

来。12 点刚过，当卢焘将军与去波元迎接他的覃议长等 10 多人，回到拉岳路口的时候，莫县长等官员即快步上前与将军及随员一一握手，并作了简要介绍。接着，两个献花的少男少女庄重地向将军敬礼献花。顿时，锣鼓喧天，龙狮起舞，鞭炮齐鸣，欢迎的口号声，一路响彻云霄，此起彼伏。整个欢迎场面，在几十名县警的维护下，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盛况空前，热闹非凡。欢迎场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宜北这座小山城几乎一整天都沉浸在沸腾之中，家乡的父老乡亲男女老少都争着看看久归的卢焘将军的风采。

## 2 连喝三捧家乡的甘泉水

卢焘将军谢绝莫县长已为他安排好下榻的县府招待处，而是下榻于女婿覃文渊家。然而，来看将军的群众络绎不绝，家里一下挤满了人，将军温和地对大家说：“我出去 40 多年啦！今天回来看看大家，房子太窄了，大家来，连坐的地方都没有，真对不起乡亲们啰。”大家听了，心里都甜滋滋的，自觉地前客让后客，让大家都能看到将军的面容。

两个多小时了，人群也逐渐散去，卢焘将军也起身到出生的老屋看看。几十年的兵荒马乱，房子已经破烂，只有断垣残壁略可辨认。房基后面有一块小石岩，岩边有一洼泉水，老母亲在家时，曾用竹管引水到家。将军已 40 多年不饮这泉水了，看到泉水盈池，清澈透底，将军立即跪在泉边，手捧泉水，连饮三捧，感慨万千地说：“我是吃这水长大的，一个人要饮水思源啊！”然而，眼前的老屋无房，归家无家，曾养育自己的泉水仍清清流淌，此情此景，似是游客的将军不禁潸然泪下。

卢焘将军非常关心学校教育。回到家的第二天上午，他就向莫县长提出要去宜北国立中学和宜北表证中心校去看看，莫县长本想过几天再陪卢焘将军去各单位看，但他说，后天就是礼拜天了，

要先去看学生和老师们，虽然这次回来没有拿什么东西给他们，但精神鼓励是要去的。于是莫县长同意了卢焘将军的意见。他们走进了校园，校园顿时沸腾了，当时部分学生正在上体育活动课，学生们都争先恐后地拥在卢焘将军的后面，个个都想认识认识这位从家乡走出去的大将军。校长、老师们也纷纷从教室、宿舍走出来与卢焘将军握手、交谈。不少老师因为在上课当中手上还带有粉笔灰不敢握手，卢焘将军就主动与他们握手，并亲切地说：“不洗手有什么要紧，我们家乡的人才，就靠你们这双带有粉笔灰的手栽培出来呵。”一席话，说得老师们心里暖洋洋的。当了解到学校建设资金困难时，卢焘将军对莫县长和学校领导们说：“要办好教育事业，主要依靠我们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支持，关键还有学校领导要治校有方，老师要爱岗敬业，钻研业务，教学有法，全社会要形成人人重视教育的风气，至于办学经费困难，等我见到黄旭初主席时，一定请求他给学校多拨些经费支持。”

卢焘将军回乡探亲期间，其所到所住的地方，基本上是时时客满“为患”，他和蔼可亲地用壮语同乡亲们交谈，乡亲们无不惊叹地说：“唉呀，卢公出门 40 多年，还能流利地说壮话，真令人敬佩啊！”卢焘将军总是笑嘻嘻地说：“我年纪虽老，但乡音不改，岂能忘本啊！”

### 3 在县政府举行欢迎会上的讲话

按照宜北县政府接待的日程安排，6月3日上午，县政府在国中（今明伦镇中心小学）校园里，隆重举行了欢迎卢焘将军回乡探亲大会。尽管那天细雨濛濛，但来参加大会的县府全体公职人员、各机关团体、学校、驻军及附近群众等仍有 4000 多人之众。大会由莫县长主持并讲话。卢焘将军随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各位家乡父老，各位乡亲，各位同胞们：

我离开家乡有四十二年了。但我身虽服务在外，心实念念不忘

故乡。凡是到贵州的同乡，都逐一问到地方及某家某安否如何。后来卸了任，自应回来一看，又因道路不靖，一年复一年，总没机会，故迟至今日。前年到京开会，制宪完毕，回程道经南丹，即去见莫县长，曾约去夏回来，后因病不果，迨至冬月。承各界诸公不弃衰朽，推选为国大代表，应当回来向诸公表我感谢之意，复因贵州毛前主席（毛光翔）病故于赤水，故到赤水吊丧。始于三月九日由贵阳起程坐汽车，十一日到柳州，十八日坐火车到桂林，廿四日乘飞机到首都（南京）报到，廿九日开会。（四月）十九日选出蒋中正为总统，廿九日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五月一日闭会。三日离开首都赴上海，十日乘机返桂林，十一日坐火车，十二日到柳州，廿日坐车到宜山，廿五日到怀远，廿六日坐船上来，三十日始由波元登陆步行回家。承各界诸公十里郊迎，使别了家乡四十二年的我，今天得与诸公晤一面，内心又惶恐又感激又欢喜。今日复承诸公开欢迎大会尤使我感愧和荣幸得很。前年到京制宪，因我省沦陷后损失甚大，又因连年虫旱灾，收成锐减。省参议会蒋议长继伊嘱奏向粮食部谷正伦部长要求减免五年征借。当即以个人名义致函谷部长，恳求减免。后得复函，允许减五十万市担，并发还三十年、三十一年两年度粮食库券，对于我省农民也可减少一些负担。我亦甚感谷部长之嘉惠。至我邑向称贫苦、文化落后。荷蒙县府历任官长，热心维护，始得有今日之灿烂整齐及安居乐业，与我四十年前所经见的大不相同。此亦是父老兄弟诸姊妹苦心通力补助政府之所致，故我有山河依旧，人物维新之叹。至于我本系贫寒家子，土不有一块，田不有一丘，只有三间古老屋，四十年回来连一间老屋都不见了，只见荒烟蔓草，能不慨然。追溯其因，何以至此，乃我与张烈士鱼书号铁城于清末在柳州初运动革命时，即痛恶满清的官，无一不贪污，非打倒此辈拯救良民不可。迨革命失败，被巡抚张鸣岐通缉，遂逃亡昆明入讲武堂学陆军，联同志乃有辛亥反正之举。及后带兵，只知做事不会要钱，以要冤枉钱为耻，并常念及岳武穆的话“文官不爱钱，武

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因此，只能过中、下生活，对于我邑之教育及慈善诸事业，并贫苦之亲戚家族等，毫无得助，抚心自问，寝馈难安。何以呢？孔门之贤，做官得粟，尚分与邻里乡党，大家得受浸润。我今日做官，空手出门，空手回来，未免对不起邻里乡党，邻里乡党又何贵有我耶？但是我人虽穷而志不穷，将来出外，对于我邑应兴应革之事，务竭其心力以补助之。尚望诸公，幸勿以我为夸大之词，徒托空言。我向来不会说空话，处处以诚，不敢昧心，不敢骗人。更望诸公勿以为我在外做事多年，迄今犹莫名一钱，与我辈家居无异，遂萌退志，仍株守家园，不思前进，致遗我服务中之罪人也，今天说拉杂话太多，且细雨纷纷，衣裳淋湿，时间过久，身体疲劳，恐易感寒疾，有失今日欢迎之雅意。我尚逗留时日，容后再个别谈谈，完毕，请解散。

卢焘五日夜灯下记(补记)

#### 4 走亲访友，家乡处处标语对联欢迎

卢焘将军在明伦住了儿晚，便到下关堂兄弟家住了几晚，以后又步行到东兴、龙岩、驯乐、永安等几个乡村去探亲访友。这年将军虽已近古稀，但步子仍很稳健。不论到那里，都不分贫富贵贱，有说有笑。将军做客时，吃的方面，不挑挑拣拣。有的亲友杀狗招待，他笑着说：“有鱼蓼、马蹄香酸水做盐水，好极啦！我几十年没有尝到这家乡风味了。”并信口做一对联：“莫羡他乡山珍海味，不如本地狗肉香猪。”多亲切啊，难怪一直到现在群众还赞叹着：“卢公出去几十年，当过那样大的官，一点架子也没有，不厌家乡菜，还和我们讲祖宗话（壮话），真难得。”

将军回乡，宜北县府大门、中小学校大门和现在明伦邮电局岔路口都扎五彩花的松门，贴上对联。县府大门的松门欢迎联是：

树建功勋，湘黔曾立战绩；  
荣归梓里，宜北幸有将军。

原上联是：“树建功勋，川黔曾留战绩”。当时有人认为用“川黔”不妥。寿公战绩固多，但扭转战局有决定性的战役还是在湖南湘西，故用“湘”代“川”为恰当。至于“留战绩”，人们认为“留”带有“遗留”。后来，寿公回筑第二年即被害，人们对此议论就更多了。

国民中学松门联：

男儿当自强，愿诸君效忠祖国；  
将相本无种，期吾辈取法卢公。

治安乡（现龙岩）松门联：

寿且康立功立德，  
慈而行救国救民。

将军回家，作了不少诗，也题了不少字送给乡亲，十年动乱，全部散失。现留有他写给同辈老友卢禹疏先生的条幅诗句是：

夜合花开悉满庭，  
漏深微雨醉初醒。  
远书珍重何由达，  
旧事凄凉不可听。  
去时儿童皆长大，  
昔年亲友半凋零。  
明朝又是孤舟别，  
愁见河桥酒蔓菁。

卢焘将军回乡探亲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的隆重接待。

据曾任环江师范学校教师韦大新撰文回忆：卢焘将军回到久别的故园明伦街，过几天就要到永安来。消息传到永安一带，方圆几十里的村村寨寨，人声鼎沸，人们怀着期待、盼望的心情谈论着。

1948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的同班同学永安中心校韦国衡（又名韦任）老师，飞马前来地蒙告诉我：卢焘将军于后天来到永安街（宜北县道安乡公所所在地）。这是老同学的大哥原道安乡乡长韦国英讲的可靠消息和确切时间。

我家在地蒙，属思恩县洛阳乡。地蒙与永安仅一岭之隔，相距6公里许。虽然隔岭不同县，但是将军是我们久仰的名人，我和老同学韦国衡都渴望亲眼见到最可敬可爱的卢焘将军。

机会终于来临，1948年6月25日，即农历五月十九日，这一天是永安街日，天公作美，高空彩云流霞，清风徐徐，附近村庄男女老少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汇集永安街，赶来拜见将军。街道挤满了人，男男女女，大家喜气洋洋，谈笑风生，广场上，街道上，汇成了欢乐的海洋。街道四周贴了许多红红绿绿欢迎将军的标语，永安中心校大门前，两株古樟树间当街一面，扎了高大青翠的松门，披挂了“热烈欢迎卢焘将军”的大红幅横额，下边搭了演讲台，台两边悬挂着醒目的大红对联。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

将军在宜北县县长莫树贤的陪同下来到台上就座，台前广场、大街站满了男女老少，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卢焘将军离开台座，步下台阶，满面笑容与前几排的男女老少频频点头，一一握手，然后用浓重的乡音向大家讲话了：“博好喽！丕依喽！达依喽！（父老们！兄弟们！姐妹们！）我出去42年了，少小离乡，今天回来，见到大家，很是高兴。……感谢乡亲们的盛情欢迎，还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去年选举，推选我为国大代表，我感到很大的荣幸。但是我当

官不要钱，由于我清贫，没有什么报答乡亲，只是在开国民代表大会时，我对中央谷正伦部长讲广西受灾很严重，后来得到照顾，减免民国三十年、三十一年两年度的粮食库券，这对于我省农民也可减少一些负担。……”

将军离开家乡十几年，乡音未改，讲话从头到尾讲家乡话，热情洋溢，台前广场上、街道上不时爆发热烈的掌声。

会后，原道安乡老乡长韦国英接待将军及宜北县府随行官员在其府第休息，我因老同学韦国衡之请，也被邀进韦府，得以面拜将军。将军问我地蒙有个韦崇周先生，曾两次到贵阳找过他，现在他在家吗？我说他是我宗族尊长，近来到庆远去了，将军听了以未能见面而惋惜。我不敢打扰将军。礼辞时，将军给我一张名片，另给一张转给韦崇周先生，并叫我代为问好。

卢焘将军平易近人，精神饱满，举步康健，穿着朴素，一身半旧（略为褪色）的安蓝（今称硫化蓝）布衫，踏着布鞋。不知底细者，还认为是庶民一个。

将军的德行、音容笑貌，感人至深，50 多年过去了，几经沧桑，我仍记忆犹新，永远怀念。

## 5 题诗龙潭

卢焘将军在家乡探亲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在走完各处亲戚朋友后，他还想到一个孩提时代令他难忘的地方，那便是龙潭。据《宜北县志》记载：“龙潭在城厢乡龙潭村边，水流潺潺，近如钟响，瀑布水悬十余丈，潭内之水清澄无比，县府每携煮茶饮之，暑气全消，精神爽快，名人临此游览络绎不绝，此系附城之胜地也。”龙潭，是卢焘将军情牵梦绕的地方。孩提时代，他曾在这里观瀑布，戏潭水，捞鱼摸虾打水仗。及至后来外出他乡，戎马倥偬几十载，仍然念念不忘家乡的龙潭。这次回乡探亲，尽管时间不长，各种应酬十分繁忙，

但他仍然抽空亲临龙潭揽胜观鱼。故地重游，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令他豪兴勃发，即时赋诗一首，诗云：

不必临渊羡，平生常自醒。  
哪肯随波流，任他热还冷。  
我欲问鱼乐，跃跃不能语。  
终非此中藏，冲天作霖雨。

对于这首诗后来有关评论家说，这就是将军一生正直宽厚、爱民爱国、刚正不阿、淡泊名利的真实写照。此诗既出，四方传颂，皆受好评。现环江诗词学会已把它镌刻成碑，由镇政府安放在龙潭峰的卢焘烈士公园内，供后人拜赏品读。

卢焘将军在将近为期一个月的探亲中，看到家乡的变化和乡亲们的热情，甚感高兴。在临走的前一晚上，他按照家乡的风俗，在县政府举行盛大的答谢宴会。第二天一早，县政府莫县长派有关官员及一个班的武警，沿路护送将军经宜山转车返回贵阳。



卢焘将军海内外亲属回到贵阳，受到中共贵阳市委  
副书记熊飞、市政协主席单启贤等领导的亲切接见

## 第二十六章

## 始终不为蒋介石所利用

## 1 担任湖南省主席兼第四路军总指挥

早在 1925 年夏间，卢焘任贵州路政督办时，曾率原任省长时的秘书长王蔬农、孙竹荪、李之白并聂伯应、刘旭初、梁希之、蒋子英及卫士 4 名共 12 人，一同到两广参观两省交通建设情况。他们在广州与粤省各上层人物来往席上，曾与当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认识，第二天，蒋介石就下请帖要宴请他们。王蔬农在头天晚上与各个要人交往席间就暗自给蒋介石看了相。他在旅店向卢焘说：“蒋介石此人奸滑，不可交，不如即时离开广州回避为好。”当天晚上他们就买船票坐船去香港。当时，蒋介石乘孙中山在北京病故前后，就加紧进行培植和拉拢党羽，排斥异己，准备篡军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也有所听闻，因此，卢焘决不上他的当。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明火执仗地违背孙中山的革命意旨，破坏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 年 1 月 20 日）的决议，制造一系列的反共人民的反革命事件。如 1925 年 8 月 20 日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工人、农民部长廖仲凯被暗杀，11 月 11 日国民党反动派召开反革命的“西山会议”，1926 年 3 月 20 日制造的“中山舰事件”，直到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接着在广州、南京、杭州、福州等地都发生了反革命事变，

对共产党人、革命工农志士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卢焘对蒋介石的这一切反革命反人民的罪行，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1927年北伐开始，经白崇禧（时任总参长）力荐，蒋介石委任卢焘为湖南省主席和第四路军总指挥，卢焘以“不能胜任”为由拒不就职。他说：“当年孙中山先生委我做革命军总司令，我尚不做，现在蒋介石来委我，我更不做了。我不能为大屠夫、大民贼卖命，我不能为虎作伥。”

“六一”事变蒋桂和平解决以后，卢焘将军只身东下广州，于东山百子路（现中山二路）马棚岗第四集团军驻粤办事处遇着李宗仁。李对卢焘说：“寿公此次对广西政局能和平解决作出很大贡献，立了不朽功勋，你可到南京去走一趟，与诸友好一晤，共商国是。”其意是到南京邀功，谋一份差事做。卢焘冷笑着说：“我想做官早已做了，何必此时才去？”李宗仁嘿嘿地笑，无话可说。

## 2 两次拒蒋接见

1946年蒋介石来到贵阳，他特别派人到半日山庄邀请卢焘赴宴。卢焘外出归来看到请帖后，马上进城到西门慈母园去住一夜，第二天清早就坐马车到青岩去回避，不愿与蒋介石会见。

1948年，国民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于南京。当时卢焘被老家宜北县民众选为国大代表赴京参加会议。卢焘将军说：“我当国大代表不是为当官，而是为宜北人民有说话的机会。”在南京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举行盛宴会招待与会代表。卢焘勉强去赴宴，他想，在公开大场合蒋不会对他说什么话，不料到宴会结束时，蒋介石特别送卢焘到第二套门，装作很恭敬的姿态对卢焘将军说：“卢公明天请到我那里一坐，有事求教。”第二天，卢焘就溜到上海去了，避免与蒋单独会见。

后来会议将结束时，何应钦设宴请贵州出席会议的国大代表，

因卢焘在贵州做过事，何过去又曾是卢的部下，所以也特别请卢焘将军赴宴。宴会刚吃到一半，蒋介石突然进来，何应钦特介绍说：“这是卢寿慈公……”蒋点头与卢焘握握手说：“前年我到贵州，特请你老人家，没有请到……”卢焘表示歉意地说：“当时主席到贵阳时，我有事还在乡下，所以没有得去拜会，非常抱歉！”

新中国成立前夕，卢焘将军在家和一些家乡青年聊谈当时全国形势时说过：“失其民心者亡，得其民心者胜。蒋介石是窃国大盗。独夫民贼，怎不败亡呢！我从来不买他的账。”



2008年11月，作者与覃胜大校（右）到贵阳市“卢焘烈士陵园”拜谒卢焘将军陵墓

## 第二十七章

# 为国为民捐躯贵阳

### 一 两次秘密接触中共地下党组织

1949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前后，“半日山庄”来了三位陌生的湖南“生意人”。领头的赵老板（即赵和璧，原名赵敬夫，在镇宁做小贩，和卢焘将军身边的老副官彭济美是湖南同乡，他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张立、肖元良同志领导下的联络员）给卢焘将军介绍说：“卢先生，这位是王老板，这位是孟老板，他们想跟你谈一笔生意，不知卢先生是否有意？”“万望赵老板包涵，我近来心情不好，对一切事情都不感兴趣，如果洽谈生意，事情办不好，我对不起你。”将军拱手谢绝来客。

“卢先生放心，正是你心情不好，我们才来跟你谈生意，我们这生意不考虑个人得失，只要老百姓有利就得了，卢先生请不要推辞，我们对卢先生的为人是了解的。”孟老板诚挚地说。将军惊讶地反问道：“什么？你们了解我？你们是共产党的侦探？”

“不错，我们确实是共产党的侦察员。现在国民党军队已经兵败如山倒，我军所向披靡，不久就要挺进贵阳，但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还负隅顽抗，他们在将要逃出贵阳时，一定还干很多坏事，我们希望卢先生在国家动荡交替之秋，为我们解放贵阳出一把力。”孟老板又说道。“卢某庸才，恐怕担不起如此重任哦，让我考虑再说

吧？”将军推辞道。

之后不几天，赵、王、孟3人又一次找到卢焘将军开导说：“卢先生放心，我们朱德司令相信你这个老同学。朱总司令和我们很感谢你1928年说服范石生使他和我军合作。这次我军南下时，朱总司令还特地交待二野统帅刘伯承和西南军事联络员陈又新将军，说到贵州时，首先要代他向你问好。”提到朱德和刘伯承的名字，将军激动地上前去和他们3位握手：“你们是朱德和刘伯承派来的？他们还记得我？”说起刘伯承（四川人，解放军元帅），卢焘将军和他也有旧时的交谊。讨袁护国时，川、滇、黔三省军队曾受滇都督蔡锷的领导，共同对付袁世凯的北洋军。也就是在那时，卢焘以黔军首领身份结识了川军中层军官刘伯承，他对刘伯承的军事指挥才能一直赞誉有加。红军长征途经贵州，刘伯承曾派人联络卢焘，让他说服贵州军阀王家烈等，不要死心塌地为蒋卖命，后来果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王家烈部与时驻黔南的桂系廖磊部，对红军过境贵州采取了“力避不战”的态度，做到既不追击又不打击，让红军顺利过境。

此时，卢焘虽然无兵权，息影山林，但其影响力仍在贵州举足轻重。别看老先生悠然林泉，却一直关心时世。他对国民党集团的腐朽透顶极度失望，内心深处对节节胜利的共产党充满了好感和热望。鉴于他在贵州的影响，共产党也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影响贵州的谷正伦，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以使贫穷的贵州免遭刀兵之灾。为此，朱德和刘伯承特地利用他们旧时的交谊，亲自布置部下在解放贵州前对卢焘进行了争取工作。

孟老板又一次紧握着将军的手说：“是的，我们是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司令派来的，我军要南下时，朱总司令对陈又新将军说你长期生活在西南，对西南的情况比较熟悉，处理西南的事情，要多多和你商量。”

送走3位“生意客人”，卢焘将军心潮澎湃，他感到自己肩上的

担子又重起来了,但这次重担是共产党和朱总司令给的,他一定要挑好,让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放心。此后,卢焘将军曾几次委派莫健(莫凤楼之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等职)、覃华儒等人,秘密与地下党和解放军联络员联系有关事项等。

据莫健撰文回忆:……11月上旬,我由重庆赶回贵阳迎接解放。到贵阳后,我首先去看望卢焘将军。因为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称他为“卢老伯”。他对我说:“你来正好。贵州几天内就要解放了,你赶快回独山去做你父亲的工作,主动靠拢共产党,为贵州人民解放事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你把我的话告诉你父亲,希望他解除一切顾虑。”同时,卢老伯还告诉我:“共产党派在贵州的联络员陈又新住在大西门社会服务处招待所,你可去拜会他,一定会受到热情接待。”

我遵照卢老伯的意见到大西门去,陈又新联络员非常客气地说:“你是独山人民选出来的国大代表,你父亲是贵州少数民族的自然领袖之一,这是卢焘将军告诉我的。我们未到贵州之前,早已掌握了你的家庭情况。你对当前形势比你父亲清楚,希望你立即回独山做你父亲的思想工作。希望你们父子协助人民解放军、协助人民政府把工作做好。你到独山后,51师师长闵学圣、政委况玉纯、副政委金风一定会热烈欢迎你!”

我听了这段语重心长的谈话后,感到很温暖、很高兴。我立即答复:“请陈联纯利络员放心,一定按你的意见去办。我回贵州来而不去台湾,为的就是迎接贵州解放!”……

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镇宁县政协委员赵和壁 50 年代回忆:1949 年旧历五月初八(阳历 6 月 4 日),肖元良和张立两同志通知我来贵阳,当时我是借做生意,运豆干、花生来贵阳卖。我们在公园南路肖元良家楼上开会,在座的有重庆的和贵阳的,一共十人。会

议内容：贵阳快要解放，要做好财粮物资工作，准备支援解放军。要保护电厂、自来水公司，保护贵阳不被烧等。我到贵阳后不久，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董学人领导的芷江工作组（侦察队）前来联系。当时董未到，先到的有化装为逃难商人的孟某（北京人）和王某（河南人）。我们在肖元良家会面，当时还有肖元良的兄弟肖元全（8月间被捕，不久被杀害）在座。孟、王二人向我们交代五大任务：第一要做到贵阳水电设备不受破坏；第二要保护贵阳不被火烧；第三要筹备粮食、物资接待解放军；第四要想做好侦察工作，争取敌军起义；第五要保护云贵间的桥梁不受破坏。要做好这些工作，就要组织地方人士出来维持社会治安。王同志提出说，贵阳有个卢焘先生，你们是否可以去找他？我们说，卢焘身边有个老副官叫彭济美，他是湖南人，可以利用逃难的名义去找老同乡，借此机会去见卢先生。我们找彭济美认老乡后，经过五六天，我带三个湖南人和王同志去慈母园会见卢焘先生，初次只作一般认识，没有谈什么具体问题。

第二次会见卢焘先生，是在1949年阴历七月二十二日（9月14日），当时我是运猪到贵阳来卖，住在友人家前后24天。肖元良和我，还有从芷江来的孙、孟两位同志，我们在巴黎旅舍二楼右边房间拜访了张彭年先生。我记得孙同志说：“湖南程潜、陈明仁起义，长沙保住了，没有被烧，贵州应向湖南学习。”张彭年说：“谷正伦专权很厉害。”我们说：“是否可找适当的人出来维持地方治安？”张又说：“谷正伦厉害，恐怕做不了。”后来我们慢慢把话引到卢焘先生，问此人是不是做得了。张说：“可以，谷原是他的部下，他在贵阳很有声望。”第二天，张彭年就引孙、孟两同志去和卢焘会面。我没有去，内容不详。

第三次会见卢焘先生，是在八月十五中秋节，记得是黄昏时候，我和孙、王两同志及一个新来的同志，一共四人。我们买了些月饼到慈母园拜会他老人家。当时他家人多，没有谈什么就走了。

八月十八日、十九日(10月上旬),我和王、孟两同志,第四次到小哲溪半日山庄会见卢焘先生。稍坐后,我先走,他们两人后走。当时还向卢要了他的一张相片。卢还交代说:“以后你们来找我,到西门或这里都行,不过要小心一些,这里有刘伯龙家住在后头。”第二天,王、孟两同志叫我想办法弄张谷正伦的照片。我到中华南路几家照相馆去看,有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摆有平刚和谷正伦合照的相片。我说要买那张相片,相馆的人说一张要五块大洋,但要有谷和平的介绍信才行。后来照相馆的人起了疑心,问我买像片去干什么,我无法回答,只支吾几句,就回巴黎旅舍向孟、王两同志汇报。因为我没有身份证明,第二天就往三桥跑了。

阴历九月中旬(阳历11月上旬),组织给我的任务是带“30号”公章密码(张立叫刻的)回镇宁组织治安委员会,粮财都作好了一些准备。不久,忽然听贵阳来人讲,贵阳治安委员会的人都被刘伯龙抓来杀了。我跑到平坝躲避两天,转到贵阳后,才知卢焘先生遇害了。我去会见赵建民和韩参谋长。赵问我是否知道刘鹤鸣。我说刘和张立同志认识,好像还有个什么亲戚关系。后来我们去找刘的弟弟刘刚人,叫刘刚人去毕节活动刘鹤鸣起义。

又据曾任镇宁县政协副主席杨文金采访赵和壁五上卢焘先生府宅的回忆:笔者带着当时他们是怎样去与卢焘先生密谈的问题,与赵和壁老人进行了座谈。赵老回忆说:我历来都是做生意为业,以做生意作掩护,受地下党的领导给党做些工作。1949年农历六月,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芷江工作组派了侦察员董学仁、孟运江等人先来贵州作三访工作。贵州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张立通知叫我速到贵阳。因当时已接近解放,县长李炳乔对有怀疑的人监视得很紧,为了不让他们发现,当时镇宁的薛运成、安化兴、李士文几个买猪到贵阳去卖,我就临时打了个主意,买了四头猪和家里喂养的三头共七头,同薛运成他们的一起运到贵阳去卖。这样我就摆脱了李炳乔他们的

监视，顺利地到达了贵阳。首先是在贵阳巴黎大旅社找到贵州的地下党领导人张立，开会是在贵阳公园南路肖元良家。会议的主要任务：一是做卢焘先生的工作，叫他站出来与我们地下党配合，领导组织成立贵州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工作，迎接解放军的到来；二是做谷正伦的工作，争取他起义和平解放贵州。会议给我的任务是：配合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芷江工作组派来的孟运江和一个姓王的去做卢焘先生的工作。

接受任务后，怎样接触卢焘先生呢？第一次是1949年农历的七月二十二日，我们通过巴黎大旅社一个叫班文学的厨师，带我们三个去大西门外卢家祠堂找到彭济美。彭济美是湖南人，是卢焘先生的副官。这次我们是以认老乡关系去认识彭济美，第一次上了卢焘先生的府宅。事隔几天后又上卢府，地点是贵阳北郊宅溪坝的“半日山庄”，经彭济美介绍认识卢焘先生。以后事隔几天又去卢焘先生家玩，只谈及一些形势等方面的问题和看法，目的是加深互相了解。第五次是农历八月十五去的，我们借过中秋节为名，买了点东西去看望他。这天晚上就向他亮牌了，说是第二野战军和朱德总司令派来的，并说朱总司令的意见，叫他站出来协助地下党工作，领导组织贵州省临时治安委员会。讲到这里，他非常高兴，坐在沙发上立即跳起来问：是真的吗？有信吗？哎！我已经有30多年没有和朱总司令见面了。孟运江拿出一封信来给他看后，他表示愿意出来协助地下党做工作，负责组织领导贵州临时治安委员会。他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二野的孟运江带回。得了卢焘先生的这封信后，我们就放心了，二野派来的侦察员就向上级作了报告。解放军由湖南向贵州进发后，谷正伦就在贵阳张贴出布告，说贵阳已混进了共产党的奸细，要组织大清查。地下党肖元良家被抄……

通过赵和璧的回忆，人们不仅可以了解贵阳解放前夕地下党活动的部分情况，而且也了解到卢焘将军此时确实已与地下党组

织有了接触。此外，广西地下党人覃华儒（新中国成立后任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等职）也来到贵阳，覃是卢焘的亲戚，到贵阳后就住在卢家。他经常向卢焘和住在卢家的一些青年学生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约法八章”等。

## 2 山雨欲来，大西南岌岌可危

据陶朱问《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第九章：石破天惊夜郎国）著记载：1949年8月28日，随着南国广州的即将解放，苦苦挣扎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仓皇逃到重庆。蒋介石一到重庆，便召集防务会议，他宣称：“展望未来，两广已不可保。在大陆上必须保存有大西南，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如果完全放弃大陆，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西南地形险要，物产富饶，人力物力充足，必须保有这一地区。”

人称“华阳相国”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终身追随蒋介石。此时，他对总统“英明之见”极为赞同。他主张西南联防，以重庆为轴心，胡宗南部20万人担任左翼，“双钳奋进，以逸待劳，合围夹击，痛歼共匪”。蒋介石深以为是，同时把何应钦侄子何绍周的2万人从昆明撤回，布防于贵阳附近，扼守黔东门户，并在四川的宜宾、东山、雅安、成都各摆一个军，云南南部配置两个军。此时，蒋介石集团仅剩下西南、西北和台湾地区，其余已无路可退。

10月，共产党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命刘伯承、邓小平统领的二野大军兵进大西南。同时，以一野十八兵团由贺龙、李井泉率领从陕西沿秦岭入川。11月1日，蒋介石命国民党宋希濂集团重点经略湖北巴东至恩施的防线。解放军第三、五兵团并四野第四十七军一部，采取声东击西之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敌人防守最为薄弱的川黔结合部突袭而进，由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

五百公里战线多路出击。蒋介石没料到共产党会有这一招，他重点经略了川东、川北防线，而对黔东却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二野不会兵出黔东，继而首先解放贵州，故布置了两个杂牌军，仅作象征性的应付。二野五兵团突破天柱，兵进黔东，蒋介石顿时慌了手脚。他忙命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及刘伯龙的八十九军，何绍周军，务必搞好贵州防务，殊死抵抗。

可是，贵州上下已危如累卵，两个杂牌军哪能抵挡得住共产党名将杨勇、苏振华的第五兵团！由于历史的成因，蒋介石梦想真正“统一中国”时，首先借围剿长征的红军为名，削藩集权，对贵州动了刀子，触动了黔省各方利益，令当地实力派齿寒心冷，彻底看清了蒋介石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的真实嘴脸。

### 3 谷正伦突访“半日山庄”

卢焘早年就读云南讲武堂，是云贵一隅颇有影响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应贵州军阀刘显世的邀请，来到了贵州。正值民国初创，借助鼎故变革的机会，卢焘创办了军校，拉起了队伍，资助了大批人赴海外留学。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贵州民国史上两支军阀系统兴义系、桐梓系皆出自其门下。国民党内的何应钦、王伯群、安顺谷氏三兄弟，早期军阀刘显世、王文华，后来被蒋介石削藩逼权的王家烈，无一不是他的门生故旧。

卢焘虽已不问政事，久居山林，但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回想当初，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入仕无门，是他通过关系，让谷正伦走出贵州，留学日本，学成归国后，又是他鼎力举荐，谷正伦得以入仕，并崭露头角，以后成为了国民党宪兵司令、粮食部长，由此带动两个弟弟入了中统，号称“一门三中委”、安顺“谷氏三杰”。

至于何绍周（贵州兴义人，何应钦二哥之子，时任贵州省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本是何应钦的侄儿，由卢

焘当年主持仪式，以见证人身份为无子嗣的何应钦过继了何绍周为其螟蛉子。论辈分，何绍周还得叫卢焘一声“爷爷”呢。至于刘伯龙，此人性情残暴，杀欲熏心。他原是大特务康泽的手下，后靠投机钻营，当上了军长。但他的八十九军为杂牌军，横行滇黔两省，名声极坏，军纪差，战斗力也差，如果谷正伦、何绍周愿起义配合解放军解放贵阳，则黔省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地下党组织两次秘密访问卢焘将军之后，这时贵阳的社会上也到处流传说：共产党解放贵州，要卢焘出来当省主席了。正当卢焘将军准备去找他的学生谷正伦等人，深谈有关起义的事项时，时任贵州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和省主席谷正伦先后突然登门“半日山庄”造访卢焘将军。

据覃华儒撰文回忆：1949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贵州省主席谷正伦突然仅带一卫士，驾车来到半日山庄将军住宅，与将军谈了三四个小时才走。谷走后，卢和家里人说：“谷正伦自从回到贵州当省主席后，从未和我见过面，今天他突然来看我，感到意外。他问我：‘朱德是否写信给你？’我很严肃地回答：‘我与朱德30多年不见面，他哪会写信给我呢？’”当时他只说这一点，大家不好再问。后来，将军的至交孙竹荪先生告诉卢慈仪说，将军事后曾私下给他透露，谷正伦之意，是他离开贵阳后，希望卢焘出来维持一切，以免贵州人民今后将骂他谷正伦祖宗十八代。

据陶朱问《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披露：在卢焘家的客厅，谷正伦态度出奇地恭敬：“学生正伦今天来拜访恩师的目的，只想看看恩师，我来贵州近一年了，因为事务太多，没能及时来看望你老人家，正伦实在惭愧，恩师今后只要有哪样事，只需知会一声，正伦就会办好。”卢焘摆摆手，端过盖碗，将茶盖往杯中轻轻刮了刮，然后俯身吹吹茶水，不慌不忙地呷过一口茶，这才正色道：“古人云，识

时务者为俊杰。此端时局多变，共产党已兵出黔东，呈疾风劲草之势，我们黔省首当其冲。你可不要守活寡，更不要做徒劳之举呀！”

谷正伦眉头一皱，笑容逃逸了个干净，满脸苦了下来：“恩师所说极是。自前日你为学生着想，那番金玉良言，学生没齿难忘。只是恩师有所不知，那刘伯龙、何绍周自恃军权在手，早就觊觎省府主席一职。学生虽为此二人的长官，实无力约束他们。”

“你的保安团呢？”谷正伦苦笑一下，“就那几根吹火筒，能顶啥事。刘伯承他们一到，那些人说不定不发一枪一弹，便垮了杆，跑得无影无踪。”

卢焘一听，急了，他将长袍的下摆一拢，“哗”地站起身，举着双手一摊，劝道：“华容（正伦号）亡命，沦为奔亡之虏。纵观历朝历代，鼎固变革之际，哪个前朝显贵莫不落此下场？以你的身份和地位，岂能幸免。不过，为师越俎代庖，已替你谋得了一条上佳出路。刘伯承代表共产党已经保证了，只要你能兴崇义之举，他们不但不会追究过去，还会让你留置黔省，继续担当大任。正伦，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你跟蒋介石打了这么些年交道，还不了解他吗？眼下，共产党已兵进贵州，再不决断，恐贻误终身。”

谷正伦沉吟一下，他摸摸胸前的长须，以征询的口吻对卢焘讲道：“这样吧，后天我在雪洞举办个全省自然领袖、社会贤达参加的聚会，刘伯龙、何绍周也会来，你公开劝劝大家，如果众人齐心，我想这事做起来就不难了。否则，贸然行事，没有大多数人的支持，弄不好生出肘腋之变，只能适得其反。”

卢焘一听，觉得谷正伦说得颇为有理。他想，只要到时他把利害关系给那些人讲清楚了，相信大部分人会有同感。这样，谷正伦就不会迟疑不决。然而，卢焘绝未料到，谷正伦会搞出另一阴谋出来，大说他办起贵州“游干班”的事情，准备将来与共产党打游击。卢焘哪里会想到自己一贯引以为豪的学生会来这一手呢？

他气得顿时脸色铁青，他如坐针毡，心中叫苦不迭。他没好气

地反驳道：“你今天这样做，不分明是把我拉来垫背吗？反共，游击？你们扪心自问，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就凭这些鱼肉百姓、武断乡曲的地霸酒徒，还能成事吗？”……

据覃华儒撰文回忆：谷正伦突访“半日山庄”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有一位约 50 岁的女人到“半日山庄”递交一封信，旋即匆匆离去。信面写“卢老伯收”，信封上印有新桥办事处（当时南门新桥正在兴建），信里是装着两张十六开空白纸，大家都感到奇怪，立即去追赶那女人，但已不见踪影。后来，把信纸化验，也不见字迹，我们联想到不久以前，听说过杨杰在昆明曾收到类似的一封信，传说是国民党特务的警告信，不久杨杰便在香港被他人谋杀。当时卢焘将军不以为然地说：“这封信是有点奇怪啊！”此信，卢家至今仍保存着。

10月底一天上午，我陪将军在家看书，约 10 点多左右，伪贵州省府派人送来一张油印聘条，聘卢为“贵州反共保民委员会”委员。将军见到条子便讥笑地说：“蒋介石垮了，共产党打过来了，你们这些人（指贵州反动头子）性命都难保，还成立什么反共保民委员会，真是自欺欺人！”又说：“我又不是国民党，我是孙中山的革命党。我才不跟这些人去干蠢事呢！”接着他对我说：“华儒，明天你把这张聘条拿到省府去退给他们。”我答道：“是啊，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天亮了还尿床？！”第二天我便把那张聘条退给了省府办公厅。

#### 4 毅然出任贵阳市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

贵阳解放前夕，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和省保安副司令韩文焕等组织“应变”，训练游击指挥人员，妄想负隅顽抗。由于革命形势急转直上，谷正伦等朝不保夕，只得囊括国家的金钱财宝，如丧家之犬那样逃离贵阳。1949 年 11 月初，解放军大部队已由湘西挺进黔东，天柱、三穗、镇远、剑河、施秉等县相继解放。从黔东节节败退的

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进驻贵阳后，企图作垂死地挣扎，叫嚷“坚壁清野”，妄图以逼人走光、粮食搬光、房屋烧光的“三光”政策来对抗解放军。国民党的“三光”政策传出不久，谷正伦、韩文焕、刘伯龙等人首先进行大屠杀，将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杀害，然后把银行的金银和一切公款抢劫一空，往滇黔公路西逃。11月8日以后，贵阳已处于真空状态，社会动荡，人心惶惶。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已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在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许多上层人士都知道这张布告中明确提出的“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采取和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以及对于“民族工商农牧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等等政策精神。加上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各民主党派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都参加政府工作和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事实，教育和启发了愿意接受党和政府领导的进步人士。见到贵阳解放在即，卢焘将军特别高兴地说：“蒋介石独裁专制，众叛亲离，非败不可，共产党得民心，必然得天下！”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贵阳各界人士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有一个群众性的维持治安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很快，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和自卫队组织起来，大家推举了众望所归的卢焘将军出任主任委员。卢焘任职后愉快地说：“我是迎新的来，送旧的去。”每天奔走呼号，带领全体市民卓有成效地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破坏活动。

据将军的长子卢慈仪说：“11月12日晚上8时左右，先父来到芦花村我的住所，抱着我的孩子，谈笑自若。他告诉我：已出来到临时治安委员会工作，这是民众约他出来的，情况很好。13日晚，他回到家里，心情非常不好，很气愤地说：‘刘伯龙到治安委员会胡闹，逼我给他筹备20万银元军饷，我到哪里去要？他同我吵起来。’

接着又说：“解放军还没有打到贵阳，谷正伦首先掳光银行金银逃跑，刘伯龙临逃走前，还想勒索市民要几十万块钱，这些人太狠毒了……”

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贵阳市政协副秘书长的朱崇演撰文回忆“贵阳市临时治安委员会”的有关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临治会的酝酿阶段。十一月初，国民党的贵州省政府、贵州绥靖公署及保安司令部等反动当局，发出紧急疏散命令，除规定党政机关及人员必须疏散外，还强调各级民意机关代表（指国民党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省参议员），一律不准留在贵阳。在发出一笔“疏散费”后，贵州省政府即迁往毕节。

十一月八日，当时担任省参议员的张彭年先生，从省政府秘书长何朝宗处得消息，说是省主席谷正伦、保安副司令韩文焕和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等决定，在他们逃走时，要炸毁南门大桥，破坏电报、电话两局和电厂，屠杀贵大亲共师生，并要组织人上山打游击。这时社会上也纷纷传说反动派准备火烧贵阳城，人心惶惶，害怕出现骚乱。

八日晚，由张彭年事先邀约的郭润生、林子贤、司季武、陈方、邓占奎、赵正一、高可亭、孟翼卿、张荣熙、陈职民、蔡森久、冯程南、李福祥，以及张彭年的子、婿及侄儿蒋珏章、章士辉、张汝赓、张汝建、张汝宣等，在中山西路张宅会集，商议对策。首先由张彭年说明商议的内容。大意是说谷正伦等即将撤走，共产党又尚未到来，贵阳即将成为真空，社会治安将成大问题，贵阳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地，保护家乡，义不容辞，故请大家来商量，拟发动组织一个民间力量来维持真空时的社会治安。

参加会商的人对张的倡议均表示同意，有些人还回顾了滇军三次入黔，进入贵阳时老百姓遭到无辜洗劫的历史，以及军阀争夺贵阳的情况，认为建立民间组织，维护社会治安，很有必要。大家意

见统一起来后，张彭年提议，这个组织名称为“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他说：“民众”二字，只代表老百姓，不代表任何官方。“临时”二字，是指在真空期间发挥作用，一有官方政府成立，这个组织即行解散。总的宗旨是维护社会治安，防止坏人捣乱，使老百姓不受祸害。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

二是临治会的成立情况。十一日上午九时许，临治会成立大会在参议会（现教育厅所在地）举行。到会人数达千人，有些是事先约集的，有不少人是临时听到消息后来参加的，也有来看热闹的。大会由彭年主持并讲话，向到会人员介绍成立“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宗旨，提议推选卢焘等人为委员。到会人员鼓掌赞成后，又宣读了临治会的通告，随即散会。

据参加地这次大会的人说，当时人心浮动，一般群众都忐忑不安，有些人连对参加这个会都感到害怕，到会场看一下就匆匆离开了。所以，会场秩序并不安静，也没有正规的程序，而且时间不长。

关于临治会的组成人员，现比较一致的回忆材料是：主任委员卢焘，副主任委员张彭年、郭润生。委员司季武、林子贤、邓占奎、陈芳、李福祥、蔡森久、陈职民、张荣熙、冯程南、赵正一、桂百铸等。上列十四人，回忆者意见是一致的。有出入的地方是，有人说委员共十七人，除上述者外，尚有青怀之、李葆善、刘锦森三人。有的则回忆委员为十五人，上列十四人之外，另一人一说为孟翼卿，一说为徐礼和。

三是临治会分颁布的通告。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通告：

- (1) 现应时局需要，由本市绅耆民众，市参议会正副议长，驻省参议员及全体市参议员自动集会，经议决于十一月十一日成立本会，各区成立分会。
- (2) 本会办公地址，设于中山西路市参议会内，昼夜办公。
- (3) 本会不参加任何方面战斗，不含任何政治意味，惟以维护全市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财产之安全为目的。
- (4) 经推定卢焘先生为本会主任委员，张彭年、郭润生两先生

为副主任委员，共同负责。

(5) 本会系临时性质，俟紧张时期经过，即自发进行解散。

(6) 自本日起，如有宵小窃发，意图抢劫纵火，或扰乱治安者，除由各该地区分会，协同当地保甲宪警，立予制止，倘无效果，即希报告本会，以便派队缉送法办。

特此通告

主任委员 卢 煦  
副主任委员 张彭年  
郭润生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通告张贴后，广大市民惶恐焦虑的心情便被安定下来，许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纷纷议论：“过去贵阳几次灾难关头，总是卢总司令出来想办法，结果转危为安，现在贵阳真空，他老人家又出来维持治安，老百姓可以放心了。”

四是临治会进行的主要工作。

(1) 请卢焘到会主持会务。临治会成立大会召开后，暂由司季武、林子贤去请卢焘，但没有找到卢。第二天早上，由张彭年写了一封亲笔信，交司、林及李福祥三人，专程去小哲溪找卢。该信原件由卢焘之子卢慈仪保存，现照录如下：

时局紧张，本市各界昨在市参会集议，决组临时治安委员会。由当众公推吾兄为主任委员，弟与润生副之。当兹情势，谅能俯顺舆情，勉为其难也。兹由众公推司继(季)武、林子贤兄等晋谒，一切托其面详。务希克日进城，共商一切，至为企祷。斋此即颂

寿慈吾兄 刻祺

弟 张彭年上  
十一月十二日

卢焘接到张的信后，即由小哲溪进城，于十二日下午五时左右，到临治会主持会务，受到会内人员热烈欢迎。卢焘对大家说，

他老了，不中用了，但为贵阳老百姓的利益，他愿做一头老牛。他表示大家要他做什么，只要能办到的，他决不推诿。前面抄录的临治会的通告，就是在卢焘等正、副主任委员看过后，才在全市张贴的。

(2) 筹集武器和组织武装力量。十一日临治会的成立大会召开后，赵正一和李葆善去到盐务局，征得该局局长龚怡和税警队长袁良的同意，借得步枪十支，子弹五百发，军装十套。卢荻初也向四十二补给区司令部借了一些步枪。还集中了一些私人手枪(注：卢焘将军带头将他珍藏 20 多年，原在广州孙中山赠送的左轮手枪一支捐给临治会)。将法院库存的一些坏枪也提出来，以壮声势。当天，筹集到的新旧枪支达百余支。十三日，又经郭润生出函，借来旧枪三百支。解放后，在向公安接管部移交时，计有步枪四百二十二支、手提式十六支、汤姆逊枪六支、轻机枪十二支、牛腿卜枪一支、短枪十五支。并有杂子弹四十箱，手榴弹四箱等。

关于武装力量的组织，据李福祥回忆，曾由邓占奎提出，由黄柱臣(理发业公会理事长、红玫瑰理发店老板)带领四十人，组成警卫队，专门负责临治会和张彭年住宅(都在中山西路)周围的安全。赵正一回忆，他所经营的远东澡塘的职工曾子厚、郑德云、王忠诚、阮月华等，参加了临治会门前的站岗守卫。

张汝赓在《记解放前夕的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一文中说，成立大会上宣布：“由邓占奎、赵正一负责组织四个巡逻队(共一百九十余人)，指派专人带队，日夜轮班巡逻全市，以防宵小。”赵正一回忆，是组织三个自卫队，共一百九十余人，派出车辆昼夜巡查，并与各分会随时联系。此外，还发动各分会组织巡查守望队，西南汽车联营公司的男、女员工李振业、徐乃真、潘顾、王新华等多人，都参加了轮流巡夜工作。

(3) 保护仓库及与电厂护队联系。十二日晨，有人报告说，四十

二补给区司令部下令炸毁北郊宅吉坝的军用仓库。临治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确定派员去制止。李福祥自告奋勇，与卢荻初同去会见该补给区司令杨亚仙，在李、卢的说服下，杨亚仙收回了炸毁仓库的命令。

对电厂的保护工作，曾由李福祥与刘仕德二人，乘刘的吉普车去联系，会见了电厂的一位姓张的负责人，据张说，电厂已组成工人护厂队，临治会不用派武装力量进厂。当即商定，厂内治安由护厂队负责；厂周围的治安，由临治会五分会负责。

(4) 布置安排的几项工作。临治会研究安排：一、派人与一些公用事业单位联系，要他们集合员工，力图自保。如有事故，要他们迅速与临治会联系。二、派人看守一些逃跑后无人看管的机关、仓库、公房。三、加设临时路灯，要各分会通知临街住户，将电灯拉出门外。上述安排，有的如将电灯接在门外执行得较好。全市大街小巷，电灯彻夜通明，又有人巡查守望，因而在真空期间，没有出现骚乱。

五是刘伯龙对临治会的镇压。十日晚，原在黄平一带妄图阻击解放军的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率残部溃逃，窜入贵阳。刘是非常反动的大特务，动辄杀人，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到贵阳后，发现谷正伦已弃城逃走，大为不满。又看到临治会张贴的通告，更是暴跳如雷，下令全部撕毁。十三日，刘伯龙声称他已被蒋介石任命为贵阳防守司令，发出布告说：本司令坐镇贵阳，尔民毋须惊忧，如有不听命令者杀，造谣生事者杀……接连若干个“杀”，杀气腾腾，其杀人成性的狰狞面目，跃然纸上。一时风云突变，贵阳被恐怖气氛所笼罩，临治会的工作，处于严重困难境地。

13日晚，刘伯龙约卢焘、张彭年到堰塘坎郭润生家中谈话。事后郭对李福祥说：见面以后，卢焘把组织临治会的原因，简短地向刘作了介绍，并说，现在你(指刘)来了就好了，我们就脱身了。刘伯

龙板着面孔对卢说：你是总司令（卢过去曾任黔军总司令），你下命令嘛。张彭年为缓和气氛，立即说：刘军长下命令，我们一定从旁协助。刘考虑了一下才说，我的事情多，社会治安由郭二哥（指郭润生）来管，防守司令部任郭二哥为贵阳市临时警备司令，从明天起实行，临时治安委员会立即撤销。

当晚，卢焘因天气转冷，没有带衣服，便回到小哲溪家中，据卢的亲属回忆，卢回家后非常气愤，告诉家里的人说：我今天和刘伯龙吵架。并说刘伯龙蓄意寻衅，逼临治会筹二十万银元做“军饷”。张彭年于晚上 10 时回到临治会，对等候在那里的李福祥等人说，刘伯龙已派郭润生为临时警备司令，但看样子他呆不久，为安定人心，我们还要坚守在临治会内，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他要张汝赓等从家中给他搬来卧具，与李福祥、赵正一及张的子、侄、女婿等在临治会内过夜，并加强了周围的警戒。

14 日早上 7 时半左右，刘伯龙派人开车去小哲溪，声称刘军长请卢公马上去开会，有事商量。卢焘起床后，被骗上车，于二桥转湾塘公路旁被杀害。

当天清晨，张彭年接到刘伯龙的电话，说他要马上离开贵阳，要张在 7 时以前，约同卢焘和郭润生去三桥见面，有事面告。张彭年反约刘到临治会来，刘说，到郭二哥家相见好了。张挂上电话后，一面派车去接卢焘，一面在郭家周围布置警戒，由武装人员护送过去到郭家。这时，派去接卢焘的汽车发生故障，经过一小时的检修，始能发动出车。不久，车子返回，司机说看见卢焘和几个国民党兵在一一辆车上，他认为是送卢公来开会的，所以原车返回。

上午 10 时，第十运输处驾驶员张敬堂，到临治会报告卢焘被杀害的消息。在临治会的李葆善、赵正一立即赶到郭润生家，向张郭报告。噩耗传来，大家十分悲愤，同时也替张彭年的安全担心，都劝张暂时躲避一下。张彭年说：在这个紧要关头，不能只顾个人安危，我若避不出面，局势将更乱而且前功尽弃。好在解放军到贵阳

为时不远，目前无论如何不能松动。万一我出了事，那是为了桑梓，也是甘心的。张不听劝阻，立即返回临治会召集会议，研究处理办法。参加会议的有陈芳、司季武、李福祥、张汝赓、赵正一，李葆善、邓占奎、蒋珏章、章士辉等人（有些人听到风声不好躲开了）。会议决定：由李葆善派车，黄柱臣派人去搬运卢焘遗体；通知各分会恢复工作；临治会联络人员加强巡逻。由于张彭年等的态度坚定，临治会又振作起来了。

据时任贵阳地下党组织主要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任贵阳第一任市委书记兼市长（后任贵州省常务副省长）秦天真，在《怀念卢焘先生》一文中给卢焘予以了高度评价：“……卢焘先生其生也荣，其死也哀。他在解放前夕拒绝国民党聘为贵州反共保民委员会委员，却满腔热情地担任迎接解放的贵阳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由于他的努力，贵阳市的工商界资金没有外流；贵阳市的公职人员保存了档案和国家财产，等待解放，听候量才录用；贵阳市没有发生大的骚动和破坏。卢焘先生是有功于贵阳的解放事业的，人民是不会忘记卢焘先生的……”

## 5 血染贵阳大地，长眠贵州高原

1949年11月14日清晨7时左右，卢焘将军还没起床，刘伯龙就派一辆小轿车来到小哲溪的半口山庄，从车上走下5个军人，对彭副官假装说是刘军长请卢公去开紧急会议，有紧急要事商量。当时将军正在起床，其中一人故意装殷勤，急忙去给将军打洗脸水，当将军上厕所时也有人跟踪。将军一生忠厚待人，公而忘私，洗完脸没有和家人说上一句话，就坦然登车。这时将军已意识到情势异常，感到此去凶多吉少，但又无法脱身。他上车后，频频回首看望家人。上午10时左右，将军家的亲友就含泪飞奔来报：“寿公被害

了！刘伯龙把他杀害在二桥转湾塘。”噩耗传来，全城震惊，万民痛惜，义愤填膺。

刘伯龙这个大特务、刽子手是怎样杀害卢焘的呢？

据原八十九军参谋长吴行中 1980 年 1 月 18 日，给省政协文史委员会所写的《我所了解的刘伯龙》一文，介绍得比较详细，现摘要如下：

(1949 年)11 月 10 早晨，刘伯龙发现谷正伦、韩文焕等潜逃的消息，即派人到各银行查看，黄金白银已被掳掠一空。刘伯龙颇为愤怒，即拟电报向蒋介石汇报谷正伦、韩文焕劫掠贵阳各银行黄金大洋潜逃情况。电文中有云：“职责无旁贷，当坐镇贵阳，誓死保卫贵州，请总统放心。尔后施政方针及行动如何？请赐示，以便遵行”等语。并即刻指示秘书出示布告，先安人心。实际上，人民群众的消息非常迅速而准确。谷正伦、韩文焕潜逃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大街小巷，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动荡。据云，谷正伦早已料到会出现这种混乱现象，曾用信件并亲自到卢焘家中，要求卢焘于谷正伦出走以后，出来暂维护社会治安。卢焘得知谷正伦已走，即联系一些开明人士，如张彭年、郭润生等出来，筹备组织维持，并亲自担任维持会主席，共同维持社会秩序。

11 日晨，卢焘派人来请刘伯龙出席维持会议。刘伯龙得到报告后，自言自语地说：“老子尚坐镇贵阳，要谁来组织什么维持会？”但他还是出席了会议。中午，刘伯龙回来下了两个手令：一个手令是派郭润生为贵阳警备司令，目的是在拉拢郭润生，分裂维持会。郭与刘是旧交，但又是维持会成员，所以左右为难，没有到差。另外一个手令是派本部上校特务大队长张卫民为贵阳警察局长，张已视事，但还抱观望态度，未实际到差。

从刘伯龙致蒋介石的电报和派郭润生为贵阳警备司令，派张卫民为警察局长来看，他首先抓警备、警察这两个单位，其企图是

想继续占据贵阳，与人民为敌。

11日下午开会回来，刘伯龙的表情颇为不快。我不便问他，就询问追随刘伯龙的少校参谋顾炳炎。顾告诉我：“军长在维持会上要卢焘筹备军费，卢未答应，所以军长极为不快。”

12日仍继续开会。下午回来，刘伯龙怒容满面，一进门就对我说：“老子非杀卢焘不可！”突然听到要杀卢焘的话，我颇为吃惊。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对卢焘并无恶意。相反，还有好感。……卢是广西人，曾当过黔军总司令和贵州省长。据传说为人忠厚至孝。所以我就对刘伯龙说：“卢焘年纪已六七十岁，退休多年，不问政治，杀他何用？”刘伯龙说：“他是桂系，是反蒋的，凡是反蒋的就要杀。”刘还继续说服我道：“据张卫民报告，卢焘等组织维持会，是要欢迎解放军进城。一方面让解放军进城。他们邀请我去开会，是要稳住我。一方面让解放军积极准备，化装进城。等到时机成熟，一声令下，里应外合。那时我们就成为瓮中之鳖，我固然活不成，你也生命难保。所以打人不如先下手，我就非杀他不可。”我看他杀卢焘的心已决，他对我说话的态度又是那样声势逼人，不顺从他，自身就会不利。于是我对他说：“你杀卢焘，我并不反对，不过我觉得耳目太多，人言可畏呀！万一势在必行，那在行动上请加注意，白天不如夜间，城内不如城外。”当时刘伯龙对我的说话，满不在乎，毫无表示。

就在12日夜间，八十九军在观音山保卫贵阳的阵地，受到解放军猛烈的攻击，到13日拂晓，就被突破，很难维持。天亮了，刘伯龙告诉我，不必要的人员，先行撤离贵阳，向安顺方向前进，在安顺停止待命。

13日下午，刘伯龙和我及少数人逃出贵阳，宿于三桥。当夜刘伯龙还杀了一个上校和一个卫士，深夜才睡。

14日凌晨，天空刚刚出现鱼肚白，特务大队长张卫民叩门，把我从梦中惊醒。他一进门就向我报告说：“昨夜深夜，军长派我去杀卢焘，已经完成任务回来。”我抱着吃惊的态度问他：“你是怎样杀

的？”他说：“我自己驾驶黑色轿车，于拂晓到卢焘家，我对他说，军长请你去，有要事商量。他起床后，穿好衣服一同出门，坐上我的汽车，就向三桥方向前进。到了二桥附近，我假装汽车发生故障，下来修理，并请他打电筒照我一下。等他下车后，我即开枪，几粒子弹就把他击毙在地。”14日早晨，我们就乘汽车向安顺撤退了。

卢焘出来当维持会主任，完全是大势所趋，顺天应民的义举，他的死是为贵州2700万人民的利益而死，死自重于泰山。刘伯龙违反民意，残害无辜，固然罪大恶极，是罪魁祸首，但我不能辞其罪，今天我就此机会，向卢焘先生请罪，向卢焘先生家属请罪，向贵州2700万人民请罪。

卢焘将军被害后，当时善后的紧急处理情况，据将军的长外孙覃栋梁（曾任广西柳州某大型化工厂总工程师）撰文回忆：十一月十三日晚上，贵阳市黎明前的这一夜，特别黑暗，人们盼望解放军早些到来，彻底结束蒋家王朝22年的反动统治。人们十分担心反动派窜回来搞“三光”，所以说，也是最恐怖的一个晚上。而五十年前地球的气温比现在低，十一月中旬的贵阳已经降霜，那一夜我又要值更守夜，又要抵御寒冷的袭击，所以说称得上漫漫长夜。

好不容易到了十一月十四早晨，这是个初冬阴寒的早上，舅父卢慈仪先生请了数位友人一早到冠生园喝早茶。返回芦花路寓所已是上午九时许。我正走过慈母园那边（与芦花路相距约150米）突然遇见三姨丈李松年先生，他匆匆走过来，面带悲容，声音有点哽咽。他把我叫到路边，一面说话一面取出一条银链，那上面系有银挖耳瓢、牙签、钥匙套、饰物等等，原一直挂在外祖父的颈项上的。我正在困惑中，三姨丈说：“刚才有人拿这银链来报信，说一个老人被害在二桥转弯塘，你马上过舅舅（卢慈仪）那边（芦花路九号）通知他们。”我接过此银链，仔细一看，正是外祖父日用佩带之物。此外，腰上还系有几块佩玉，立即向舅父报告了此事，经家人商

议，应立即派人前往察看，探个确切。但是舅父卢慈仪不宜前往，怕特务识出他。决定由我前往为妥，于是叫了一位住在舅父处的广东商人黄康陪我一同前往。我们从市西路走到紫林庵，快近头桥，当时已到了郊区，房屋稀少，行人冷落，几条野狗在凹凸不平的碎石泥士公路上懒洋洋地夹着尾巴走过，一片凄凉景象。此时我心中又急又乱，加快脚步恨不得立刻赶到二桥转弯塘。黄康一面喘气一面急忙赶上来，边用粤语问我：“点解行得咁快？”我不理会他，加紧脚步。在距离转弯塘约 150 多米处，公路左边一间小茅屋外的一个青年汉子，比手划脚地在大声说道：“你们不知道吗，这就是贵阳城内有名大孝子、卢总司令卢焘司令官呀！”我闻此言后本来就像铅块重的心，感到更加沉重。远远就看到一群围在转弯塘公路两侧，人人面带悲容，个个脸色凝重，还有的显得十分悲愤。我从人们脚下空隙处看到仰卧在地下的一双脚，穿着一双我们家乡广西宜北手工做的蓝土布鞋，正是这双布鞋，令我的心咯噔地一下子往下沉，毫无疑问，被国民党匪徒暗害者千真万确地是我的外祖父卢焘老先生。但人们往往存在一些侥幸心理，一定要挤上去看个明白，此鞋原是家乡人半年前做好寄来贵阳给我穿的，因当时处于青年时期的我，脚长得快，已不合穿了，外祖父见了说：“很久没穿家乡的布鞋了”一试之下，很合穿，于是就穿上它。不待我看清遇难者的遗容，立即感到双脚酸软，直觉告诉我，外祖父已惨遭毒手，等我好不容易迈开双脚挤进人群圈子内，看到外祖父头朝西北，脚向东南，仰卧在公路左侧（现贵阳二桥转弯塘，市人民政府修建有卢焘烈士遇难处纪念碑），一身熟悉的蓝布长衫已抚平拉齐，盖至脚下，胸腹部有几处微细的弹孔，一顶博士帽（礼帽）已用来遮住了半个面部，但从身材、穿着、三分之一露出的面部，我已完全确定千真万确外公已遭国民党反动派残杀。此时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在烧纸钱，在遗体的颈部周围点了些香烛，这位女同胞一面低声饮泣，一面哭诉，她曾受到卢总司令的恩德救了她一家老幼，常思大恩大德无以

为报，今晨偶然经过二桥转弯塘，见到他老人家被特务暗害倒在血泊之中，“天杀的国民党特务，连这样一位慈样的老人，老同盟会员、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爱国爱民的大孝子、数次拯救贵阳人民免于兵灾人祸的忠厚长者、人民心目中的菩萨、孝子，他们都要加害，真是丧尽天良，禽兽不如，杀千刀的狗特务……”一面流泪，一面烧纸。可惜处于当时紧急情况，遗憾地未能问清她的姓氏。围着的群众也有抽泣的、满面悲忿的表情，充分说明了卢焘老先生在三十万（当时人口）贵阳市民心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他的被害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邪恶、凶残、毫无人性。蒋介石这流氓出身的窃国大盗，政治上的反动，对人民的残酷镇压，有史以来的暴君，无出其右。

证实了这一切之后，我立刻拖着千斤重的双脚，向着市区返回。这时与我一道前往的黄康，又用粤语对我说：“早知是咁样，我都唔陪你来。”此人真是势利小人，毫无正义感和同情心，犹如市井无赖。当时我很气愤，心想：你黄康如今全家还住在我舅父的房子中，不收分文租金，你们刚从柳州逃来贵阳时，每日三餐供你全家茶饭，分文不取。如今我外祖父为了人民的利益，惨遭毒手，你竟然说出这种话来，不如一个普通市民。当我返回到芦花路九号，向舅父、母、三姨、五姨以及三姨丈，说明我亲眼看见外祖父大人已经遇难。于是舅父卢慈仪先生叫我随他到治安委员会，找了其他负责人，由周朝杰先生开了他的福特轿车，到慈母园取了一床行军帆布床，随车而去的还有梁兆元先生（广西桂平人）、孙家祺先生（贵阳人，现任市政协副主席）、我舅父卢慈仪及我共五人。车到转弯塘，看见前来凭吊的群众更多，烧的香烛及纸钱比比皆是，舅父立即下车跪在外公遗体旁，亲吻外祖父的额头及面部，大放悲声，痛骂国民党反动派及蒋介石特务，哭泣得死去活来。此时周围的群众见状莫不动容，有抽泣者，有默默流泪者，有跟着痛责蒋匪帮者。还有些老太婆、老大爷，喃喃念经，愿卢老先生早升仙界的，一切都说明了

贵阳市民对这样一位爱国爱民、一生追求进步的和平民主人士是何等的敬重，对他的遇害是何等的悲伤。对于人民公敌蒋介石和他的反动政权，无比痛恨、无比仇恨。

接着，同去的几位先生，将舅父卢慈仪扶起，劝节哀。我们五人一同将外祖父的遗体抬起平放在行军床上，此时始见到地下那一滩殷红的鲜血，这鲜血和其他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一样，是为中华民族的翻身解放，中国人民的富强康乐，为建立新中国而流的。遗体颈部向北，脚朝正南，停放在原处，后商议运回治安委员会去，要卡车来，当即到治安会由五位持枪自卫队员护送，开了一部道奇大卡车，仍然是我们五个人一同前往。到转弯塘时，只见家中亲人来了大部分，均守候在帆布床四周，围着遗体痛哭，他们是二姨母卢慈明、五姨卢慈达，表弟熊定宇、定成、定一、族堂大舅卢培芝，堂舅母刘氏，表妹卢锡麟、锡勤、小宝，以及来筑学习住在小哲溪半日山庄外祖父家的同乡族侄孙婿覃华儒、宣北同乡吴长治、卢胜党、卢振义（用平）等人。

万人送别卢焘将军遗体



我们将行军床抬上大卡车，大家环绕在四周跪着。当时贵阳市的公路十分落后，路面碎石凹凸不平，坑坑洼洼，车子跳得很凶，我和表弟熊定宇分别跪在床头床尾，用双手努力把外公的遗体固定在行军床上，又用双脚及身体把行军床固定在卡车车厢内。车子驶过头桥，算是进了当年的市区，当群众知道是运回卢焘老先生的遗体时一齐围了上来，汽车无法开行，群众纷纷要求与这位为了

他们生命财产安全，为了贵阳市的解放和解放军能顺利接收城市而光荣牺牲的卢老先生见最后一面。一路均由治安队员维持秩序，群众中悲声四起，车勉强开到金锁桥，又无法开行，最后又来了一批治安队员开路，才缓缓地开进了慈母园的石拱门。

外祖父的遗体，刚由我们从卡车上抬下来，又被周围的群众围个水泄不通，一片片歔欷之声，空气中充满了悲壮之情，又经过治安队员的劝说和维持，始将遗体运入厅堂，刚一位上拖门（犹如广州市老式住宅大门的木拖门），而此时挤上的群众，几乎把门挤倒，待我们将卢老先生遗体从行军床上搬开时，始见两股鲜血从伤口中流出，染红了帆布床，此帆布已成为烈士为革命为人民而牺牲的见证，成为历史文物，现保存在舅父卢慈仪先生处。

我们检查了外祖父的遗体，全身共中八枪，头部三枪、身五枪，弹孔极微。枪枪都是致命的，均为美式卡宾枪弹所穿……。

## 6 惨遭杀害，举世悲痛

卢焘将军被害的当天，贵阳 30 万人民真是可悲又可喜。可悲的是，全城人民痛哭早上为贵阳解放而献身的老省长老将军卢焘烈士；可喜的是，当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就已挺进了贵阳，首先消灭了还残留在城里的宪兵特务。15 日，解放军大部队浩浩荡荡正式入城。

贵阳市鞭炮齐鸣，人民载歌载舞，沉浸在欢乐之中，同时也沉痛地哀悼被反动派杀害的卢焘和革命志士。贵阳市并成立了有杨勇、苏振华、陈又新、陈曾固、秦天真等党政军民商学工各界人士 276 人参加的“卢焘先生遇难治丧委员会”，与卢焘家属家祭相结合在慈母园举行悼念活动，为期七天，累计参加悼念的各界群众达 3 万多人以上，出殡送别群众近 2 万人。18 日上午，贵阳市临时治安委员会副主任郭润生陪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事联络员陈又

新前往慈母园吊唁。陈对卢焘之子卢慈仪说：“我离开北京随军南下之前，朱总司令曾面示，贵阳解放后，要首先拜访卢焘先生，向他问好，有关贵州及西南事务，要多与卢焘先生商量。讵料，到马场坪时，就听到卢老先生遇害了，心中非常难过。”

在为期七天的悼念活动中，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兼贵州省省长、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第五兵团政委兼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军区政委苏振华，西南军事联络员陈又新将军，贵州省副主席陈曾固，中共贵阳市委书记兼市长秦天真等党政军领导参加了悼念活动，并送了挽联。

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和副主席李济深，给卢焘烈士之子卢慈仪发了来唁电：“急，贵州省人民政府，转卢慈仪君：惊悉寿慈先生惨遭毒手，无任痛悼，特电致唁，并望节哀！”

同时，朱德总司令还派人专程从北京送来了一条长3米宽1.6米的绸缎祭帐，给卢焘烈士题写了“英雄不死，永志人心”的挽联。

杨勇、苏振华、陈曾固送的挽联是：“为社会而牺牲先生堪拜，毁仁义以肆虐大憝宜诛。”

陈又新送的挽联是：“衔命飞骑问起居，八千里路遥归，恨我挽



卢焘将军牺牲后，国内外党政军等各界人士送致挽联多达410多幅

救乏术；捐躯饲虎安闾阎，三十万人解放，知公不负平生。”

秦天真送的挽联是：“起撑危局功在筑城此无良对匪党人人切齿，出抗顽凶情殷闾阎感斯铭德哭先生个个伤心。”

据陶朱问《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著中叙述，卢焘将军被害后，何应钦本人不便出面，通过他人转给卢焘之子卢慈仪一封悼唁书信和赠送了五千元大洋，谷正伦、何绍周等人也暗中派人参加了卢焘的吊丧活动。

卢焘将军治丧委员会全体同仁的挽词是：

呜呼日黯灵昏，艰危殒长之血。街祭巷哭，涕泪沾羊祜之碑。是则香留豹皮，未足喻其芳烈。险履虎尾，惟有致其精诚而已矣。

卢寿慈先生，灞陵疲乏前李将军，则射虎无意，午桥庄畔，裴令公海鹤再翔。值贵阳真空时代，为人民主持治安，草木识万福，威名妇孺知，君实姓字萑苻，隐慢七著无惊，人皆知，微先生之力不至于此。然而豺狼在邑，遑念老成之典型。鱼羊食人，不顾凡民之匍匐。气豪吞贼，张睢阳与尹子奇，同时尸解成仙。颜鲁公为李希烈所害，肩脾分巨野之家，异时虽快人心。头颅触不周之山，今日已倾天柱。痛哉惟是哀动，行路伫看，鹤吊双飞。死重泰山，不比鸿毛一掷。谨为诔曰：

宜山之北，柳江之阳，佳哉正气，郁郁苍苍。诞生英杰，卓有声光。童牙挺秀，犀角轩昂。略观大意，书读青箱。其事亲也，有道显扬。显业褒大，媲美泷岗。每遂乌哺，已见龙骧。孝子不匮，有亲之丧。衣麻泣血，寸草断肠。夫惟纯孝，能祓不祥。攒宫启柩，瑞木成



卢焘将军治丧委员会会议

章。播之山国，观者堵墙。其事国也，奋迹戎行。革命以来，建树非常。鸠呼时雨，隼擎秋霜。壁垒屹屹，战阵堂堂。其治军也，子仪父兄，柔道胜刚。如臂使指，有智运囊，志湔国耻，愿为国殇。北门之锁，南方之强。归甲曾赋，宜北故乡。出其余绪，敦俗农桑。树艺为圃，牧畜登场。当道倚畀，借箸筹商。为恋慈母、又还夜郎。庐墓所在，园树未忘，更于城北，小启山庄。牙素长掩，角巾徜徉。蛙声鼓吹，鸟语笙簧。素云玄鹤，黑动红羊。斯人不出，民以回皇。斯人既出，民以预康。治安之会，大力匡襄。尽乃心力。得乃糗粮。山邱功德，巩固金汤。奈何虺毒，有甚猱狂。险呈鹿铤，逆竟鴟张。惊我桑梓，戕我元良。我心裂素，我泪沾裳。白虹遽起，碧血谁藏。棠云南国，贞露北邦。归真箕尾，万丈光芒。留名汗简，千古馨香，今夕何夕，维酒维浆，麒麟格泽，翩下大荒。

1950年1月8日，贵阳市党政军民等各界人士近千人，又在原省参议会会址，隆重举行贵阳革命殉难烈士追悼大会。1月12日《新黔日报》，头版报道了追悼大会的情况，刊登了朱德总司令、李济深副主席给卢焘烈士家属的唁电及朱总司令给卢焘烈士的题词等，同时在四版还登载了卢焘烈士的照片和生平及遇难情况。

卢焘将军牺牲后，其家属共收到贵阳市党政军民及国内外等各界人士，生前亲朋好友，给卢焘烈士送来的花圈、唁电、挽联、挽诗、挽词等共410多帧。

卢慈仪给其父卢焘烈士的泣血述是：

先严讳焘，字寿慈，广西省宜北县人。先世耕读相承，代有隐德。先王父泰留公，服膺道义，热心公益，乡党称为长者。先严天资英特，髫龄就傅，研治经史，颖悟异侪辈，逊清光绪戊戌府试，名列第一。壬寅重九，先王父弃养。先严先以大姑丈郭醴轩协戎之丧，驰往庆远，为之料理，甫竣事而大姑母自经以殉，又复为之营葬，故于十月十六日始得家书，即连夜返宜奔丧，哀动路人。服阕后，迫于家

计，乃弃举子业而橐笔于桂林新左营及庆远济字营诸戎幕，历掌书启，兼理收支，均为上级所器重。时清政府不纲，国事凌夷，革命思潮，渐及两粤，爱国忧时之士，翕然景从。先严盱衡时局，念非革命，无以救国，遂与济字营同志张君铁城深相结纳，密谋策应。始则在怀远创设半日算术科，在罗城开办竞化学堂及随营学堂，继则在柳州开设樟脑公司及富贵客栈，用以鼓吹主义，吸收同志。戊申，以密运枪械事泄，几遭逮捕，幸邑令素重张君，纵之远遁沈阳。

先严原名启熹，字亮畴，至是始易今名。辗转闲关，几经艰险，历南宁、龙州入越南，逃亡至昆明，宣统己酉入云南陆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庚戌入陆军讲武堂步兵特别班，辛亥八月毕业。重阳日云南反正，以排长职率队攻军械局。民元壬子，奉檄援黔，唐都督萱赓开府贵阳，委先严充大队长及铜松支队长。继又入役川滇，甲寅经刘护军使如周电调来黔，充东路巡防第一营管带及贵州新编陆军第一团团附，翌年兼该团第三营营长。适王君伯群归自京津，以稔知袁世凯有帝制自为之意，届时滇黔当申大义以举义师，自非积极训练干部，不足以备非常之选，言于刘使，有模范营之成立，委先严兼任营长。已而果有护国之役，先严奉委第二团团长，进兵湘西，攻克麻阳。袁氏旋殂，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简任先严为贵州陆军第二旅旅长。七年戊午护法军兴，先严改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出湘西驻辰州，被推为湘黔联军总指挥，与北伐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相拒于桃源。先严乃以“剿匪保商安境息民”八字相约，冯亦深表同情。相处三年，地方安堵，商民相庆，一时同称名将，有陆抗羊祜之誉。九年庚申奉调赴渝，值黔军总司令王君电轮赴沪养疴，先严被推代其职务。未几返旆黔中，刘督去职，旋被推为黔军总司令。辛酉经孙非常大总统特任为贵州陆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晋衔陆军上将。当是时林俊廷据桂为粤军所驱逐，率三万饥军取道独山来归挥下，先严自维身虽桂籍，服务皆在黔中，利客军之拥戴，而贻害于邻省，丈夫不为也，因谢绝而使之去。壬戌袁君鼎卿组织定黔军来黔，先严深恐兄弟阋墙，民生涂炭，当与和平谈判，让出政权，

乙卯无惊，闾阎安谧。时则滇军范石生、杨希闵、蒋光亮、杨如轩、杨池生等五旅方由滇退驻黔西盘江一带，皆百战之卒，夙称精锐，派杨君复光来洽，愿为前锋驱袁。先严慨然曰：“杀人争城，徒苦吾民，吾不忍为也，今政府整军粤峤，方将威弧北指，扫荡中原，诸君有志，曷若联轡赴粤，以戮力于国家事业乎？”词严义正，范杨钦服，一致推戴，愿隶指挥。先严遂于交代清楚后，率之出桂，会合桂军何中权、刘玉山、刘秉权等组成滇桂联军，推先严任总司令。迨闻关抵粤，而局势大变，中山赴沪，陈炯明已赴广州。先严乃嘱诸军权作枝栖，已则搭轮赴沪，旋以赵督恒惕之约，税驾长沙，更以洛阳吴巡阅使佩孚、南苑冯巡阅使玉祥迭电相邀，北游燕豫。癸亥，南旋于粤。夏四月奉孙大元帅聘为大本营高级顾问，旋又改聘高级参谋。以接家书知先王母在筑抱病，不敢应命。随星夜赴沪，正拟溯江旋黔，适接刘督如周电，惊悉先王母已弃养，一恸几不欲生，即匍匐就道，返筑治丧。以择地需时，爰权厝灵柩于北门外普照寺后福德隆张府所置园地内，以俟妥觅佳城，诹吉就葬。时黔中为滇军驻守已将两载，而黔军在渝扩充实力，声势方盛，于是有出师五路复黔之议。先严方守制，浸闻其事，深惧彼此兵戎相见，糜烂地方。时渐督卢永祥与松沪护军使何丰林有江浙联军之举，南方政府方谋有以策应，先严乃说于唐督办曰：“黔军久客蜀中，环境艰苦，不忘桑梓，势所必然，蓄意进兵，其锋方锐，兵法所谓兵哀者胜，此殆似之。且君昆仲先后建节于黔，固已无异桐乡，宜留去思，以传达千古，今如周旋鞭弭，势必荼毒生灵，揆诸仁人君子之心，何忍出此！为君借箸以筹，亟宜率师北伐，声援卢何，则丰功震于海内，大名垂于汗青，以此易彼，得失显然，唯君图之！”唐君筹维再三，深韪斯言。先严乃兼程赴渝，言于袁督办鼎卿，但使黔军退出，黔政收回，何必志在报复，演至于兵连祸结，蹂躏珂乡。袁君感于诚意，欣然采纳。遂以定议十二月二十九日滇军撤退，黔军彭总司令令仲文入贵阳。说者谓先严力任斡旋，消弭兵氛，有足多者。乙丑春贵州省政务委员会成立，推先严为委员会长，坚辞不就。会桂中军事方殷，先严眷念桑梓，因应粤桂两

省当轴之请，率黔军两旅援桂。师次独山，闻桂事已解决，即通电解职。

鉴于黔号山国，交通不便。举凡风气闭塞，文化之落后，以及一切建设之莫由推动，其主因实由于此。自非修建公路，不足以资改进，因赴南宁与桂省当局洽商，拟联合修筑黔桂公路，久之未获就绪。丙寅周督办继斌兼领疆圻，远瞩高瞻，首从事于开辟公路，知先严曾有意于此，深喜所见相同，请为襄助。先严因于下卯春赴粤采购汽车及有关材料，并劝促桂方积极修建南丹河池一带公路，以与黔境衔接，轮蹄鞅掌，孜孜不懈。周君特为卜地于贵阳西郊，迁先王母之柩安葬于此。邦人感于先孝思之笃，相与撰著鸿文，刻石砌墓，并贵名曰慈母园，以资表彰焉。先严素有志定业，历年公私冗迫，未遑顾及，此幸得赋闲居，深冀小试，稍偿夙愿。因思造林一端，收效虽缓，功用实宏。癸酉在粤，乃与林耿凡、杨景星诸君集资合组同德林场于宜山之洛西乡，为十年树木之计。丙子夏宁桂失和，广西成立抗日救国军，先严方在桂被推为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独念外侮日亟，国难方殷，正宜举国团结，同心协力，共支危局，不当尚有意气之争，授倭以隙，故师出南丹，即通电提倡议和。九月和议成，先严即遣散部队，解职返黔，经黔桂两省政府聘为顾问。戊寅春赴柳州于东古陵辟德寿林场，犹畴昔树木宜山之意也。于时倭焰鴻张，江淮鼎沸，当偕慰劳团同赴前方正阳关、田家庵、信阳、合肥、徐州等处慰劳抗日部队，风尘仆仆，未敢告劳。己卯冬敌机轰炸筑垣，金井街住宅悉毁，爰迁居于北郊之小宅吉小筑数椽，杂植花树，藉作疏散之所，兼为搜裘之谋，取昔人又得浮生半日闲之意，“榜曰半日山庄”。每星初露晚，落叶新花，流连景光，优游杖履，自谓多年劳苦，于此乃得小休，每诵渊明松菊三径之辞，未尝不悠然神往。壬午赴柳州，照料林场，寄居于超凡义姑之息影奇庐。甲申七月，敌骑侵桂，柳州疏散，遂旋筑垣。十二月黔南事变，全家疏散至桐梓，住于二姐丈熊君绍逸家。乙酉正月，忽感风邪，寒热交作，昏迷达十五日之久，继稍能言，家人及二姐丈苦劝服药，坚决不听。独思吃黄果，复苦不从，殊知剖食数片，神志转清。自是逐日均食黄果，渐及糯

食、鸡汁，日有起色。又得二姐慈明、三姐慈定等昼夜服侍，渐次复员。厥后始知所患，实为斑疹伤寒重症，乃食黄果而告痊，可谓邀天之佑矣。嗣或访问亲旧，或经营林场，常往返于柳粤。丙戌以还，两次被选为国民大会广西省区域代表。第一次以大会延期未开，徒劳往返。第二次莅会，则会后赴桂，报告闭会经过于民众，盖治事之不苟如此。去年乙丑冬十一月十一日，贵阳已成真空状态，各界民众，怵于萑苻堪虞，情势严重，因有临时治安委员会之组织，冀合群力，共保身家，以维过渡。公推先严担任主任委员，先严自顾年事已高，难胜繁剧，深虑或致复食，有负民众付托之殷，惟能念自民初寄寓黔中，至是凡三十余年，实为第二故乡，兹则安危所关，于义不容漠视，不得不竭其精力，以从诸君子之后，勉任巨艰，期于地方有所贡献。殊有国民党反动军长刘伯龙者，由贵定、龙里等处回窜贵阳，心怀叵测，碍于地方有备，故于治安会，深为嫉视，扬言有渠坐镇，何烦民众越俎。十四日清晨，派人至半日山庄，以约会为名，诱请先严同登汽车，疾驶至西郊桥头附近之转弯塘，惨遇害，于是先严遂弃不孝而长逝矣。呜呼哀哉！

先严事亲至孝，交友以信，接物以诚，恺悌慈祥，霭然仁者，此非阿好者之私言，实黔人之公论也。乃生命之为宿，其惨酷一至于此，彼苍者天，谓之何哉！矧先严素性恬淡，生平治军从政，无不以仁民爱物为宗旨，从无丝毫权利之见。晚岁弭影林泉，久不预闻时政。此次承乏会务，原以众口交推，友好敦促，论其义则无异桑梓之敬恭，论其情，则正如同舟之共济，今桂人而为黔牺牲，以维持全市治安，保卫数十万人民生命财产之身，而罹膏血郊垌之祸，彼刘氏子顾独非黔人乎？何以雄猜阴狠至于如是其极，虽不旋踵而卒服厥刑，然先严已不获复生矣。呜呼，惨哉！

先严殉难时，因仓卒无法营葬，故运遗体至慈母园装殓权厝，以待卜地诹期本市僧道及尚节堂诸节嫠暨乡村农妇，每日自斋香烛纸钱，亲诣慈母园先严灵前诵经超度，络绎不绝。又丧堂布置所需工料，或者不忍计收代价者。呜呼！昔苏文忠之被逮，杭人普建道

场为之祈禳。司马温公之薨，乡人为之它材负土，不忍取值。以今方昔，未可谓书之不足仪矣。今政府矜恤耆旧，特为死难诸烈士同为开会追悼，足表荣哀而慰英灵。至先严生前诸友好暨各界民众诸君子，于治安会甫经结束后，即共同发起治葬会，醵资协力，代择吉壤，会葬执拂，历冬徂春，听夕从事，其中经过，煞费苦心。其有以事不克分身与会参加而竭诚尽力，从旁赞助，促成义举者，尤不乏人。凡此精诚，贯于金石，风义薄乎云天，共患难于生前，验交情于死后，不孝固宜铭心镂骨，永矢弗谖。即先严有知，亦当瞑目于九泉矣。

先严生于前清光绪八年壬午，享年六十有八岁。家慈覃夫人自光绪癸卯来归，生长姐慈祥，适宜北覃君文渊。次姐慈明适桐梓熊君绍逸。三姐慈定适广东李君松年。五妹慈达适台山李君荣波。七妹慈和适太原李君振麟。八妹慈平适河北王君孚忱。及不孝与四弟万水，共兄弟姐妹八人，慈祥、万水、慈平皆先卒，不孝取刘佩媛，有子四人，曰青还、青田、青冰、青蓝，皆幼。先严体素丰强，虽在桐梓罹大病，然未两月即复原，近年饮食如恒，腰脚弥健，含饴弄孙，足娱晚景，不孝私心窃慰。方谓得以承欢膝下，稍尽乌私。庸讵知奇祸横飞，天不慭遗，不孝应变无方，捍卫乏术，致先严以垂暮之年，不免虎口，呜呼！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虽万死何赎乎！而今而后，长为无父之人，永抱风飘木之恸，缅忆音容，肝肠寸裂，抢地呼天，曷其有极！先贤邱应台先生有言曰：“为人子而不能知亲，非子也，知而称之，或过其实，谓之子情，不谓之子道。”不孝蒙昧孤陋，未能窥见先严志事万一，何敢厕于称之之列，祇以痛遭大敌，惧湮潜德，谨摭拾畴昔庭训所及，旁征月旦，暨诸父老之所称，迷据事缀辞，期无悖于过实之旨，藉备乡乘国史之采择。伏冀名贤、耆硕、故交、长者，矜其哀悃，宠赐表章，俾光泉壤，而资兴感。则歿存戴德，宁有涯矣。苦块昏迷，为遑伦次。伏祈  
矜鉴！

棘人卢慈仪泣血谨述

1986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证书，追认卢焘将军为国家级烈士。同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烈士编辑委员会又把卢焘将军列为“中央立传烈士”。如今，在贵阳贵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已在其遇难处西郊转弯塘修建了“卢焘烈士纪念亭”，在西郊老阳关处修建了“卢氏陵园”（已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及计划修复其旧居供人瞻仰等。与此同时，多年来，其家属每年分别从美国、加拿大、香港、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太原、石家庄、北京、柳州、宜州、环江等国家和地区，回到贵阳访问、扫墓时，都分别受到贵州省委、省政府、省政协、省委统战部及贵阳市委、市政府、市政协、市委统战部等历届领导的亲切接见。《贵州日报》、《贵阳晚报》、《贵州政协报》及《贵州文史资料》、《贵州党史通讯》等报纸杂志，也都经常报道将军生前的丰功伟绩。贵州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卢焘将军》，贵州电视台还以卢焘将军为主线，专门摄制了《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给卢焘烈士颁发证书

贵阳》、《贵阳英烈》、《风雨送君归》等专题片，并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了七集电视剧《喋血黎明》(又名《解放贵阳》，此剧现可在全国各大网站下载收看)在央视播出，中共贵阳市委党史办公室组织人员绘编了《布衣将军——卢焘》连环画册，1999年11月14日，贵州省政协、省委统战部及贵阳政协、市委统战部等，还在贵阳联合举行了“纪念卢焘先生遇难五十周年座谈会”，座谈会由省政协副主席王中刚主持，副主席袁荣贵(原常务副省长)发表重要讲话，老同志王思明(原省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后曾任省政协主席)、唐弘仁(原省政协副主席)等共100多人出席。

同样，在将军的家乡，广西人民也不会忘记他。198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拨出专款，在将军的家乡环江县城的望峰上，建起了卢焘将军的石雕像一座，在将军的出生地明伦镇的龙潭峰上又修建了卢焘将军纪念亭；县政府拨款出版了纪念文集《卢焘烈士》和《怀念卢焘将军》诗集，作家黄绍峰还创作出版了传记小说《将军死于谋害》等。

卢焘将军一生为国为民做了许多许多有益的事情，特别是在贵阳解



广西环江县城的卢焘雕像



广西环江县明伦镇卢焘将军纪念碑



广西环江县明伦镇卢焘将军纪念亭

放的前夜,他还为贵阳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实在是令人可歌可泣!可敬可佩!在祖国大地到处涌动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和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像卢焘将军一样的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们,他们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同辉,与祖国同存,与人民同在,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他们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卢焘在第二故乡贵阳的遇难纪念亭



位于贵州省贵阳市北郊的卢氏陵园

## 第二十八章

# 罪魁祸首刘伯龙的可耻下场

### 一 刘伯龙其人

刘伯龙是贵州龙里县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和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毕业生，抗战前在康泽的别动总队任参谋长。1940年别动队改编为两个师：新二十八师（师长刘伯龙）、新二十九师（师长马维骥）。同年，二十八师驻贵州，该师先驻黔北，后来调到黔东。

刘伯龙以杀人闻名。他常常以睚眦之怨杀人，甚至无缘无故杀人。被他无辜杀害的人不计其数。

刘伯龙在龙里时，有一个姓郭的副官向他妹妹刘腾英求婚，已得到他家里人刘逸群、刘腾栋的同意，但刘伯龙认为郭某不该打他妹妹的主意，便把姓郭的杀了。刘认为他的表弟邬承兰在观音山开烟馆，丢了他的脸，也派人把邬抓来杀了。

刘伯龙的秘书沈某，跟他有十几年之久，被他暗杀在贵阳黔灵山下。杀沈的原因不明，一说是沈向他请长假，另一说法是沈给他办了一件机密公文后，他杀沈是为了灭口。

1949年夏，八十九军在滇东“清剿”。刘伯龙有一次乘车赴云南，在滇、黔两省交界处的公路上，有一辆军用卡车因抛锚停在路中央修理，刘伯龙被阻停车。那辆卡车上的一个国民党国防部的上校走到刘的车旁观看了一下，刘立即用手势命令他的卫士把这个

上校枪杀于路旁。

刘伯龙在滇东“清剿”期间，曾命三二八师师长张涛屠杀沾益建新村人民，命令中有“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斩尽杀绝，倘有玩忽，唯该员是问”等语。张本人没有去，是副师长魏锡龄率两个团去执行的，魏怕以后追究责任，曾将刘伯龙的命令拍成照片保存。

刘伯龙还以同样的语气命令三四三师师长项荣还在曲靖的五岔屠村。

1949年9、10月间，独山县有力士坤凯里的王富文，岑巩县有力士坤龙颈坳的王瀛湘，同时在贵州自卫干训团受训。谷正伦是该团团长，韩文焕是教育长，团址在贵阳次南门外丁公祠。某星期日，王富文、王瀛湘两人外出突然失踪。韩文焕判断是刘伯龙派特务捉去了。韩打电话给刘伯龙说：“谷先生叫你把这两个人放了，有什么问题等他们结业以后再说。”刘说：“这两个人不是我抓的。”由于韩文焕没有掌握刘抓人的证据，虽然明知是刘干的，也无可奈何。直到后来刘伯龙被杀后，才由刘的特务供称：这两个人是他们奉刘伯龙之命在贵阳次南门口一架马车上抓去的，同车的四名青年学生也一齐抓了。刘伯龙暗杀王富文和王瀛湘时，为了灭口，把四个学生也暗杀了。

1949年11月15日，刘伯龙由贵阳赴晴隆途中，在平坝附近看见一个道士向贵阳方向走。刘叫卫士下车，把这个道士枪杀了。

刘伯龙过镇宁时，谷正伦住在县政府里，刘对县长李本侨交代说：“值此非常时期，凡属形迹可疑的人都要杀掉。”李问：“什么样的人呢？”刘答：“三教九流啦，走江湖卖艺的啦，和尚道士啦，穿西装打红领带的啦。”最后加上“外省口音的啦！”当时谷正伦的机要秘书蔡虹云在场，此人满口湖南腔，听到这里急忙缩进房间去了。

刘伯龙对人民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而对蒋介石、何应钦等却极尽谄媚适迎之能事。龙里有中学一所，抗战期间刘伯龙为了适迎国民党的参谋总长何应钦，曾建议将该校命名为“应钦中学”，

特函约龙里士绅、猫场人胡鑫武到县城开会，希望胡为他说话，殊不知胡以何应钦既非龙里县人，对龙里又没有贡献，不同意用“应钦”二字命名。刘遂以“共产嫌疑，谋为不轨”的罪名将胡扣押。胡愤极，在狱中破口大骂。刘知道后认为胡敢于这样骂他，必定后台不小，乃派人和胡谈条件，胡无可奈何，接受了出去后不登报、不上告、不到重庆活动三个条件，才被开释出来。胡一向看不惯刘伯龙的为人，曾写了一首绝句讽刺他：

渺小身躯量偏狭，满预狡黠尚浮华；  
草菅人命称绥靖，天子门生处处夸。

## 2 谷正伦、韩文焕与刘伯龙的矛盾

1948年底贵州成立三二八、三四三两个师。三二八师师长张涛、三四三师师长项荣还，都当过何应钦的侍从副官。后来两师合编为八十九军。关于军长人选，谷正伦希望蒋介石在贵州人陈铁、王文彦、刘汉珍三人中任意圈定一人，但蒋一个都不用，直接派刘伯龙为八十九军军长。

谷正伦认为刘伯龙从前在黔东声名狼藉，荼毒乡里，到缅甸作战时又毫无作战能力（抗战期间，刘伯龙率新二十八师到滇缅边境参战，所部一触即溃，后该部番号被取消，刘即到成都的国民党中央军校任教育处长）。所以，不希望刘回来当军长，同时，还担心他尾大不掉，不听指挥。但蒋介石既已决定，谷亦无可奈何，只得接受既成事实。

1949年3月，刘伯龙到贵阳组织军部。刘来后，同谷正伦、韩文焕又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矛盾。

一个是在同桂系的关系上。谷正伦对蒋介石一向忠诚，在蒋的面前他奉命唯谨，十分恭顺。他同桂系并没有特殊的关系。但在一

九四九年初那样的历史条件下,蒋介石已退居幕后,李宗仁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对各省的控制趋于松弛。当时谷正伦、韩文焕认为,贵州必须和四邻省份密切联系,广结外援。那时白崇禧握有重兵坐镇武汉,对贵州有屏障作用,即使他今后退回广西,只要所部不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消灭,仍不失为一支力量,所以理应及早与之联络,引为外援。1949年4月,贵州秘密开放烟禁,关于烟土经广西出口的问题,也需要同广西洽商具体办法。贵州绥阳人沈久成曾任师长和军长,和桂系有较深的关系。这件事刘伯龙知道后,即向蒋介石告密(这是刘死后我们才知道的,刘有电台直接与蒋联络)。当年六月,蒋介石给谷正伦来电:“贵州属西南行政长官公署,今后有事仍须向张长官请示。”(张长官即张群)谷接电后大发雷霆,把贵州的军统特务陈士贤、何锦书等叫去大骂一顿,严询是谁告的密,二人矢口否认,谷才未予追究。这一份电报反映了蒋介石同桂系之间的矛盾,蒋不准谷正伦和桂系勾搭。

刘伯龙的看法和谷正伦、韩文焕不同。他只拥蒋,把白崇禧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他的想法和蒋介石相同。这一想法的实质,是宁愿谷、韩被共产党消灭,而不愿谷、韩同桂系联系。所以,刘伯龙同谷、韩搞不拢是意料中事。刘伯龙曾扬言要杀掉韩文焕和沈久成。

谷正伦晚年回到贵州当主席,他以家长自居,对于从外省回来的贵州籍军人,只要有可能,他都要设法安插,例如以王文彦、宋思一为贵州绥署副主任,朱敬民、车蕃如为参谋长,宋质坚为副参谋长,聘请张卓为顾问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同时这些人对谷正伦也相当尊重。而刘伯龙自恃是蒋介石的亲信,目中无人,不听谷的招呼,这就伤了谷的自尊心,而谷一时也把刘无可奈何,因此更加恨刘。有过这样一件事:龙里县长一再向韩文焕反映,龙里的望族共三家,最守本分的是宋述樵家,从不过问地方上的事情;其次是晏玉琮家,晏玉琮的大嫂对地方上的事情喜欢插嘴;最糟糕的是刘伯龙家,刘家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根本不把县长放在

眼里，韩将情况向谷反映，由于刘伯龙是蒋介石的亲信，谷拿他无可奈何，只是憋了一肚子的气。

刘伯龙在 1949 年贵州解放前夕乱下条子委派师长和旅长，也是使谷正伦大为恼火的事情。按谷正伦、韩文焕当时的应变部署，是以省、专署、区、乡这一行政系统为纲进行布置。其所以按这一系统，是因为省和县都有财权，专署虽无财权，但今后可利用所属县的财权，筹措粮饷。贵州全省保安司令部的腹案是，解放军来了，让出城市把政权转移到偏僻地区去打游击。为此目的，各级政府都作了相应的游击准备，包括选择根据地，储备粮弹，配备无线电台等措施。在上述构想下，谷正伦起用了各专县有声望的人，尤其是军人，来担任当地的专员、县长和区保安副司令，以便团结地方上一切反动力量进行垂死挣扎。如任命谭本良为兴仁专员，任盛濂为镇远专员，余辉庭为榕江专员，陈泰运为贵定专员，毛梦先为铜仁专区少将保安副司令，都堪为都匀县长，等等。可是，刘伯龙却无视省保安司令部的统一部署，乱下条子委派了一些师长和旅长。例如：派阮略、刘剑魂和刘伯龙的兄弟刘逸群为师长，罗再启为旅长，甚至把安龙管区的岑国斌也派为游击司令。这不仅破坏了省保安司令部的全盘部署，而且给地方上带不少问题，如这些师的粮饷来源问题就无从解决。

谷正伦身为贵州绥署主任和贵州省主席，也只是在接到行政院长阎锡山电报后，根据指示将贵州保安部队改编为一〇一军，并以韩文焕为军长，接着才任命了六个师长（其中四个是原来的保安旅长，另外两个都是县长兼三县联防司令官）。六个师的经费都是有着落的。此外，他没有再派过师长。十九兵团司令何绍周也没有任命过师长。而刘伯龙是何绍周指挥下的一个军长，却乱飞条子委派师长和旅长，确属十分狂妄，目中无人，谷正伦焉得不恨他？

### 3 惡有惡報，省長殺軍長，以平民憤

谷正伦最后下决心杀掉刘伯龙，是在刘伯龙枪杀卢焘这一事件发生之后。

据曾任一〇一军(原省保安军)参谋长肖开训撰文回忆：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进入贵州东部，国民党四十九军自黄平撤退。谷正伦预料贵阳将失守，怕贵阳在国民党军队撤出后的真空期间被暴徒焚掠，将来贵州人不原谅他，挖他家的祖坟，因此想找一位年高德劭的人出面维持秩序。经熟虑后，认为卢焘是最恰当的人选，也是谷正伦当黔军第二混成旅长时的旧长官，在旧军人中被认为是宽厚长者，很受贵州人的尊敬。卢在贵阳闲居多年，一向不问外事，经谷正伦亲自登门拜访，劝卢出面主持一个维持会，卢却不过情面才答应了谷的要求。但卢年事已高，只出名承头，具体事务由社会闻人郭润生负责。

十一月十二日，我承韩文焕的指示，转嘱贵州省会警察局长张安庆拨几百支旧枪给郭润生。十三日早上，我在核实了张安庆确已执行这个指示后，便在当天上午离开了贵阳。

刘伯龙于十日到贵阳。当他获悉卢焘和郭润生维持贵阳治安时，便派车将卢焘劫持到贵阳西郊的二桥转弯塘。将卢杀害在路旁。接着刘伯龙又找到郭润生。郭说：“我服从军长的指挥。”可能还说了一些捧刘的话。刘本来是个喜怒无常的人，这时忽然转怒为喜，不唯没有杀郭，反而又乱下条子，派郭当贵阳警备司令。

这时，谷正伦已由贵阳撤退到晴隆。谷知道卢焘被杀后，深感内疚，这正是“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如果他不劝卢焘出面维持社会治安，卢焘是不会死于非命的。谷气得吐血病复发，这时才下定决心，不问后果如何，非杀刘伯龙不可。

接着又发生一个事件：十一月十七日下午，刘伯龙的八十九军搜索营在晴隆抢劫贵州全省保安司令部的械弹。谷正伦认为这是刘伯龙有意放纵他的部下胡搞，从而更加坚定了杀刘的决心。

谷正伦决心杀刘伯龙以后，恨不得马上执行，急得茶饭无心，坐卧不安。经韩文焕代为策划，11月17日下午4时许，谷召见了八十九军的师长张涛和项荣还，将自己的决心告诉他们，张涛表示赞成，项荣还也赞成，不过项认为刘毕竟是他的军长，他不能动手，但表示保守绝对秘密。于是作了如下的分工：18日上午设法诱骗刘伯龙到县政府来，由一〇一军负责将刘枪杀，枪响后，由张涛负责在山下缴八十九军直属队的枪。

当夜，韩文焕指定保一团团长李成举担负杀刘伯龙的任务。李成举奉韩的命令由兴仁率两个营星夜驱车赶来晴隆的。李挑选一个打土匪有经验的军士来当枪手，这名军士身材不高，但极为精干。李成举在县府大门准备了机枪阵地，以便机枪可以随时进入射击位置。

18日上午，刘伯龙将乘车赴普安，他的军部将移往那里。9时许，张法乾打电话给刘说：“谷先生已经起床，你要见他就来吧！”刘伯龙带了一个姓苏的副官和两名卫士（其中之一是普安士绅陈亮卿的侄儿）一同上山来，刘到谷的房间内，谷同他谈了大约刻把钟的话，刘告辞而出。这时韩文焕由西边房间走到穿堂来和刘打招呼说：“伯龙，我今天要和肖开训到兴仁去，我要整理一下东西，不能奉陪了！”说完，就缩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刘伯龙从上房下来时，东边厢房内正在写由刘伯龙接替谷正伦为贵州绥靖公署主任的布告。这是故意写来哄骗刘伯龙的。但当时在东边厢房内的上校参谋宋克今和前贵阳警备副司令魏持平也不明真相，还以为刘真的要当绥署主任了。

刘伯龙走到西边厢房张法乾的房间里，红光满面，腰悬一支非

常漂亮的纯白色左轮手枪，副官和卫士均不在身旁。坐定后，他就吹起牛来：“我到哪里都有吃的，因为我的伙食车子总是先出发替我准备好了！”他又自鸣得意地说：“我从来不看经理处长的账，因为书面的账总是假的，我叫他口述，这样，他才作不了假。”这时，一个少校军官进来向绥署参谋长张法乾请示有关军粮补给的问题，不待张开口，刘伯龙就抢先对这个少校说：“你叫他们乡保长办，他们如果不办，你就杀他们；如果你不办，我就杀你！”这个军官弄得莫名其妙。答应一声：“是”，行个礼退出去了。这时刘伯龙俨然以省主席的口气，拍一拍何朝宗（省府秘书长）的背说：“今后省府的事你要多负责啦！否则——”何朝宗说：“未必你要杀我？”刘答：“说哪里话！”之后，刘又炫耀了一下他那支漂亮的左轮，说这是从美军那里弄到的。

刘伯龙赖在房间里不走。李成举着了急，他去报告韩文焕，可否把刘拖出来打了。韩说不行，房间内有我们自己人，怕误伤。

刘伯龙不走，是在等他的警卫车。他的警卫车上有一排人，全部持冲锋枪。李成举很机警，他替刘伯龙打电话到八十九军军部去催，当他知道车子已经开出时，就走进房间来报告刘伯龙说：“报告军长，你的警卫车开出来了。”刘这才起身告辞，何朝宗送他到房门口，张法乾送他到礼堂后门的梯坎上。刘伯龙一行四人，李成举带着那个军士，一同进入礼堂。不久，就听得啪啪几声枪响，接着是一梭子弹，一时山下枪声大作。

李成举事后叙述详情如此：我在礼堂周围早埋伏了人，并且和挑选的枪手约定，以脱帽为号。进礼堂后，我走在刘的侧后，用手揭了一下帽子，枪手就从后面用左手拉刘伯龙的手，把刘扭转身来，用二十响的自来得手枪对准刘的腹部开枪，刘喊了一声妈，就倒下去了。刘的一个卫士用冲锋枪扫射了一夹子弹，奔出了礼堂大门。这时我向他大叫说：“你疯了！各为其主嘛。你军长都死了，你讨死

做什么？赶快把枪给我放下！”这个卫士才放下了枪，和苏副官等在人一同就擒。

那时，山下刘的警卫车刚到，听到山上枪响，大呼：“军长糟了！”一齐向山上冲，被山上的机枪压制着，上不来。与此同时，张涛率部在山下开始缴八十九军直属队的枪。

刘伯龙被杀后，人们到礼堂去，看见刘仰面躺在地上，下腹有枪眼，左轮子手枪不见了，皮鞋、军裤都被人脱掉。肖开训接着下山去嘱咐一〇一军的营长严继斌，叫他到旅馆去代为照顾家眷。下午4时许，张涛缴枪完毕，问题全部解决。刘伯龙的搜索营长徐某和刘豢养的一个特务头子被捆上来。

刘伯龙的尸首被拖到山后去，张涛打电话给张法乾转报谷正伦说，刘伯龙到底是张的军长，张请求谷正伦准许他买副棺材把刘埋掉。谷同意了。谷以后释放了苏副官和卫士，枪毙了刘伯龙的搜索营营长徐某和刘豢养的特务头头。刘伯龙的妻子有金子四百两，张涛没有没收她的，让她带着苏副官乘吉普车逃到昆明去了。谷正伦奖赏了动手枪杀刘伯龙的军上。

刘伯龙死后，谷正伦、韩文焕等才来凑他的罪状，共得“克扣军饷，紊乱军政（指刘乱派师长和旅长），纵兵殃民，擅杀无辜”四条，并且以这四条作为杀伯龙的理由，呈报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长阎锡山备案。张法乾为谷正伦拟电报稿拍发给黔东的专员、县长、保安团长，饬令他们逮捕刘逸群就地枪决。

刘伯龙一生残害人民，作恶多端，广大人民对他怀有刻骨仇恨。当刘伯龙由于反动派内部倾轧而被杀的消息传开后，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晴隆、普安、盘县及滇东老百姓甚至沿途数百里燃放鞭炮以示庆贺。

#### 4 剑子手刘伯龙的幕后操纵者

据谷正伦的部下吴道安（曾任省府秘书长）说，1949年11月18日，谷正伦在晴隆把刘伯龙杀了之后，在刘身上搜到了一封电报——蒋介石指示刘伯龙杀害卢焘，可见卢焘的被害是蒋帮特务早已蓄谋的。

据陶朱问著《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中曾写到，1949年2月，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奉命到浙江奉化溪口接受蒋介石训示时，曾向蒋介石拟定要在国民党撤离大陆之前，将蒋的所有政敌和对现实不满的人列入最后的暗杀名单，这些人包括李宗仁、龙云、白崇禧、黄绍竑、刘斐、李济深、李任仁、李宗煌、朱蕴山、梁漱溟、柳亚子、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孙起孟、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何思源、陈仪、杨杰、卫立煌、张澜、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史良、沙千里、黄炎培、张东荪、王造时、储安平、贺耀祖、范朴斋、程潜、唐生智、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卢汉、刘文辉、邓锡侯、邓汉祥、潘文华、鲜英、卢焘、顾毓权、荣德生、袁翰清、刘人爵、张严佛、唐伯球、邓介松、肖作霖、陈云章、安恩溥、龙泽汇、陈汝舟、李宗理、杨玉清、唐鸿烈、麦朝枢、林式增、黄翔、骆介子、毛健吾、祝平、骆美轮、李炯、朱敬、瞿绥如、罗大凡、郭汉鸣、徐天深、刘绍武、王慧民、郭威白、黄耀、彭觉之、杨德昭等84人，其中卢焘排在第50名。经审核后，蒋介石又亲笔添上了宋庆龄、张学良、杨虎城3人，最后确定名单共87人。

1949年8月28日，蒋介石逃到重庆召开秘密防务会议，毛人凤汇报说：“据中统消息，贵州宿将卢焘已公开策动谷正伦、何绍周、刘伯龙等要进行起义了。”提起卢焘，蒋介石不禁勃然大怒：“毛

局长，你们忙来忙去，都忙些什么？一个杨杰，从年初到现在，依然逍遥自在，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制裁此人。贵州又生事端，卢焘……乃黔省军阀原凶、封建余孽，屡次背执总理信条，与中央作对。你们怎么忘了这个人？名单上不是有吗？为什么拖到现在还不动手？”

“总裁。”毛人凤可怜巴巴唤过一声，忙解释道：“卑职工作失职。卢焘此人是社会名流，不比杨杰，在黔省影响也一般……”

“糊涂！”蒋介石猛地一声大喝，毛人凤不由得浑身一抖，忙打住了话。这时，他终于在记忆深处唤醒了对卢焘的认识，此人是何应钦、王伯群、谷正伦等国民党人员的老师，又局限在贵阳，即使制裁了他，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得罪何应钦。因此，他故意轻描淡写，极力将卢焘之事敷衍过去。

“我早说过，不能心慈手软，我们的教训不是杀人太多，而是太少。照这样下去，你我都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总裁！”毛人凤小心翼翼地说道：“此人听说是何敬之（应钦）、谷正伦的老师。”

“岂能因人废事。”蒋介石摆摆手，已不容毛人凤争辩。毛顿时噤若寒蝉。回到住处，毛人凤立即与军统重庆站站长兼重庆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徐远举、副站长周养浩（曾任贵州站站长兼贵州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处长）进行商量，派谁去执行刺杀卢焘为好？徐远举一句不经意的话，令毛人凤顿时有了主意。徐远举说，何绍周已无意瞻望贵州省主席一职，觉得斗不过谷正伦，一个鸟都不生蛋的地方又有啥搞头，现在一门心思想接替卢汉，担任云南省主席。周养浩则补充说，真正想挤走谷正伦，梦想当贵州省主席的是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听说早就不满谷正伦，常常自恃军权在手，根本不把谷正伦放在眼中。综合两位手下的意见，毛人凤就直接作了工作安排：制裁卢焘不用我们动手了，刘伯龙不是想挤走谷正伦当贵州省主席吗？那我们就给他这颗糖吃，让他去杀卢焘，但要讲清楚，卢焘是委座亲自点名的要犯，只要完成了任务，我们就一定要保举他当贵州省主席。后面的具体工作由周副站长，直接通过军统内线与

刘伯龙单线联系。

就这样，狗胆包天的反动军长刘伯龙就实施了他要当贵州省主席的这一丧尽天良的罪恶计划。

## 附文：

### 一、卢焘《简明年谱》遗稿

(1882~1945)

予原名卢启熹，号亮畴，因革命失败改今名(卢焘，号寿慈)。

光绪八年(1882年)壬午九月初一，生于恩县属之五洞九伦村。是年一岁，正遇才院村莫梦笔(弼)之乱，吾母莫，襁褓避于那平村，与吾父泰留公赖针指度日。后吾父为官军向导数年，事平始归。

光绪九年 两岁……

光绪十六年 九岁，始开蒙入私塾，从卢慎徽先生读。取学名启熹。是年，将《四书》全部读完。

光绪十七年 十岁，正月随吾父至庆远府，依大姑夫郭醴轩协镇，从钟逸卿先生读。是年，将《诗经》全部读完。

光绪十八年 十一岁，正月，仍回乡里从族兄楚材读。

光绪十九年 十二岁，仍从楚材读，将《书经》、《诗经》全部读完。是年十二月，随族叔重周公赴庆远，又蒙郭礼轩姐夫留读。

光绪二十年 十三岁，从简敬轩先生读，取字亮畴。读《幼学》、《礼记》、《声律启蒙》。

光绪二十一年 十四岁，从韦星五先生读，初学作对，始读《唐诗三百首》，并将《礼记》、《幼学》读完。

光绪二十二年 十五岁，郭姐夫聘蔡漫云先生来教专馆，始开笔作破承起讲，令抄古文及郑小谷之补学轩八股文读。

光绪二十三年 十六岁，从杨香林先生读，是年作完篇。

光绪二十四年 十七岁，仍从杨香林先生读，是年二月，考府甄别，作《其为人也发愤》题，蒙取第一名。八月，学院冯金鉴莅临岁考，改策论，故未侥幸。

光绪二十五年 十八岁，辍学，从忻城县汉堂吴辅廷出巡，边学书启。

光绪二十六年 十九岁，奉双亲命与清德女士订婚，即赴桂林新左营周鑫吾管带幕，充书识。

光绪二十七年 二十岁，八月郭姐夫奉委左军中营管带，遂随返柳州充收支。

光绪二十八年 二十一岁。五月，因游勇陷三江口洪河厘金，郭姐夫被撤职回庆，十月初二作古。十一月十六，得乡人口信，吾父于九月初九日辞世，哀哉！哀哉！遂连夜回籍奔丧。

光绪二十九年 二十二岁。正月初八日，从俗抢婚，接清德女士到家为孝媳。二月十二日开吊葬父。是年四月，游勇大股骚扰全境，八月，奉母携室潜避庆城，住于郭姑妈家。随入杨发贵军门幕，驻柳州。旋助张萼楼管带营防，驻运江。

光绪三十年 二十三岁。五月十一日，绍字先锋营陆亚发在柳州叛变，祖绍文出走，又潜回庆城。八月，入济字营龚捷三统领幕，得与张铁城同事，朝夕聚谈，渐闻革命事。

光绪三十一年 二十四岁。因本地与县城距离太远，且地亦辽阔，为政治管理所不及，最易藏匪，故改为安化厅，俾易佐治。是时正与张铁城密运革命，在（宜山）怀远创设半夜算术科。

光绪三十二年 二十五岁。三月初十日，长女慈祥生。是年四月，与张铁城赴罗城属之龙岸圩，开设竞化学堂并随营学堂。易麦秋、陈晓峰新由越南革命统领关仁甫处来，遂充任教职员事。

光绪三十三年 二十六岁。乃辞职与张铁城创办樟脑公司于柳州，并设富贵升旅馆，招纳各方面同志，如卢笙伯、王威祥、易麦秋、陈晓峰、胡俊仙、胡俊仙、晏国香、刘古香、王贯三、李德三

(山)、张品三、郑明斋、龚献之等诸同志。

**光绪三十四年** 二十七岁。诸同志聚者日众，正拟扩大发动革命，突于六月二十三日，因运樟脑赴港出售，回时暗藏枪弹于洋纱包内，被武宣厘金局查出，该县遂电稟张抚鸣岐，转饬柳州府杨道霖太守拿办。幸杨太守素重铁城，先令逸遁，乃发令缉拿。遂不辞母及妻小而别，与张铁城先后逃匿到粤，又被粤督张人俊电令通缉。铁城逃奉天，予乃更今名字(卢焘)逃龙州，经越南赴昆明，欲继续运动革命。往(时)赤手空言哪能济事？非入新军或陆军学堂，密灌革命思想于同学不为功。

**宣统元年** 二十八岁。正月十一日，次女慈明生。四月入云南陆军第十九镇机关枪营，李承邺管带幕(充司书生)职。八月，陆军第十九镇崔祥奎镇统开办随营学堂招生，遂投考肄业。

**宣统二年** 二十九岁。正月，李根源总办陆军讲武堂，复归并入，挑入兵科特别班肄业。

**宣统三年** 三十岁。八月毕业，奉派人七十三标三营后队充见习生。是月十九武昌起义。九月九日夜，云南响应反正，十二日组织军政府，公推蔡锷为都督。遂奉扎委充七十三标三营后队三排排长，十月奉委援川第二梯团步兵独立大队后队队官，出发泸州、重庆，促其反正。在泸州与川南总司令但懋辛会合时，清总督赵尔丰饮差端方被杀，全川独立。遂下重庆，与川东正都督夏之时，副都督张培爵会师北伐，正雇船待发间，适南北议和，遂止。

**民国元年** 三十一岁。元月，南北议和成立，三月乃奉调援黔。五月七日，本大队长黄毓英在黔东江口县属之野猫溪被叛兵谋害，奉贵州都督唐继尧委充大队长职。

**民国二年** 三十二岁。元月，奉委充铜松支队长。八月，熊克武、杨庶堪在重庆独立，奉命赴援。十月率队回滇，张文光在大理独立，复奉命赴援。

**民国三年** 三十三岁。二月，大理事平，坚辞回桂。四月，在柳

州奉贵州护军刘显世电调来黔。五月奉委东路巡防第一营管带。七月贵州新编陆军，委王文华为第一团团长，同月乃奉委第一团团附。是月十七日，三女慈定生。九月团长之兄伯群由沪回筑，朝夕相聚，谈及袁世凯终究要做皇帝，我等须设备反对，非练兵不足以御，乃组织模范营。唯斯时人材缺乏，乃函约滇中同学之李雁宾、胡瑛、范石生、洪鹤年、朱泽民、杨复光等人，来黔襄助。

民国四年 三十四岁。二月奉委兼第三营营长。四月模范营成立，奉委充模范营中校营长。八月筹安会酝酿。十月十七日，长子慈仪生。十二月洪宪帝制发生。即解散模范营分配于各营听候命令。

民国五年 三十五岁。元月三日奉赴东路接第二团团附。袁世凯称帝，云南首义声讨。委王团长为东路支队司令，又奉委充第二团团长，出兵漾头司与北军之师长马继曾部相持于麻阳之小村地方。后我右翼三团吴传声团长歼灭汪学谦旅于洪江，是役吴团长阵亡于芷江之望城坡，马继曾旅亦自戕，我司令官王文华率大队来援，麻阳之敌败退，我克麻阳。五月，袁世凯自毙，国会举黎元洪为大总统。奉委充贵州陆军步兵第二旅旅长，驻铜仁。

民国六年 二十六岁。九月十五日，五女慈达生。六月，倪嗣冲督军团叛变，张勋复拥宣统复辟。贵州组织护法军，奉委为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出湘西，驻辰州，与北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相御于桃源。乃与约“剿匪保商，安境息民”八字，幸蒙采纳。于是彼此各守防地，相处三年，地方人民极为相安，时誉之为陆抗羊祜再见于今日也。

民国七年 三十七岁。八月十六日，次子万水生。八年，三十八岁，仍驻辰州。

民国九年 三十九岁。八月，国会西迁，遂奉调赴渝。十月，王总司令（文华）赴沪，委代斯职。后因政变（即“民九事变”），刘督军出走，遂被推为黔军总司令。

民国十年 四十岁。四月，王总司令电轮在沪，被卵翼之部下

袁祖铭指使何厚光，刺于一品香门口。伤心哉！人心之险恶莫过于此！五月五日，孙总理在粤就非常大总统，湘桂反对，川滇坐视，唯黔首先通电承认，并筹出师改造广西。令谷正伦为第一纵队出师柳州，胡瑛为第二纵队出师南宁。随奉大总统电令为贵州总司令兼省长，并加陆军上将衔陆军中将，统辖五旅：一窦居仁、二谷正伦、三胡瑛、四张春浦、五何应钦兼参谋长。

**民国十一年 四十一岁。**四月袁祖铭组织定黔军回黔争夺政权，恐地方糜烂，人民涂炭，乃由省议会电请（袁）回来，和盘让出，不废一兵一弹，交代清楚。适部属等固不服，而滇军范石生、蒋光亮、杨希闵、杨如轩、杨池生五旅，新由滇退至黔西一带，拟以应付。遂劝彼等赴粤，奉承大总统作国家事业，勿需争此区区之城池。五月，遂带其出桂，经柳州、赴粤。九月到粤，而大总统已为陈炯明叛变赴沪矣。遂与陈商，资助回桂。乃与范石生、刘震寰商于泰安客栈：陈军漫无纪律、洪兆麟等不学无术，只知卖包子，岂能军乎？若我军一下，此无纪之军，非兽散不可。范、刘返梧进行，予则买舟赴沪转湘，与赵炎午说陈之不可助，非败不可，后果如言。

**民国十二年 四十二岁。**元月，奉大总统函谕赴沪。因铁路工潮，未克登车，延至数日，始到汉口，孙大总统已赴粤矣。遂应吴佩孚之约赴洛阳、冯玉祥之请赴南苑。二月三十日转粤，是夜正与范石生谈粤事，次早三月初一而沈鸿英已炮轰观音山，当为范石生将李易标击退，粤事渐平。四月二十四日，奉大总统聘为大本营高级（等）顾问，又委为大本营高级参谋。因接家报云家慈疾笃，不敢应命，遂买舟赴沪到汉，到汉口始得刘督军电，惊悉我母已辞世一月矣。哀哉！痛哉！当即匍匐奔丧，回筑料理丧事。暂厝于北门外普照填充后张福德隆菜园地，在家守制。

**民国十三年 四十三岁。**在家守制。十月，因黔军在渝组五路回攻贵阳，遂说滇军唐继虞督办让出黔政，率师北伐，声援卢永祥。于是星夜兼程赴渝，与袁祖铭等商，只要滇军让出，何需武力？为双

方皆听纳。十二月二十九日早，滇军完全退出，黔军随即入城维持治安。

民国十四年 四十四岁。元月，被推为贵州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不就。即取道川汉赴粤与胡代帅汉民、谭总司令祖庵面商援桂事宜。旋赴梧州，与黄会办绍竑到南宁之八塘，与李督办宗仁商应付唐继虞、龙云事，并借黔两旅援桂。五月师次独山，接胡代帅电，刘、杨已解决，可将援桂之师移作援滇。继又接李、黄之电亦云唐、龙已崩溃，所有援桂之军，请改援滇等语。查粤桂事已均平，滇无可援之必要，遂亦通电辞职。遂赴邕商开筑黔桂公路，未遂。仍返筑家居。

民国十五年 四十五岁。五月，周西成入主黔政。八月兴工开筑公路。十二月，代卜地葬母于西门之金锁桥侧高地，现改为慈母园。当承各界送碑纪念，甚为铭感，刻骨不忘。

民国十六年 四十六岁。元月，赴粤采购汽车及各种交通器具，并催促桂方动工修丹池路，以衔接黔境之麻尾、南寨之路。

民国十七年 四十七岁。致力于公路事。

民国十八年 四十八岁。家居。李燊率滇军回黔，周西成阵亡黄果树。

民国十九年 四十九岁，家居。

民国二十年 五十岁。携眷赴粤，居住于故友张伟卿邮务长宅。

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住粤。

民国二十五年 五十五岁。六月，中央用兵于桂，乃三度赴邕调和。八月，收编散军，用就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于南丹，即通电请和。九月三日，中央派程潜、朱培德、居正三大员飞邕议和，随即遣散部队解职。旋应贵州省顾祝同主席、并广西绥靖公署李宗仁主任聘为顾问。

民国二十六年 五十六岁。二月，应贵州绥靖公署薛岳主席聘

为顾问，乃携全眷返筑。

民国二十七年 五十七岁。元月，因日寇占我京沪，乃赴柳种松百余万株于东古陵。随赴前方正阳关、田家庵、信阳、合肥、徐州我军所在之地，随慰劳团往慰，五月返柳。

民国二十八年 五十八岁。二月四日敌机来轰炸筑垣，家屋被毁尽将，遂避居于小哲溪半日山庄。

民国二十九年 五十九岁。在柳照料林场。

民国三十年 六十岁，家居。

民国三十一年 六十一岁，赴柳居于赵凡妹之息尘寄庐，乃约张任民、阚德轩诸好在，拟文呈请省府转呈国府，明令褒扬先烈张鱼书（铁城）。

民国三十二年 六十二岁，仍居柳。

民国三十三年 六十三岁。五月，奉（广西）省府文转文转国府一月十一日明令褒扬先烈张渔书。七月，桂省紧急疏散，乃携李敏候、正俄两义女返筑。十二月九日，全家疏散到桐梓熊少逸二女婿家住。二十四日，因阅报惊悉至友王伯群在渝作古，随即搭车带女婿李振麟赴渝吊唁。

民国三十四年 六十四岁。元月回桐梓，阴历正月初六，偶患伤风发冷，病重卧床十数日，系斑疹伤寒，极不易治，二月以后始渐复原。五月返筑，九月赴柳，十二月下梧州（这段病情经过从略）。

## 二、卢焘将军手书选载



1940年1月23日，  
卢焘将军在广西柳州，欣  
闻中国军队在广西宾阳  
昆仑关抗击日本侵略军  
取得胜利的消息后，给远  
在贵阳的八女卢慈平介  
绍战时的情况

南北天山任吐吞  
貔貅十萬陣  
雪也一朝肅僂儈  
敵血立  
鳥昆侖嘆國魂  
石湖印泉作曲  
榮斌兄  
壬子夏六月成

不必臨澗羨平生常自  
悲嗟那肯隨波逐浪住他  
藏冲天作霖雨  
宜興沈淳款

卢燕手书李根源诗赠友人杨荣斌

卢燕手书在宜北龙潭观鱼即兴所赋诗句

卢燕将军在就任贵州抗日  
救国军总司令时，在贵州独山莫  
凤楼先生家与诸将领商议抗日  
救国大计题诗共勉

事蹟功業在社會  
不朽播石碑  
舉桂比藩屏  
範猶存名聲  
和善題

### 三、参考文献

- 1.环江县政协文史委、县志办编(覃华儒主编).卢焘烈士.(内部发行)
- 2.贵州省政协文史委编(莫健主编).卢焘将军.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
- 3.环江县政协委员会、县诗词学会编.怀念卢焘将军.(内部发行)
- 4.黄绍锋.将军死于谋害.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 5.贵州省政协文史委编.贵州文史资料.(内部发行)
- 6.环江县政协文史委、县志办、县委史办编.环江文史(1~4辑).(内部发行)
- 7.郭军宁.朱德与范石生.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 8.陶朱问.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 9.王志之.民族英烈传(1~3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 10.广西政协文史委编.新桂系纪实(1~3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 11.辛平.民国将领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 12.庚新顺,朱永来.八桂将军风云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 13.林建曾,肖先治等.贵州著名历史人物传.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 14.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编.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 15.全国政协文史委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书稿.(内部发行)
- 16.李希泌等.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4

17. 谢本书,荆德新等编.云南辛亥革命资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 谢本书.蔡锷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20. 中国少数民族知识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英才(近现代).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21. 杨天石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96

## 尾语

第一次听到卢焘将军的故事，还是我上小学二年级的那年寒假，是我的两位爷爷给讲的。

记得那是大雪纷飞临近过年的一天下午，我高兴地盼来了当时还在柳州地区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调回家乡工作）的父亲回到了家。准备好晚饭，父亲便叫我去请大爷和三爷来家吃饭，从我记事起，父亲每次回来都是这样，不管有没有好吃的东西，他都叫我去请他们两位老人到家来坐坐。我知道父亲对两位爷爷有着特别敬重的感情，因为我爷爷，也是大爷的二弟、三爷的哥哥，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乱日本”时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不到30岁的奶奶和不足5岁的父亲及两岁的姑姑，全靠爷爷两位兄弟的鼎力相助，才使我父亲一家三口艰难地熬了过来，父亲不仅读完了初中，而且还到外地参加了工作。所以父亲对他的伯父和叔叔，一生视如亲生父亲，其敬重的程度不言而喻。

我的大爷和三爷都是文盲之人，他们为何又知道卢焘将军的故事呢？话还得从那个时代的“抓壮丁”开始。抓壮丁是国民党政府强迫老百姓当兵的一种卑劣手段，即每一个家庭只要有两个男孩以上的，不管愿意不愿意，除留一个守家之外，其余必须全部去当兵，否则按违抗兵役令论处。这样，我的大爷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被抓壮丁到黔东地区当兵，1934年逃回后，1936年7月又以“民团”的身份，到南丹参加了卢焘将军组织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我三爷是20世纪40年代初得到所谓的“照顾”才在本县当县

兵(即县警),直到1948年卢焘将军回乡探亲时,三爷都还在县里参加过接待将军的警护等工作。所以我的两个爷爷,对卢焘将军的一些故事是略知一二的,当然绝大多数,也还是他们在军中听到别人的传说。

那天晚上,父亲与两个爷爷及几个叔叔,酒至半兴时,大爷和三爷就开始讲起了卢焘将军的故事。由于当时年纪还小,我只懵懵懂懂地记得他们讲:“卢焘小时候家里很苦”“卢焘打仗很勇敢”“卢焘很关爱士兵”“抗日救国军的每辆军车都插挂有‘卢’字的三角旗”“卢焘回乡不摆架子”等等。

从那以后,我就对卢焘将军有着特别的仰慕和崇敬之情,经常缠着两个爷爷讲将军的故事,直到大爷在20世纪80年末去世和三爷在21世纪初去世前都还是如此。不同的区别,只是脑记与笔记的问题了。

除此之外,卢焘将军的故事,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偶尔也听到班主任或老师蒙炳良、莫宏肖、陆永秀、莫子任等,在课堂或课外曾经讲到过。

由于卢焘将军远在贵州做事,加上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频繁,故有关卢焘将军故事的文字介绍,在当时的家乡几乎没有。我真正看到介绍卢焘将军的文章,是我参加工作后1983年秋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到环江县志办公室找朋友玩,看见他桌面上摆着一本刚从贵州邮寄过来的《贵州文史》(具体哪一期已记不清),当时我就随手乱翻了一下,其中在目录页上,我意外地发现了覃华儒撰写的《卢焘传略》一文,并快速地翻到了正文,爱不释手地浏览了一遍。我真是高兴至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约一万字的全文,我就粗略地浏览了两遍,卢焘将军从出生到外出求学到参加革命,到考入云南讲武堂与朱德同学,到护国护法转战南北,到主掌贵州军政大业,到跟随孙中山北伐,到支持红军,到致力黔桂交通建设,到为贵州的解放献出宝贵生命等栩栩如生的资料,让我这个原来

只是听到一些零零星星的口述故事的人，真是心潮澎湃。我觉得，卢焘将军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爱国爱民的将领，他不仅是我们的家乡的优秀儿子，而且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和伟人。作为将军家乡的后人，我们不仅倍感骄傲和自豪，而且应该更加努力工作，以优异的成绩，报答将军未竟的事业！

为了让更多的家乡人真正知道卢焘将军的其人其事，于是当时我就向朋友提出借书一晚，让我把《卢焘传略》全文抄录下来（当时小县城还没有复印机），拿回家乡让更多的人传阅。得到朋友的许可后，我立即把书拿到所住的旅馆，关起房门，拿饼当饭，就开始忙碌起来。经过近一个通宵的加班加点，终于把《卢焘传略》一文全部抄完。第二天，当我返回单位把《卢焘传略》手抄本交给同事们传阅时，他们都爱不释手，许多同事也都跟着抄了起来。这样经过“一传十，十传百”，我的《卢焘传略》手抄本，在不到半年内，竟在我的家乡明伦及周边的龙岩、东兴等乡镇，产生了《卢焘传略》的手抄本多达 30 多本，直至我的手抄母本最后也不知道传到哪个人的手里，至今下落不明。

1987 年 11 月，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成立前夕，由县政协文史委、县志办与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覃华儒副所长，共同编写的纪念卢焘将军文集《卢焘烈士》一书印发后，使我从中更多地了解到卢焘将军生前叱咤风云的事迹。在这本集子里，不仅有国内外各界人士怀念将军的文章 20 多篇、挽联挽词 50 余帧、照片 18 张、将军遗作 12 篇，而且还有孙中山大总统给将军的任命手令两帧、朱德总司令给将军的题词，以及朱德总司令、李济深副主席给将军的悼念唁电、国家民政部给将军颁发的国家级《烈士证书》等，全书信息量大，史料宝贵，内容丰富，第一次看到这样正式介绍将军的专集，真是让我如获至宝、兴奋异常。

特别是在 1987 年 11 月 23 日至 27 日自治县成立的庆祝活动期间，作为时任县委宣传部新闻干事的我，又荣幸地被大会筹备领

导小组安排接待和采访，应邀回乡参加县庆活动的将军子女及亲属，并全程陪同他们前往将军的出生地明伦街参观访问。这次应邀回乡参加县庆活动的将军子女及亲属共有 12 人，他们分别从广州、上海、贵阳、柳州、宜州等地赶来。在几天的活动中，我先后采访了将军的长子卢慈仪、五女卢慈和、长外孙覃栋梁及族婿覃华儒等人，第一次零距离接触了将军的亲属，了解到将军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根据当时的报道安排，我所写的将军亲属回乡参加县庆活动的消息和小通讯两篇稿子，均于次月先后在《河池日报》和《贵阳晚报》上发表。

自从有了将军生前丰富活动和事迹的线索以后，我对将军的研究就更有了兴趣。1988 年 9 月，通过成人高校考试，我以全县第三名的高分，被广西区党校民族班大专政治专业（原于 1978 年恢复高考第二年考入中等师范学校）录取，成为一名在职带薪脱产深造两年的党校学员。到南宁读书后，我觉得比在县里工作时间宽松了许多，每天除了上午 4 节课和个别下午有课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室、宿舍自学，或是到图书馆浏览报纸杂志，或查阅有关资料等。由于有了这样良好的学习环境，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萌动了要把将军的事迹，以纪实的形式，全面、系统、完整地写成一本书的念头，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将军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就这样，从那时起我就根据《卢焘烈士》一书文中资料欠缺比较多的重大部分，利用休息日、节假日到本校图书馆、广西图书馆、广西通志馆等，有针对性地查缺补漏，如将军青少年时代在庆远求学和参加革命部分，到云南考入昆明陆军讲武堂和参加重九起义部分、援川援黔部分、湘西护国护法战争部分、代理黔军总司令部分、出任省长部分、统率滇黔大军挥师南下部分、在广州协助孙中山击退陈炯明部分、致力交通建设部分、三度赴邕调停蒋桂矛盾部分等。此外，我还利用假期和后来毕业回到单住上班出差的机会，先后到南京、长沙、贵阳、昆明、广州、重庆及湘西的麻阳、沅陵（古称辰州）及黔

东的铜仁等地的档案馆、县市志办,查阅有关佐证资料。在将近 20 年的资料搜集和采访中,我先后共阅读(含网上资料)了有关卢焘将军史料的文章约 150 多篇、涉及的文献书籍近 90 本,所做的摘录笔记和卡片 5 本约 2.6 万字,复印资料约 3.8 万字,采访知情老人 20 多人次。但从南宁毕业后,由于工作的频繁变动,加之公务繁忙,使将军之书一推再推,迟迟不能动笔。当然,在这十多年里,我始终忘不了要完成这本书的信心和决心,先后也陆续写出了有关章节的小文章寄发有关报刊发表。如 1992 年写的《卢焘将军营救韦拔群的前前后后》在《广西党史研究通讯》上发表;1995 年写的《卢焘将军与宜州》分别在《河池日报》(连载)、《宜州文史》、《环江文史》上发表;1988 年写的《谋杀卢焘的祸首——刘伯龙的下场》在《河池日报》上连载发表;2007 年写的《卢焘将军传略》和《卢焘将军指挥护国护法两次重要战役纪实》,在《河池日报》综合连载发表。十多年间,累计发表有关卢焘将军的文章近 5 万字。

然而,真正促使我下决心写《布衣将军卢焘》(简称《布》,下同)这本书的时间,是 2007 年“五一”长假期间。当时,放假在家休息,我就着手写了《卢焘将军传略》和《卢焘将军指挥护国护法两次重要战役纪实》两篇稿子。在写这两篇稿子的过程中,我觉得材料非常丰富,写起来真是左右逢源,轻松自如,仅一个星期两篇稿子约 3.3 万字的大样就出笼了。这样,我认为写《布》全书的时机也已成熟了,于是决定在理完这篇稿子的后期修改后,立即着手谋划《布》全书的写作提纲及腹稿了。

但事与愿违,5 月 9 日下午下班后,我突然接到了继母(吾母黄锦荣早于 1991 年 11 月 11 日病逝,享年 53 岁)打来紧急电话,说父亲(父亲因病已退休 13 年)病重已送到镇卫生院治疗,但疗效不佳,院方要求立即转院。接到电话后,我连晚饭都顾不上吃,立即飞奔环江县城等候父亲转至环江医院治疗。由于家乡地处偏僻,道路崎岖,护送父亲转院的救护车,直到深夜 12 时才赶到环江医

院。经过一夜的抢救，在父亲的病情有了相对的稳定之后，次日上午我又将父亲转至在宜州的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父亲转到宜州治疗后，虽然表面上病情有了相对稳定和好转，但我知道他这次病情不同以往的那几次那么轻，所以我心里很乱，也没有心机再考虑《布》的写作谋划了，只好又把此事暂搁起来，每天都忙碌于单位工作和医院照顾父亲之间。但忙碌归忙碌，孝心归孝心。尽管经过院方多方的全力治疗，但由于父亲的病情过重，他只在医院呆了32天，就于6月12日下午5时58分走完了他人生71年的历程。在单位领导、同事和老乡、朋友，以及亲戚和乡亲们的关怀和帮助下，我们弟妹6人终于按照父亲他老人家的意愿，将他送回老家入土为安。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我从悲痛中走了过来。在工作之余，我又想起了未完成的《布》一书的责任所在。7月18日，经过反复酝酿和推敲，《布》一书的第一期工程“写作提纲”，终于在平静中“动工”了。经过整整10天的冥思苦想，共30章192节的写作提纲第一稿终于出笼。后来经过中共百色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刘先明，河池市教育局长蒙权，环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继纯，原环江县人大副主任、副研究员蒋志雨，贵阳学院副教授唐永贵，环江县党史办主任、副研究员谭鹏星，环江县广播电视台台长卢万举，宜州市广播电视台副局长、主任记者韦云学等同志的过目润色和建议，最后几经修改终于成为现在的28章125节，总字数拟写20余万字左右。

敲定了写作提纲，接下来就是全面启动全书最浩大的工程——正文写作。从8月1日开始，在不影响单位正常工作的前提下，我坚持利用早上上班前、午休、晚上、双休日等时间进行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坚持抢抓时间，一鼓作气，对于不必要的应酬，能推掉的就推掉，实在不能推掉的，则作一般应付，争取及早退场，抓紧时间安心写作。在具体的时间安排上，则重点抓住上班时间的晚上和双休日。如每天吃完晚饭后，我就开始拿笔写到深夜1~2点钟才休息；而双

休日则更不用说了每天从大清早到深夜基本上都窝在办公室里写作,中餐晚餐大都是叫来快餐解决;其他上班前、午休等一点点空余时间,也充分利用,分秒必争。8月23日,在全书写作过半时,我曾几次电话联系将军之子卢慈仪有关送稿审阅事宜,但都无人接电话,后来通过与其亲属联系才知道,将军93岁的公子已于前几天的16日在广州仙逝。对此,我曾默默表哀,非常惋惜。经过满满一个月的加班加点,平均每天以5760多字的写作速度,终于完成了全书第一稿17.88万字。

此后,接着打印、校对、出样,修改、补充、出样、校对,再修改、再补充、再出样、再校对……如此反复八次,可谓“十赐其稿”,千锤百炼,最终才形成今天全书正文26余万字的结果。为了《布》一书尽早与广大读者见面,几个月来,我寝食不安,全身不仅熬掉了6斤肉,而且头发也白了不少,还有不少人嘲笑我花那么多精力和财力,去为一个民国老人树碑立传不值得,但我觉得自己能为宣传和弘扬一个具有爱国爱乡爱民精神的壮族优秀儿子出点力量是值得的。因为,像卢焘将军一样,千千万万为国为民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们,都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和宝贵财富,同时也是壮族人民的自豪和骄傲。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弘扬爱国爱乡爱民的壮族优秀传统,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大、更加美好。

《布》能够顺利完成了资料搜集、采访、写作、打印、校对、修改、补充、完善、出版、发行等工作,都凝聚了方方面面的力量。如除在文献的参考上,还在资料搜集和采访中,得到将军的子女及亲属卢慈仪、卢青还(卢慈仪长女)、覃栋梁、覃华儒、卢峰、覃栋云、郭忠凯等人的大力支持;在写作、打印、校对、修改、补充、完善等方面,除了前面提到对写作提纲提出宝贵意见的8位同志外,还得到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贵州省消防总队后勤部部长覃胜大校,贵州省政协常委兼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姚鍾伍,原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研究员范同寿,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建曾,贵州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方家印,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贵阳办事处副处级干部梁仲刚,贵州省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处长莫仕标等同志,对全书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同时还得到了河池日报社长、总编辑石峰,环江县人民政府县长蒋向明,河池日报主任罗宗肯,作家黄绍锋(河池日报)、何述强(广西文联)、谢树强(宜州市文联),宜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黄庆军,宜州市广播电视台局长牙运良、副局长杨镇,宜州市志办主任王立高、主任科员邱伟华,以及宜州市广播电视台局、广电网络宜州分公司施杨洛、郑媛珍、王伟盛、韦文清、刘芳、瞿朝宁、陈建强、温宜纯、黄春宁、黄胤森、姜丽雯,环江县委宣传部记者卢增令,环江县广播电视台记者莫琨飞,广西维尼纶厂实验高中韦荣臣、市保洁公司梁继赋等人的鼓励和帮助;在出版发行上,得到了广西民族出版社张丹竹主任、黄丹编辑以及广西、贵州有关新华书店及众多亲朋好友的鼎力支持;特别是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河池学院党委书记、教授银建军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时任新华社广西分社社长、高级记者杜新(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广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分别为本书挥毫题字等。借此机会,谨让我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本人学识浅陋,加之出书时间仓促,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但难免仍有错漏,敬请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08年11月19日  
匆匆写于广西宜州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IyNTU0NjQuemlw",  
  "filename_decoded": "12255464.zip",  
  "filesize": 48056857,  
  "md5": "2bd360b5c4f956de887837b8f08f8a65",  
  "header_md5": "149b10050c3fbf30d07afe19bf88cfa6",  
  "sha1": "cae6d6f186019cccd6f5265b6f13dc94a5281f49c",  
  "sha256": "7bb3436bb832d26976a152111c6b0ef7a176f4010e165b9ca1440f6b9e730c77",  
  "crc32": 1645253336,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51484747,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343,  
  "pdg_main_pages_max": 343,  
  "total_pages": 367,  
  "total_pixels": 147847564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